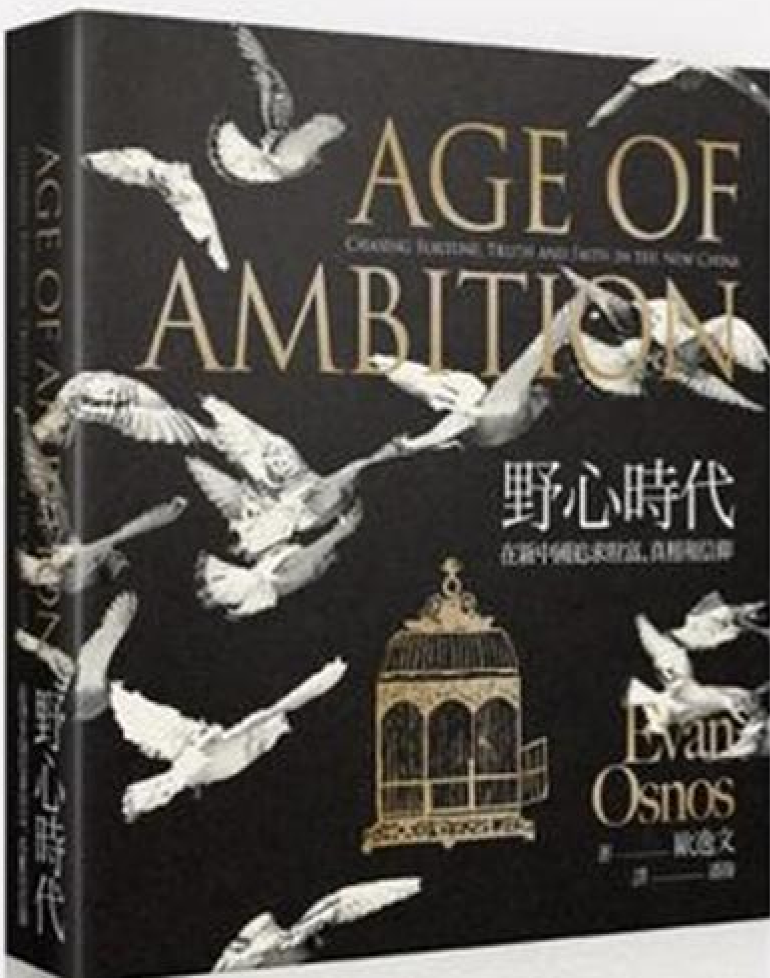

AGE OF AMBITION
野心時代
Evan Osnos
歐逸文
2014 美國年度 國家圖書獎
全球唯一指定中文版！
繼何偉（Peter Hessler）之後，
普立茲新聞獎得主 歐逸文 Evan Osno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野心時代

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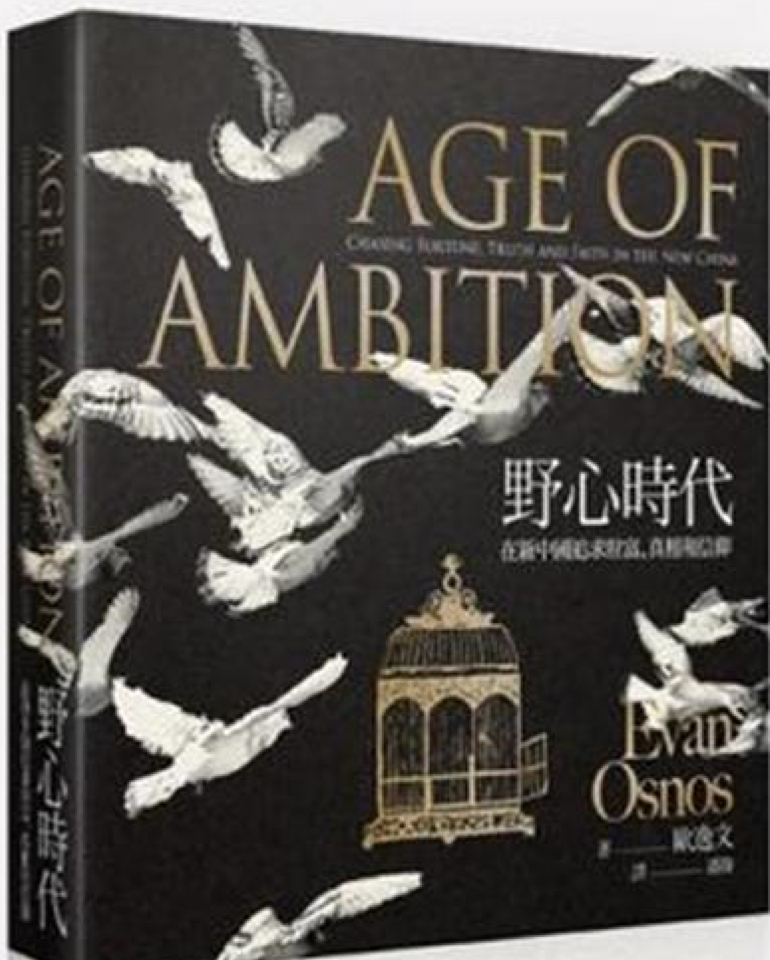


Evan Osnos

著 —— 歐逸文

2014 美國年度國家圖書獎 —— 全球唯一指定中文版!

繼何偉(Peter Hessler)之後,
普立茲新聞獎得主 歐逸文 Evan Osnos


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野心時代
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
Evan Osnos
歐逸文
2014 美國年度國家圖書獎
全球唯一指定中文版！
繼何偉（Peter Hessler）之後，
普立茲新聞獎得主 歐逸文 Evan Osnos

目錄

序

第一部財富

第二部真相

第三部信仰

序

1
2
PARTI財富──
０１.鬆綁
０２.召喚
０３.文明的洗禮
０４.心靈的胃口
０５.不再是奴隸
０６.割喉
０７.任重而道遠
PARTII真相──
０８.戴銬而舞
０９.自由引導著人們
１０.奇蹟與魔法引擎
１１.獨唱團
１２.抵抗的藝術
１３.七項判決
１４.雞舍裡的病菌
１５.沙塵暴
１６.電閃雷鳴
１７.發光的東西
１８.硬道理
PARTIII信仰──
１９.精神空虛
２０.視而不見
２１.靈魂之舟
２２.文化戰爭

２３.真正的信徒

２４.突圍

結語

3

第一部財富

Chapter1鬆綁

時值1979年，5月16日。天上月細如絲，在中國外島的金門，26歲的陸軍上尉溜離崗位，來到岸邊。他行動時儘可能安靜，爬過矮樹叢來到俯臨海岸的突堤。若是他的計劃被識破，他就會蒙羞乃至被處決。

這名上尉時名林正誼，是名模範軍人、台灣陸軍最受推崇的年輕軍官之一；台灣這個島嶼省份正由中國共產黨的對手統治。30年來，台灣拒絕共產黨的統治，而林上尉則是那股反抗力量的象徵：讀大學時，他是明星學生，放棄平穩的百姓生活，加入軍旅，這種決定十分罕見。後來當上台灣總統的蔣經國與他握手，加以表彰，合照刊滿報紙，讓林變成“反攻大陸”夢想著奪回中國本土的看板男孩。

林正誼身高將近六英尺，身材挺拔，鼻子寬平，罐狀耳由軍帽沿突出來。他棄筆從戎，讓他取得在前線最敏感地點當連長的差使；這個葡語拼音成Quemoy的小島用中國官話通稱為金門，隔著約一英里的海水，與中國大陸岩岸對峙。

只是林上尉心中的這個秘密，對他及家人是如此危險，以至於甚至不敢洩露給他妻子；林妻在家帶兒子，肚裡還懷了第二個孩子。林正誼已經意識到身邊累積的歷史使命感。在動盪30年後，中國正在呼籲台灣人民與“偉大祖國”團結統一。任何想叛逃到大陸的軍人都會被當場射殺。雖說後果很清楚，真試著那麼做的人極為罕見；最近一案發生在不到一個月前。但林已聽到了“召喚”。他相信，中國將再度繁榮，而他將與中國一起成功。

他在昏暗中找到那條沙徑，帶他平安走下布滿地雷的山丘。海風吹得滿是樹瘤的松樹、木麻黃都彎了腰。那一帶海水，白天碧綠晶瑩，但此時是無止境的漆黑一團，隨著浪濤起伏升降。為了防止入侵，海灘都裝設了長長的金屬反空降樁，由沙堆突出來，朝向大海。

就在林上尉離開樹木邊緣、衝往海邊之前，他鬆脫鞋帶，赤腳走在土石之上。他已準備要拋棄同胞、家人，乃至自己名字。

事實上，試著游過該水域的其他人走的都是相反方向。1979年，中國大陸是一塊人們都想逃離的地方。

18世紀時，帝制中國控制著全球1/3的財富；其最先進城市的商業化及繁榮程度絕不亞於大不列顛及荷蘭。只是到19、20世紀，中國因外國入侵、內戰及政治動盪而國力大傷。1949年中共掌權後，進行“土地改革”，把中國小塊的家戶農田群組起來，導致殺了幾百萬名地主以及中共認定的敵人。1958年，毛主席發動“大躍進”，想讓他的國家騰空而起，只要15年就可以超越英國。有些謀士跟他講，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毛無視而且羞辱他們；國家科委副主任范長江因此跳窗而死。政治宣傳者稱頌一項又一項荒誕不經的糧食大豐收，稱其為“放衛星”，與蘇聯發射人造衛星的成功等量齊觀。但那些數據是捏造的，隨著饑荒的蔓延，很多抱怨者們被施刑折磨或被殺害。黨禁止人民離鄉找食物。毛的大躍進導致全世界最慘的大饑荒，死亡人數在3000萬到

4500萬之間，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多。林上尉由台灣叛逃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比北韓還要窮，人均所得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1/3。

4

此時鄧小平當上中國最高領袖還不到6個月。鄧時年75歲，是個能說服人但樸實無華的政治家，而且是個倖存者——屢次被毛主席整肅離開領導群，兩次謫居於北京之外。往後的歲月裡，鄧經常被描述成中國後來經濟勃興的唯一設計師，但那種觀點是黨御用的歷史學家打造的成品。鄧了解自己知識的極限，經濟事務上，他最精明的招數是聯合陳雲——陳雲也是黨的元老，他如此懷疑西方，以至於他歡迎的改革思想乃是重讀列寧著作《帝國主義論》而衍生的；鄧還聯合趙紫陽——趙是黨內年紀較輕的進步派領袖，他千方百計減少貧窮，因此在農民間流傳一句諺語：“要吃糧，找紫陽”。

變革的發生，乃是來自基層。在內陸村莊小崗村，當地農民前一年冬天因毛的經濟願景而如此貧苦悽慘，以至於他們停止澆灌公社土地，靠乞討為生。在絕望中，18名農民分割土地，各自耕種；他們自設時程，除了政府要求的配額賣給政府外，無論剩下什麼，他們都賣到市場上去以收穫利益。他們簽下了生死狀，面臨逮捕時，要彼此保護各自的家人。

到了來年，他們的收入比起以往要多達將近20倍。他們的實驗被發現時，有些黨特務指責他們“挖社會主義牆角”，但更賢明的領導人允許他們的計劃進行下去，最後還推廣給全國8億農民。這個人稱“包產到戶”的收益傳播得如此之快，有位農民把它比喻為雞舍鬧雞瘟，“一家的雞糟了瘟，全村都會染上；一村得

了，全國都會感染。”

鄧與其他領導人不時爭吵，但是鄧的領袖魅力、陳的謹慎慢行、還有趙的能幹，三者結合取得驚人的成功。他們創造出來的模式撐持了幾十年，叫“鳥籠經濟”，誠如陳雲所稱，空氣夠流通，足以讓經濟茁壯，當又沒那麼自由到讓它成為脫韁野馬。大佬們年輕時是革命黨徒，曾監督處決地主、抄沒工廠、打造出人民公社；可現在他們把整起革命顛倒過來而保存住自己的力量：允許民營企業，向外在世界開一扇窗，哪怕誠如鄧所形容，會有“幾隻蒼蠅”飛進來。中國的改革沒有藍圖，其策略如陳雲所述，乃是前進而不失控制——“摸著石頭過河”。（免不了，鄧因為這種修辭形容能力而得分）。

1979年，黨宣布不再把人民貼上如“地主”、“富農”的標籤，接下來，鄧小平把最後的汙名除掉。他說：“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黨把經濟實驗擴大。官方表面上說，私營企業獲准僱傭不超過8名員工——馬克思相信，企業有8名以上員工，就會有剝削——但最後小型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其速度之快，以至於鄧小平對南斯拉夫特使團說，情形“彷彿有支陌生軍隊突然憑空出現”。他不居功，“這不是我們中央政府的成就。”

遍及整個中國，人們退出曾宰制他們生命的集體農場。他們談到這件事時說，自己獲得“鬆綁”——這個詞彙較常用在囚犯或野獸獲釋。他們開始談論政治及民主。但鄧小平不是毫無限制。1979年3月，林正誼展開其大陸冒險前不久，鄧才對一群黨的高官演講，下令說，“我們能夠允許這種公開反對憲法原則的‘言論自由’嗎？”黨絕不會擁抱“個人主義民主”。經濟自由可以有，但政治要有控制。中國想繁榮壯大，“心靈的解放”必須要有限制。

變革開始在大陸鞏固時，林正誼由遠方觀察它。他出生於1952年，也就是台灣與大陸展開政治與意識形態對峙後三年，對峙還持續了幾十年。1949年，中國國民黨在內戰輸給共產黨之後逃到台灣，宣布全島戒嚴，而且理論上準備有朝一日重掌中國政權。

5

台灣生活很困苦而且設限頗多。林生長在宜蘭肥沃的河口三角洲小鎮。他的祖上為更早來自大陸的移民，已傳數代。國民黨部隊來台後，把這些早期移民視為低階級者，政治上不可

靠，而且就業與教育歧視既深且廣，這些台灣人也是受害者。

林正誼之父林火樹開一家理髮店，母親則替鄰居洗衣裳。一家住在鎮子邊緣的簡陋房子裡。只是林父把中國古代科學與治國之道傳授給子女，何以中國文明一度如此先進，早在古騰堡（Gutenberg）之前400年便開始印刷書籍。他大聲朗誦古籍如《三國演義》、《西遊記》等給孩子們聽，把中國復興的夢想灌注到他們體內。他把第四個兒子取名為“正義”。

林正義很小時便好奇，中國歷史雖然光輝，為什麼他家只能勉強餬口。林回憶說，他哥哥從不向母親問有沒有午餐，因為那個問題讓人不舒服。“他會彎腰看灶。灶若是暖的，意味著我們就有午餐。”不然呢，他們就餓肚子。對林來說，這個經驗培育出極為務實的傾向。最後，他主要以歷史及經濟為透鏡，來打量人類尊嚴的課題。

他十來歲時的重心曾放在有關工程的故事，即中國古代領袖李冰的事跡；李冰是西元前3世紀的蜀郡郡守，服職於現今的四川省，他著手想控制住致命洪水，於是投注8年時間開鑿穿過山丘的水道。他靠著數千名民工，用稻草燒岩石，再用水來冷卻，而讓石塊裂解。結果建成一套灌溉系統，他是如此龐大、持久，以至於都江堰經常被比喻為世界奇蹟；他把全國最窮的地區之一轉化成富饒之境，四川迄今仍以“天府之國”而聞名。

林正義是林家諸子中最有出息的，1971年，他考進國立台灣大學農學系，主修水利組。為了付他的學費，三個哥哥輟學到他爸爸的理髮店工作。林進入台大時，校園裡正因台灣與中國大陸前途而辯論得如火如荼。長年來，台灣年輕人被教育以大陸是由“共匪”及“兇寇”在統治。國民黨用這一威脅正當化自己實施的戒嚴法，並犯下大量侵犯人權的罪行，鎮壓政治對手還有共產黨同情者。

但林進入大學之際，台灣的地位正在崩蝕。1971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造訪北京，大陸取得影響力。同年10月，聯合國投票剝脫了台灣在聯合國大會的席次，轉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大陸政府是中國人民的合法代表。在此氛圍中，林正義找到了自己的發聲點。他當上一年級學生代表會主席，一個最熱誠的台灣年輕人誕生了。在一場名為“反對共匪混入聯合國”的座談會上，他拿起麥克風呼籲全島進行抗議，此一想法在戒嚴時期是如此的激進，就算他的同伴們也無法挺身支持。在另一起事件裡，他矢言絕食抗議，直到校長勸他停止。

當林正義宣布他要轉學去讀陸軍軍官學校時，他對記者們

說：“若是我從軍的決定，能激起每個年輕人的愛國心……那麼其影響則難以估計。”林也有實際考量：讀陸軍軍官學校免收學費，還有補貼。

讀大學時，有一天在朋友的家，林正義見到一位名叫陳雲英的年輕女子；她也是政治活躍人士，在國立政治大學主修文學。他倆畢業後就結婚生子。林花了兩年攻讀企業管理碩士學位，接下來獲派到金門帶領連隊；金門在冷戰時代以“自由世界燈塔”而聞名，原因在於它是挺立於共產大陸海岸線前的最後一小屑土地。鑑於國共兩方守軍曾炮轟彼此如此猛烈，台灣軍隊把金門島的山丘挖成蜂窩，設置碉堡、地下餐廳，還有深深挖進花崗石山的一座醫院，目的是讓金門能撐過核武器攻擊。

6

林正義下部隊後改名“林正誼”，他1978年抵達金門時，戰爭的心裡成分已大於具體行動。兩邊軍隊依然用大炮互相轟炸，但只是按表操課：大陸單打雙不打；台灣則在每週剩下的日子還擊。雙方大多數心血用在打政治宣傳戰，用巨大、高功率的喊話器轟炸，還用熱氣球投擲傳單。他們把撞球大小的玻璃容器放進海水漂到對岸，裡頭塞滿物資，旨在用發財的希望誘惑投誠者。台灣這邊動用美女照、描寫外在世界的微型報紙、乾淨內衣褲、流行音樂卡帶、如何建造簡單收音機的說明，另許諾金幣及名譽，給任何有意投誠的人。大陸則回敬以美酒、茶、哈密瓜，還有小冊子，裡頭是叛逃到大陸而微笑的台灣外交使節和科學家——共產黨形容這是“棄暗投明”。

1978年12月，美國總統卡特宣布正式承認北京的共黨政府，切斷與台灣的正式外交關係。這條消息葬送了台灣島還能奪回大陸控制權的任何希望。在台灣，誠如一位記者形容，人們“緊張得如像穿過大街的貓，而當時交通越來越糟。”1979年元旦，北京政府宣布停止炮擊金門，而且放送一則對台灣人民的呼籲，“光明的未來……屬於你和我。與祖國統一的神聖任務，歷史已交給我們這一代。”中共宣稱，“建設即將在祖國大力展開。”

2月16日，林被奉派到更接近大陸的地方，名叫馬山，接掌這個小小前哨站的指揮權，當地頗為寂靜、強風吹拂，在阿兵哥當中夙稱“宇宙的前線”。馬山連長地位顯赫，但根據軍方調查說，林非常憎恨這項差使，原因是他被放逐在外島，而他本可以到陸軍官校教書，或者考試晉升到更高的官階。而現在，他的哨站只是達官要人想在前線與愛國阿兵哥合照的最愛場合。4月，他返台探親尋友；有一個晚上，他對一位大學同學張嘉生

（音）說，他相信唯有大陸興盛，台灣才會繁榮。

回到馬山，林的所在地與大陸如此之近，他由雙筒望遠鏡就可看見人民解放軍戰士的臉。他的思想已經開始大轉彎。雖然台灣跟共產黨是仇人，但一般人認為，他們是同一族裔分割為二，擁有共同的歷史及命運。誠如美國內戰時代，有些家族具體上被分隔開來。有一個案例指出，就在共產黨切斷船運交通之前，有位台灣母親派他兒子去大陸採購，結果無法回家達40年之久。

在兩岸分裂的前幾年，有些士兵曾試圖游泳到大陸，但金門列島海流洶湧，叛逃者經常被海浪沖回來，筋疲力盡，然後以叛國賊之名被捕。為了嚇阻其他人，軍方摧毀了金門島大多數漁船，少數留下來的幾艘也要求在夜裡鎖住船槳。那些年代，任何可以轉化為漂流裝置的東西，比如籃球、腳踏車胎，都得登記，好比武器；而且軍方還會環島抽查，到家家戶戶敲門，下令查看所有球類、內胎有沒有好好保管。

早在1979年春天，有位阿兵哥罕見地叛逃，但也一樣被捕。為此，林正誼依舊沒退卻。他相信自己的計劃更為周詳，但他打算把自己的叛逃對長官的影響化到最小。按時程，他在5月將被安排由馬山調到另一個指揮哨，他相信自己若是在交接期叛逃，高階軍官們就有藉口互相指責漏失線索，而避免大多數責難。春天的金門島恰是霧季，濕暖空氣與海上冷空氣相碰，遮覆住海岸線，如灰色簾幕，霧氣之厚正好隱藏一個人潛入海浪的身影。

春季來臨，海流每天在逐漸加強，到了夏天就強到足以把人推到海岸，而無論他與浪濤搏鬥得有多厲害。林正誼要是想游往大陸，立刻就得走。

5月16日早晨，林正誼在指揮哨。他向連上的文書廖正朱（音）要了最新的潮汐表。高潮在下午4點，接下來開始退潮。

日落之後，當天晚上林到營部開會，再返回馬山吃晚餐。8點30分，一名叫佟清耀（音）的文書兵來到林的餐桌前，報告說他要去營部接一名新兵。1小時之後佟返回連上，但林已不在食堂。

他也不在兵營裡。到了夜間10點50分，來自師部的兩名上尉在日誌上登記他缺席，組織搜查隊。到了午夜，司令官開始發動全島搜索——部隊裡叫做“雷霆演習”——派了10萬人，軍民都有，男人、女人乃至小孩都在內。他們打開農人穀倉，用竹竿戳進池塘。接下來搜索隊發現了第一個線索：由馬上到海

邊的雷區小徑盡頭，找到了他的運動鞋，印有“連長”兩字。他們搜索了林的房間，發現有幾件東西不見了：一隻水壺、一個羅盤、急救箱、連旗，還有救生衣。

但當時，林已遠遠把他們拋在後頭了。他由指揮哨動身，只需跨越300公尺就抵達岸邊的棕褐色大圓石群，他從那裡滑入浪中，海的力量就會把他拉離金門陸地。他還採取另一重要步驟：根據軍方調查，他游泳叛逃前兩天，曾檢查沿岸的入口哨，跟守望地平線的年輕義務役士兵談話。他跟他們談到一則老笑話：若是在夜裡，你看見沒有跡象會攻擊你的游泳者，不必麻煩去射擊，他們可能只是“水鬼”；而若是你開槍了，等於誘惑他們來報復你。惡兆及鬼魂的迷信在台灣很盛行，而長官隨意地講述一下，很可能就足以讓緊張兮兮的十八、九歲阿兵哥，對暗夜大海上神秘的影蹤要不要發布警報，三思而行。

來到水中，林正誼奮力快游。海水拉扯著他，但很快他就離開淺水區，獨自位在暗黝的深水區了，周遭只有海水與天空。他只消游到小海峽的中間，接下來漲潮就會帶他走完剩下的路程。

他先用自由式游到力氣耗盡，再改成仰式漂浮著，等力氣恢復。3個小時之後，他的兩腿直打抖，因水溫低而變得麻木，但他已接近陸地了。那裡是中國土地的最東端——角嶼。角嶼只有60英畝大，唯沙地與棕櫚樹叢而已，除了中國戍衛哨所及大炮，無人居住。他曉得岸邊布滿地雷。他伸手探進衣服，裡頭有包密封的塑膠袋。那是個手電筒，他用冰凍的指頭摸索著按鈕，啪地一聲打開後，他向人民解放軍發出信號，而他們開始集結於岸邊。

林抵達淺水區時有很多嚮往：共產黨的小冊子裡保證，投誠者會受到英雄式歡迎，還有黃金及現金獎勵。但是在黑暗中，只有一名中國士兵蹚進水裡，逼近林正誼，然後逮捕了他。

Chapter2召喚

每回往中國一遊，起因都是“地心引力”的故事。出生在天津傳教士家庭的美國作家赫西（JohnHersey）把它稱為“召喚”。

大學一年級那年，我閒逛到現代中國政治史的導讀課程：革命與內戰、毛主席悲劇般而變化多端的力量、鄧小平的失勢與得勢，還有他如何帶領中國走出鎖國，進入世界。那時，距離89年示威過去才5年；當時廣場上的學生，年紀只比我大一點，在黨的權力要塞裡建起一座帳篷之城和國中的迷你國，以

脈搏狂跳的理想主義而鮮活。從電視8

上看，他們看來在東方及西方之間搖擺不定；他們頭髮蓬亂，帶著行動音箱，高喊著美國人亨利的“不自由毋寧死”等口號，但他們也大唱國際歌，跪著把自己的請求呈給身著筆挺中山裝的要人。有位學生示威者對記者說：“我們要什麼，其實我並不清楚，但我們就是要得更多。”他們的運動在6月3到4日深夜裡血腥結束；當時官方擴音器大喊，“這裡不是西方，這裡是中國！”政治局派遣人民解放軍對付人民，是其革命以來的第一次。黨對成功鎮壓這起對政權的挑戰，覺得很自豪，但也了解此舉對黨的形象大有損益，於是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有系統地把那些事件從歷史裡抹掉，只殘存著幽靈般的輪廓。

等我對中國產生興趣，便搭機到北京，並花了半年學習北京官話，那是1996年。北京城令我震驚。攝影鏡頭從未能夠傳達的是：不管在精神還是地理上，它酷似朔風橫掃蒙古大草原的程度，遠大於霓虹四射的香港。北京聞起來，像煤、大蒜、工作汗漬羊毛衣與廉價菸草混合的氣味。在一輛浮話連天的計程車上，車窗全閉而熱氣蒸騰，這個城市的氣味會直卡到你的上顎和鼻底。北京群山環抱，卓然高於華北平原地勢之上，到了冬天，由成吉思汗故國颳起的強風便呼嘯而下，鞭打在你的臉上。

北京當時很乏味，噪音煩人。最好的建築之一是“建國飯店”；建築師自豪地描述它乃是美國加州假日酒店的完美複製。中國的經濟總量要小於義大利。感覺上距離鄉下並不遠。大多數晚上，我在名叫新疆村的穆斯林區吃飯，當地住著來自中國遙遠西部的維吾爾族人。他們開的灰磚餐廳很小，門口綁著提心弔膽的綿羊，到了晚餐時間，那些動物就會一頭接一頭消失於廚房。每天顧客散去後，店小二跟廚師就爬上餐桌呼呼大睡。

網際網路兩年前才抵達中國，但當時每100人只有5條電話線。我由美國帶來一根傳輸線，把它插進我宿舍的牆壁，機器爆出“啪”的一聲，就沒有反應了。

我第一次去天安門廣場，站在廣場中心四面環顧，三面分別是毛澤東陵墓、人民大會堂及天安門。當然沒有一絲示威的殘痕，而且，自1977年毛的遺體塗上防腐劑並放進玻璃棺以來，廣場一無變化，身為老外，我發現自己實在忍不住不去凝視那些中共建造的史達林式建築物。那年夏天，《紐約時報》刊了篇標題為《長征到無關痛癢》

（TheLongMarchToIrrelevance）的文章，文中說，“一度無所不在的中國共產黨，幾乎已無蹤影。”

廣場的另一邊倒是獻給了未來：那裡有個巨大的數字鐘，高50英尺，長30英尺，計時到秒，頂上文字寫道：“中國政府收回香港主權。”不到一年，英國政府就要按日程歸還自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敗北後，英方控制的香港群島。中國人深恨那段被侵略的歷史，誠如他們形容，被列強“瓜分”。所以香港的歸還，象徵著恢復了中國尊嚴。時鐘底下，中國遊客們在拍照，而當地報紙則報導，許多新郎新娘站在數字鐘底座旁拍結婚照。

香港回歸滋養了一股愛國熱潮。改革、西化進行20年後，中國作家開始掉回頭，排斥好萊塢、麥當勞及美國價值。那年夏天有一本暢銷書叫《中國可以說不》，執筆人是一群年輕知識分子，他們譴責中國“痴迷於美國”，作者們主張，中國人因為攝食於簽證、外援及廣告組成的“三餐”，已壓抑了民族想像。中國若不抗拒這種“文化絞殺”，就會變成“奴隸”，讓外國入侵的羞愧歷史延續下去。這些觀點儘管是支持政府，但北京當局對其傳播迅速所導致的不安，表現得很躊躇，最後把該書下了架。但沒過多久，一堆模仿之作便冒出來，想操弄相同的情緒：如《為什麼中國可以說不》、

《中國仍然可以說不》及《中國應該永遠說不》。那年秋天，中國慶祝十一國慶，我正在當地。國營媒體《人民日報》刊登社論提醒大家說，“愛國主義要求我們熱愛社會主義制度。”

兩年後，我回到中國，進北京師範大學就讀。我對該校的了解大多來自1989年的史實：當時北師大是最積極參與示威的大學之一；有好些日子，全校9成的學生都上廣場抗議。但當我來讀書時的那年夏天，我碰到的任何人，其最迫切想做的事便是滿足被壓抑的消費欲望。變化如此之大，怎麼誇張形容都不為過。社會主義全盛時期，有部電影名叫《MustNeverForget》，內容講述有個人是如此渴望一件新的羊毛西裝，以至於最後發了瘋。但現在中國出現《精品購物指南》這樣的雜誌，主打的內容例如《離婚之後，房子歸誰》。有篇文章談論飲料，其中一則條目是“選擇喝蘇打水的男人”，文中解釋說，“眾所周知，這類男人自尊心強烈、有想法及野心，幾乎不能容忍白開水。”

中國政府跟它的人民達成交易：用繁榮換得忠誠。毛主席痛斥小資產階級偷懶享樂，可現的中國領導層主動提倡追求好日子。示威後那年冬天，北京各單位就發大衣、毛毯、可口可

樂、即溶咖啡還有額外的肉類給員工。一條政府新口號傳遍全城：“貸款，實現你的夢想。”

人們還在適應“工作以外的生活”這個概念。中國把每週工作6天改為5天才剛過兩年，政府又再次調整了舊社會主義日曆，創造出以往想像未及的東西，即長達3週的假期。中國學者們歡呼，發明了“休閒研究”這個全新的學術領域，致力於研究這個“人類社會演化中的重要階段”。有個週末，我和中國同學們一起去內蒙古旅行。火車超載了，而且通風系統把柴油廢氣吸進來，並吐進車廂內。但沒人抱怨，原因是有車在動，就已經算是小確幸了。

大學畢業後，我去芝加哥、紐約及中東當記者，到2005年，《芝加哥論壇報》問我想不想回到中國。我由開羅市公寓打包，班機在一個無風的夜裡降落在北京，當時是6月。中國仍有2億5000萬人一天的生活費不到1.25美元。事實上，相當於全美人口的這麼多人，在描述新中國時經常被略而不談，這實在不對，但它卻可以理解，原因是周遭變化的規模和速度太大了。我已認不出來北京市了。我去找新疆村夜裡賣羊肉的小攤，但是在一波市容美化時，它們都被清除掉了。人民的收入開始飆升，其速度之快是這個大國未曾體驗過的。上次我來中國，人均所得是一年3000美元，相當於

1872年的美國。美國花了55年才達到7000美元。而中國只用了10年就辦到了。

此時中國每6小時的出口量，相當於1978年一整年；也就是林正誼上尉游到大陸的前一年。我登門拜訪林先生，本是想求教經濟學；我試圖從學者們那裡了解驅使中國日新月異的原因是什麼。當時，林正誼已經改名為林毅夫，是著名經濟學家，年紀在五旬之末，剪大平頭，髮色已灰，眉毛很濃，戴著的鐵絲框眼鏡常會滑下鼻沿。我對他的背景一無所知。當我跟另一位經濟學家提到林毅夫時，他認為我從林的人生軌跡去了解中國勃興的動力，其功效要比我想讀的那一堆書來得好。

我首次向林探詢這些事時，他客氣地說：“那是舊事了。”他極少談到自己的叛逃。我可以理解，但我的好奇心徘徊不散。我們頭一次見面之後，我多次去拜訪他，談論他的最新著作，最後，他對我追問他過去這件事屈服了。我搜集有關他的文件，還走訪過他游過的海岸。他說，當他離開台灣時，只想“人間蒸發”。

為了找尋當初我所認得的中國，一開始我戀著鄉下不放。

那裡是文學及水墨畫的中國。有一個月，我什麼都不做，只走路或搭便車沿四川省的河流旅行。我睡的小鎮似乎半被丟棄，原因是都市在召喚，讓不太老、不太小的人都抗拒不了它的吸引力，被席捲而走。村莊裡，老者開玩笑說，當他們去世時，只怕沒有力氣夠壯的年輕人幫他們扛棺材。

若是有人跟你講，中國的城市有時候感覺像是例外，是海一般凋敝鄉村地區中的孤島，這種說法絕非實情。中國每兩個星期的建設總面積，相當於一個羅馬。（2012年，城鎮化程度首度超過鄉下。）我開始感受到一種壓迫感，宛如走進突然出現的城市，黑色柏油路還沒有劃線，無拘無束，綿延數英里，兩旁建築物林立，但還沒有人居住。唯一恆常的便是新東西不斷冒出來。有位中國朋友問我，他下次訪美，該去哪個城市，我建議紐約，他儘可能有技巧地回答說，“每次我去，紐約看起來都一樣。”而在北京，我不放棄每個邀請，原因在那些地點、那些人，你這次不去，就會消失，根本沒有下一次。

當我想去找個地方住下來，建築廣告如“美林香檳小鎮”、“威尼斯水岸”及“月亮河度假村”，門類繁多。我選擇了“世貿國際公寓”，這是一棟剛從大海般建築工地裡冒出頭的住宅。不管誰蓋房子，都安裝了防噪音窗戶，原因是在可預見的未來，房子的四周都不時有噪音環繞。我住在22樓，很多個早晨，我要去上班前會憑窗研究中國人，放眼往下看，一小隊戴著橙色安全帽的工人在看似永不停息的建築吊車底下移動。夜裡，另一班工人接手，焊槍火焰發出的光亮映照在窗戶上。任何人想琢磨共產黨的口號——“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什麼意思，世貿國際公寓大概是最好的地點了。

9年前，《紐約時報》曾預言共產黨的“長征”將走向無關痛癢之處，但黨現在比以往都富有和壯大，有8000萬黨員（每12個成年人裡有1個），而且沒有組織化的反對力量。即使是西化的科技公司及避險基金裡，黨都開設細胞單位。中國有高度運作的獨裁政體——沒有獨裁者的獨裁政體。政府聽命於黨；國有公司的執行董事、天主教主教及報紙的總編輯都由黨來任命。敏感的法院案件，黨會提出忠告給法官該怎麼判，另外黨也指揮全國部隊的將領。在最低層面，黨感覺起來像一張嚴密又無處不在的巨網。我在北京認識一位有才華的年輕記者，她告訴我說，大學時他會入黨，是因為黨把可得手的工作職位增加一倍，還因為她最喜愛的教授請求她幫忙，來填滿女性雇員的配額。

我抵達中國時，黨正在進行“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

動”，期望藉此能年輕新鮮起來。依黨的標準，這相當歡樂。跟1960、1970年代人們公開譴責或對質大不相同，此時，黨鼓勵人們慶祝自己的“紅色生日”，即自己入黨的日子。每位黨員按期要寫

2000字的自我評價，市場嗅到商機，很快就有許多網站推出自我評價的“範本”。裡面草擬出絕妙的自我批評，如“我付出的心力不夠，沒能建立科學的世界觀”。我的記者朋友曾在大學時代入黨，這時試著來寫自我評價，只是當她在黨的月會上朗讀時，因為沒能收納那些飽受推崇的詞彙而被批評，只好回頭去找“範本”。

我離開中國那7年，語言已發生變化。本意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詞，已遭男、女同性戀者挖苦，來形容彼此。一天下午我在銀行排隊，有位老者往前探頭，很不耐煩地說，“同志，我們快一點！”兩名青少年差點笑壞了。稱呼餐廳女侍或售貨女郎的“小姐”一詞也被重改意義，大多數用來指妓女；而且這種新型小姐，在一個遍布腰纏萬貫的新興富豪的國家，突然變得無所不在。

11

但最令我吃驚的是“野心”這個詞彙發生的變化。在中文裡，野心總是帶有野蠻放縱及荒謬期待的意味——比如有句諺語說，“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兩千多年前，有本政治忠告匯編集子叫《淮南子》，書中《主術訓》篇便警告統治者“故有野心者不可便借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但突然間，我到處都看得到“野心”的提示——在電視脫口秀和勵志書籍裡。書店裡塞滿這些書，書名如《偉大的野心：新興商業英雄們的創業風雲》以及《20幾歲要有點“野心”》。

夏日炎威稍退時，我動身去見一個叫CGC的人。之前曾聽過他，是山東東師古村一個小農之家五兄弟裡的老么，這個村人口500。兒時得病，讓他失去視力，直到17歲前沒有上學讀書。他家人讀文學及冒險小說給他聽，他也收聽廣播，並從他爸爸那裡得到鼓舞。（陳的父親原不識字，成年之後才去讀書，最終掙得教職。）

CGC學習按摩及針灸，事實上這是中國盲人唯一能取得的教育。但他對法律更有興趣，因此申請了旁聽法律課程。父親給他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殘障人士保障法》，他則請父母與兄長多次讀給他聽。CGC發現，他家並未依法得到免稅的待遇。他大膽到北京上訪申訴，令大家很吃驚的是：他竟然打贏了官

司。接下來不久，他娶了一位廣播應答節目上談話的女子。她的爸媽跟中國絕大多數父母一樣，不贊成她嫁給盲人，但她毅然與CGC結婚。

東師古村的村民種小麥、大豆及花生；這位男按摩師懂得法律，於是人們來向他求教。有個案例是他阻止地方幹部取得農田控制權，再以更高價錢回租給農民。另一個案例是他關閉汙染當地河流的紙廠。有位記者來採訪他，他說：“最重要的事情是讓老百姓懂得他們有權申訴。”陳在中國政治界是個怪胎，不僅因為他的生活環境是在貧困鄉村，還因為他是個新型活躍人士，比傳統的YY分子還要難以捉摸。

2005年我聽聞到他大名的時候，他正在搜集一些因違反中國一胎化政策，而被迫接受墮胎及絕育手術婦女的供述。她們拒絕或逃跑時，當地政府曾把她們的爸媽或兄妹關起來，迫使這些女性現身。CGC幫這些女性打官司，而當地官員則把他軟禁在家。

夏末有一天，我乘飛機到山東，接下來換乘了一台又一台計程車，才來到東師古村。那個下午令人昏昏欲睡，我抵達通往村子的那條窄窄泥路，才離開計程車，徒步走上了那條有坡度的小路。陳住在一間農舍平房裡，正門前有棵垂柳以及爬上房屋石牆的開花藤蔓植物。門兩旁有褪色的紅春聯。就在我快到門口時，兩名男子擋住我的路。一人瘦骨嶙峋，臉頰紅而有裂痕；另一人則粗壯結實，在微笑。

結實的男子說：“他不在家。”他微笑著走近我，以至我聞到了他午餐吃了什麼。我說：“我想他應該在，他在等我。”

他說，即使CGC在，他也不想見任何客人。其他人三三兩兩成群趕來，有人抓住我的手腕，扯著我往回走向計程車。一輛警車靠路旁停下，警察向我索取護照。他們說，你不准來到這裡。他們讓我選擇，是到派出所“休息一下”，還是原路返回。

那個結實的傢伙不再微笑。他想知道我打哪裡知道東師古村這位盲人。我說，“從網路上”。他一直睨眼看著我，我從他的表情察覺到，網路對他來說，跟說我是由神靈引導來的，意義一樣。他打開出租車門，把我推進去。

我跌回計程車內，車慢慢地駛離鎮區，而警察尾隨著我們。計程車司機搞不清楚這一團混亂是怎麼回事。我解釋說，CGC正在搜集因一胎化政策而衍生虐待的申訴，司機說他聽說臨近有個地方，人們也有類似的訴苦。他載我到一個叫泥溝鎮的地方，我們停車在街上的一排商店旁。商店的一樓賣肥料，頂

上有個窗子用柵欄封住。我走出車外，站在窗下時，有個女人來到柵欄旁，從裡面往下瞧著我。

我問她怎麼會在裡面。她說："我們無法離開。我們沒有自由。"她很平靜，說當地的計生委把她鎖在肥料店裡頭，原因是她的兒媳不接受強迫結紮，也不願繳納超生費用，這筆錢相當於她們一年的收入。

我抬頭看著那位婦女，"你在這裡待多久了？""3個星期。"

"你們有幾個人？""15個。"

就訪問而言，這是個稀奇古怪的安排。我站在窗戶底下，而她則透過窗柵往下瞧。我上下打量著那個建築區，人們都在忙著自己的營生。一邊有個美髮沙龍，對面則是水果攤。

當地計生委辦公室在街對面占了一層樓。我走進去，詢問有關被拘留在肥料店的那些人。辦公桌後有一男子名叫萬振東（音），是計生委統計部門的領導，他說他不曉得有什麼拘留中心，不過補充表示，那些抱怨被拘留的人，通常是生太多孩子而不繳罰款的人。萬說："一胎化政策，是本地99.9%的人支持的。"

我一回到北京，就打電話給CGC，那位盲眼按摩師。只是每次我撥號，就會斷線。有好幾個月我沒有任何進展。我向一位名叫TB的律師描述自己在泥溝鎮的所遇，他一點也不詫異。人們開始把這些拘留中心稱為"黑牢"。你很難搞清黑牢有多少家，地點又在哪裡，你必須挨村挨鎮去找。TB對我說："當地人很難把訊息提供給律師及媒體，因為地方政府會盡最大努力，不讓任何人知道。"

在東師古村，網路還不為人熟知，但在北京則不然。一開始，中國政府把網路看成機會所在；中國很晚才加入工業革命，中國領袖本盼望訊息革命能幫助國家縮小與西方的差距。但這股熱情冷卻了。2001年，國家主席江澤民把網路認定為"政治、意識形態及文化上的戰場"。我從山東回來那個星期，公安部擴大了網路上官方"禁止"出現的訊息清單。只要有可能，中國政府喜歡用類別來組織世界，原先列出的禁止門類9種，包括"謠言"及任何"有損國家聲譽"的東西。此時已經增加到11項，把"煽動非法集會的訊息"及"涉及非法民權社團活動的訊息"也加進來。

可以取得的訊息，規模暴增。2005年初，中國大約有100萬個部落格；到了年底，已增加4倍，政府下令網路公司設立了"自律"系統，以刪檢、監視人民使用國外的網路。

黨東拼西湊地建立起最後通稱為“網路防火長城”的東西，它是個龐大的數位防衛工事，目的是不讓中國用戶取得批評中國高級領導人的新聞報導，或者來自人權組織的消息；最後，他們把社群網站如推特（Twitter）、臉書（Facebook）都封掉。跟有形的長城不一樣的是：數位防火長城可以伸縮，以適應新的挑戰，或傳達開放的錯覺。通常我不知道哪些東西受到禁止，除非我把想找的東西輸入搜索框，然後就會收到這樣的提示：HTTP404——無法找到該網頁。

有些人試圖削弱黨對網路訊息的掌控，而黨則越來越堅定給予處罰。一年前，一位名叫師濤的人在湖南省的《當代商報》服務，參加幹部會議時，總編輯在會上傳達了中央最新指示——有關XXX示威周年的題材，將不予刊登。當天晚上，師濤登陸自己的電子郵件帳戶（huoyan1989@yahoo.com.cn）把這份黨的文件（《關於當前穩定工作的通知》）匯總寄給“民主通訊”的編輯；“民主通訊”網站設在紐約。兩天之後，北京的國家安全局接洽“雅虎中國”（Yahoo！China），索取該帳戶的使用者姓名、電子郵件等內容，還有從哪些地點可以取得該電子郵件。雅虎言聽計從，到了2004年11月23日，師濤被捕，控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國家機密”罪。審判為時兩小時，最後被判10年有期徒刑。

本案最清晰地揭示：當中國政府碰到不確定的新挑戰時，它為了維持控制會動用哪些力量。人權團體批評雅虎交出師濤的訊息，公司共同創辦人楊致遠回答說，“若你想在當地做生意，就得照辦。”美國國會議員注意到了此事。眾議院小組委員會聽取中國網際網路報告時，紐澤西州出生的共和黨議員史密斯（ChrisSmith）好奇地問道，“假如半世紀前，納粹秘密警察追問安妮·法蘭克（AnneFrank）的下落，難道交出訊息、以遵守當地法律是正確答案嗎？”雅虎不為所動。當師濤的母親控告該公司，理由是曝其子於險，雅虎加以駁回。

外界給雅虎的壓力使其難以承受。2007年秋天，唯一在納粹大屠殺倖存下來、服務於美國國會的眾議員蘭托斯（TomLantos）把楊致遠等網路大公司高層叫到外交關係委員會，說，“你們真是道德上的侏儒。”師濤的母親聲淚俱下地進行作證，證供結束後，楊對她鞠躬三次，說，“我個人願意道歉。”雅虎與她的家庭達成賠償協議，但師濤依然關在牢裡。在中國境內，黨釋放出明確無誤的訊息：網路並非暢所欲言的天堂。

世貿國際公寓太安靜又太昂貴了，而我真的需要更多機會

練習中文：比方說，我打電話給房東，提議他把我的押金留下來，當成最後一個月的租金，我竟錯誤地告訴他，把押金當成最後一個月的“月經”。

為了準備2008年奧運會，北京城大部分地區都拆除重建了。北京出生的作家查建英前往美國求學，回到京城之後，他引述一位朋友形容：北京城變成了這樣一個地方，即已經找不到“掛鳥籠”的所在。老北京少數殘存的幾個區大致上由小巷弄組成；兩旁排列著由灰磚、黑瓦及木材蓋成的宅院。這種建築安排大致已保留約700年沒變，當時是元朝的規劃，蒙古人把這些巷弄叫做“胡同”，這個詞彙後來在中文裡變成“街巷”的代稱。蒙古人把胡同設計為一致寬度，不是12步便是24步。1980年代，北京由6000條胡同組成；這些年下來，只有幾百條胡同倖存，其他全被夷平，空間騰出來蓋辦公大樓及公寓大廈。城裡的44個親王府，只有1個完整地保存下來。

我四處打聽，找到草廠北巷45號一間住宅要出租。住那些老宅的人，大多使用一間公共廁所，地點在我租屋前門再轉角。但這棟住宅安裝了室內管路，還予以翻新，變成四間現代化的房間，還包圍住一個小小院落，院裡有一棵棗樹及一棵柿子樹。我把新址跟《芝加哥論壇報》司機老張講的時候，他頗不以為然。說：“你方向搞錯了吧！應該由平房搬到樓上的公寓，而不是倒過來。”

房子四壁空隙頗多，下雨時天花板會漏水，冬寒壓倒暖氣時，我在房內得戴滑雪帽。腳底下老鼠、甲蟲及壁虎來來往往，我不時得用雜誌打蟑螂。但住在窗戶可以打開的地方真是舒心，我真喜愛。巷子對面，有位鄰居在他屋頂裝了鴿舍，那是他的嗜好。他在鳥兒腳上裝了木哨管，所以每當它們在上空迴旋飛翔時，會聽見悠揚迷人的哨聲。

我的書桌靠窗，窗戶外儘是老北京鼓樓的景致；鼓樓建於1272年，上面是挺拔的木造亭簷。數百年來，鼓樓及其附近的鐘樓為北京市民計算時間，告訴大家何時睡覺、起床。這兩座樓是方圓數裡內的最高建築。鼓樓有24面巨型皮鼓，大到足以讓轟轟鼓聲傳到京城的最遠處。

中國帝王很執迷於掌控四季更迭，及每日的時移刻轉。春天時，皇帝會詔令文武百官在什麼時候更換服裝，易裘為絲；到了秋天，皇帝又敕令何時耙掃落葉。掌控時間是如此與皇權緊密相連，以至於1900年外國軍隊入侵時，其兵將爬上鼓樓用刺刀切劃皮鼓，顯示威風。有好一段時光，中國人把鼓樓重新命名為“明恥樓”。

Chapter3文明的洗禮

解放軍戰士把林正誼拉上海灘。當時是1979年5月16日，夜最深沉之刻。他們懷疑林是間諜，因為以前沒碰到過從台灣游過來的官兵。

而在台灣，林的長官們不知如何設想。他們懷疑他是投共去了，但要是林成功了，他們認為對岸的廣播站應會洋洋得意地吹噓林已抵達才是；或許他淹死了，又或許他自始自終都是大陸間諜。不管如何，一名台灣最受推崇的戰士突然失蹤，讓人覺得很丟臉。軍方把林歸類為失蹤，繼而宣布死亡，撫恤他的妻子陳雲英大約3萬元。她懷了孕，還隻身撫養兩人的3歲兒子。為了保護她免遭報復，林完全沒把自己的計劃告訴她。林的父母則在家裡的神龕內加了塊牌子，刻上他的名字。

在大陸，林被拘留盤問了3個月，直到他說服了他們，相信自己不是間諜，便獲釋且准許旅遊。在一個大多數人還深陷於文化大革命的國家，他以改信者的熱情來看待毛澤東的遺緒，他還去了共產黨戰時總部的延安朝聖；他告訴我，他“想接受教育”。

他還到了四川，親眼觀看心中英雄人物李冰所建造的古壩。從突出的堤上俯臨洶湧堰水，他凝視著這條浩蕩的水渠。都江堰經常被援引為自從兩千年前它蓋好以來，中國一直墮落不前的象徵。但林卻把它看待成振作人心的泉源。“我想，若是我們有所作為，我們可以改變人民的命運、國家的命運達千年。”

林叛逃的喜悅，因為他把家人扔下的慚愧，而被沖淡。他對我說：“我愛我妻子。我愛孩子們。我愛我們家。我覺得虧欠他們。身為知識分子，我也強烈覺得，自己對中國的文化與繁榮有責任。若是我強烈信仰什麼才對，那麼我有必要追隨他。”

他來到大陸的前幾個月，他跟他妻子取得聯繫，這根本想都不能想。台灣軍政府無疑在監視她，想找出林正誼下落的蛛絲馬跡。他想起有個李姓表親，當時在東京求學，便寫信跟他說，“目前我唯一能聯繫的親人就是你，但是你也應該特別小心，不要給國民黨當局抓到任何把柄，免得惹來一身麻煩。消息最好採用口傳，不要留下痕跡。”林請李代他買生日禮物給陳雲英及孩子們，簽上他跟陳雲英之間的小名“方方”。在信中，林承認，“雖說男兒志在四方，不能眷戀兒女私情，而忘卻肩上的責任；但是思鄉之情日漸加深。”他掛念父母、兒子及剛出生的女兒。談到他的兒子，他說，“小龍已經3歲，正是最需要父親

的時候，但卻只能和他母親相依為命。小麟出生，連跟父親見面的機會都沒有……對於他們我實在有說不盡的抱歉，但望團圓之日早日來臨。”

他對台灣政府仍有餘恨，認為分派他的任務，其政治宣傳的成分比實際進展來得大。他寫道：“可是國民黨對我只是利用，而不是真正的培養。”他激情地談到鄧的經濟改革，最初幾個月便造就經濟勃興，中國發生許多變化。“但基本上每個人是可以吃得飽、穿的暖……整個大陸正在以一個飛躍的速度向前進步，人民充滿朝氣和信心。我深深地相信，中華民族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而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值得驕傲的，也是可以抬頭挺胸昂立於世界之上的。”

但是等到新鮮感消失，叛逃者的生活就變得艱辛。一位1981年駕機叛逃到大陸的飛行員黃植誠回憶說，“一開始，歡迎之聲不絕於耳，接下來便丟下你，讓你自謀生路。”

林先申請到北京人民大學攻讀經濟學，但遭到拒絕。他的官方檔案裡充斥著各種對他政治背景的懷疑，以當時的語言習慣來講，大家說他“出身不明”。遭拒之後，他申請讀北京大學。校方行政人員董文軍（音）本擔憂林最後被查出是間諜，但最後決定林毅夫獲准入學。誠如他後來所述：“總之經濟系沒有情報可以搜集。”

林對同班同學說，他是新加坡來的學生。解放軍想酬賞他的叛逃，林則要求別把他的故事用於政治宣傳。他看過衝上金門海岸的小冊子，前總統是叛逃者，但他不想自己變成那樣的焦點。他放棄林正誼這個名字，此後他改名林毅夫，意思是“有毅力的男人”。

有一天下午，在林的辦公室，我提到台灣有人推測他向人民解放軍提供軍事機密，來證明他值得信賴。他自己也聽說過。他澀然一笑說：“那是無稽之談。我來的時候，除了一身衣服，別無其他。”他指出，自己逃離金門時，中國已在呼籲統一，而且低級軍官的機密實在沒什麼用途。他駁斥台灣軍方的報告。報告中說，他會叛逃，部分原因在於職場受阻，還誤導哨兵，以便掩飾他逃脫。林把自己泳渡大陸描述成理想主義之舉。“我依然相信，我台灣的朋友們也有相同的抱負，想對中國有所貢獻。我尊敬他們的志向。我相信自己能對中國歷史有所貢獻，只是要透過這一方式。離台是我的個人選擇。”

依大陸人的標準，這個舉動很激進：因為在歷史上，個人抉擇對中國人來說，幾乎是排在最後的選項，其原因很多，但

從古至今，最根本的都與這塊土地自身有關。密西根大學心理學者尼斯貝（RichardE.Nisbett）研究人類世界觀的差異，他發現在中國古代，肥沃平原及河流孕育出稻米耕種；而種稻需要灌溉，強迫人們“彼此合作，耕耘土地”。相形之下，古希臘人住在山區、海邊，靠放牧、貿易及捕魚為生，故比較能獨立。依此歷史，尼斯貝看到了希臘人有關個人自由、個體及客觀思考的觀念是如何形成的。

個人只是鑲嵌在更大集體組織裡的分子這種認知，貫穿於中國藝術、政治及社會。西元前3世紀的哲學家荀子相信，只有社會禮儀及模範才能控制個人“任性”的嗜欲，一如用蒸汽再加壓力才能矯正扳直變形的木板。中國最富盛名的古畫之一，是范寬繪於西元11世紀的《溪山行旅圖》，常被譽為中國的《蒙娜麗莎的微笑》。但相形達文西的人物特寫，范寬畫作描繪的是一個小小的騎馬人物，四周包圍著巨大、霧氣蒙蒙的群山。在帝制中國的律令裡，判官考量的不僅是動機，還有對社會秩序的傷害，所以犯人謀殺了社會地位較高的人，則較之他殺了地位較低的人，會受到更嚴厲的懲罰。處刑是集體式的連坐，判官不僅宣判那個犯罪的個人，還宣判他的家人、鄰居乃至鄉長老。

中國20世紀初年的改革派領袖梁啟超，原本歌頌個人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但1903年造訪舊金山的唐人街之後，就放棄了那個觀點，而且下結論說，不同中國宗教、家族之間的競爭，讓中國人民無法繁榮。他寫道：“故吾今若采多數政體，是無異於自殺其國也。”

梁啟超夢想中國有個克倫威爾式的人物，“雷厲風行，以鐵以火，陶冶鍛鍊吾國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後與之讀盧梭之書，夫然後與之談華盛頓之事。”

1911年清帝國落幕後，當上臨時大總統的革命家孫中山評論說，中國會弱，原因在人民是“一盤散沙”。他說：“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他請民眾把政府設想為“一部大汽車”，而政府官員事實上是“汽車夫”，必須有駕馭的自由。

中國始終不乏詩人、藝術家及革命黨人——白傑明（GeremieR.Barme）及賈佩琳（LindaJaivin）兩位作家把他們稱為中國歷史上“沒纏足的人”——但毛主席決心把“個人服從組織”這一觀點供上聖壇。他宣稱，黨必須“根除一切不團結的傾向”。

中國共產黨把人民組織起來，納入工作單位與人民公社。

單位沒發函，你無法結婚或離婚，無法買機票或住旅社，就此而言也無法拜訪其他單位。大多數日子裡，你在單位的範圍內過日子、工作、買東西及學習。為了查明、矯正個人思想，毛大力仰仗政治宣傳及教育——他稱其為“思想改造”，後來俚語通稱“洗腦”。1950年，有位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得知其事，造出“brainwashing”一詞。

黨為了讓其欲傳達的精神鮮活起來，便推銷各形各色犧牲的典範。1959年，報紙大寫特寫一名叫雷鋒的戰士；他身高只有五英尺，自稱是革命機器裡的“小螺絲釘”。他也出現在相片巡迴展裡，更出現在各種影像如“雷鋒幫助遼寧人民公社鏟糞”及“雷鋒補襪子”裡。在軍方宣布這位年輕戰士死於意外（被倒下的電話杆打到）之後，毛主席忠告人民要“向雷鋒同志學習”。接下來幾十年，地方的博物館裡展覽了便鞋、牙刷等等雷鋒物品的複製品——宛如聖人遺骸。

要求服從的壓力，影響深遠。一位文化大革命期間遭恐嚇的醫生——流放到西部沙漠，而其妻在當地自殺——後來說道，“在中國你想活下去，必須什麼都不透露給別人，不然事情可能用來對付你……正因如此，我最後認為，人最深沉的自我最好是模糊不清的，好比中國山水畫的雲霧，把私人部分藏在你的社會角色之後。而你流露在眾人之前的自我，就好比晚餐的米飯，乏味而不顯眼，只反襯出周遭菜色的滋味，而毫不流露自己的味道。”

變革在1980年代加速時，中國領導人警告說，全國必須要“摸著石頭過河”，事實上，許多捲進中國轉型急流的人發現：他們已經別無選擇，只有跳進去，儘快地游，而對岸有什麼東西，他們的感受至為模糊。

檯面上，中國依然對個人存疑：即使改革已然上路，但中國最權威的字典《辭海》1980年版仍把“個人主義”定義為“小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中心，損人利己的行為”。

而且，共產黨最痛恨的東西莫過於柴契爾夫人（MargaretHildaThatcher）式的自由17市場基本教義。只是，中國仍把她某些最基本的想法制定為法律：如公共服務退場、對工會的敵意、及以國家和軍隊為驕傲。

遍及全中國，人們開始踏上路途，加入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中國非凡的經濟成長，靠的是結合了充沛而廉價的勞動力及大舉投資工廠及基礎建設——這種配方，拔去阻塞，釋放出毛主政的動盪歲月裡儲存的經濟能量。總書記趙紫

陽周遭都是經濟學家，試圖模仿南韓及日本的經濟成長。為了繁榮，他們必須權宜變通。國營智庫的研究員吳敬璉，其生涯伊始是一名社會主義正統派，這種立場說服他的中學放棄教授英語及西方經濟學。但文革期間，他擔任幼稚園長的妻子，因其父曾是國民黨部隊將領而被打成“走資派”，紅衛兵剃光她半邊頭髮。吳自己也被貼上“反革命”標籤，送去“勞動改造”。他對我說：“我的意識形態經歷了巨變”。到了80年代，吳成為自由市場的首席專家之一，哪怕那個詞彙爭議太大，難說出口。吳敬璉改稱它為“商品經濟學”。

1980年起，中國指定幾個經濟特區，利用稅賦優惠等優勢來吸引外國投資、科技及海外客戶人脈。特區需要勞工。自50年代起，黨為了控制人們而把戶籍分割成兩種類型：鄉村及都市。這種區分注定你的出生地、求學、受僱，很可能下葬地點也在其中。除了少數特例，不然只有公安局才可以改變你的戶口。但隨著新式機器和施肥的採用，讓農村需求的人大減，因此在1985年，政府正式允許鄉村人口暫時居住並工作於城市。接下來8年內，移往城市的人口達到1億人。1992年，鄧小平讓大家了解，繁榮至上。他造訪一家7年內擴大16倍的電冰箱工廠之後說：“發展才是硬道理。”1993到

2005年間，國營企業裁員7300萬人，叫這些下崗工人去找新的收入來源。中國領導人保持貨幣低值，讓出口產品變得便宜，於是出口激增。1999年，中國出口量不到美國的1/3。10年之後，中國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

自主權慢慢進入日常生活。毛時代，兼職被視為不道德，原因在個人的空閒時間屬於國家所有。到了90年代，日夜兼職的人口如此之多，以至於名片印刷業業績勃興。一度鼓勵人人當機器裡“不鏽螺絲”的國營媒體，此時也承認競爭是新事實。《河北經濟日報》寫道：“你必須依靠自己，闖出自己的道路，去戰鬥。”不論通道是什麼，大家有錢就賺。在貧窮地區，血販子挨家挨戶這門交易，以幫助人們支付納稅、學費等開銷。在哈佛取得博士學位的人類學家景軍發現，人們賣血之頻繁已超出人類極限。他寫道：“血販子會把人倒過來，腳部靠牆倒吊，以便血液能流到手臂。”（這種生意後來釀成大災難：90年代中期，血販子造成中國最慘重的愛滋病大爆發，估計有57000人感染。）

講“個人”的主題滲透入電影、時尚及音樂。電影導演賈樟柯回憶說，80年代他在山西煤鄉長大，會坐4小時的公車，只為買一盤鄧麗君流行歌曲的錄音帶，而且音質不算很清。鄧麗君是

台灣歌星，人氣之高，以致林毅夫的金門馬山連會廣播她的歌來吸引投誠者。因為她的姓與鄧小平相同，大陸官兵開玩笑說，他們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賈對我說：“在此之前，我們唱的歌是《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和《咱們工人有力量》。歌詞總是‘我們、咱們’。但是在鄧麗君的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裡，歌詞談的是‘我’。我的心。我們當然會愛上它！”

公司強化了這種訊息。中國移動針對25歲以下客群，銷售手機服務，使用的口號是“我的地盤我做主”。即使在變化緩慢的鄉下地區，人們談到自己時的方式也不一樣了。挪威漢學家賀美德（MetteHalskovHansen）花了4年在鄉下學校，她發現老師們給學生的教育是讓他們做好準備，未來想生存下去的世界，要求是“自立、自強、自力更生的個人”。2008年賀美德觀賞一場賽前動員會，學生們背誦的誓詞是：“天生萬物以來，沒人跟我一樣；我的眼，我的耳，我的大腦，我的靈魂，都獨一無二；沒人講話、做事跟我一樣，我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我是大自然的奇蹟。”

想離開——中國人叫“外出”——的欲望席捲各村莊。這股浪潮吞噬的，不見得是最成功、最有自信的男男女女。相反地，遭其襲捲的是最不合宜的人——最不安定、最任性、最沒福氣的人。當十來歲的少女龔海燕想離家那天，不懂城市。只是龔海燕心裡打定主意之後，堅持的程度就像騾子。龔對我說：“他們別無選擇，只好同意。”

龔海燕是湖南人，與毛主席同鄉。她出生在山腳下的挖斷崗村，父母是在慘澹條件下結合的。文革時代，因為他倆的家庭都被歸類為“富農”，受到同樣的政治折磨，於是在鄉裡媒人的撮合下結了婚。龔家種花生、棉花，養雞也養豬。龔家有兩個孩子，海燕是老大，身材嬌小又多病。她雙肩瘦削，嘴唇很薄，臉龐不動時，神色有幾分遲疑。依鄉村生活的等級制度，這些特色對她沒有好處。當地男生要的是兩頰豐潤、唇如花蕾的女孩。多年以後，我在北京認識她時，她對我回憶說：“若是有人喜歡過我，我還真想聽聽原因是什麼。”

但即使還是小孩子，龔便精力過人。鄰居們開始做小生意，她便纏著爸媽，讓她也加入這一潮流。父母笑了。“我們只有三戶鄰居，家背後就是大山，誰會來買東西呀？”他倆問道。可海燕沒退卻，她找弟弟海斌一起做生意，先買來冰棒，再挨家挨戶轉售。拖著重30磅的保麗龍隔熱容器，沿著村莊滿是車痕的小路走上一天，她弟弟打退堂鼓了。她說：“我把他打得半死，他還是不肯再出來。”但海燕摸熟了附近村裡，知道哪些爸

媽拗不過孩子們的懇求，然後找出最佳販賣路線。很快地，她一天可賣上兩箱。她下結論說：“不管做什麼，都得有策略。”

出生於70年代、與龔海燕同一輩的男男女女有所不同，從談話中便聽得出來：他們說“我”，講得很自在，相形他們的父母則會用集合詞“我們單位”、“我們家”。

（老一輩中國人最後把她那一代人叫做“我世代”。）

龔海燕16歲時，考試成績好，讓她得以就讀當地的重點中學，這對務農家庭來說是轉型契機。開學前不久，她搭拖拉機進城，去補冰棒的貨，但拖拉機栽進溝裡，其他乘客摔出來沒事，但坐在前座的她右腿粉碎性骨折，鼻子幾乎斷掉。她出院時傷勢好轉，但還戴著石膏模子，發現學校無法收容走不動路的學生。校方建議她退學。

龔海燕的母親江小員（音）可不吃這套。她搬進宿舍，背著女兒上下樓梯到教室，來回上廁所。（海燕把自己訓練到一天上廁所不超過兩次。）龔上課時，她媽媽就匆匆跑到街上，提籃子賣水果賺點小錢。我一直好奇這個故事不是真的，只是打比方——直到我見到她的母親，江小員回想到那段時光仍然火大，她說：“有棟校舍特別高，那裡是實驗室，而她們上課在4樓。”龔從沒認真考慮換別種工作。江對我說：“讀書是唯一的出路。我們可不要她跟我們一樣在田裡工作。”

龔的醫療費用讓父母背上債務。她說：“我出那次車禍，讓家裡變得亂七八糟。”當時是1994年，中國史詩般的勞工大遷徙正加緊進行。1978年，中國近8成人口在田裡工作，這一數據到1994年已降到不足5成。而龔海燕也從當地的重點學校休學，前往廣東沿海工廠打工。

隨著移民增加，政府試圖管理人潮的流向。有條口號呼籲鄉村人口在家附近找工作：“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官方正式把新移民叫做“流動人口”——這個中文詞彙既有流氓又有流浪狗的意味。警方把犯罪歸咎於他們稱為“三無”的現象——這些移民無家、無工作、無穩定收入來源。城市想方設法限制新來人數。在北京，市政府限制好幾類人，包括“乞丐、街頭賣藝、算命等其他從事封建迷信活動者”。他們若被發現，就會被遣送回老家。北京還正式頒授“綠卡”，限制就讀公立學校及住房，但標準之高，只有1%的新移民符合資格。上海市出版一本手冊叫《進入上海指南：給前來上海工作的兄弟姐妹們》，頭一章的標題便是“別盲目前來上海工作”。

只是，大家還是來了。到了2007年，1億3500萬鄉村移民

已生活於城市，政府把“流動人口”該稱為“外來人口”。國務院下令各級政府要改善他們的保險及工傷保護，確保移民“受到文明洗禮”，官方媒體喜歡這麼形容。

在珠海市，龔海燕在松下電視組裝線找到工作。她把兩條電線用焊錫接起來，每天2000次，並把工資寄回老家。若是她提早完成，工頭就增加他翌日配額。工廠有辦廠內報，兩個月過後，龔寫了一篇文章叫“我愛松下，我愛我家”。文章收到了她想要的效果：她脫離生產線，被拔擢為編輯。她找到可以全神投入的工作。但接下來有一天，她一位老同學來找她，那個週末用其他老友升大學、搬到新地方等新聞“款待”了她。在工廠範圍內，龔海燕認為自己算是成功：她用頭腦而非指頭工作。但現在她得知自己錯失了什麼，這令她鬱悶不安。

她痛責自己輟學的決定，說：“真是軟弱又愚蠢。”她身旁周遭，中國經濟正在起飛，而她卡在最底層。電視、成衣工廠要的是不會抱怨的工人，也不提供就業安全、在職訓練或成長的許諾。外來人口如她，賺的錢只有廣東一般居民的一半，而且差距越來越大。要是她待在廣東，能指望的生活，不過是低人一等的健康醫療教育，而且她為孩子付出的教育費用，將要比有當地戶口的父母高出5或6倍。廣東省產婦死於分娩者，3/4以上是外來人口，因為她們無法取得婦產科的醫護。

在電子廠組裝線，老闆偏好女性勞工，是因為她們對瑣碎的工作跟謹慎。龔海燕待的工廠裡，男性只有保全、卡車裝運工及廚師。她說：“假如我想安定下來，可以選擇的便只有他們。”她知道返回村子有哪些危險。當時已是1995年，而中國鄉下與城市之間收入落差之大，在全世界只比辛巴威及南非好一點點。她必須到城裡。她說：“我決定回學校。”

她接著說：“村裡每個人都反對這個點子。他們說，你都是21歲的大姑娘了，找個男人嫁了吧。”依村子的等級排行，地位唯一比年輕女子來得低的人，便是對未來還心存志向的年輕女子。只是她的父母支持她的決定，學校允許她重新入學，讀高一。她考得縣裡的全國大學統招的最高分數，得以進入令人垂涎的北京大學就讀。當年24歲的毛主席來到京城，有次忍不住說：“北京就像一個大熔爐，在那裡，不可能有變化的人也能被改變。”

她跟林毅夫一樣，在入學之前更改名字，變成海燕；“燕”字指的是小而硬實的海鳥。高爾基在一首過去的革命詩篇《海燕之歌》裡提過。那首也是列寧的最愛之一。龔毫不關心革命，但她很愛一隻鳥兒面對風暴的意向——誠如高爾基形容，“這是

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閃電中間，高傲的飛翔”。

龔在北大取得中國文學學士，再到上海復旦大學讀新聞學碩士。到了第二年，她已感受到專業的核心要素。只是有件事付諸闕如：談戀愛。

中國人生活變動之大，如天翻地覆，這一切之中，對個人最私密的莫過有機會自擇配偶。幾百年來，村裡的年輕人是由媒人及父母，依相親的社經地位撮合起來——此之謂門當戶對——新郎新娘能參與的極少。

孔子煞費苦心，教誨仁義與責任，他在教學記錄《論語》裡，談到“情”僅僅一次。愛情故事在中國要到20世紀才流行起來。歐洲的故事主角偶爾還以喜樂收場，而中國戀人們一般都屈服於無法控制的外力：父母作梗、疾病及誤解。這些愛情故事可以分門別類為悲戀、苦戀、慘戀、錯戀及貞節牌坊戀，因此讀者可以藉此期待其命定的結局。而第六類叫喜戀，則賣得沒那麼好。（中國有個傾向，就是把愛情看待為持久的麻煩。1990年代，羅斯鮑姆（FredRothbaum）及曾育彪兩位學者分析80首中國與美國流行歌曲的歌詞，發現中國歌曲更常提到痛苦及“負面期待”，瀰漫著一種感覺：一段關係命中注定下場悽慘，無法取得救贖。

在中國，男女戀愛也會扯上歷史關係：1919年，當中國學生奮起而為他們稱為“德先生”與“賽先生”的[閩主]和自由而[是威]時，同時也要求終結包辦婚姻。他們稱其為“自由戀愛”。毛立法禁止包辦婚姻及蓄妾，規定女子有權要求離婚，但這套系統幾乎沒有留給情慾任何空間。沒能走進婚姻禮堂的約會是“無賴行為”，而性是如此被目為羞恥，以至於毛時代的醫生經常碰到無嗣求醫的夫婦，原因只是他們欠缺性知識，不知怎麼做愛。《大眾電影》雜誌刊登一張灰姑娘親吻王子的照片，讀者還寫信來責備。有人寫道：“我代表工農兵大眾譴責你們，怎麼這麼不知羞恥！”

雖然包辦婚姻1950年便被禁止，但很多媒約工作，還是由工廠廠長及共產幹部來做。

1970年，有位名叫閻雲翔的年輕知識分子從北京被下放到東北的夏家村，他發現慘戀十分普遍。當地女性對自己嫁給誰幾無置喙權利，村裡有個傳統，女性出嫁當天，離開娘家時都要啜泣。要到80年代，村裡的長老才開始釋放對當地婚姻的掌控權。閻雲翔後來當上人類學家，繼續造訪夏家村。他參加一場婚禮，新娘是嫁給所愛之人，她私下對閻說，太高興了，哭

不出來，只好在手帕上抹辣椒，把眼淚逼出來，這樣才符合父母一輩的期望。

社會主義全盛時期，夏家村每個男子都希望自己看起來很老實，而一個光棍最混蛋的事便是風流。但是突然之間，老實男子被認為寒傖好欺負，人人都想風流如電影《鐵達尼號》中的李奧納多·狄卡皮歐——那是當時盜版最兇的電影。

世上許多國家結婚率都在下降；美國的成年人結婚率跌到51%，為有記錄以來最低。只是在中國，其文化是如此圍繞在家庭與子女，所以儘管離婚率在攀升，但98%的女性人口最後都出嫁了——全世界比例最高之一。（中國既沒有[閔全]聯盟，也沒有禁止歧視法律，而且依然是對同性戀最嚴厲的國家之一。）

自由來得太突然，也帶來了麻煩。中國的酒吧或教堂很少，也沒有男女混打的撞球，所以男女社交場合還是勉強拼湊。大的工廠會替整天在生產線上工作的工人們組織“交友俱樂部”；北京電台103.9兆赫的“交通之聲”在每個週日，都撥出半小時專門留給計程車司機，讓他們在電台中自我介紹，尋找另一半。軍方頻道的央視7套會替戰士們舉辦約會節目。但是這些舉措僅僅讓既有的障礙更加嚴重，而且對大多數人來說，愛情、抉擇與金錢的困擾，反成為令人迷惘的新麻煩。

中國的“一胎化”政策對婚嫁產生意想不到的影響。由於提倡使用保險套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這讓性愛與生殖脫鉤，並激發出小型的性愛革命。只是，競爭因此也升高了：1980年代超音波科技傳到中國，導致夫妻把女性胎兒拿掉，只為著等生男孩。結果便是中國現在有2400萬名男生，到2020年就是適婚年齡，但卻找不到配偶——誠如中文所形容，變成“家譜樹”上的“光棍”。中國媒體則狂轟濫炸女性說，若是她們到30歲還單身，就會被視為“剩女”。

一天，龔海燕對我解釋說：“中國婚姻市場裡，有三種人想存活下來：男人，女人，以及有研博文憑的女人。”還在攻讀碩士學位時，他發現中國男人對教育程度超過他們的女人，非常畏縮。在上海時，她說：“這城裡，我沒半個相熟。我爸媽只有小學文化。他們會接觸的那種人，我無法產生興趣。”

男女戶口不同也很少能成婚，這一點讓她很困惑。她對我說：“即使法律明文規定‘戀愛及婚姻自由’，事實上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2003年，網際網路用戶只有6900萬（占總人口的5%），但是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同年秋天，入口網站搜狐

報導說，

該網站最常搜索的人名，以前是“毛澤東”，此時變成“木子美”，一個性愛部落格部落客。木子美把她一次幽會的錄音發上網，點擊量之大讓伺服器崩潰。（對那些倒抽一口氣的人，她回答說：“我透過性愛表達我的自由。”）

龔海燕付了500人民幣（當時約合60美元），購買早期的線上相親服務。她挑選了12名男士，把訊息發給他們。當她沒收到回信而向該公司投訴時，客服告訴她，“你瞧瞧自己——你長得醜，還想追這些優質男？難怪你收不到回信。”她追蹤找到其中一名單身男子，才了解他根本沒有在該網站註冊。照片、基本資料及聯絡方式……這一切都是從其他網站東拼西湊而來的。中國一度很擅長仿製馬球衫，而此時改而偽造網路上相親了。龔說：“我並不想做老闆，我只是很氣憤，我想替所有與我情況差不多的人辦一個網站。”

她用網站設計軟體“FontPage”設計出雛形，把自己的生意取名為“Love21.cn”（後來改名為“世紀佳緣”）。為了賣廣告，她雇了自己的弟弟海斌；他中學輟學後，學了幾門電腦課程。她先動員自己的朋友，其他客戶跟著上門。有位網站設計師同意投資相當15000美元。（後來，他從該網站找到了自己的結婚對象。）龔用這筆錢來擴張，而且她發現，客戶需求量之大超過她的想像。在偏遠地區，電腦掃描還很難取得，客戶便把照片用郵件寄來。註冊會員以每天約2000的速度增加。

龔與我認識的其他中國網際網路創業家一點也不相像。首先，中國科技界排行拔尖的都是男性。另外，與那些窺出中國網際網路巨大潛力的人不同，她的英語講得並不流利，甚至沒有電腦技術文憑。她身上還有一絲鄉下氣息。她講話音量很高，但是在眾人之前聲音則會發抖。她只有五英尺三英寸高，雙肩依然瘦削，當她談論自己的生意時，我感覺她在談她自己。她跟我說：“我們跟你們外國人不一樣；你們在酒吧很容易交到朋友，或者去旅行，跟陌生人搭訕。我的網站不是幫助人們找樂子。成為我們會員的訴求很明確，就是要結婚。”

空閒時間，龔從事寫作。網路正在成為匯聚各色點子的論壇，而龔為自己博得了“小龍女”的美譽，她是提供諮詢的專欄作家，專門診治人民共和國的各種婚姻疑難雜症。她出沒於苦惱單身漢、為兒女擔心的家長以及焦慮新娘的各種訊息裡——其中很多人以前或現在是她相親網站的會員。

通常，她給出的建議讀起來像是反對中國古代禮制。她對

一位新婚女性說，如果你婆婆把你當成“傳宗接代”的機器，而且你丈夫又袖手旁觀，那就不要這個丈夫，“鼓起勇氣，離開那個家庭”。碰到一對有錢的新婚夫婦，丈夫到處拈花惹草，太太並不因此大哭大鬧，也不軟弱無能、自我哀嚎，而是讓丈夫簽下一份協議，“如果再有不忠的行為，他必須放棄他的所有財產”，龔對這位妻子的舉動拍手稱快。總之，龔把尋找“真愛”，形塑為一件仰賴自己而非別人的事情。她寫道：“天上不會掉餡餅。”

Chapter4心靈的胃口

龔海燕推出自己的生意不久，有一則貼文吸引了他的注意，中寫道：“尋找妻子，身高1.63公尺，容貌中等以上，有碩博學歷。”

這位徵婚者是位博士後，鑽研果蠅。他喜歡運動，所貼的是他在研究實驗室工作檯前，戲謔展現自己臂上三頭肌的照片。龔對我說：“他的條件很好。”接下來她檢查他的擇偶要求，發現自己“找不到任何匹配他的女生。”但是她決定以高度自信的姿勢回答他。她寫道：“你的聲明寫的不好，就算有女孩子符合一切條件，還是會覺得你太挑剔。”

這位男士名叫郭建增，他尷尬了，回答說：“我以往沒有寫過這類東西，不太清楚該怎麼做。”龔自願幫他修飾其聲明。她對我說：“修飾之後，我可以想出世上有四名女生符合這一標準，包括我自己。”

郭建增時年33歲，非常害羞。他倆見面時，他手機裡只儲存了8個號碼。他不是天生浪漫的人——送給龔的第一件禮物是一副眼鏡，取代她壞掉的——而且他不算有錢，戶頭裡存款不到4000美元。但龔請他做線上智商測試，很驚奇他以5分打敗她。另外，他照顧自己鰥夫父親的孝心也令她感動。他們第二次約會，他便向她求婚，地點在地下道。

她坐上他的自行車後座，就去民政局，花了9元登記結婚。整個儀式只花了10分鐘。他沒買結婚戒指，反而是買台筆記型電腦送她。他們租了一間小小的公寓，月租金100美元，還跟一位鄰居老者共用衛浴。

到了2006年，龔的相親網站已有100萬名註冊用戶；翌年，創投資本家注資到她的公司。她開始從收發訊息中收取費用（大約美金30分）。等到她開業第7年，網站已有5600萬註冊用戶，而且在上網瀏覽、單一訪客訪問量兩方面，都名列中國第一，成為中國最大的線上相親服務網站。她把原先“Love21.cn”的網名改掉，換成聽來更堂皇的“世紀佳緣”。她

給網站一條很符合她性情的定義：嚴肅婚戀交友網站。

一天早晨，我到龔的辦公室；當時她正慢慢走進會議室，參加替新進員工辦的“指南說明會”。時間快到中國農曆新年，這個國家的單身男女都會回家“走親戚”——少不了會被絮絮叨叨地問到終身大事。對某些人，這種壓力大到難以承受。過完年之後，世紀佳緣的會員註冊數將會大大攀升，好比新歷年後，美國健身房人數大增一樣。

在人群前發言，哪怕人數不多，依然叫她緊張，她把講話要點印在紙上隨身攜帶。她說話之前，員工們先聽營運長、一位名叫方清源的男士講話，他輕言細語地對他們說：“在本公司，別花心思在尋求上司關注或裙帶關係上。努力工作，你的成功會清楚表現在你的成果上。別費心拍馬屁。”

輪到龔說話時，她跟新員工們講，現在他們正在進入“幸福的事業”。她沒有微笑。她談到幸福事業時很少微笑，反而專注在“價格/表現比率”以及“資訊不對稱”。她身著辦公套裝：戴眼鏡、綁馬尾，不施粉黛，身穿的粉紅色愛迪達夾克左袖還皺皺的。她眼前的年輕男女正要加入世紀佳緣近500名的員工之家。她告訴他們，你們的客戶事實上跟你們幾乎一模一樣：是外來人口，隻身進城，因“三座大山”而找不到愛情——沒有錢、沒有時間、沒有關係。公司目標很簡單：讓人們有所選擇。

在中國，“選擇”一時間變得五花八門，大家還沒適應。當地媒體經常把龔描述為“中國第一紅娘”，儘管她的事業反對的正是做媒這個想法。雖然她的公司名叫“世紀佳緣”，但她最想直言不諱的卻是：她相信緣分已經過時。她對新進員工們說：“中國人還是相信緣分，大家都說：‘哦，我就隨緣吧。’只是他們不必再那麼做了！現在，欲望就可以引導他們。我們呢，要把戀愛自由給大家。”

這麼多年來，人們對婚姻這項人生大事沒有太多置喙餘地，現在似乎想彌補失落的時光。我讀到一則線上徵婚啟事，作者名叫林瑜（音），她對未來丈夫的要求如下：

“沒結過婚，碩士以上學歷，非武漢本地人，非農村戶口，不是獨身子女，不吸菸，不賭博，身高1.72公尺以上，需交往一年才能結婚，愛好運動，父母非離異，年收入5萬元人民幣以上，年齡在26到32歲之間，每週必須有4天在家吃晚餐，以前至少交往過兩個女友，但不能多餘4個，非處女座，非摩羯座。”

中美兩國相親網站最大不同之處，在觀念方面：在美國，網站有擴大你潛在伴侶的力量；在中國，一個有13億人口的國

度，相親網站則保證做相反的工作。龔的主任工程師陸濤（音）說：“有一次，我看到一名23歲的女孩在北京找相親對象，而當地有40萬個男性用戶。她用血型、身高、星座等等來縮小範圍，直到人選只剩83人。”（有位中國銀行家告訴我，他只用單一標準在世紀佳緣上篩選，那就是身高，就讓他找到一堆身材高挑的模特兒名單。）

我在世紀佳緣註冊，以了解龔的事業，當時我回答了35個選擇題。共產黨花了幾十年提倡一致性，但世紀佳緣的問卷讓你毫不懷疑地了解：現在的男人要有能力知道自己幾斤幾兩。繼身高、體重、收入等基本資料之後，問卷要求我描述自己的頭髮，先是顏色（黑色、金色、深褐色、淡褐色、灰色、紅褐色、銀色、染色、禿頭或其他）；接下來是形式（長而直、長卷髮、中等長度、短髮、小平頭或其他）；談到臉型，我有9種選擇，包括橢圓形叫“鵝蛋臉”、狹長的叫“瓜子臉”，有一度，我很懷疑“國字臉”是否指愛國人士，接下來才了解，它指的是下巴較寬的臉型，很像中國字裡的“國”。

按要求，我得提示自己“最迷人的特色”，我有17種選項，包括我的笑容、眉毛還有雙腳。“宗教信仰”方面，我有16種選擇，為了看來與眾不同，我勾了“薩滿教”。為了回答“謀生技能”，我得殺出24種選項，包括翻新房屋及商業談判。直到我做完時，我還被問到對度假地點、閱讀題材、婚前協議、抽菸、寵物、個人空間、做家務、退休計劃等看法。接下來我碰到一個問題，要我從一個表中選擇最能描述我自己的簡單評價：

1、有孝心的兒子

2、很酷的男人

3、有責任心的男人

4、精打細算的居家男人

5、誠實率直的男人

6、敏感的男人

7、事業為重的男人

8、睿智有遠見的男人

9、相貌普通的男人

10、幽默的男人

11、愛好旅遊的男人

12、喜歡宅在家裡的男人

13、考慮周全的男人

14、勇敢的男人

15、忠誠的男人

16、有管理能力的男人

17、很帥的男人

18、穩重、傳統、沉默的男人

下一頁，我被要求選擇最能描述我個人外表的選項。我回想到“藍色螞蟻”時代。再檢查以下選項：

1、我很斯文都市派

2、我是大西部來的牛仔

3、我陽光而優雅

4、我俊俏文雅

5、我成熟有魅力

6、我高而魁梧

7、我簡單而樸素

8、我含蓄又酷

龔海燕進入這門有得選的行業，時機很好。中國人一生中花在選擇上的時間越來越多。

80年代，個人收入開始上升，購物者結群而動，爭著購買與他們的鄰居一模一樣的產品，其力量之強，後來變成眾所周知的“潮流消費”。

夏家村裡，非正式活動中心從黨支部移動到村裡唯一一家店鋪。年輕人談到他們稱為“個性”的品質，開始語帶尊敬。鎮中心的少年開始買髮膠塗頭髮，還買牛皮製的樂福鞋。他們開車到村裡那家店，而不走路，哪怕距離只約300公尺。家家戶戶重新安排房子格局，夫妻不再跟爸媽及孩子睡大通鋪，而且不同輩分開始睡在不同的房間。當地黨書記不再稱自己是“革命機器裡永不生鏽的螺絲釘”，而坦白地講，“我為什麼幹這份差？很簡單——賺錢。”

鑑於國家已不再直接指定工作，它此時得帶領大學畢業生們通過並不熟悉的求職經歷。新的就業市場（以及婚姻市場）創造出對新衣裳、健身俱樂部、化妝品、剃刀及刮鬍膏的需求。2005年，中國電視播出第一個“美國偶像”風格的節目——

蒙牛酸優格超女大賽。節目之成功，孕育出一個叫做“選秀”的新門類，就是在節目之中，參賽者可以彼此選擇或被選擇，觀眾亦然。

購物，或至少是逛街，變成主要嗜好。中國公民平均每週花約10小時在購物，而美國人平均不到4小時。這種差別，部分歸因於中國購物流程的效率較差——公共運輸、比價都花時間——另外部分原因在於這是新式娛樂。一項廣告研究發現，在正常日子裡，上海人平均看到的廣告量是倫敦消費者的3倍。市場充斥著新鮮品牌，彼此爭奇鬥豔，而中國消費者對博眼球的大膽花招，相形下司空見慣，感到自在。廣告如此充斥版面，以至於時尚雜誌不得不衝破“物理限制”：《時尚》（Cosmopolitan）雜誌中文版的編輯不得不把一期切分成兩本，原因在每一期雜誌都厚到難以處理。

我的手機裡也充塞著垃圾廣告，提供範圍極廣的消費選擇。一條來自“北京最大室內騎馬場”的消息說，“有心騎馬者請注意”。一天早上，我收到的廣告說，“巨型百年建築，英國工藝建造”還有“宮殿級巴洛克別墅，5400平方公尺私人花園”。更多的消息是販售偽造票據，幫助大家申報不實開支。我實在喜歡想像現今典型中國男人的模樣：每天早晨走在巨型英國建築裡，跨上他的馬，穿過他的私家花園，出發去買些偽造票據。

西方公司你爭我搶地增加選項，希望能符合中國人的品味。“箭牌”（Wrigley）造出小黃瓜薄荷口味的口香糖；“哈根達斯”（Haagen-Dazs）賣月餅。不是每種想方設法都取得成功；“卡夫食”（Kraft）想製造一種“麗滋”餅乾，其口味是用辛辣的四川黑胡椒油煮魚來調配，結果失敗。“美泰”（Mattel）玩具公司在上海市中心開一家6層樓的芭比娃娃大型百貨店，附設水療及雞尾酒吧——最後他們發現，中國爸媽不贊成芭比的讀書習慣。“家得寶”（HomeDepot）發現，農民和工人的子女最不愛的事，便是自己動手做。

外國人實在難以理解中國消費者的某些選擇。有種時尚眼鏡框出現在市場，名曰“海倫凱勒”。記者採訪該公司，為什麼選這位全世界最出名的盲人來打眼鏡廣告。公司回答說，中國學校教導海倫凱勒的故事，主要是把她當成自強不息的象徵。可以肯定的是：這款鏡框銷售很好。海倫凱勒眼鏡銷售主打的口號是：“你看世界，世界看你。”

在中國，金錢與愛情掛鉤的程度，總是比西方來得公然、明顯，只是在幾乎人人都赤貧的時代，婚嫁的財務比較簡單。傳統上，中國新娘的爸媽會付嫁妝，而新郎的爸媽出的數目較

多，在中國這叫“生女兒賺錢”。毛澤東時代，結婚交換的禮品通常是穀物，但是到了1980年代，夫妻期盼的是“三樣圓的，一樣有聲音的”：一輛自行車、一塊腕錶、一台縫紉機，以及一台收音機。或者，在某些地方，要求的是“三十雙腳”：一張床、一張桌子與幾把椅子。在中國大多數地區，這種風俗留存下來（變成現金），只是金錢押寶越來越高而已。

對婚姻傳統最大的衝擊來自意想不到的地方：1997年，國務院恢復人們買賣房屋的權利。依社會主義傳統，僱主本來是把城市裡的工人分配住到清一色的混凝土住宅區裡。以至於政府開放房地產市場之際，中國官僚甚至還沒把“抵押”這個英文詞彙給正式翻譯出來。只是沒過多久，全球最大的房地產財富斂聚就風風火火地展開了。

傳統上，新婚夫婦是搬去跟新郎的父母居住，但是到了21世紀，能與老人家住很久的夫婦不到一半；魏尚進及張曉波兩位經濟學家發現，有兒子的爸媽替子嗣蓋更大更貴的房子，希望吸引更好的匹配對象——這種房地產現象以“婆婆症候群”而得名。報紙用新聞標題鼓勵這種現象，說“房子是男人的尊嚴”。在某些村莊，房地產“軍武大賽”展開了，各家各戶都想壓倒對方，蓋超多樓層，就算當時沒錢裝潢，空著也行。

2003年到2011年間，北京、上海等其他大城市的房價飆升8倍。

野心時代不再用出身來分類人們了，用的是人們的未來。社會主義時代，中國人重視父母和祖先的“政治可靠”，但現在，男男女女們打量彼此，是依他們的潛力，特別是賺錢潛力。只是，在新的婚姻市場上，態勢也越來越清楚，普遍的期望與現實並不相符：龔的世紀佳緣網男性會員裡，只有1成有房，而一項外界做的調查說，受訪女性近7成表示，自己不嫁給沒房的男人。住房的精準細節，對戀愛有沒有前途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我被要求從下列選項中挑選：

1、我沒有房

2、有必要時我會買房

3、我已有房

4、我與人合租

5、我自己租房

6、我與父母合住

7、我與親友合住

8、我住工作單位的宿舍

所有問題當中，這則最重要。龔對我說：“如果你是與人合租或共用一個地方的男人，幾乎可以說一開始就不必玩了。”條件大好的男人不憚於詳加敘述：他們的單身廣告裡採用一個新的詞彙“車房齊備”。

想要趕上他人的這個壓力，造成一種“語言膨脹”。幾年前，“三無”指的是沒有棲身之所、工作或收入來源的移民工。等到我開始來龔海燕的辦公室溜達之際，“三無”指的是沒房、沒車、沒儲蓄的男人。三無男人若能結婚，叫“裸婚”。2011年有部電視劇叫《裸婚時代》，講的是一個條件很好的女子不顧父母反對，嫁給一個經濟條件一般的男人，搬到他家裡去住。劇集變成中國收視率最高。若是在1930年代，這個故事寫成小說，會被歸類為“悲戀”：故事結尾，那對夫妻離婚了。另一個人氣節目與“選秀”有關，叫《非誠勿擾》，參加的單身男女彼此打量著，而螢幕上冒出來的泡泡提示著男嘉賓是否有車有房。有一期節目，一位三無男子邀請某女士坐他的自行車，但她輕蔑地拒絕說：“我寧可在寶馬車裡哭，也不要在自行車上笑。”這句話讓內容篩檢人員實在受不了。他們很快重組節目，增加一名主婦般的共同主持人，忠告著美德與節制的好處。

龔的公司每週都會組織單身派對1-2次，有一天晚上，我與其他300名精心打扮的男女有次序地排隊進入一家北京的舞廳。每人都拿到裝有電池的燈，其形狀是噘起的嘴唇，大家把它別在衣服上。主持人蹦到台上，請大家引起注意。他說，“請把手放在心臟部位，然後跟著我說……‘我發誓，我來到這裡，絕對沒有欺騙之心，邪惡之念。’”

12名女性來到台上，開始互動遊戲，每人都拿著一根紅色權杖，頂端有個心形的燈：如果燈亮，表明有興趣；燈不亮，則相反。她們都是事業有成的人，有工程師、研究生、銀行職員，年齡在20歲末，30歲初。

男士們一個一個登台回答女孩們的問題，不過在問答當中，我感受到男女期盼的巨大落差。有位銀行職員穿著毛衣、胸肌鼓鼓，吸引了很多女孩子，不過當他說一星期有6天半必須待在辦公室時，女士們就噤聲了。下一位是穿著呢套裝的物理學教授，他說他的人生目標是“不奢望取得偉大的成就，只希望自己沒有後悔的事情”，女士們沒什麼反應。最後一位是幹練的刑事案件律師，他極愛遠足旅遊，他的表現都不錯，直到後來他向女嘉賓們強調，自己非常看重“順從”這項美德。結果沒有一盞燈亮，他獨自一人走下舞台。

再過幾天就是農曆新年了，隱隱然像是大限。當天晚上我碰到一位男士叫王晶斌（音），他30歲，國字臉，人很和氣，為了返鄉團圓而努力準備。我們沿著一道牆而坐，他對我說：“他們（指家人）給我很大壓力。就因如此，我今晚才來這裡。”大學畢業後，王成為生意人，出口餐巾等紙制產品。這項工作對他使用的英語詞彙影響很大。當他描述相親不順利時，會說自己“被退貨了”。他現在還單身，讓鄉下的親戚們很心煩。他跟我講：“我姐姐很不贊成我來這裡，她說：‘在那裡你別想找到老婆。’”他自己是怎麼想的呢？他說，“我得按自己心思來走，我姐姐的教育背景、生活經驗跟我不同，所以我倆想法不一樣。”

他姐姐讀書只到國中，仍住在老家村子裡，開一家店賣麵條及汽水。她20歲時，經親戚介紹，嫁給一位鄰村男子。相形之下，王晶斌在山東大學讀英文專業，然後來北京找工作。我們碰面時，他已在北京待5年了，已經快要掙脫工人階級之列。我們聊天時，我心裡替他填了該問卷：1、有孝心的兒子……4、精打細算的居家男人……14、勇敢的男人。

王晶斌告訴自己，每星期至少參加一次男女派對，直到找到對象。他說：“跟你說實話，昨天我就被一個姑娘退貨，原因在我身高不如她的期望。”我問他，是否贊成婚前應該有房有車這種想法。他說：“贊成，原因在房與車是禮貌的象徵。女人嫁男人，部分原因是嫁給他的房跟車。我現在還租房子，所以我覺得壓力很大。”他沉默了一下，說：“但是，我有潛力，你覺得呢？依我看來，買車買房要再花我5年，再5年。”

Chapter5不再是奴隸

鄧小平宣布，“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當時他沒說是哪些人，要由中國人自己去琢磨。

在此之前，黨首要也最持久的目標，一直是階級專政。毛拆散400萬家私人企業，把資產國有化，把社會階級打得如此之平，使得中國的貧富收入差距，在社會主義國度裡，降到最低。學生們被教以小資階級等“階級敵人”是“吸血鬼”、“寄生蟲”。文革時代，這股熱誠最為熾烈，軍方為了剷除軍階，做過了頭，以至於在戰場發生紊亂，士兵們必須由制服的口袋數來辨認彼此（軍官口袋比兵多兩個）。任何努力，想改善個人命運，不僅毫無意義，而且非常危險。黨禁止競賽運動，而且，以前奪牌的運動員發現：自己被追溯指控為“奪牌狂”——犯了追逐勝利，不顧大眾健康的罪。人們最後說，“造火箭的賺得比賣雞蛋來得少”。

但是現今各地方報紙最常見的主題之一，便是夢想“白手起家”。吃午餐時，我喜歡把報紙攤開在餐桌，閱讀街頭小吃攤販變成速食大亨等第一代企業巨子的故事。中國人對窮人變富翁的故事，態度沒什麼與眾不同，只是它們已變成中國自我定位的重中之重。中國人現在談論脫貧致富，跟美國人把矽谷創業家由車庫起家說得天花亂墜，方式一模一樣。第一批實踐鄧小平宣言的人，被稱為“先富群體”。儘管最近大家尊敬白手起家的財富，但中國花了好幾十年在反地主、反“走資派”，以至於大多數先富群體寧可隱姓埋名。中國人愛講，“人怕出名豬怕壯”，所以《福布斯》雜誌2002年開始出版其中國富豪榜時，刊出來的男女富豪照片，都戴著紙袋，凸顯他們寧可保密。樂透彩得主如此擔憂外界的矚目，中國報紙刊出贏家拿著超大尺寸支票時，他們都戴了頭套及太陽眼鏡。

對共產黨來說，階級的重現反而是出現一個機會：黨最後相信，吸收這些有財產的人，可以壯大自己，對抗爭[閩主]的鼓譟。黨官援引古哲孟子的名言，“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但仰仗經濟繁榮來確保“恆心”，卻造成麻煩，在中國共產黨的本質悖論裡滋生。黨是馬克思、列寧的傳人，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者，能掌權是靠著指責資產階級價值與貧富不均，怎麼能堂而皇然擁抱新有錢階級？它該如何維繫治國的意識形態正當性？

然而，這是個自我創造的時代，對共產黨亦然。任務落在國家主席兼黨總書記江[則閩]身上。2002年開完黨最重要會議之後，他大搞一個修辭學新解：他承擔不起使用“中產階級”一詞，但是他宣稱，自此以後，黨將致力於“新中等收入階層”的成功。“新中等收入階層”無所不在，黨官稱頌，新口號奉其為神聖。中國的人民警察學院有位作者描述，新中等收入階層是“支撐文明禮貌的道德力量，要剷除特權、根治貧窮，必須有這股力量。它是一切的一切。”

同一個會議上，黨還對其憲法進行重大修改，不再自稱“革命政黨”，開始自稱“執政黨”——中國領導們已然改動其存在的理由。藉著成為執政黨，這批前反抗軍、花了幾十年痛斥整地為“反革命分子”的人搖身一變，成為十分熱心於保持現狀，以至於革命這個詞彙現在都有問題。位於[添安門]廣場一側的革命史博館名字取消，整合進“中國國家博物館”。2004年，中共國務院總理溫說：“團結與穩定真的高於其他一切”。

若是這項變化在中國百姓聽來很偽善，他們也沒什麼選擇，只能接受。尤有甚者，人們被剝削了那麼久，以至於他們

對舊教條殊無好感。黨與人民此時面朝反方向：中國社會越來越多元、喧鬧、無拘無束，黨則變得越形一元、正經八百與保守。

2007年10月，我向人民大會堂提出申請，想採訪“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政治行事曆上最神聖的事件，每五年召開一次，一整星期辦演講、典禮。官方形式上，人民共和國的領導班子是由黨代表大會決定的。（事實上，那些決定私下早已做好了。）國家主席兼黨總書記胡登台，走到講壇。他跟許多位在黨頂峰的同儕很像美式專業訓練出身的工程師，也是一位接受“發展是硬道理”的技術官僚。時年65歲，他十分沉默寡言，喜怒不形於色，以至於中國民眾替他取綽號叫“胡[面癱]”。這有部分要歸咎他自己：文革大恐怖之後，黨竭力防止其領袖搞個人崇拜。做得很成功。胡年輕的時候，官方傳記臚列一個事實，說他愛跳社交舞；可一等他攀登黨的頂峰，談及他喜惡的唯一亮點，就被隱晦不談了。

胡放眼看去，台下是兩千名忠誠黨代表組成的人海。這個場面是演出團結一致的活戲：壁壁相連的紅毯、紅簾幔，還有巨大的紅星由天花板射光下來。胡身後，有幾排貴賓官員依階級高低就座，很多人跟他一樣，打紅領帶。整齣戲編排完美無瑕。每隔幾分鐘，就有一群年輕姑娘帶著保溫瓶，經過貴賓席，倒茶之精準有如水上芭蕾舞者。胡用老百姓不會用到的詞彙講了兩個半小時。他談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及“科學發展觀”，還有一如往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矢言只進行加值式的政治改革。他說，黨必須保持“核心”地位，以“協調各界努力”。

人民大會堂外，中國擁抱階級回歸。1998年，當地一家出版社翻譯了福塞爾（PaulFussell）的文化諷刺著作《格調：社會等級與生活品味》，書中有這樣的觀察，論如“你觀賞的運動賽事肢體接觸越暴力，階層就越低”。然後換成中文版後，諷刺意味大大褪色，而書卻大賣，因為被當成新世界的“戰場指南”。譯者在前言寫到：“只有金錢並不能使你獲得普遍的認可、尊重和賞識。你怎樣花你的錢，這些消費使你呈現什麼特徵，則成為更加要緊的問題。”

布魯克斯（DavidBrooks）的書《BOBO族：新社會精英的崛起》2002年譯成中文版，也成為暢銷書。書中描寫遠方世界——一個由美國資產階級波希米亞人占居的國度，混合60年代的反文化以及雷根時代經濟學——只是在中國，它俘虜了奮鬥上進者的自我感知，而“BOBO”一詞中文被譯成“布波族”，成為

中國網路當年搜尋最熱門的詞彙之一。布波族酒吧、布波族讀書俱樂部很快出現，還有一款筆記型電腦，廣告保證布波族得到“爵士情調的浪漫”。接來下中國媒體用膩了布波族，改向“DINK”——北京話說成“丁客族”——雙薪、不生小孩，一些列其他新標籤、新認同隨而出現：網民、房地產大王、房奴。有位匿名作者寫了篇大受歡迎的文章，刻畫出年輕白領階級男男女女的標準典範：

“啜飲卡布奇諾咖啡，上網約會，組織丁客家庭，搭地鐵及計程車，坐經濟艙，住好旅館，上酒吧，打長途電話，聽藍調，加班工作，晚上出門，過聖誕節，搞一夜情—

—床頭櫃擺《大亨小傳》及《傲慢與偏見》。為愛情、禮儀、文化、藝術及經驗而生。”

野心時代裡，生活加速了。在社會主義底下，叫人匆匆忙忙的理由少之又少。除開毛時代的大躍進幻想以外，人們依官僚制度及四季節奏工作。動作快一些或者更有效率些，以及冒更大危險，餐桌食物也所添無幾。就好比帝制時代的宮廷鼓樓，社會主義中央計劃官員決定，秋天何時打開中央供熱系統，而到春天又何時關閉。可是，忽然之間，中國被一種感受咬住，那就是國家進行得太慢了。任教於中山大學的社會學家何肇發出版一份宣言，支持快速，他說在日本，行人平均每秒走1.6公尺。他批評中國同胞說，“即使穿高跟鞋的美國女人都比中國小伙子來得快。”他呼籲國人要緊急領略到每一秒鐘的可貴。他寫道“浪費時間的國家會被時間拋棄。”

有些賣命工作的人，在其還不甚懂得如何花錢時，就已經取得非比尋常的財富。2010年，中國經歷“海外首次公開募款熱”，翌年5月，約會網站創業家龔海燕把她的公司弄到納斯達克上市，交易首日結束，她的持股價值超過7700萬美元。她的丈夫為了公司，辭去果蠅研究工作。

龔海燕邀我去吃晚餐。他們在北京的北郊買了房，我們車停靠路邊時，太陽正在西下。經過一處寵物水療浴及名叫“清錦源”的豪宅群，我們轉彎進入林木青翠、有大門的社區，這令人聯想到美國紐澤西，而非中國。她的家外面塗灰棕色，裝飾濃郁的義大利風情。龔兩歲大的女兒穿著睡衣，由大門蹦出來抱住媽媽的腿。她丈夫帶我們進入餐廳，而跟她住在一起的父母及奶奶已經坐在餐桌旁。

一家四代女性同住一屋，讓我印象深刻。龔的奶奶94歲，文革時被歸為富農，受了很多折磨。她出生時，中國剛廢除纏

足陋習；我們吃飯時，我心中盤點了她這一生所經歷過的中國20世紀大戲，直到她住進孫女位在北京郊區的豪宅。龔一邊用筷子扒飯，一邊說：“以前女人慣常講：‘嫁漢嫁漢，穿衣吃飯’。只要你能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我就嫁給你。但現在不一樣了。我可以擁有好的生活、獨立的生活。我可以挑剔。若你有什麼讓我不喜歡的，嗯，你就倒霉了。”

好些年來，龔家搬離開出租公寓，斯時他們6個人睡兩張臥房。現在，他們住獨立式房屋，左鄰右舍是歐洲外交官及阿拉伯商人。他們搬進來才9個月，四壁猶然空白，

30

還沒買書畫或藝術裝飾品，但遲早會買。有台機器腳踏車停在前門，按鄉村傳統，是用來擋想偷腳踏車的小賊的，只是我想，龔的鄰居並不會帶來那種威脅。看來好像龔家就是把湖南細軟打包進來，然後在北京一間CEO住得起的別墅就全給卸了下來。

野心時代要的是新技術、新知識。在中國創業，得會拼酒，為了協助菜鳥度過此一煎熬，哈爾濱市開了一家夜校叫“偉良人際關係學校”，傳授“飲酒策略”課程。（小竅門之一：飲一杯之後，偷偷把酒吐進茶裡。）學不到的就用買的：電子產品大亨張大中就聘請三名“閱讀幹部”，把他想讀卻沒讀的書總結起來。

中國“虎媽”有很多吹毛求疵的習慣，西方人近來才讀到：在此之前很久，最暢銷的中國父母教養指南是《哈佛女孩劉亦婷：素質培養紀實》，一位名叫劉衛華的媽媽記錄下她如何把女兒弄進常春藤名校。教養方法在孩子還沒出生就開始了：劉衛華強迫自己吃高營養餐，儘管它叫她噁心。到18個月大，她教女兒背唐詩。小學時代，她帶著女兒到喧鬧場合讀書，以磨練她的專注力，而且照表操課：每讀20分鐘，跑樓梯5分鐘。為了培養韌性，叫女兒雙手握冰，每次15分鐘。這乍一看來很荒謬，但是對於還在奮力脫貧的中國人來說，事實上任何犧牲聽起來都合理。

垂涎於精英教育之文化資本的，其勤勉程度莫過於先富群體。他們當中很多人出身一文不名，也曉得：都市知識分子當他們是土包子。中國人口這麼多，讓大學入學競爭激烈得如此殘酷，人們把它比擬成“千軍萬馬走獨木橋”。為了創造更多入學機會，政府十年間把大學、學院的數目加倍，成為2409家。即使如此，有心讀大學的學生，每4人才有1人能考進去。

受過美國教育會格外有公信力，先富爸媽把自己的焦慮灌注到子女身上。2008年秋天，我與一名名叫張茵的女士吃午餐。她以“垃圾皇后”之名而眾所周知。上海雜誌《胡潤報告》（HurunReport）每年都會公布中國最有錢人的排行榜。2006年，張茵成為中國第一位女首富。她是中國最大紙廠玖龍執業的創辦人，她曾有“垃圾皇后”那個綽號，是因為她征服不起眼的利基（Niche）行業，以最高效率迎合全球貿易：她買進堆積如山的美國廢紙，以低廉價格運到中國，回收做成紙箱，用來包裝印上“中國製造”的商品，再把貨賣回美國。2006年《胡潤報告》估計她的財富有34億美元。翌年，張茵的財富倍增到超過100億美元，而雜誌認定，她是全世界靠自己發跡最有錢的女人，排行在奧普拉（OprahWinfrey）及J.K.羅琳（J.K.Roling）之前。

張茵與她的前牙醫丈夫、現任她公司的董事長劉名中，在這家全球最大紙廠的經理專用咖啡室接見我。而這裡只是張茵在華南東莞市幾家廠房之一。她時年52歲，是守舊派的工廠老闆，不會說英語，而她的中國話帶著濃重的東北腔調。她身高幾乎不到5英尺；談話之間，有幾波滔滔不絕的力量及不耐煩推促著她，彷彿她在傳遞中國工業界的認同。她說：“市場不等人，若是今天我不開發，而等一年，或兩三年再開發，那我對市場而言，就無足輕重，而錯失機會了。我們都只是普通人，跟別的公司沒兩樣。”

當我們吃飯時，她不想談生意了；這對夫婦倆想談自己的兩個兒子。老大人在紐約，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電機碩士；老二人在加州，讀大學預校。用餐到一半，她的助理把一張老師替她兒子寫的大學推薦函遞交給她。張看了看，還給助理。

她對我說：“他的GPA在4.0-4.3。”接下來，帶著自修有成的人特有的自豪，她說：“他腦子裡都是美式教育，有必要也接受一些中式教育。不然的話，就會失去平衡了。”

2005年我抵達中國時，據美國國土安全部資料，讀美國私立高中的中國學生只有65人。

5年後，人數已近7000。共產黨的達官顯要跟我講他們的子嗣就讀於塔夫特（Taft）或安多佛（Andover）時，我已經見怪不怪了。（最終，有一群中國精英父母把來往奔波的費用省下來，把子女送去北京一家新開的奢華預備學校就讀，而他們聘請了喬艾特（Choate）及霍奇斯基（Hotchkiss）的前校長來經營。）

一切自力更生的途徑中，讓人最感刺激、影響最廣的，莫過於學習英語。“英語熱”感染餐廳侍應生、公司董事長及大學教授，把這種語言抬高為界定人生潛力的手段—

—這股力道強到足以改換你履歷表的形貌、吸引配偶，或者在村子裡取得很高地位，龔海燕的約會網站上，男男女女自我描述時，除了提到汽車房子，經常還含括英語流利程度。每位大學新鮮人英語理解力、至少要符合最低限度，而且唯一會考的外語就是英語，一位鄉下學校老師王剛寫了本小說《英格力士》（English），他說：“若是我們能重整（英語）字典的字眼，整個世界就會向我敞開。”

這一點與過去相比，真是極大扭轉。在19世紀的中國，英語被蔑視為跟外國貿易商打交道的掮客所操語言。1861年，改革派學者馮桂芬寫道：“今之習於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達游閒，不齒鄉裡，無所得衣食者，始為之。”但馮知道，為達外交目的，中國需要英語，於是呼籲創設特殊語言學校。他寫道：“中國多秀民，必有出於夷而轉勝於夷者。”毛喜愛中國學俄語，而且驅逐了那麼多英語教師，以至於到60年代，全國英語老師不到1000位。鄧向世界開啟中國國口後，英語熱變牢固了。2008年受訪者當中，82%認為學英語很重要。（在美國，11%認為學中文很重要。）在2008年，中國估計有2億到3億5千人在學習英語，中國最大的英語學校“新東方”在紐約證交所掛牌上市。

我想見一位名叫李陽的男子，他是中國最受歡迎的英語教師，而且，或許是全球唯一一位能讓學生激動到哭的語言教師。李是自己公司“李陽瘋狂英語”的頭牌老師兼總編輯。他的學生背誦他的傳記時，其一致程度有如念咒：他是黨政治宣傳家的兒子，父母的嚴格紀律讓他變得太羞怯，甚至不敢接電話；他讀大學差點被當掉，只是後來他準備英語考試時，大聲朗讀，而且發現讀得越大聲，膽子就變大起來，而且講得更好；後來他成為校園名流，再發展出事業帝國。他開始教書20年以來，曾現身於數百萬中國成人及孩童之前。

2008年春天，他來北京市郊一所規模不大的學院，監督一整天的密集研討會，我去造訪他。他抵達時，有專用攝影師及個人助理在側。他踏入一間教室，大喊：“Hello，everyone！”。學生們鼓掌歡迎。李穿了紫灰色高領衣及深灰色短大衣。他當時38歲，黑髮已襲上一絲淡淡銀白色。

李凝視學生們，請他們站起來。學生都是醫生，年紀30多或40多歲，是北京各醫院挑選出來，為當年夏季奧運服務的，

但是跟其他中國幾百萬名學英語的人一樣，這種他們花了很多年由教科書學習的語言，幾乎沒有自信說出口。“李陽英語”闖出名氣，靠的是一種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技巧，而香港有家報紙把英語稱為“喊出來的語言”。李陽主張，喊叫才能釋放他稱為“國際肌肉”的東西。李站在學生之前，以帳篷復興教派人士的態度抬起右手，請他們用盡力氣大喊。他陣陣如雷地喊：“I（我）”，學生們回喊：“I（我）”。

“wouldlike（想）！”“wouldlike（想）！”“totake（量）！”“tota
的）！”“your（你的）！”“temperature（體溫）！”“temperature（體溫）！”

醫生們一個接一個嘗試。一位戴時尚黑眼鏡的女士說著英語：“我想量你的體溫。”李很誇張的搖一下頭，叫她再說一次。她臉頰紅起來，突然大喊：“我想量你的體溫！”接下來是一位穿軍服的粗壯男士，他不必李陽鼓勵便說出英語：“我想量你的體溫。”再來是位細小女子，她發出一聲大概是油漆也剝得掉的尖叫。我們繞教室而走，每一次講得都比前一個來得更自信。我很好奇病人會怎麼回應，但是我能開口詢問之前，李陽已經走出門，前往臨近教室，會見另一群學生。

李陽固定在大運動場授課，每班人數有一萬人或更多。最熱心的粉絲付出鑽石級票價，能額外與這位偉人上小組課程。牌價是一天250美元——超過一般中國工人一個月的薪水。學生們圍著他要簽名。偶爾還有人寄上用內衣包起來的情書。

李的成就，還有另一種流傳廣泛的看法。香港教育學院英文專家亞當森（BobAdamson）告訴我：“評審團對他真的有幫人們學到英語與否，依然見解不一。”李陽註冊商標式的叫喊盤踞在特定的聲域：我聽起來，跟某人專門警告有卡車開過來的嘶喊，並不相像，但它的緊急意味，又比叫人吃晚餐來得強。他愛用花俏的愛國口號如“征服英語，讓中國更強”！他在自己網站上宣稱：“美國、英國、日本——他們都不想讓中國強大！他們最想要的，是中國年輕人留長頭髮，穿奇裝異服，喝汽水，聽西方音樂，沒有戰鬥精神，喜愛享樂貪圖舒服！中國年輕人越沉淪，他們越快樂！”中國最有影響力小說家之一的王朔對李陽民族主義式的修辭感到很遲疑。他寫道：“我見過這種煽動。它是種老巫術：召喚一大群人，花言巧語讓他們激動，造出一種強到足以填山移海的力量感受。”王朔繼續說：“我相信李陽熱愛這個國家。但這麼做，我擔心你的愛國情操會變成種族主義般的狗屎。”

但我開始花時間研究他的學生，發現他們看待他，與其說

是一位語言教師，不如說是見證人有望自我轉型。李在紫禁城內、在長城上開班授課。他的名字出現在一百種書籍、光碟、有聲書及塑膠的包裝袋外。李陽的產品大多有他的肖像：戴著無框眼鏡，笑得威風，堪稱21世紀中國人的典範。當他談話時，李陽蠻誇張，自詡名聲堪比奧普拉，而且說自己的書賣出“幾十億本”。（事實上不需要那麼錦上添花，有位他的出版商對我說，估計他的書銷量是幾百萬本。）有位專欄作家在國營《中國日報》宣稱李陽是個“煽動家”。《南華早報》則質問說，李陽的“瘋狂英語”是不是會演變成“某種教派，其領袖堅稱他們應被奉若神明。”（“教派”在中國是個危險詞彙；宗教團體“[砝倫攻]”1997年被貼上這個標籤，此後政府便圍捕其信眾。）

我問李陽對《南華早報》那篇文章的看法，他說：“我被惹毛了。”他說，自己對被人膜拜並無興趣，動機不過是賺錢。他說：“成功的秘訣便是讓顧客一直掏錢出來。

33

我的結論就是如此。”談到他的學生那麼忠誠，他的目標很單純：“我們該怎樣讓他們花錢、花錢、再花錢。”

李陽的宇宙論是說把英語能力跟個人力量綁在一起，而個人力量又綁上國家實力，這種組合能產出強烈、有時甚至極端的崇拜。有位叫馮濤的學生對我說，當時他曉得自己的現金足以去上李陽的一堂課，但缺少趕去當地的火車票錢，“我去賣血”。收集一批這樣的粉絲，上課氣氛堪稱排山倒海。李陽的妻子是美國人，叫李金（KimLee），她對我說說：“有好些次我得跑進去或者請一位塊頭較大的人，去把我女兒從群眾裡拉出來，他們推擠得好厲害，我很害怕。那些時刻，可不只‘哇，他好有名’，而是

‘喔，天啊，這種出名已經失控了’。”

李金在“瘋狂英語”這個世界裡宛如一塊找得到的正常綠洲，令我驚訝。她笑著說：“我只是一個很偶然進入奇怪生活的母親。”她原是佛羅里達州一名教師，1999年隨邁阿密教師工會來中國旅遊，遇見李陽。4年後她嫁給李陽，生了兩個孩子，開始在台上擔任他的教學助手。她道地的美國人長相，說笑時一本正經，完美陪襯了她丈夫的風格：如同美國電影《新婚夢想家》中，一對夫妻角色，一個美國的愛麗絲?克蘭登

（AliceKramden）跟她中國丈夫雷爾夫。一開始，她也因李陽的譁眾取寵、滿嘴民族主義激情而困惑，但是當她注意到學生們反應之熱烈，她為他能跟他們溝通的能力而折服。她

說：“此人對他做的事激情萬分，身為一名教師，你怎能不被感動？”

北京課程結束幾星期之後，我參加李陽每年最受期待的活動。“瘋狂英語冬令營”。大風雪剛好碰到中國人最重要的團圓日農曆新年。場面之混亂史無前例。在廣州，數

10萬旅人被困在火車站周遭道路。但是，很神奇地，有700名成人、小孩仍設法抵達廣州市南從化區的大學校園。有位10歲男孩跟我講，他已經坐了4天車，開車的人是他哥哥。

那場英語訓練營裡，督學穿著迷彩服，用擴音器講話。他們帶領學生們以隊形環繞校園。李的面孔無所不在，連同英語詞彙印在超大海報上。在通往咖啡廳的樓梯上，海報寫著：“你想過自己夠格吃這頓飯嗎？”（HAVEYOUTHOUGHTABOUTWHETHERYOUDESERVETHEM
沿著學生們排隊等上課的廣場，海報寫著：“絕不讓你的國家失望！”（NEVERLETYOURCOUNTRYDOWN！)通往大會場的出入口上方貼著：“一生至少一次，你應該體驗完全瘋狂。”（ATLEASTONCEINYOURLIFE,YOUSHOULD

EXPERIENCETATALCRAZINESS.)

開幕日上午9點前不久，學生們魚貫進入會場。沒有暖氣，十分寒冷，就跟他們住的宿舍一樣。（前一個晚上，我穿著全套衣服，還戴帽子才能入睡。）李陽把說英語能力與體格堅韌聯結起來，是基於他的基本信念：說英語世界與非英語世界，兩者間落差如此寬廣，以至於任何努力或丟臉的舉動，都值得一試。他下令給學生“愛上丟臉”。在一支給中、高年級學生的影片裡，他說：“你必須犯很多錯，你必須被很多人嘲笑。但是沒關係，因為你的未來跟其他人的未來完全不一樣。”

一條長而鋪上紅毯的伸展台從群眾中心切過，一陣鞭炮聲過後，李陽蹦上舞台。他戴了無線麥克風，來回踱步於伸展台上，腳的高度，剛好與坐著仰望他的群眾肩膀等齊。

他問到：“世界人口1/6說中文。那為什麼我們要讀英語？”他轉身向一排悶悶坐在他身後的外籍教師揚手說：“因為我們可憐他們不會說中文！”群眾掌聲如雷。

接來下4個小時，在凍得麻木的寒氣中，李陽由盛氣凌人轉為激動振作。他在攝影鏡頭前神采飛揚，他揶揄一流大學畢業但講中文的人，聽眾如痴如醉。接下來幾天，學生們破曉時一起跑步，高喊英語。每節上課之間，校園裡散布著喃喃自語的英語學習者，像攻讀猶太教法的學生，他們臉貼著李的著作，

雙唇飛快讀著。

一天下午，我逛去外頭，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在門口碰到張濟民，他很瘦，愛發問，今年23歲，留著卷狀頭髮讓人想到電影人物丁丁。他較愛用英文名字麥可，跟我講他研習“瘋狂英語”已有5年。張的爸爸是退休曠工，他沒錢買票參加冬令營，於是前一年他來當營隊活動的保全員，儘可能豎起耳朵旁聽。今年，他獲拔擢為營區助教，還有小小津貼。

我們往外走到太陽下，麥可對我說：“我見到李陽時，通常會緊張。他是超人。”麥可的熱情很能感染他人。他說：“我還不懂‘瘋狂英語’時，我是個很害羞的中國

人，什麼也說不出口，太羞怯。現在我很有自信。我可以在大眾場合對任何人說話，

也可以鼓舞大家說話。”

麥可的哥哥曾擔任李陽的助手。哥哥英語學得不多，但麥可開始一天花約8小時學英語，反覆地聽李陽錄音帶裡的聲音，他說聽起來“像是音樂”。他最愛的書是《李陽標準美語發音寶典》，有益於他磨練母音、打造子音。最後，他在一家英語學教取得教職，另希望有朝一日他可以自己開一家。

那年冬天，我遇見幾十名李陽的學生，總是問他們，英語能滿足他們人生什麼需求。有位養豬場主希望能迎接他的美國客戶；有位金融工作者是趁假期來進修的，他想取得職場優勢。英語能帶給他什麼，麥可毫不懷疑。幾年前，他哥哥參加直銷網路，販賣健康飲料及口服補充品。這類銷售組織在北京官話叫“老鼠會”，在財富飆升的中國很盛行，推波助瀾的還有迅速致富的夢。整個人口漂浮於意識形態信仰。

麥可繼續說：“他一直要我加入。”我腦中試著想像：他以目前敘述英語的熱情，誇讚某健康滋補品的益處，會是什麼光景。“我花了半年做那個生意，一無所獲。”麥可的哥哥最後去美國，想賺些錢來償還他的債主。麥可說，他到紐約當餐廳侍應生，直到他回國後，輪到麥可賺錢養活爸媽。

麥可邊說著，聲音裡的熱情消褪了。他哥哥要他也去美國。他說：“他的夢想很大。但我真的不想去那裡，原因是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意。若你只是工人，工字不出頭，發不了財的。你會買不起房，買不起車，無法養家。”

麥可瞪著自己的雙腳說：“我別無選擇。這就是人生，我應該一直微笑，但事實上我覺得壓力很大，有時我想哭，可我是

男人。”

他停了下來。空蕩蕩地很安靜，除開一陣夾著李陽語音的暖風，在我們身後的體育場迴盪著。

幾個星期後，麥可邀我去他與父母合住的廣州公寓吃午餐。公寓位於淘金路高聳的現代公寓大廈。麥可在大門接我時，心情很好。他說：“我晉升為教學督導了，還有加薪。”一家人的公寓由客廳、兩間小臥室及廚房組成。他的父母正在做飯，空氣中瀰漫菜的味道。麥可與他父親睡一間臥室的上下鋪，他母親與姐姐合住另一間。麥可的房間堆滿英語學習書籍。感覺上，英語像是摸得到、很凌亂的另一個室友。他在一個箱子裡摸索帶回來的自製字詞卡，就像李陽往常做的那樣。他抽出一張卡，上面標記著：“職業：太空人、麵包師、理髮師、酒店老闆、生物學家、藍領工人、老闆\經理人、植物學家……”

麥可還小時，一家住在叫“五號礦”的採煤鎮。他的父母度過貧困及政治動盪的艱辛歲月，麥可說：“生活只有一個目標，正常過日子。”但麥可很渴望離開五號礦。他在一個用做語言練習的段落裡寫道：“我再也無法忍受每天吃饅頭、剩下來的菜還有番薯。再也受不了年復一年穿同樣補丁的衣服，被同班同學嘲笑，再也受不了走路一小時，去上那間破爛的舊學校。”

在煤礦老闆等人借錢幫助之下，麥可去讀大學，而英文變成他最迷戀的東西。他在日記寫道：“有些夜裡我甚至睡不著，好想起床練英語。”他看美國電影，學習動畫《獅子王》裡老獅王木法沙雄壯的聲音。替木法沙配音的人是瓊斯（JamesEarlJones）。在校園裡，這位聲音聽起來有點像黑武士（DarthVader）（黑武士的配音演員也是瓊斯）的中國年輕人令人側目。他的朋友霍布森跟我講：“他就像株小草。”

讀大學時，麥可到當地電台、肯德基洗碗打工，但即使有煤老闆借的錢，學費還是很貴，麥可讀了兩年輟學，正職時間用在讀“瘋狂英語”。他比我遇見的任何人，都要徹底吸收自我創造帶來的希望。最後他自稱“再生說英語的人”。在日記裡，他不再膠著於自己的挫折。他寫道：“樹的成長要靠氣候，但我創造了自己的天候，控制了自己的命運。你無法改變生命的起點，但靠著學習及努力工作，你可以改變終點！”他的書架好多商業竅門的書，以及自助指南。他染上業務員的習慣，就是在自己評論時，加上奉承逢迎式的問題如“你能相信嗎？”

我們坐在他臥室裡，他決定播放一些他替學生們製作、當

成發音範本的錄音。他點擊一段叫做“英語是什麼？”，加上海浪及海鷗的聲音做背景，錄音時請一位名叫伊莎貝爾的女孩幫腔，你一句我一句地展開：“英語十分簡單。我完全可以征服英語。我不再是英語的奴隸。我是它的主人。我相信，英語將成為我衷心的僕人，一生的朋友……”

錄音又播了一分鐘，麥可專心地聽著，此時我的眼光落在一張手寫的中文小標語，貼在他的床角，上頭寫著：“過去不等於未來，相信你自己，大奇蹟。”

Chapter6割喉

野心時代從中國海岸拂向內陸，由城市往工業鎮，再由工業鎮往鄉村，與移民的路線剛好顛倒。當它抵達那些長久以來，一直盼望有機會從草根底層逃脫的人，此時對財富的追求變強變烈，出現奇思怪想。偏遠村落的農民從事大膽的發明，博得“農民達·文西”的綽號。有些點子極為務實——有位罹患腎臟病的男子自造洗腎機，材料是廚具及醫療器材，包括衣夾及二手血泵。但這些發明家之所以興起，更常見的原因是他們被普遍存在的一切皆有可能的感受所激勵：他們建造賽車跑車與機器人，有位叫吳書仔的老爺爺用木料造了一架直升機。他的鄰居說他的直升機看來像雞籠，但吳堅持不懈，盼望“可以乘這輛飛機飛出大山去見見世面”。

然而，儘管有這麼多農民達·文西，還有白手致富的傳言，但態勢越來越清楚，就是先富群體超前的速度，遠非他人能夠趕上。到2007年，前10%的都市中國人，收入是底層10%的9.2倍，比前一年的8.9倍變得更高。民眾示威，經常是由領不到工資的憤怒工人，或者田地為了開發而被抄沒的農民所發動，其件數到2005年暴增為8萬7千件，而10年前只有1萬1千件。人們越是了解貧富差距擴大，就變得越鋌而走險。前文提到的英語老師麥可，他認為自己每天工作時數必須增多，以至於決定每晚睡眠時數限制在4小時。他對我說：“錢，我可以賺，但是時間，我造不出來。”

奮力想趕上先富群體的人雖然被激發出創造力，下場卻可能很悲慘。有位叫王桂平的裁縫，住長江三角洲的江蘇省泰興，他加入鄰居們，搞生產化學品的新生意；他跟另一位村民講，做這些可以“讓我兒子上好學校，我們變成城裡人”。夜裡，全家人都入睡了，受過國中教育的王裁縫借助一本化學書，進行實驗。他發現自己能把某溶劑偽裝成另一種，而後者更貴，故從中可賺取差價。他後來回憶說：“在賣之前，我喝了一些，胃有點燒灼，但沒有太嚴重。”他找到其他化學成分的代替品，

以廉價充高級，獲利固然上升了，但他調製的東西最後變成了毒藥，而在2006年，它被拿來做感冒糖漿，在廣東一家醫院就造成14人死亡。裁縫則鋃鐺入獄。那一年，中國關掉400多家小型製藥廠。總計起來，他們那些含毒的製品造成數百人死亡，有些受害者遠在巴拿馬。

想趕上致富，幾乎影響到每個人，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有位50歲的前理髮師蕭潤平發現，自己的冒險致富的胃口大增。2007年夏天開始，他頻頻從自己住的香港鄉下前往澳門——中國唯一合法賭場賭博的轄地。澳門坐落在珠江注入南海入海口岩岸的一隅，面積約為紐約市曼哈頓區的1/3，涵蓋一處熱帶半島及兩個小島，在中國地圖看來像大陸剝離的碎屑而已。

很久以前，毛主席便禁止在中國賭博，但賭博卻在澳門留存下來，原因在歷史留下的難題：有將近500年，澳門是葡萄牙人的殖民地，1999年回歸時，當地獲准保留一些昔日公子哥的享樂傳統，作家奧登（W.H.Auden）稱當地為“天主教歐洲來的雜草”。中國新富的錢財注入澳門，導致當地房地產業空前勃興；到2007年，也就是蕭潤平開始去澳門時，澳門賭場的總營收已超越美國拉斯維加斯。再過幾年，流經澳門的賭金金額便超過拉斯維加斯6倍以上。

蕭潤平以前運氣並不好。他成長於香港鄉下的淤泥灘，新屯民區的一處鐵皮小屋。他出生那一年，要命的大洪水淹過他家那一區，接下來的幾年則發生旱災，然後又颱風肆虐。有位當地官員在自己的回憶錄談到那段時期，寫道：“神明彷彿要把我們逼瘋毀掉。”蕭有5個兄弟姐妹，他只念到國小畢業。當理髮師之前，蕭曾去當裁縫、工地工人。照理來說，賭博在香港並不合法，但是跟許多中國人的社會一樣，大家低調地把它視為一種生活中必備的活動；到了9歲，蕭已經鑽進人群，去看當地人斗撲克。

13歲時，他就開始小賭，有家地下賭場雇他四處巡邏，監視賭客的手。他對我說：“我很擅長觀察人的舉動。每當我看到人出老千，我就向莊家報告。”

成年後，他繼續賭牌，只是輸多贏少。他的模樣並不起眼——身材瘦長結實，兩頰豐滿，頭髮蓬鬆，眼神敏捷警戒，是個習於保護自己的男子。他19歲結婚，生了3個小孩，離婚，再娶。在他福興老家村落，他以綽號“爛賭平”聞名，他倒不怎麼在乎。

當理髮師的時候，蕭結識一位瘦削的當地小伙子王鑑明。

王生長的區域跟蕭一樣，是香港最窮的地區之一，也一樣輟學找工作。他們偶爾會到王為他母親工作的咖啡廳碰面吃晚餐。當晚，蕭一直想當小鎮開發商，在村子附近的稻田建售房屋，而王想開自己的餐館。當王鑑明開始到澳門那一邊工作，當“疊馬仔”，就是招賭客組團，給他們信用額度，然後依他們下賭的金額抽佣金時，兩個交情更好。他招的人當中，蕭也居其一。

每星期一到兩次，蕭會來公共碼頭搭船，橫渡珠江入海口的洶湧水域。每天來澳門賭運氣的有7萬人，其中半數以上來自中國大陸。蕭對自己的賭癮能否帶來好運並未心存幻想。他說，“每10個來賭的人當中，可能有3個會贏；那3個人繼續賭下去，只有1個會贏。”他玩百家樂，中國賭徒的最愛。它的勝率比別種賭法高一些，同時容易精通。玩百家樂並不需要技巧，結果為何，在牌發下來時已經注定好了。

2007年8月，蕭按例去賭，這次則一開始就交好運，而且連贏幾個星期，旺到不行。有些天，他贏幾千美元，其他日子裡，他則把幾十萬美元贏回家。在王的推薦下，他獲邀到最奢豪、只對下注最大玩家開放的貴賓廳，而且成為揮金如土、搭直升機來回該水域的豪客。蕭賭的也越來越大，王的抽傭、小費就越多。隨著冬日接近，蕭的大贏引發出一連串事件，足以顯示出何以在中國新的金權地貌中，澳門是很容易沾上是非的所在——不管你以前是香港理髮師，還是美國最有錢人之一，都是如此。

賭城是能自我翻新的聖地。拉斯維加斯原來位於沙漠邊緣，沙暴及突發的洪水肆虐之地，也是19世紀摩門教傳教士眼中“上帝遺忘的”土地，他們拋棄了它——但是接下來，當地變為每年吸引人數比伊斯蘭聖地麥加還多的城市。已過世的美國大西部歷史學家羅斯曼（HalRothman）寫道，拉斯維加斯向每個來玩的人提出同樣問題：“你想成為怎樣的人，而你打算付出多少代價？”

渡輪抵達澳門，迎上來的是一群兜售的人。我是在一個秋天下午到達的，有位年輕小姐把一張中文廣告遞給我，寫著“直通美國”，上頭有免費電話，給講中文而想以折扣價格買美國房地產的人。我的手機響了，是家賭場發來的自動簡訊：

“新濠天地慶祝‘一元致富、富、富’的幸運得主。贈品為大獎11532812港幣！登上致富快車，下一個百萬富翁就是你。”

澳門人口只有50萬，感覺起來，像是既放大又縮小的中國。驅動澳門的，是相同的野心、冒險與自我創造的結合，只

是通過這裡的錢跟人數量之大，把這個結合品蒸餾成萃取液，效力如此之強，讓它既可以像是澳門城最強的力量，也可以成為它最大的負債。澳門以前生產煙火、玩具及塑膠花，但是一等賭場降臨，工廠就消失了。一般民眾的收入，要比一般歐洲人來得多。建築工沒完沒了。我入住飯店時，窗戶景象讓我回想起剛到中國的頭幾個月，焊槍的光芒一天24小時映照在窗戶。

即使以中國標準來看，澳門的成長速度也令人咋舌。2010年，揮金如土者在澳門丟擲的賭資，大約有6千億美元，大約等於全美國自動提款機一年提取的現金。但是，就算賭桌上易手的現金那麼多，也只是全貌的一隅而已。2011年美國國會中國關係執行委員會的年度報告中指出，“澳門賭博業的成長，系中國大陸賭客的資金及美國控營的賭場之成長所推波助瀾，伴隨而起的還有廣泛的貪腐、組織犯罪及洗錢。”2009年美國外交官在內部電訊中形容，該地已成為“澳門洗錢服務中心”布希政府國務院亞洲暨太平洋事務高級顧問亞瑟（DavidAsher）對我說，澳門“《007》電影的風味已一去不返，而越來越像《諜影重重》的場景。”

2005年，美國聯邦調查局滲透一個走私團伙，其中一人為澳門籍男子洪濟明（音），幹員們扮作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游擊隊的代表。加西亞（JackGarcia）幹員要求買武器，洪給他一本型號目錄：反坦克火箭、榴彈發射器、衝鋒槍及AK-47。為了引誘洪等人前往美國，便於逮捕，聯邦調查局還假辦一場假婚禮，由一名男幹員及一名女幹員擔綱演出。洪等一干客人收到香味撲鼻的邀請函，去停泊在紐澤西州梅伊角的遊艇上參加慶祝典禮。加西亞對我說：“我當伴郎，我們由單身最後一夜的排隊上接到他們，開車直送聯邦調查局辦公室。”共有91人被捕。依據本案，加上其他訊息，美國財政部把澳門匯業銀行列入黑名單，罪名為從事洗錢勾當，與北韓政府掛鉤；對此，該行予以否認。

自夏朝以來，賭運氣向來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藍志雄教授對我說：“政府經常千方百計禁賭，但賭得最大的人，正是官員自己。他們可能會丟官、杖責、下獄、流放，只是我們依然見到這股趨勢橫亙歷朝歷代。”藍研究中國人對冒險的態度。他跟我走路前往新濠天地：那是一家賭場建築群，使用的促銷口號寫著：“來玩，改變你一生！”經過6年研究調查，藍把每個賭桌看待成“微型戰場”，科學與信仰兩方在其中對峙。賭場（莊家）是一方，他們可以穩妥地算出自己的優

勢到小數點第2位。對家一方，是一堆有關命運及迷信的中國人信仰之大集合，對此藍說，“人們曉得它是不理性的，但它依然是文化的一部分。”他點出一些眾所公認的民俗信仰：要改善勝率，就要穿紅色的內衣褲；離家時，所有燈光要點亮；要預防連輸不已，去賭場的路上絕不要碰見尼姑和尚；別走大門，總之走側門。

自澳門建城以來，就跟陰謀牽扯上關係。其建城故事敘述一件高明的騙行，1564年左右，中國當地漁民請求來訪的葡萄牙艦隊幫忙跟海盜打仗；葡萄牙人把自己的大炮偽裝起來，放進中國船隻，在海上伏擊海盜。為表報答，中國同意葡人居留在那個半島上。澳門成為來往印度與日本的重要停靠站，只是最後，離此不遠的香港建起更好的港口，使澳門不得不找尋別的特長：鴉片、娼妓及賭博。荷蘭裔作家德·利奧（HendrikdeLeeuw）1930年代為了寫《罪惡之城》（CitiesofSin）而造訪澳門，他感喟說本地“聚集了世界上所有的社會渣滓、醉醺醺的船老大，是四海漂泊的流浪漢、失意者的居所，美麗而野性的浪女數量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港口都要多。這裡就是地獄。”

澳門有史以來的大部分時間內，其地中海情調跟中國風味一樣多，有著巴洛克建築風的教堂，棕櫚樹下咖啡座一排又一排，移居海外的老者早晨喝咖啡，閱讀《澳門論壇報》。只是我來的時候，澳門已有幾許波斯灣的風情：中央空調的豪華飯店、高樓大廈、豪華跑車閒擱在大太陽下。澳門政府的稅收經常比預算多一倍，跟科威特一樣，澳門發支票給居民，依據的是“現金分享計劃”而施政。失業率在3%以下。《澳門商業》等雜誌的發行人阿奇維多（PauloAzevedo）跟我見面小飲時說：“拉斯維加斯花

75年的成就，我們15年就達成了。”這種步調讓澳門欠缺很多東西，如計程車、道路、住房、醫療服務。阿奇維多說：“要找牙醫，我得到泰國去。”有一個月，澳門面臨沒硬幣可用。賭場重組了澳門人工作與生活的節奏。而其方式並非普世稱譽。“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區錦新也是中學老師，他碰到學生對他說：“我可以現在就去賭場找個工作，賺的比我的老師還多。”

拉斯維加斯大亨永利（SteveWynn）在車程離渡輪碼頭不遠處，蓋了涵蓋兩座飯店的建築群，其中的路易威登店，據說每平方店面產出的銷售量，要比全球其他分店來得多。公關處人員帶我四處看，我們走經一個螢光水母住的水族館，它在夜

間要用特殊設計的隔簾遮起來；公關人員對我說，中國客戶要求的豪華等級要升高，原因是來的人“不是董事長就是集團主席”。我們駐留在建築群最新、有米其林星級評等的餐廳，

他們聘請一位駐店詩人，替每位貴賓量身裁製一首詩。我向一位女服務生請教，為什麼每桌旁邊都放了一個小型的白色皮凳，她回答說：“那是讓你放手提包用的。”

一個世代以前，中國人還得把珠寶等值錢物埋在後院裡，以躲避政治迫害。到2012年，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奢侈品的最大消費國。雖說中國人一點也不懷念被剝奪、匱乏的年代，但這種一心一意追名逐，能把中國人改變到多大地步，大家還是很好奇的。有個廣受傳頌的笑話描述有名男子在北京街角被一輛跑車擦撞到，撕扯掉他一隻手臂，他驚恐的瞪著傷口大叫：“我的表！”

澳門總是令我回想到美國的“鍍金時代”。《強盜貴族》（TheRobberBarons）一書的作者約瑟夫森（MatthewJosephson）描寫1870年代美國人如何調適自己突然發了財。他寫道，有一男子“叫人在他牙上鑽小孔，然後齒科專家植入兩排鑽石；他走到外頭時，咧嘴微笑，牙齒就燦然生輝。”當時美國政治系統挨到的批判，跟今日中國的政治體系面臨的差不多：貪腐、欠缺法治、面對企業壟斷時軟弱無力。1870及80年代，罷工及示威肆虐全美時，也遭武力相向。賓夕法尼亞鐵路的史考特（ThonmasScott）放言，讓罷工者“嘗幾天來福槍當三餐，看看他們還會不會喜歡那種麵包”。歐洲人老愛說，美國是由野蠻直接到腐化，中間沒有通常該有的文明。

澳門讓中國新的有錢階級得到放縱的機會。當設計他的賭場時，永利尊重中國有關致富之道的一切迷信：飯店設計者意識到水療中心的私人房間數目為“4”——不吉利的數字，原因是在中文裡面聽來像“死”——他們就在大廳裡裝一排假門，暗示總數是8，8這個字在中文裡聽來像“發”。在拉斯維加斯，永利出大名，但他的澳門賭場還是使用賭場設計家稱為“驚奇特色”的東西。每個小時一次，遊客們會聚集在大廳，觀看地板洞開，而一條動畫巨龍會爬出來，蜷曲在空中，眼放紅光，鼻孔噴煙。

新濠天地聞起來有香水、香菸、地毯除汙劑的味道。事關輸贏，中國賭客很少喝酒，而低沉、歡樂的賭場聲音，不時被捶桌子的聲音打斷；捶桌的原因有贏錢很高興、輸錢很不爽，還有想改改運。有一晚我湊到一桌百家樂附近，只見一名濃眉而小瘦的男子臉泛紅光，流著汗在表演“眯牌”：就是慢慢地瞥到他的牌邊線，他周遭的人則吼著“小！小！”想喊走會叫他輸的大

牌。男子眯牌到足以看見他的牌數時，臉氣得扭曲起來，把牌扔到對桌去。

藍教授說：“美國人往往認為自己是命運的主宰，而中國人則視命運為非由自主之物。為了改運，中國人覺得有必要做點什麼，來取得好運。”調查顯示，來賭場的中國人往往把下注當成投資，而投資當成下注。在中國人看來，投入股市及房地產跟賭場幾無不同。韋伯（ElkeWeber）及奚愷元兩位行為科學家對比了中國人及美國人對金融風險的處理態度。他們做一系列實驗，發現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自認為比美國人要謹慎得多。只是他們接受測驗，要求做一連串金融決策時，此一刻板印象證明是錯誤的：同等財富階級的中國人，要比美國人更愛冒險。而且是常態。

日積月累下來，我已能料到我的中國朋友會冒著我認為很不安全的風險，拿著他們的儲蓄創業，在沒有職業保障的情況下，就搬到全國各地。有一種說法——韋伯及奚愷元稱為“緩衝墊假說”——指出傳統的中國大家族網路讓人們有信心，就算自己冒險沒成功，也能轉向其他親戚求助。另一種理論則跟經濟起飛年代關係較密切。澳門大學商學教授蕭志成對我說：“鄧小平進行的經濟改革本身就是一大賭博。所以人們才會有此想法，即冒險不僅可行，還很有用。”他說，對那些脫貧成為中產階級的人，“他們的思維很可能是如此：假如我輸掉半數錢財，嗯，我還撐得下去，我又不會變窮，幾年後我就會賺回來。但若是贏了呢？我就大大發財了。”

中國對敢於冒險的流行，讓我想到了林毅夫，這位台灣叛逃的軍官，他押寶在新中國。雖然他的歷程比大多數人激烈的多，但是他的決定與任何動身尋找更好前途的移民，實有雷同之處——龔海燕與她的線上約會生意，或是“瘋狂英語”的學生；或是以此類推，在美國鍍金時代由歐洲來的移民。你想成為怎樣的人，而你打算付出什麼代價？

以“爛賭平”蕭潤平的案例，成功與冒險招來注意。蕭連贏4個月後，香港暢銷的《蘋果日報》八卦專欄注意到有位神秘人物在澳門大殺四方，據說斂聚的財富高達1億5千萬美元。“他到底是太幸運，還是真有點石成金之術？”該報2008年元月問道。

翌日，香港立法會議員、大賭徒詹培忠跟該報說，他有聽人說，新來的豪客是“賭神”，這一名詞系借用香港電影明星周潤發主演的一部電影名。職業賭徒有個說法，叫蕭之流的人為“流星”，憑空而來，通常也消失得一樣快。連贏這麼久，金額這麼大，肯定會招致懷疑。賭場深知自己在百家樂的優勢（大約

1.15%）是已事先注定的：賭客想要贏的機率，在玩3萬手之後，就化為泡影。一個很

著迷的玩家可能週末賭上一千手，最後大有斬獲，但玩上7個月，應該幾乎沒人能抱著錢回家。把蕭潤平封為賭神的報導刊出沒多久，他21歲的兒子就接到一連串恐嚇電話。接下來有一晚，某人潛入福興村，放火把他家一部分燒毀。最後，蕭的朋友王鑑明，當初介紹他進貴賓廳的疊碼仔，接獲一通憤怒的電話，電話另一端的男子下令開會，討論爛賭平有沒有出老千的問題。

多年以來，一直沒人比何鴻燊更能印證澳門精神的了。這位大亨身材高大，專跟小明星、舞女約會，直到80幾歲跳探戈都還舞藝超群，經常坐在車牌HK-1的勞斯萊斯豪華車裡游車河。他父親把家產在股市敗個精光以後，何在二戰期間在澳門開了一家貿易公司。他後來說：“到戰爭結束，我賺了100多萬，而我起家時只有10元。”他擴張營業，進入航空、房地產及船運業，為期40年，這讓他成為亞洲最富有的人之一。外國政府懷疑他對中國犯罪組織太寬容。何鴻燊否認這項指控，但各國官方阻止何氏家族想在美國、澳洲經營賭場的野心。為了保持澳門精神，何鴻燊挑選經商伙伴時來者不拒；他託庇伊朗國王來經營賭馬、豪華賭輪則靠菲律賓馬可士，另與北韓金正日經營一座小島上的賭場。因為他的人脈，情報界幹員費盡心力想交結何鴻燊，但任職於香港的聯邦調查局退休幹員、現已逝世的葛羅夫（DanGrove）對我說：“沒人過得了第一關。”

何鴻燊的賭業壟斷權在2002年期滿，外國公司蜂擁而入，競奪經營執照。第一家新開張的賭場是“澳門金沙”，撐腰的是拉斯維加斯的阿德爾森（SheldonAdelson），此君在《福布斯》雜誌的排行是美國第9大有錢人。阿德爾森與何鴻燊的外貌適成相反，他矮而結實，一頭艷紅短髮。他父親來自立陶宛，開計程車為業。他在波士頓市的多徹斯特區長大，經營的生意很廣——替飯店打理化妝室用品，賣化學噴霧劑為汽車擋風罩除冰——直到1979年，他推出“電腦經銷商博覽會”（COMDEX），才出現事業的重大突破。後來他買下拉斯維加斯的金沙飯店，創造出美國最大的民營國際會議中心，把賭博與展覽中心搭配起來而致富。

阿德爾森早就垂涎澳門，視之為接觸13億中國人的入口，而他向北京領導人“求愛”成功，方法是強調自己對共和黨政界的影響力。（2012年總統選舉，他是唯一最大的個人戶金主。）2004年5月，他開張自己第一家賭場，接下來著手進行他說是在

夢裡閃現的點子：在澳門兩座島之間的開闊海面上，重現拉斯維加斯長廊。他的公司用300萬立方的砂石填埋入海，造價24億美元的“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開幕，以超大比例複製拉斯維加斯的威尼斯人酒店，賭博樓板面積全球最大。他對大家說，希望有朝一日，澳門能讓他超越比爾·蓋茲及巴菲特的財富。

拉斯維加斯的盈利大多來自硬幣餵進角子老虎機，澳門有所不同，3/4的營收來自貴賓廳投下的巨額賭注，豪客們一天24小時在那裡賭。賭場仰仗豢養著“疊碼仔”的中介公司，他們的存在，是為了解決在澳門經營賭場的某些實際問題——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禁止他們到大陸收賭債。透過疊碼仔便合法的繞彎路解決這個麻煩，原因在疊碼仔能夠從全中國招來有錢客人，給他們額度，再來處理收帳的棘手事情。這套系統對有必要把大筆現金弄出中國境內的顧客，特別有吸引力。若是某貪腐官員或公司的董事長想藏匿贓款，疊碼仔是條好渠道，可以在邊境一邊交現金，到另一邊再取回，用籌碼的形式，可以賭，也可以兌成乾淨的外國貨幣。（另一種做法是揣帶現金通過管制鬆散的澳門邊境，這麼做在洗錢圈子裡稱為“藍精靈”（smurfing），典故是來自漫畫中的小精靈，指的是由不起眼的信差組成的大軍。）

疊碼仔業當然有很多奉公守法的人，但幾十年來，它一直容易受犯罪組織介入。在中國，出名的犯罪組織有“三合會”等；三合會脫胎於19世紀的政治會社，咸信“三合”一詞便是源自三個團體合併成一個強大組織。他們插手高利貸及娼妓業，澳門的賭場界感受得到它們的存在，只是近些年，三合會變得越來越生意取向。他們把販毒等微罪擱到一旁，以便追求伴同因人民共和國更加繁榮而衍生的犯法商機，如洗錢、金融詐欺及賭博。誠如犯罪學家所述，幫派分子變成“灰色創業家”，而且到底是三合會從商，還是生意人的做法變得像三合會，兩者越來越難以區分。以往在地方報紙以綽號知名、有三合會聲譽的男子，現在搖身一變，成為經營博彩業的人士。

事實證明，澳門對貪腐的中國官員格外有吸引力。黨的核心幹部落馬，背後澳門的角色頻頻出現；他們帶著公款來澳門，再兩手空空而回。有一對來自重慶的張姓官員，

2004年在賭場輸掉1200萬美元以上。有位前江蘇黨委書記輸了1800萬美元。另一位來自重慶的官僚之尤其顯眼，不在他輸的金額，而是他輸的速度：他竟能在48小時內輸掉25萬美元。這麼多官員因在澳門揮霍公款而被捕，以致2009年，學者們計算出平均每個官員在被捕前賭博台上輸錢的平均數字：330

萬美元。

為了找出沒被宰過的百萬富豪，疊碼仔會細心閱讀商業報導，找尋新人。有位39歲的疊碼仔跟我講，“今天在澳門，一個人若沒賭上幾十萬美元，那麼他根本不算真的客戶。”客戶要是不付帳怎麼辦？“我們會去他容身的城市，打電話給他。接下來，若是有必要，我們會在當地等個兩天，向他施壓一下。”

蕭家被放火幾星期後，一群小伙子被叫到香港郊外某停車場開會，召集人是中國三合會最惡名昭彰之一“和合圖”的中級幹部施華倫。

施華倫年紀30，身材魁梧。他對屬下說，計劃勒索蕭潤平。其中一人後來在庭上描述說：“老闆要某人吐些錢出來。”老闆指的是張治太，他是和合圖的首領，香港警方及美國檢警都曉得他。香港高院法官波克哈利（VerinaBokhary）形容，張治太在澳門金沙的貴賓室是“他說了才算”的人物；而蕭在百家樂發財，澳門金沙也失血不少。一但他被懷疑出老千，張的人馬就打算把他贏的錢奪回來。

施華倫提出很直接了當的計劃：伏擊蕭的朋友王鑑明，用兩台車把王的車夾停下來，然後迅速送到鄰近村落，他們在村裡一棟破敗孤絕的房子準備了手套、頭套、鉤子、刀，還有可伸長的警棍。計劃中，是想打斷王的兩手兩腳。只是接著施把他的人馬叫回來：計劃升級成謀殺，以便讓蕭明白：他們是認真的，肯定要把他贏的錢吐出來。

只是施華倫向手下交付這種差使，反而讓他們退縮了。其中一人問道：“有必要這麼認真嗎？”

施很吃驚。他說：“老闆叫你們去做，你們敢不做嗎？”另一個被挑選來行刺的人發牢騷說，當天晚上他本來要去吃喜酒的。第三個人劉明義

對沒給酬勞，而叫他去做這種差使，十分不滿。他後來說：“你不付錢給人，也想指望人家幫你？”

劉特別感到不安的原因，在於他認識被盯上的被害人。劉當時20幾歲，是農人之子，曾替茶樓當外送，開自己塗成金色的豐田車穿梭於那個行政區，偶爾還會送外賣去王鑑明的村子。劉說：“想到要殺人，誰都會吃驚，更何況是你所認識的某某人。”

施華倫指出劉在這樁謀殺案該扮演角色時，劉很猶豫。頭頭火大了，罵說：“丟你老母，你在考慮什麼？”

碰到壓力，劉不再反抗，他對頭目說，這件案子他會出力去做。但其實他心中不這麼想。他十來歲便加入和合圖，只在施手下當小卒，且生活捉襟見肘。這些年來，他在報攤和網咖工作。當時他已有懷了孕的女友，而且他開豐田車撞壞一台卡車，要500多元來修理，已經叫他夠心煩的了。

對擔任打手的劉明義來講，這件差使只有吃力不討好，預定作案日拂曉前幾個鐘頭，他打電話給認識的警察，提供線索。兩人在當地叫大叔公廟的小廟附近碰頭，劉把一切都給警察講了——有關謀殺的計劃、賭神、關被害人的房子、刀鉤等等。後來在法庭上，劉解釋說，“我是孩子的爸，想當負責任的人。”他決定脫身。認罪協議或許意味著得坐牢，但他計算過，在他最關切的事到來前——“在我小孩懂得一切之前”——他就能出獄。

警方在幾個小時內逮捕5名男子。那年秋天，他們出庭受審，劉作證指控。5人堅稱無罪，但因他們是合謀蓄意致人傷殘的三合會成員，而被判有罪。首謀的施華倫還因其他指控，即策劃謀殺、召人犯案而被定罪。5人都被判有罪入獄，最高刑期為14年。

（劉因其合作而獲免刑。）調查期間，警方另拘留和合圖首領張治太，但他沒被羈押太久就放出來。根據施的辯護律師海恩茲（JohoHaynes）所述，張打電話給他的律師，拒絕回答任何問題，結果便是他沒被指控任何罪名，安全脫身。庭上宣判時，海恩茲感嘆說，小魚小蝦坐牢了，“大老闆卻安然無事，在澳門逍遙自在。”

審案時，蕭潤平及王鑑明也出庭作證，他們被詢問估計一下在那5個月大贏期間，蕭攢聚了多少錢。這個問題很複雜，原因是澳門豪客經常“超注下賭”（sidebet），實際賭金比檯面上的籌碼要高出許多倍。（超注下賭時，賭客及疊碼仔私下同意，每100元籌碼則等值於1000或10000，接下來私下擺平輸贏。）蕭潤平估計，他贏了約莫1300萬美元。王供稱的數字則大得多，是7700萬美元。

43

一位前理髮師贏了多達7700萬美元，而且比負責把錢弄回來的匪徒命還大，這讓香港媒體從業人員大感興趣。有一陣子，他們追逐這位賭神，當他是奇人，話雖如此，他拒絕任何採訪。審判一年之後，香港《壹周刊》刊出了一篇報導，指稱蕭有作弊，找到操控全局的方法。文章宣稱，他花錢買內線，

專門記錄賭客的輸輸贏贏，以便把他的贏放到最大，而輸呢，則減到最小。雜誌臆測，賭場沒察覺此一詐欺的原因在蕭下注時，很多都是超額下注，帳面上沒記錄，除此之外，疊碼仔做夢也沒想到一個默默無聞的賭客敢冒這種不凡的風險，試著買通賭場職員。蕭從未回應這篇報導。總之，當地媒體發現他已經消失了。

賭神從當地社會版面消失。接下來，在2010年秋天，澳門金沙前行政總裁翟國成（SteveJacobs）提出不當解職之訴，多般指控阿德爾森。翟國成說，他與阿德爾森討論賭神案件，還有不顧阿德爾森的反對，談及傳說三合會涉足金沙各賭場；他說，阿德爾森依然試著“積極栽培疊碼仔生意”。翟國成訴狀裡也指控金沙賭場雇用一名澳門議員，如此該賭場有違反《反海外腐敗法》之嫌。該法禁止各公司賄賂外國官員。賭場經營公司否認一切指控，另外表示，翟國成才是未能阻止三合會首腦接近公司的元兇。

但美國政府注意到本案。司法部及證券交易委員會對金沙展開調查，了解是否有違反《反海外腐敗法》。阿德爾森強烈否認有任何不法。他說：“當這些謠言之煙霧散去時，我絕對——不只百分百，而是百分之千——敢打包票，一切都是無的放矢。他們要取得我所有的電子郵件，我可沒有電腦，而且我不用電子郵件，我不是用電郵那種人。”

阿德爾森跟他的同儕這才發現，要在中國經濟大繁榮的邊界做生意，要冒各形各色、始料未及的風險。他們慢慢了解：自己的財富，此時有多少跟他人的行為掛鉤起來——共產黨幹部、三合會，甚至是一個做夢想打敗賭場的理髮師。賭神一案，其檔案可以解讀成一連串意外事件：蕭潤平在百家樂賭桌大行其道；王鑑明太幸運，因為暗殺他的差使，居然交給一個有良心的刺客；阿德爾森很倒霉，記者們大肆報導這件晦澀的殺人陰謀，而殃及到他的賭場。但換種說法來看，這件奇事跟賭場的運氣關聯甚少。相形之下，它不如說是與各方自我利益的激烈碰撞有關，是中國在其鍍金時代的寓言。

在它的放縱逾越、陰謀、充滿道德彈性之中，澳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焦慮的新紀元開啟了一扇窗。在中國往昔幾乎均貧的時代當中，幾乎沒什麼東西可偷，也沒有什麼理由考慮到因有可能驟然得到財富而產生的道德壓力。但現在，中國新得財富，政府管理又晦澀，經證明這幾乎是製造濫權的完美溫床。

2007年，蕭潤平在澳門交好運時，華裔經濟學家裴敏欣指出，中國各省份裡，幾乎有半數把它們的運輸部門主管關進牢

裡。裴計算過，千奇百怪的貪腐，耗費掉中國國內生產毛額的3%——比全國教育經費還多。

對中國政府來說，澳門橫氣十足的成功，造成一種兩難處境：該放任它繼續下去到什麼程度？中國只消使用簽證許可，就能扼殺澳門的繁榮——公民要取得特別許可，才能去澳門，而中國可以隨心所欲地開放、關閉人潮。只是掃蕩澳門也會造成政治麻煩。中國的贏家，那些白手起家的人、新中等收入階層的成員，想去享受一下自己發財的成果，澳門是個好地方。只要他們不去關心政權內部到底是怎麼運作的，那麼統治班子也不好公然的管他們怎麼做。由澳門飛北京的航班上，我旁邊坐著一位前軍方官員，現在他擁有房地產及一系列工廠。他對我說，每個月去澳門一次，“透透氣”；那趟

航程的大多數時間裡，他都在仔細檢查他新買的珍品：一隻價值12000美元的“威圖”（Vertu）手機，手機用鱷魚皮包裹，配備一個按鈕，讓他可以連上一名全職的管家。

在此時，澳門領導跟他們北京同道一樣，瞧不出任何應該改變的理由。我接洽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局長雪萬龍時，他說，“澳門又不是拉斯維加斯。”我過了半響才了解，他援引拉斯維加斯，是指拘謹的道德自製標準。他繼續說：“澳門僅是博彩業，就吸引了200億美元的外國投資，簡而言之，很符合公共利益。”這個觀點，與黨談論自己在中國的成功一致，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而對很多人而言，此一觀點正確無誤。

蕭大贏過了4年，我從香港一位朋友那裡聽說他可能已回到老家元朗區，住在離他成長而已被拆除的貧民區不遠之處。據說他已經跟另一個三合會叫“和勝和”的敲定了保護協議。我坐高鐵去郊外找他。他住在在植物繁茂的河口三角洲，遠處地平線有青翠的小山環繞。夏季炎威已退，建築似乎到處都在進行，舊村落被改建成很多別墅，有著諸如尊爵、天藍及銀花園之類的名稱。

我在一處廢鐵廠附近的建築工地找到蕭。四周是阡陌縱橫的菱角田及水仙田。他在做房地產生意，得償夙志，正在蓋14間大宅，住宅乃現代設計，不鏽鋼及黑色花崗石的風味極濃，蓋好之後看來會像加州沙加緬度或亞特蘭大的住屋，名稱叫“登峰造極”。蕭穿著鬆鬆的黃色高球衫、牛仔褲及髒髒的球鞋。他似乎謙遜起來，語音很粗，身形幾乎跟他的工人們難以分辨——都是來自中國鄉間而曬得很黑的瘦削中年男子。我抵達時，大約是在下班，我發現一名男子赤身露體，用一桶肥皂水草草沖洗。我自我介紹時，蕭看來不怎麼高興。但我解釋說，

自己對他感興趣很久了，並且曾追尋他的路線，總之，我很好奇他當初要冒那種風險。他同意跟我聊天。我們坐在晾衣繩旁的摺疊椅上，往外瞧著還沒蓋好的房子。

我問他，那段銷聲匿跡的時間裡他到哪裡去了，他微笑了。“全中國，我自己開車，有時我住五星級飯店，有時我住在默默無聞的小地方。我最喜歡內蒙古了。過了一陣子，我搬去江西的山裡，待了8個月，開始降雪時，我差點凍死了，於是便下山回家。”

我問他，玩百家樂時是否有耍詐。他說：“那些記者，只聽那些想把錢要回來的人所放的謠言。人人都說我在賭桌上出老千，但我沒有。我賭的時候，一直都有10個人的眼睛瞪著我，你說我怎麼出老千？”

他的否認，倒是打開了一種可能，即賭博本是被操控的遊戲。有位被告聘請的律師對我暗示說，蕭很可能是受僱的小玩家，參與一樁更大的詐欺陰謀，只是接下來他發現，自己可以把這項犯罪計劃轉化為對他有利。我突然想到，假如此說為真，那麼意味著蕭潤平允許大家把野心押寶在他身上，只是後來他自己發財的欲望壓倒一切。但律師也說：“這世上虛偽太多，誰曉得真相是什麼？”

我問蕭潤平，他是否認為三合會還在找他，他回答說：“我今年50歲了，能活到幾歲，70嗎？那麼我只有10來年可活了。我有什麼好損失的？沒什麼好害怕的。”他沉默片刻，臉上浮現出一絲詭異的微笑，“再說，他們若是來找我，我也可以去找他們。”

因為他的小孩，他已不再去澳門。他說：“我不要他們去賭博。有兩個孩子都大學畢業了，一個還讀到碩士，他們不罵髒話，是好孩子。”他接著說：“你想賭得好，警覺性要很高。我不建議人人這麼做。大家叫我爛賭平，我可不喜歡這個稱呼，原因是我從未上癮。我賭，是因為曉得我會贏。”

夜幕降臨時，蕭提議開著他黑色的凌志SUV，載我去火車站，車就停在我們身後，蠟打得如此之亮，以至於它在街燈下微射光芒——這是他有錢的唯一跡象。天空深紫，光線熹微。“以前只要我想去威尼斯人賭場，就會有直升機來接我。”蕭潤平說：“現在我變成泥腿子，房地產更有油水，比賭博、賣毒等等都賺。”他對還在蓋的房子點頭說：“這些房子每間成本幾百萬元，賣出去要價則是一千萬。”

Chapter7任重而道遠

先富群體有了財富的裝飾品——孩子在常春藤名校讀書、閱讀團隊替他跟進新書速度——他們就想要心靈與氣質了。已奮力攀到中國工業革命頂層的男男女女渴望能有機會，在更廣大的世界、在品位、藝術及美好生命等事務上，擴大自己的選擇範圍——至少了解他們錯失了什麼。

1942年5月，毛主席在談及藝術與文學的未來時說：“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對毛來說，藝術是“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黨應該確保藝術、文學和其他品位表現，緊緊附著在後來被稱為中國社會“主旋律”的東西上，也就是黨對價值、優先順序及欲望加以提煉之後的解釋。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繪畫表現臉蛋紅通通的農民、電影塑造堅強的戰士、詩歌謳詠崇高的英雄主義而聞名，這種風格被稱為“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系由黨的信仰所形塑而成。正如“中共文藝沙皇”周揚曾說：“今天的理想，就是明天的現實。”有某些案例中，藝術家太專注於直言不諱地表現當今事實，會被譴責為“寫實主義創作”，因而獲罪。

1976年毛死掉以後，第一批站出來的前衛藝術家自稱“星星畫會”，這個名稱是畫會成員馬德升對以往“單調一致”發出的駁斥，也是“強調我們個性”的一種方式。

1979年，他們的首次展覽被國家博物館拒絕，他們把自己的作品掛到外面的圍牆上，在“我們要求政治民主及藝術自由”的標語下發動遊行。1990年代大多數時光，當局逮捕赤身裸體出現的表演藝術家，關閉實驗性的表演，用推土機剷平地下藝術家的村落。

但是金錢的注入，讓藝術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改頭換面。張曉剛之類的中國畫家賣出的畫作，叫賣接近100萬美元；年輕一代的藝術家成長於經濟起飛年代，擺明了他們不耐煩於替威權及政治服務。跟其他各國藝術家一樣，他們的視線專注在消費主義、文化和性，而他們碰到的，是新一輩的投機者與收藏家。

一位北京策展人兼收藏家李蘇橋對我說：“我跟朋友們講：‘與其賭4000元在一輪高爾夫球，你不如買幅藝術作品。’”當時我們在一家名叫“新千禧年”的畫廊，李把一件黃毛衣綁在脖子上。他當時44歲，先在汽油產業發財，之後從事藝術品收集已有5年。他估計，自己每年花在購買年輕藝術家作品的

金額，大約20萬元。“我有些朋友住在北京市北的別墅群，談到居家裝潢時，他們會花10萬人民幣買張沙發，再買張100元人民幣的複製畫，掛在沙發上面的牆壁上。有時候，他們不在乎價格，在乎的是大小。”就李蘇橋所知，前衛“跟政治無關”。他說：“中國收藏家更感興趣的，是當前的東西，而非記憶與悲劇。”

共產黨發現，要剝奪中國藝術的反叛能量，最好的方式便是擁抱它；北京市政府多年來威脅要拆除“798工廠”（一處之前是軍方在北京的電子產品工廠，後來被轉化為畫廊及工作室聚集之處），在2006年把它設計成“創意產業區”，觀光巴士為之塞滿附近街道。

藝術商業市場吹氣般膨脹變大。整個中國蓋起了數百間當代藝術館。以往僅能餬口的藝術家，現在作品賣到全世界，並在長城畔蓋起鄉間別墅。藝術家[愛未未]自己開餐廳，以便朋友們、批評家及跟班者能長宴通宵。他委託製作了一系列巨型水晶吊燈台，以揶揄中國的新美學；他把一具燈台掛在鏽跡斑斑的斷頭台上，讓中國新近的不協調變成卡通。

從事藝術的前20年，[愛未未]斷斷續續地創作一串也算重要的作品，同時賭賣古玩，他創作出裝置藝術、攝影作品、家具、繪畫、書本及電影。他曾是早期前衛團體“星星畫派”的成員，現在則幫忙在首都的邊緣建立實驗藝術家社區。雖然他沒受過建築師教育，卻創建了中國最受追捧的建築機構之一，接下來才轉而執迷於別的藝術形式。

2004年，藝評家卡特（HollandCotter）在《扭腰時報》稱，[愛未未]是“一類角色是挑釁的、打破模式的、滑稽學者型的藝術家”。目前他50出頭，已經在中國願景裡發現了豐富的新脈動。2007年他提交給卡塞爾第12屆文獻展的作品，是安排了把1001名尋常中國公民，送到該展覽的主辦地德國卡塞爾市的一場探險。他把這個項目稱為“童話”，指的既是卡塞爾是格林兄弟的故鄉，也是指那種被把持住的外界魅力，而中國有好幾代人竟然無緣窺見。

為了招募赴德國的遊客，[愛未未]更熾烈地轉向網際網路，而那揭曉出一個他以前並不清楚的廣大世界。現在他意識到了，他對我說：“網際網路是力量很強的工具。”他從各基金會及其他機構籌錢，以備航資，其辦公室為“童話”設計每一個細節，乃至手提箱、手環，以及配備了1001張復古清代木椅的宿舍式生活空間。

“童話”誠為中國規模的社會雕塑品，其後勤作業令博伊斯（JosephBeuys）都感到畏縮疑遲，他是該展覽的德國發起人，並宣稱“人人都是藝術家”。只是，對畫家兼社會批評家陳丹青而言，這個項目在中國具有不同的迴響；在中國，來自西方的肯定，包括簽證，一度具有近乎神話的價值。“過去百年，我們總是等候美國人或歐洲人或任何人來點我們的名字。喂，你過來。”

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態度，總是揉合了憐憫、嫉妒及憎恨：憐憫那些蠻夷沒住在中央王國，嫉妒他們的實力，憎恨他們入侵中國。魯迅寫道：“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種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

1877年，清朝正在衰敗，而西方列強崛起，中國改革志士送一位年輕學子叫嚴復到英格蘭，研究英國海軍力量的來源。嚴復結論說，英人力量的根不在其武器，而在其思想，他返國時，帶了一箱書，作者有斯賓塞（H.Spencer）、亞當·史密斯（AdamSmith），米勒（JohnStuartMill）、達爾文（CharlesDarwin）等西方思想家。他的翻譯不算盡善盡美——“天擇”一詞較偏自然淘汰，顯示出更嚴酷的那一面，但這些人對中國的思想衝擊很大。對嚴復等人，進化論不光是生物學，還是政治科學。中國改革派翹楚之一的梁啟超歸結說，中國必須“成其為最適者之一”。太虔誠地崇拜西方也變成負債。20世紀早期擁抱歐洲觀念的活躍人士被譏笑為“假洋鬼子”；崇拜西方是可以被懲處的罪行，一直到毛統治的最後幾年，他與美國建交為止。

到了80年代，西方在中國人眼裡，越來越是機會與創造自我的寶地。有部極受歡迎的中國電視劇《走進歐洲》，講的故事是一名身無分文的福建男子，身著破爛T恤抵達巴黎，幾個月內，他就變成了房地產開發商。在高潮的一幕中，他面對一群歐洲聽眾問道：“距今兩年之後，什麼會成為巴黎新地標？”他拉開蓋在建築模型上的布，然後宣布：“美麗的塞納河畔會充滿遠東的光輝：中國城投資貿易中心！”節目中，法國群眾爆出歡呼讚美聲。

中國人看待西方的矛盾情結非但沒有消失，反而深化了。中國年輕人成長時，看的是NBA與好萊塢電影，書店裡架上擺的卻是《中國可以說不》之類的書，它是我第一次造訪中國時最暢銷、最受爭議的書。這種結合會叫人不知所措。2007年，有3名學者詢問中國中學生：想到美國時，心中最先浮現的5個

詞彙是什麼，學生們的回答顯示出萬花筒般的景象：

“比爾.蓋茲、微軟、NBA、小布希總統、總統選舉、民主、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911事件、賓拉登、哈佛、耶魯、麥當勞、夏威夷、世界警察、傲慢、霸權、台灣。”

我抵達中國時，大多數中國人可涉足到的、最接近西方的地方，叫“世界公園”，一座位於首都邊緣、迪士尼風格的景點。旅客們可以爬上迷你的埃及金字塔、觀看按比例做成的埃菲爾鐵塔、徜徉在仿製的紐約曼哈頓區。只是，隨著人們越有錢可花，他們便探索出更多種花錢的方式。中國旅遊業探詢民眾，最想去哪裡玩，得分最高的莫過於歐洲。再問他們喜歡歐洲的什麼，中國人把“文化”置於榜首。（在負面排行榜上，遊客們抱怨的是“傲慢”及“中國菜做得很爛”。）

中國報紙上，異國度假旅遊的廣告變得密密麻麻，感覺起來好像每個人都準備出國，於是我們決定加入他們。競爭的中國旅行業界所設定出的各式旅遊行程，其遵循的原則與其說是西方豪華旅程的觀念，不如說是依顧客的喜惡。我在網路上瀏覽某些安排：“住豪華酒店，看壯觀風車，賞峽谷美景”的四天巴士行程，強調的是荷蘭、盧森堡宜於拍照的鄉間；“回首舊大陸，探訪新東歐”雖有一定的冷戰魅力，但確實很冷，我可不想在2月去那裡。

我選擇了“經典歐洲”，一趟很受歡迎的巴士行程，10天內巡遊5個國家。旅行費要提前付款。機票錢、旅館、三餐、保險等五花八門的費用，以人民幣付款，相當於2200美元。此外，旅行團的每位中國籍成員都被要求繳納相當於7600美元的押金——超過一般工人兩年的工資——以防止任何人搭機回國前跳團離隊。我是第38位入團的人，也是最後一個，翌日凌晨出發。

我接到通知，按時到上海浦東國際機場2號航站第25號登機們集合，在那裡，我看到一位身材瘦削的43歲男子，頭髮中分下垂。他穿灰色花呢大衣，戴方框眼鏡，自我介紹名叫李興順（音）。為了在人群中辨識出，我們每個人都收到一個亮黃色的領章，上面的圖案是一條鼻孔噴煙的卡通龍，龍爪上穿著健行鞋，下面印著本團的口號：龍騰萬里。

我們登機，在中國航空直飛法蘭克福班機的客艙坐好。我翻閱一本中文版《境外旅遊需知》，要求我們細細閱讀。冊子羅列出曾經發生過的不愉快的意外：“旅遊途中嚴禁攜帶任何仿冒歐洲的商品，因為海關檢查人員會抄沒並處以重罰。”另敦敦

告誡在歐洲旅遊要密切注意安全：“若有吉普賽人沿街乞討，勿施捨；若他們多人圍堵，索看錢包，嚮導遊大喊求救。”隨意與陌生人交談也必須小心：“若有陌生人要你幫其拍照，提高警覺，那是他們行竊的最佳時機。”

我來往歐洲多年，但這本小冊子卻讓我大開眼界，對與這36名遊客及一位導遊一起旅行，竟產生一種奇異的安全感。小冊子還以一句孔子風格的名言結尾，把這次旅行描繪成一次對人性的測驗：“任重而道遠。”

我們在大霧中降落於法蘭克福機場，並在航站內全團集合。團員年齡不一，下至6歲的陸可怡（音），上至他70歲的外祖父劉功生（音）。劉是一位退休的礦業工程師，他的老伴黃雪晴（音）坐在輪椅上。所有遊客大概都屬於中國的新中產階層，其中有高中理科教師、室內設計師、房地產主管、電視台布景師，還有幾位大學生。他們沒人出生農村，翌日他們看見法國農場上的馬兒吃草，覺得極為罕見，人人搶著拍照——但他們來到更廣的世界，還沒有感到舒適自在。除少數幾個人以外，這是他們頭一次到亞洲以外旅遊。李導遊向全團介紹唯一非中國人的我，大家都衷心歡迎我。10歲的劉一峰（音）理了小平頭，穿著一件滿是星星的黑色長袖衫，邊笑著問我：“你們外國人的鼻子都這麼大啊？”我們登上一輛金色大巴。我挑了一個靠窗的座位，旁邊坐著一個健壯的年輕人，年紀18歲，穿著黑色羽絨服，戴了一副細框眼鏡，額頭上的頭髮留得很長，垂到鏡框邊緣，上髭淡淡的。他自我介紹說叫許諾，姓名在中文剛好是“Promise”（許諾，承諾）的意思，他非常喜歡，就把“Promise”用做他的英文名字。

許諾是上海師範大學的大一新生，主修經濟學。他的父母坐在走道對面，我問為什麼他們一家過年的時候不去走親訪友，而是選擇出國旅遊，他說：“過年走親訪友是中國傳統，但現在大家越來越富有了，此外我們太忙，這一年再騰不出時間旅遊了。”我們用中文對話，但他在表示出驚奇的時候會冒出一句“Oh，myLadyGaga！”，這句話是他上學時學到的。

在大巴的第一排，李興順拿著一個微型麥克風面對我們，在接下來的幾天，我們白天沒睡覺的時候，他大致都是這個姿勢。對於中國遊客來說，導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身兼口譯員、嚮導和“戰地指揮官”；誠如一本中文導遊書籍形容，導遊的職責不僅在傳達事實，還要“表示贊不贊成、誇獎或反對、高興或嗤笑”。李興順給人沉穩的感覺，他常用第三人稱的“李導遊”來稱呼自己，另外他最引以為豪的就是辦事效率。“各位團

員，我們的手錶必須調為同一時間，現在是晚上7點16分。”他要求我們每次出發都要提前5分鐘集合：“我們不遠萬里而來，總要玩得盡興。”

李導遊大致描述這次行程計劃：我們很多時間會花在路上，所以，他會在坐車時講解歐洲國家的歷史與文化，如此，我們到各景點遊覽時，便不致於浪費寶貴時間，可以從容拍照。他告訴我們，法國科學家研究指出，一個導遊講解的最佳時間長度是75分鐘左右。他說：“你們知道嗎？在你們李導遊知道這件事之前，我在大巴上最長一次講了4個小時。”

李導遊建議我們每天睡前用熱水泡腳——這可以紓解時差疲勞，他說。此外，他還建議我們多吃水果，而這有助於平衡歐遊期間所吃的太多麵包和乳酪。因為時逢中國新年假期，有很多其他中國遊客，因此我們得注意，在休息站別上錯其他大巴。接下來，李導遊向我們介紹大巴司機派查。派查有點冷漠，來自捷克，以前是曲棍球員，也做過卡車司機，由駕駛員座位上向我們懶懶地揮揮手。（後來他對我說：“有6、7年，我車上載的都是日本遊客，現在全是中國遊客了。”）李導遊另提到行程之外的事情，“在中國，咱們都把大巴司機當超人，一天24小時都能開車，無論我們要他開的時間是多晚。只是在歐洲，除非有天氣、交通等特別狀況，法律有規定，司機一天最多只能開車12個小時！”

他解釋說，每位司機都得帶一張卡，必須塞進儀表板，駕駛時數超限要受罰。李說：“我們或許會認為，你可以弄張偽卡，或在記錄上作弊——做什麼大不了的。但一旦你被逮到，罰金是由8萬8千歐元起跳，還會沒收你的駕照！歐洲人就是這樣辦事：表面上似乎靠大家的自律，但事實上背後有嚴峻的法律。”

我們快抵達飯店了——盧森堡一家叫“最佳西方”的酒店——但李導遊對我們簡介的卻是早點。中國人的早餐標準是吃一碗米粥、油條，或許有幾個豬肉包子。但是在歐洲，他以最有技巧的聲音警告說：“我們整趟旅程，早餐除了麵包、冷漢堡、牛奶、咖啡，大概不會有別的了。”全車為之靜默片刻。

我們沒機會看見白天的盧森堡；拂曉時分，我們便離開了最佳西方酒店，回到高速公路。李要我們確定沒把任何東西留在酒店，原因是，有些較年長的團員習慣把現金放在馬桶蓄水槽或通風管。他跟我們講：“我碰過最糟的一次，是有位客人把錢縫進了窗簾。”

我們前往的第一站是德國小城特里爾（Trier）。對大多數第一次游歐洲的人，特里爾並非很熟悉的地名，但是對中國遊客而言，它卻是異常熱門的景點。因此自從幾十年前，中國共產黨就開始組團來拜訪這個馬克思的誕生地。我買的一本中文旅遊指南，作者是位退休外交官，他說，特里爾是“中國人民的麥加”。

我們在一條整潔的街道旁下車，街道兩旁都是尖頂的、色彩柔和的建築。黏著雨滴的鵝卵石泛著銀白光。李導遊戴上一頂墨綠色帽子，快步領著我們往前走。我們直接抵達了布呂根特拉斯街10號，一棟漂亮的白色三層樓房，有多扇綠色百葉窗。李說：“這裡就是馬克思住的地方，現在是博物館。”我們試著開門，但鎖上了。冬天作息不快，而博物館要再過一個半小時才開門，因此李說，我們只能從外貌品味馬克思之宅。“這裡我們越早結束，就越快去巴黎玩。”大門旁邊有一塊匾，上面有馬克思的側面頭像。博物館隔壁是一家叫做“甜蜜生活”的速食店。

李導遊嘴上雖說我們可以在這裡隨意待多久，不過他不忘建議我們去街角的超市去買水果，以備接下來的旅程。我們在馬克思宅邸前亂逛，拍照兼躲車，直到有個孩子哀求著說，“我想去超市。”並拉著他的媽媽往亮晶晶的店門走。我站在一位很高的50多歲男子旁，一起端詳馬克思的頭像。男子叫王正宇（音），他問道：“在美國知道他的人不多，對吧？”

我回答：“比你想像的多。”我提到，我本以為在這裡會見到更多的中國遊客。王笑了，他說：“那些東西，年輕人都不再曉得了。”

王正宇瘦瘦高高，有那種自力更生派男子的氣質。他生長於華東商業都市無錫，早期被分配做木匠，直到改革浪潮席捲中國後，他毅然從商，現在經營一家小型成衣廠，專制易洗免燙的男士長褲。他不會講英語，但當初他創業時認為自己需要一個容易上口的國際企業名稱，所以他取名為“格-瑞-特”，雖由中國字組成，但他認為，讀起來最像英文“great”。

王很愛旅遊。他說：“以往我太忙，只是現在我想遊山玩水了。以前買地、蓋廠、整屋都由我來。但現在我女兒長大了，已經能主持工廠工作。我該做的只是存存錢辦她的嫁妝而已，那倒是很容易的事。”我問他們夫妻為什麼挑歐洲旅遊。他說：“我們是想，趁還有精力，先去最遠的地方。”我跟王是最晚去超市的人。也就是說，我們這個團在中國人的麥加逗留了11分鐘。

直到最近，中國人才有很充裕的理由把這個世界看待成尋歡作樂的地方。在古代中國，出遊是件危險的事，有句諺語：“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孔子還認為旅遊有損德行，加油添醋說：“父母在，不遠遊。”只是，古代中國玄奘和尚還是去印度，而15世紀的鄭和還率領帝國船隊遠達非洲，“以觀夷域”，而威名遠播。

千百年來，中國人移民到全世界，但因貧窮作梗，移民踏上的不是休閒旅遊之途，毛澤東則認為，觀光業不符合社會主義。毛去世之後，直到1978年，中國人除了工作或求學，否則是不准前往海外的。首先，他們獲准到香港尋親，後來，到泰國、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旅遊。政府對外在世界還很不放心。1996年，我來北京的第一年，政府修改移民法，中國人想出國便容易了，話雖如此，法規還是要求人們必須“政治可靠”，而且露骨地不讓那些被認為“太個人主義、腐敗、墮落或不道德”的人出國。翌年，政府以“有計劃、組織及控制的態度”，放行旅客前往其他國家。中國以地緣政治來考量批准被旅遊的國家。大洋洲國家萬那杜同意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才獲准成為旅遊地點。

政府各部門開始派人出國，並試圖為這些先遣人員考量任何可能發生的事情。2002年有本指南手冊叫《赴外人員最新必讀》，警告說，在中國邊境以外的“外國情報單位及其他敵對力量”會發動“心理戰和思想戰”，用“反動的政治宣傳推翻黨的領導人”。因公出差的人要是碰上西方記者，該怎麼辦？手冊作者們提供策略說，“簡單回答，避實就虛。”

8成中國遊客首次出國旅遊，是以組團的方式，而他們也博得了愛國旅客的名聲，即使有時過了頭。2005年，在馬來西亞一家賭場飯店，大約300名中國遊客拿到印有卡通豬臉孔的餐券。飯店方面解釋，這個圖案純粹只是區別吃豬肉的中國客人與不吃豬肉的穆斯林，但中國遊客覺得被冒犯了，他們靜坐抗議，還唱起國歌。有些案例當中，首度出國的中國遊客在下榻酒店留下的印象毀譽參半，發生過幾起事件後，北京政府出版一本叫《中國公民海外文明舉止指南》的手冊，羅列多條規則，包括：

三、保護自然環境。別踏草坪；勿摘花采果；勿追逐、捕捉、餵食或向動物丟擲東西。六、敬重他人權利。勿強迫外國人與你合影；勿朝著他們方向打噴嚏。

我們團裡，並沒有人有朝動物丟東西的行為。我越是閱讀，便越懷疑《中國公民海外文明舉止指南》的作者，其水準

是不是跟不上中國公民了。大多數國家要在一般公民可支配收入在5000美元時，才會讓大批遊客到海外去玩。但當時中國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僅約其半，旅遊業者要讓行程負擔得起，只有靠大量訂機票與郊區飯店的無情殺價。李對我解釋說："每條路線，幾乎都是由機票決定。"只要在某個日子出現最廉價航班，中國團就嗅到商機。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旅遊路線很像是走北斗七星：由德國開始，繞彎經盧森堡到巴黎，接下來突然急轉往南，經過法國，攀越阿爾卑斯山，直抵義大利，遠達羅馬。這趟行程本可以在羅馬結束了，但我們向後轉，沿原路回到米蘭。

一開始，歐洲並非首選目的地。2000年，去彈丸之地澳門玩的遊客，總數比去歐洲各國加起來的還多。但外界已經注意到了中國商機。法國飯店集團"雅高"（Accor）開始增加中國電視頻道，聘請會說中國普通話的工作人員。其他飯店遵循風水觀念，把床鋪搬離窗戶。越多中國人前往歐洲，旅遊行程變得越是便宜。2009年，英國旅遊業報告指出，"歐洲"對中國是如此成功的"單一、聯合"品牌，以至於個別國家應該明智的擱下自尊，不要急著主打"次品牌"如法國、義大利，這樣會更好。歐洲，與其說是地圖上的一個區域，不如說是一種心理狀態，把儘可能多的國家塞進一個人單一的7天行程，對較少有旅遊機會的工薪階層而言，更有吸引力。李導遊說："在中國，若是你能用100元買10樣東西，不管品質，都比100元買一樣來得好。"

我與一對來自上海的年輕夫妻由馬克思宅邸踱回大巴。太太叫郭彥瑾（音），人很隨和，年紀29歲，自取英文名字叫凱倫（Karen），在一家汽車零件廠的財務部工作；她的先生顧曉傑（音）是某環境清潔部門的職員，英文名字叫漢迪（Handy）。他身材如美式足球員，胸膛厚實，身高1.8公尺以上，個性很平和。他的栗色毛衣有個高爾夫球袋圖案，可我問他打不打高爾夫球，他笑著說："高爾夫是有錢人的東西。"

漢迪與凱倫這趟旅行，存錢9個月，他們的雙親還資助了一些。李導遊要我們別太操心身上帶的錢，而掃了度假的興致——他的建議是：把物價標誌當成人民幣而非歐元。但漢迪與凱倫每一分錢都看得很緊。幾天之內，我們在5個國家內買的每一瓶罐裝水，他倆還能絲毫不差地告訴我確切價格是多少。

回到金色大巴，往西開過法國香檳-艾登（Champagne-Ardenne）區冬日的樹林區，李導遊為自己講求高效率破了例。他說："我們得習慣歐洲人有時慢條斯理。"他接著說，在中國買東西，"我們很習慣三個人都把要買的物品同時放在櫃臺上，收

銀的老太太算帳兼找零，絲毫不差。歐洲人做法不一樣。我意思不是他們很笨。若他們很笨，就不會發展出這些科技了；科技是極要求精密計算的。他們只是做算術跟我們不一樣而已。”

最後，他給我們建議說：“讓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辦事，原因是如果我們催人家，他們會覺得煩，然後心情變壞，接下來我們會認為，他們在歧視我們，其實不盡然是那麼回事。”

有時候，李導遊對歐洲的高水準生活非常驚異——他會用一堆統計數據轟炸我們，像波多葡萄酒的價格、荷蘭男子的平均身高——但要叫中國遊客羨慕歐洲經濟，此非其時。李很誇張地形容地中海式生活風格，“慢慢起床，刷牙，泡杯濃縮咖啡，品味香氣。”全團都笑起來。他再說：“像這樣的地方，他們的經濟怎能保持成長？那是不可能的事。這個世界上，只有人民勤奮、工作努力的國家，其經濟才會成長。”

我睡著了，醒來時已在巴黎郊外。我們的巴士沿著塞納河往西而行，經過“奧塞博物館”（Museed’Orsay）時，陽光正好射透雲層。李大叫，“感受到巴黎的開闊沒有？”大家鏡頭颼颼猛拍。他另外指出，巴黎市中心是沒有摩天大樓的。我們在阿爾瑪橋畔的碼頭登上雙層遊艇，船嘎嘎往上游開去，此時我與46歲的會計師朱忠明（音）聊起來，他帶太太、女兒來玩。朱成長於上海，當地的房地產上漲時，進軍房地產業。他說：“無論是何時買進，都賺一大堆錢。”他頗有領袖魅力，開玩笑而笑起來時，臉頰上綻放出大大的酒窩。他自2004年起便出國，所以團裡其他人都很聽他的。此時，遊艇開到蘇利橋，靠著塞納河的白色石頂河堤慢慢轉身，往回開。

朱表示，中國人對歐洲感興趣，部分原因出自想了解自身的歷史。他說：“歐洲開始統治世界之際，中國也很強。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落後？從那時起，我們一直在思索。”的確，一個強大文明如中國，為什麼在19世紀會衰落，這個問題好比中樞神經，貫穿中國對自己過去的分析，以及對未來的展望。朱提出一種解釋，“當初我們被入侵時，反應不夠快。”這種因被害而衰落的說辭，我在中國經常聽見。（另外，歷史學家也經常責備中國官僚體系與威權制度的僵化效應，再加上其他原因。）但是朱並把中國的麻煩全歸咎於外國侵略。“我們把自己三大核心思想——儒釋道——丟棄了，那真是一大錯誤。自1949到1978年，我們被教導馬克思的革命思想。”他停了下來，看著妻女在船側拍照，橙紅的太陽正在西沉，隱沒於建築物之後。他說：“我們花了30年，現在知道那真是一場災難。”

船靠岸，我們去吃晚餐。我們經過一對在門口親熱的男

女。凱倫挽著漢迪的臂膀，兩人把頭別開了去。我們隨著李導遊走進一家中國店面，走下一排樓梯，再進入一個很熱的封閉門廳，左右兩旁都是沒窗戶的包廂，裡面擠滿了中國食客。這份熙熙攘攘在街道上是看不到的，是與巴黎並行的另一面。那裡已無空桌，因此李導遊帶領我們走出後門，左轉，進入第二家餐廳，也是中餐館。再走下另一道階梯，進入另一間無窗的包廂。飯終於送來了，菜色是紅燒肉、炒小白菜、蛋花湯、辣子雞。

20分鐘以後，我們爬上階梯，來到夜空下，又趕忙跟李導遊走進“拉法葉百貨公司”（GaleriesLafayetteHaussmann）。這家位於鄂圖曼大道的10層樓百貨公司顯然很歡迎東方客人的到來，已布置好中國紅的彩旗及卡通兔，慶祝兔年。我們收到中文寫的歡迎卡，祝福快樂、長壽及消費打9折。

翌日，在羅浮宮，接我們的是另一位說中國話的女性導遊，身形像隻蜂鳥，她大聲說：“我們在90分鐘內有好多東西要看，所以得加快腳步！”她快跑到一支捲起來的紫色旗子下，那是她用來集合大家的標誌。然後一邊開步走，一邊用中文發音教大家一些法國話：“bonjour”（日安）讀起來大約像是“奔-逐”。這很符合我們當下的狀態，我們跟著她匆匆走過十字轉門；而褲廠老闆王正宇，則試著對警衛講他新學的法國字眼：“奔逐，奔逐！”

導遊給我們的忠告是注意力要放在“三寶”上：勝利女神像、斷臂維納斯及蒙娜麗莎。我們依次圍聚在每一個寶貝旁，左右則是其他中國旅遊團，好像敵軍一樣可以分辨：戴紅別針的是“U-Tour”旅行社的團，戴黃色帽子的是深圳學生團。我們破曉之前便馬不停蹄，但氣氛似乎因勤勉與好奇而充飽了電。我們發現，依我們的路線，坐電梯要繞遠路，我很好奇坐輪椅的王雪晴怎麼觀看館藏。接下來我發現，她的親戚扛起她的輪椅，而她則很費力地上下大理石階，大家再推著她到各項珍品之前。

夜色降臨時，又是一天引燃大家稱賞的歐洲景點之旅，但中國遊客的心裡難免還有一絲較勁。我們在一家中國餐館等位置時，朱忠明提到了周朝（西元前1059-255年），即孔子、老子等中國思想巨擘雲集的年代，他對我們一群人說：“當時，中國真是他媽的好！”他太太王建欣翻白眼說：“你又來這一套了。”朱戴著一頂剛買的埃菲爾鐵塔棒球帽，上頭有電池燈一閃一閃。他轉身朝我講話，想找新聽眾：“真的，在周朝，事實上我們跟古羅馬或埃及一樣好。”

從巴黎駕車往阿爾卑斯山脈要7小時。途中，坐我旁邊的許諾在他背包摸索著，掏出一份皺巴巴的《華爾街日報》，那是他從盧森堡旅館拿的。他安安靜靜地讀完每一頁，只有讀到有關中國的一則報導《歐盟發現華為有國家資助》，才手肘推推我請教意見。報導中說，歐洲貿易官員發現，中國科技大廠“華為”從國營銀行取得利率低到不公平的貸款。許諾問道：“美國憲法禁止各公司收受政府補助嗎？”我問許諾有沒有用“臉書”——臉書在中國，官方是封鎖的，但稍動手腳還是連得上。他說：“上臉書太麻煩了。”因此他改用中國版臉書，叫“人人網”；人人網跟其他國內網站一樣，任何敏感的政治討論都會被刪檢。我問他知不知道臉書被封。他說，“那好像跟政治有關。”他停頓一下，說：“但事實是我不是真的了解。”

中國學生有這種脫節，是司空見慣的。他們生活在一個取得科技、資訊的管道前所未有的時代，但“防火長城”也矗立著，政府設立的這個龐大的數位過濾基礎設施，再加上人工刪檢，便足以攔住黨反對的政治內容進入中國人的電腦。很多中國年輕人視防火長城為一種汙辱，但這些障礙如此大，以至於讓很多人不想花心思去規避它們。外在世界的資訊能滲透進去的零零星星：許諾對蘇菲瑪索的最新電影、許多瑞士賽車手的優點，如數家珍，但中國領導人私人斂聚大筆財富的新聞，他就不知道了。

外國思想同時在中國泛濫著，以至於人們要了解它們，只能靠把它們分門別類為可管理的碎片。在北京，一本美食指南叫《評論》，把中國菜分為18種不同門類，但亞洲以外（義大利、摩洛哥、巴西）則只歸類為“西方食品”。

當天晚上，我們留宿在瑞士小鎮因特拉肯（Interlaken），李導遊向我們保證，這裡“空氣清新無比”，對任何居住在中國大城市的人，都算是享受。我跟鄭道（音）與她主修藝術的19歲女兒李澄（音）到鎮上閒逛，漫步經過精品表店、賭場及“荷黑馬特”（Hohematte），就是那片遼闊綠地，當地人在那裡舉辦唱山歌及瑞士角力比賽。我們這趟行程走到一半時，這位19歲的女孩還是無動於衷，她說：“除了建築物不同，塞納河看來與黃浦江沒什麼大的差別。地鐵？有啊，你說什麼我們都有。”她笑了。

當李澄與她的朋友們走在前頭時，她母親跟我說，她想讓女兒了解中國與西方之間比“硬體”更深的差異。李導遊嘲笑歐洲人過得優哉游哉，而鄭則說，中國人變得相信，“凡事不爭先，你就墊底。”在十字路口，一輛汽車停下來等我們過馬路，鄭指

出其間差異。她說：“國內駕駛員認為，‘我才不停，不然哪裡都別想去了。’”

旅程的最後幾天，李導遊原本令人安心的忠告及效率開始不那麼講究了。在巴士上，大家開始問說我們能不能去西餐廳；我們來歐洲一星期了，還沒在不是中餐館的地方吃頓午餐或晚餐。（有份旅遊調查說，近半中國遊客到西方去玩，吃過的“歐式”餐點不超過一頓。）但李導遊警告說，西餐上菜很慢，若是我們吃太快，下一道菜還沒上我們就消化完了。“留著你們下一次來玩再吃吧。”大家沒有異議。在米蘭，他再次提醒我們留心小偷，只是衛生專家漢迪表示懷疑。他說：“義大利沒他形容的那麼亂，只是聽來嚇人。”

我開始好奇了：這樣的旅行團還可以再撐多久呢？年輕人當中，自助旅行開始變得流行，而我的團友們也因為如此奔波的行程而勞累不堪。在米蘭，我們有30分鐘自由時間，所以凱倫、漢迪與我走進涼爽的“米蘭主教座堂”內部。漢迪仰望著教堂高拔的彩色玻璃窗傑作說：“那樣看好累，但真是漂亮。”

義大利當地報紙裡，充斥著總理貝盧斯科尼因與未成年人上床即將被起訴的新聞。李導遊一派外交官口吻，說：“這麼老了，他真夠男人！”橫跨義大利當天的車程讓他陷入反思的情懷，想到中國國內的生活。他說：“你不時會好奇，提倡民主是好事還是壞事。當然，民主益處很多，人民有言論自由、選舉自由。但一黨專政就沒有好處嗎？”他指著窗外的公路說，義大利花了幾十年才見建好這條路，原因是地方的反對。“要是在中國，6個月就弄好了！要讓經濟持續成長，那是唯一之道。”

李是如此擁護政府，以至於我差點把他當成官方發言人，只是他的言論，我每天在北京跟人交談都聽得到，已經熟悉到耳朵生繭。他說：“海外專家永遠無法了解，何以中國經濟成長得如此快速。沒錯，我們是一黨專政的國家，但主政者是由精英中選任的，而精英又是從13億人當中挑出來的，所以領導們堪稱超級精英。”

但李導遊在形容西方時，至少有一點，他的仰慕是真誠的，而不摻雜質。談到有位西方朋友辭職，背個背包去旅行以找尋他的人生意義時，他說，“中國父母會接受嗎？當然不會！他們會指著你罵：‘你這個廢物！’但是在歐洲，大家認為，年輕人想追求什麼，可以隨心所欲。”

他繼續說：“我們中國，老祖宗留下那麼多東西給我們，但是，何以我們會感覺要找到新東西，是那麼困難？原因就在於

我們的教育系統限制太多。”我們全團聽得更認真了。就在美國父母懷疑，自己是不是能從嚴厲的中國“虎媽”那裡學些什麼時，中國父母則試著讓國家僵化的教育體系恢復創造力。有一天早上，曾麗萍（音）對我說，學校老師對她帶自己6年級的孩子來歐洲玩，十分不以為然。“每次學校放假之前，老師都跟學生講：‘別出門，留在家溫習，因為很快你們就要參加中學考試了。”但曾麗萍自己就曾做過不尋常的事。她辭掉美術老師的穩定工作，把存款全投入創辦自己的時尚品牌。“我的上司們都說：‘這麼好的工作環境，你不做多可惜呀。’但是我證明給自己看，我的選擇才是對的。”

翌日來羅馬，我們造訪許願噴泉，踱步在遼闊壯觀的聖彼得廣場（St.Peter’sSquare）。朱忠明說，廣場的派頭讓他回想到北京，“就好像以前，很多中國老百姓來北京，就只為看一眼[添安門]廣場。”他笑了。

我們往那區建築走下去，坐在一處窗台休息。朱點了根菸。他一直在思索大國命運這個奇怪的問題。我問他，你相信美國政客說他們不反對中國崛起嗎？他搖頭說：“不可能，他們會讓我們成長，但會限制我們。我認識的人都這麼想。”最後，他以自己能找到的最客氣的說法，說：“美國人有必要適應自己世界地位變弱的現實，一如當初的中國。你很習慣當世界老大，但總會掉到老二的位置。雖然不會那麼快發生——大概要20年或30年吧，但我們的GDP總之會超越你們的。”儘管朱遊歷甚廣，他卻認為中國與西方哲學的差異會持久不變，誠如他所述，這是“兩種不同的思考方式”，這一點令我驚訝。他說：“我們會用他們的工具，學他們的方法。但基本上，中國會始終繼續自己的道路。”

他的感悟，令人對中國未來會不會循著西方發展走，並不感到樂觀。就一定程度上很難跟他爭辯什麼；中國變富以後，自然而然就會變得更西方、更民主自由，這種看法令我信服的程度，跟我學生時代、受[添安門]廣場悲劇效應而來北京比起來，早就大大不如了。我今天定居的中國，既令人振奮又令人瘋狂；是白手致富的天堂，也是黑獄依舊存在的國家；它對世界極為好奇，但是對自己的世界新地位，又傲慢地想要捍衛。我的同車團友受西方吸引而來，他們對眼前的所見難以理解，就像我對這個“無拘無束”的國度，卻甘心服從掌權的共產黨，也百思不得其解一樣。

如果說，想像著中國向世界開放，就會讓它更靠近西方，實在是太天真，那麼，蔑視更微妙的變化中的力量，或許也是

一樣天真。現代中國旅行團，正如現代中國國家，通過管理好他們的人民，讓他們免於威脅而獲得安全——避開西方小偷，也要避開西方飲食及西方文化，以承諾在紊亂的世界裡造出秩序。而這一根基是脆弱的。外表看來，我們團友碰到的西方，的確比歐洲更“歐洲”——很多方面既不光鮮也不整齊，令他們始料未及。只是，在中國一黨專政的繁榮福音宣傳背後，我的團友也捕捉到歐洲一些細微內涵的點點滴滴，窺見人性、開放，以及一個曾被禁止的世界。事實上現在，大權在握的黨宣稱它不再革命，藉此希望它的人民就駐足在政治之外，各過各的營生。但事情並沒有那麼容易。

許諾終於放下他那份皺巴巴的《華爾街日報》，此時他不再高談闊論。他言簡意賅地說：“我讀外國報紙，才知道很多以往不了解的事情。”這是他們第一次出國，看到了一些以往沒見過的東西，而路走多了，他們會找到一覽全貌的方法。

第二部真相

Chapter8戴銬而舞

北京有一座微妙的建築物，它聞名的原因不在其建築的式樣風格，而是它的神秘性：它面朝長安街，隔壁便是類似美國白宮的中國權力中樞；它的建築物是三層樓的現代式綠色辦公群，屋頂是涼亭狀，也像是一頂男士的假髮。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它沒有地址、沒有匾額招牌，而且沒出現在任何一張公開的黨結構圖表上——至少在書面上並不存在。我第一次問人，這是什麼單位，它的警衛說：“我不能跟你講，這裡是政府機關。”後來在北京住久了，我只知道它被叫做“該部”。

各國首都都有自己的秘密部門，但北京這個部最古怪的地方之一，便是它明明身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卻極為低調不願張揚。英譯名稱裡的“宣傳”用了“publicity”，有其目的；但中文名稱則是中央宣傳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有權力、最神秘組織之一——這個政府部門有權力解僱總編輯、下令教授噤口、查禁書籍、重剪電影。我定居中國的時候，該部及其全國分部，控制超過2000家報社、8000份雜誌、每部電影、電視節目、教科書、遊樂園、電玩、保齡球俱樂部，連選美比賽都在其管轄範圍。從喜馬拉雅山到黃海，哪則廣告可登上看板，都由中宣部的人決定。他們掌握最大筆的社會科學經費，因此他們有權否決某些學術研究。例如，用到某些描述中國政制忌諱詞彙的那些（被禁詞彙之一便是“[疾全]主義”）。中宣部對中國思想領域管理權限之廣，令鑽研它的學者布雷迪（Anne-MarieBrady）將其比喻為擁有類似“梵蒂岡對天主教世界的影響力”。

喬治·奧威爾寫道，“一切政治文章，不管在哪個國家，目的都是”捕風捉影讓無形的風變成堅固的實體”。杜魯門時代，國務卿艾奇遜（DeanAcheson）把各項事實刪修揉捏，最後人們說，他的話“比真理還清晰”。但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願意把時間、心力用在政治宣傳上。公元前3世紀，秦始皇治理天下，便奉行“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政策。毛澤東把政治宣傳及查禁刪檢權力神聖化，並奉為“思想工作”極重要的部分，而且靠著此行動，他把長征重塑為戰略勝利，而非潰敗。

毛死後5年，其繼位者替毛動盪狂暴的統治期間下了正式判決：他們說毛“功過七三開”——這一不可思議的算法，往後幾十年的學生研習甚久。

中宣部曾經差點被廢。19⑧⑨年[添安門]廣場[是威]，讓黨的某些領導認為，來到現代，政治宣傳的效果漸漸喪失。但鄧小平不以為然，他甚至做了決定命運的決策——他宣稱，黨未來的存亡，仰仗兩大支柱的程度更甚以往，即“繁榮”與“政治宣傳”。他說，那些湧到廣場的中國年輕人，“要改變他們的思想，得花好些年的教育，不是一兩個月就能達成”。只是，蘇維埃式的宣傳手法導致失敗，鄧與他的人馬急需新的招數，而他們在公關聖地美國找到了。

這個不可思議的、新的模範人物是20世紀知名的的美國首席專欄作家李普曼（WalterLippmann）。鄧一行人避而不談李普曼早年的[返共]言論，而稱許他百般努力，預防多數統治，並左右了美國民眾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觀感。他們研究並採用李普曼的信念，認為照片有力量，套用李氏自己的說法，“放大情感的力量而削弱批判思想”；鄧等人也採納李氏觀點，認為好的公關可以為統治精英創造“群體心靈”，“炮製共識”。

為了替崛起中的中產階級形塑恰當的政治宣傳，他們師法另一位美國公關教父、已逝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威爾（HaroldLasswell），此君1927年寫道：“假如大眾可以掙脫鐵鏈，那麼要有銀鏈給他們才行。”黨的意象塑造者，生涯之初用在譴責資本主義走狗，此時研究起可口可樂的成功，而且評論說（正如一本中國政治宣傳教科書所說），可口可樂證明“你要是形象夠好，任何問題都可以解決”。為了學習這門藝術的現代竅門，中國共產黨向形象藝術的大師們鑽研：中宣部頂級官員要開一次5天的研討會，提出個案研究的心得，比如英國首相東尼·布萊爾對狂牛病爆發的反應，還有911事件爆發後，小布希政府對美國媒體的操控。

2004年，中宣部創設輿情局，職司調查研究，評估民眾意向，而省掉投票的麻煩。中國“思想工作界”非但沒有凋亡，其規模更大更複雜，根據一項估計，甚至發展到每

100名中國人裡就有1位中宣官員的地步。傳統拿著傳聲筒震耳欲聾發聲、靠油印的小冊子發送指令的時代一去不返。此時，中宣部跟其他要搞競爭的企業一樣，以網路點閱率及黃金時段收視率來衡量自己的效率。它創設預算龐大的廣告攻勢，取得知名電影導演如張藝謀等人的協助，讓人民沉浸在輕羅薄紗般的情緒訊息裡。至於目標呢？正如一位宣傳人員所述，要“進入他們的耳，他們的腦，他們的心”。黨的學者指出，要讓人民的思想遵從主要意識形態，因此讓大家行為標準化，此時比以往更顯重要。

最讓中宣部殫精竭慮的莫過於媒體。[添安門]事件後，國家主席江說：“我們的報刊、廣播、電視，今後決不允許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提供陣地。”江說，中國在他稱為“所謂透明度”上絕不會屈服。按要求，記者們依然要“齊聲同調”，中宣部將協助他們，方法是頒布廣大且不斷變動的詞彙表，條列必須與絕不容出現在新聞中的字眼。有些原則絕不改變：任何提及台灣法律的新聞，必須稱其為“所謂法律”，而中國政體是獨一無二的，因此記者絕不能“據國際做法”來比照北京當局。談到經濟時，若逢假期，不能熱衷報導壞消息，或被政府歸類為“無解”的東西，如中國銀行的脆弱性、有錢人的政治影響力。最禁忌的主題便是[添安門]本身；中國教科書裡沒有任何提到19⑧⑨年的示威抗議；那年政府討論那些事件，定論為“暴亂”或“動亂”，是一小撮“幕後黑手”組織的。

記者們能選擇的空間太少，只能遵從那些指示，千依百順的程度到了即使中國已變得較多元、能有不一樣的聲音，新聞界還是寧靜的綠洲——單一得叫人透不過氣來。中國天南地北的報紙，經常刊相同的標題，用一模一樣的字型。2008年5月，強烈的地震襲擊四川省，翌日早晨，我買遍當地報紙，全國報紙有默契地異口同聲，說地震“牽動中國共產黨的心弦”，其一致性令我驚訝。

少數中國新聞網站，則會敘述有所不同的事情。其中之一是個叫《財經》的雜誌網站。國營新聞通訊社“新華社”稱頌人民解放軍的救災努力，《財經》——名稱是《財政經濟》的意思——卻在努力挖掘死傷人數的估計值，另報導“很多受災民眾根本沒受到任何紓困救助”。我很好奇，《財經》寫的東西為何能有所不同？我想，這一定跟刊物掌舵者有關。此人是女性，名叫胡舒立，以探卜中國言論自由的邊界而聞名。我向她提出前去拜訪的請求，想知道像中宣部這樣的一家連建築物地址都不存在的機關，她是怎麼跟它打交道的。

未見到胡舒立之前，我便聽過她的大名了。我坐在財經編輯台外，她的辦公室非常時尚，空間寬敞，裝潢呈灰色系，地點在北京市中心“泛利大廈”9樓。我聽到她穿著高跟鞋喀拉喀拉急急走來，但是接近門口時，她又繼續走下去，先到編輯台滔滔不絕地說一大串指示與想法，再轉身朝我走來。在我來訪之前，一位認識她多年的編輯錢鋼便警告我說，胡行動的步調“如疾風驟雨”。

胡舒立55歲左右，高約5尺，很苗條，髮型剪得俏皮，身上行頭很多，色彩繽紛，但很協調。她口若懸河，好勝爭強，以

至於她看起來像個“女教父”（有位女記者初次見她的感覺就是如此）。另一位她的同事把跟她聊天的經驗，比喻為飽受機關槍火力洗禮。國營報紙《經濟日報》總編王朗（音）是胡舒立的老朋友，頻頻拒絕她邀約共事的提議，原因何在？他對我說，“保持距離對我們的友誼較好。”有人說跟她在一起很刺激，有人說提心弔膽，因人而異。她的上司王波明是“財訊傳媒”集團的主席，

《財經》是集團的子公司。王波明半開玩笑地對我說：“我怕他。”

黨的用語裡，記者是“新聞工作者”，胡舒立特立獨行。她愛揭弊到無可救藥，但她姓胡，跟好些中國最有權力的黨領導關係培養得很好。1998年，胡創辦《財經》時，只有兩台電腦跟一間借來的會議室，自此之後，她帶領該雜誌，對中宣部能容忍多少事實、多大挑釁，分寸拿捏得幾近完美。這意味著決定什麼可以報（猖獗的企業敲詐、層出不窮的政治貪腐），但什麼又不能報（[砝倫攻]、[添安門]廣場事件周年……不一而足）。許多固執的中國記者不是被捉拿下獄就是被噤口，胡舒立當老總卻還屹立不倒。中國及外國媒體界經常描述她是“中國最危險的女人”，只是她淡化這個角色，說自己只是“一直啄木鳥”，不斷敲打樹木，倒不是想把樹推倒，而是讓它長得更直。

《財經》光潔的觸感及設計有如美國《財富》雜誌，每一期都有厚厚的廣告，如卡地亞手錶、中國各信用卡發卡銀行、賓士SUV；文章也可能因此故意排得緊密。中國政治宣傳官員較可能強行取締閱讀人數以百萬計的電視及大眾市場報，而不會來管每期只賣20萬本的雜誌——即使雜誌會寄送到中國最重要的政府辦公單位、金融公司及學術界，而擁有超凡的影響力。《財經》也有中、英雙語網站，每個月吸引320萬的獨立訪客。胡在紙質雜誌與網站，都撰寫專欄，廣獲引用。每一年她都舉辦大會，吸引黨的經濟領導高層前來參加。

中國新聞產業裡，真相經常得屈從於政治考量，因此胡舒立的生氣勃勃相形之下極為突出。2008年汶川大地震過後不久，國營通訊社“新華社”在它的網站刊登了一篇報導，詳細描寫中國神舟7號如何進行第30次地球繞軌，裡頭有大量扣人心弦的細節，像是“調度員堅定的聲音打破太空船上的安靜”這樣的描述。然而，很不幸地，神舟火箭根本還沒發射——新華社後來道歉，說刊了一篇草稿。

只是，不把政治擺在真相之前，可能會有危險。2008年，就是汶川大地震那年，“無國界記者”組織依新聞自由度排行各

國，在173個國家中，中國名列167名——落後於伊朗，但領先越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保障言論、新聞自由”，但法規讓政府有廣大權力，可以依照“損害國家利益”等罪名，把編輯與記者關入大牢。當時中國有28名記者坐牢，數目居全球之冠（直到2009年，伊朗才超過中國，為10年來頭一次）。

在這麼多風險面前，胡舒立身為中國第一的《財經》雜誌因懷有雄心壯志，而被我視為世界級新聞組織。經濟學家謝國忠對我說：“它跟你在中國看見的一切都不一樣。就此而言，它的存在就是一個奇蹟。”

我第一次到胡舒立家拜訪時，很準確地說，自己有些茫然若失。她跟手下許多記者、編輯們不一樣，沒住在新蓋的北京住宅大廈，而是與自己的先生住在舊式的混凝土住宅區裡，一間有三個臥室、放眼可看到雜草叢生的花園的公寓。這一區是中國舊式媒體的據點，國營廣播公司、電影電視刪檢機構的總部都在這裡。1950年代，這裡的建築物還是黨核心幹部才有權居住的地方，政府把這塊空間分配給胡舒立的父親。

胡舒立根正苗紅。她的外祖父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譯家兼編輯，而且胡仲持的哥哥經營大型出版公司；她的母親胡令升是北京《工人日報》高級編輯，父親胡繼偉，早年是地下共產黨員，後來在全國總工會任職。只是從年紀還小開始，胡舒立的天性讓她母親很擔心，她自己解釋說：“我總是想到什麼說什麼。”

文化大革命在她13歲時吞噬全中國，班上停課了，她家也遭殃：母親身為報社高階主管，受到檢討，被軟禁在家；她父親被調去做幕後工作。胡舒立跟她的同齡人一樣，變成紅衛兵，遊歷全國宣揚對“最紅太陽”毛澤東的熱愛。隨著運動急轉直下漸趨暴力，胡舒立轉到書本中避難，勉力維持還有受到教育的樣子。她說：“那個時代非常困惑，原因在於我們失去一切價值。”她在16歲生日的前一個月被派到鄉下，體會農村革命。在當地的所見，令她大為震驚。

她回憶說：“太荒謬了。”農民找不到工作的理由。她接著說：“他們只想躺在田裡，有時一躺兩個小時。我說：‘我們該開始工作了吧？’他們回答說：‘你怎麼會那麼想？’10年後，我才了解一切都出錯了。”

對很多與她同輩的人來說，下鄉勞動啟示極大。另一位被派到鄉間的年輕信徒吳錫（音），回憶他到鋼鐵廠的第一天，他對我說：“我們一直被教育‘無產階級是最無私的階級’，對此我

們完全相信。”他到工廠幾個小時之後，有位工人同事靠近他說：“夠了，你可以停（工）了。”

吳很迷惘。“我沒別的事要幹，所以我最好還是繼續做吧。”那位同事跟他耳語忠告：“那樣子大家會不高興的。”

吳如果工作一整天，人人的工作配額都得體高，於是他放下工具。很快地，他學懂在國營工廠要想生存下去的其他秘密——怎麼從倉庫扒零件，又怎麼做檯燈到黑市去賣。對後來變成著名作家及編輯的吳錫來說，下鄉讓他見識到兩個並行不悖的現實世界。他對我說：“某些話是場面話，而另一種則是真話。”

1978年大學複課時，胡舒立進入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新聞系根本不是她的第一志願，但那是學校能提供的最好的。畢業之後，她進入《工人日報》，1985年被分配到沿海的廈門市分社，而廈門被指定為自由市場經濟成長的試驗城市。她天生擅長營造人脈

——固定與市長打橋牌——而且接受她採訪的人當中，有位市政府青年才俊，此人對自由市場的開放，讓他博得“財神”的綽號，此君名叫習近平，多年之後當上中國的國家主席。

1987年，胡舒立取得美國“世界新聞研究所”的邀請，到美國訪問5個月。這個經驗，讓她對什麼叫“可能”的感受大為改觀。她任職的《工人日報》總版面為4頁，但她在美國拜訪的每個城鎮，似乎都有份報紙，版面多達10到20倍。她說，在明尼蘇達州有一天晚上，“我花一整晚閱讀《聖路易先鋒報》。”她返回中國，19⑧⑨年春天，[添安門]廣場運動讓北京媒體打了雞血一般，包括胡舒立，許多記者都參加示威。胡回憶說，6月3日夜裡，解放軍掃蕩示威，“我上街，再回到報社說：‘這件事，我們應該報導。’”但高層命令已經下達，“我們連報一個字都不行。”許多直言不諱的記者，不是被解職，就是流放到各省。胡的丈夫苗棣是個電影學教授，本以為她會被抓，不過到最後，她只被停職18個月。

停職結束後，胡出任《中華工商時報》國際部主任，該報是中國率先專門報導經濟新領域的全國性報紙之一。1992年，她巧遇一小群海外取得專業、回中國成立股票市場的金融專家、其中很多人是官二代。這群人自稱“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

1992年，該機構在崇文區飯店租了房間，成員把床挪走，設立辦公室。中心的其中一人叫高西慶，他在杜克大學取得法

學學位，回中國之前在尼克森的律師事務所工作。另一人是王波明，其父是中國前大使，當過外交部副部長；王波明在哥倫比亞攻讀財經，而且在紐交所研究部門擔任經濟學家。高西慶和王波明取得黨內新星如王岐山的支持，王的岳父是國務院副總理，另外支持的人還有改革派政治新秀周小川。

胡舒立開始結交建立人脈，成果是取得一連串獨家新聞，還有結識一群後來登上中國最高官位的人，她這一點，別人望塵莫及——王岐山後來成為政治局常委、高西慶主宰中國主權基金、周小川則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後來，北京有很多人竊竊私語，說這些人脈庇護了胡舒立，但她堅稱，外人太高估她與權貴人士的熟練程度。她說，“那些高層官員的生日，我都不知道。我是記者，而他們就是以對待記者的方式來對待我的。”

1998年，胡舒立接到那批飯店金融人士之一的王波明打來的電話。王打算辦一份雜誌，想找她來掌舵。她提出兩個條件：王不能用她雜誌的篇幅去推銷別的業務，另外給她25萬美元（當時算很可觀）的經費，付給記者薪水，高到足以防止記者受賄。王波明同意了，那可不是慈善事業，王波明與他政府裡改革派的盟友都相信：隨著中國經濟現代化，不能再仰仗反應遲緩的國營媒體，人民再也不能因資訊匱乏而被蒙在鼓裡了。

王波明的辦公室大而凌亂，就在《財經》編輯部的樓下。有一天早晨他對我說：“大家需要媒體來發揮其功能，向民眾揭露事實，依此言之，也是幫助政府查處惡事。”他是個大煙槍，戴著菲拉格慕牌眼鏡，濃厚的黑髮夾帶灰白，幽默感源源不絕。儘管他出身共產黨世家，但多年的海外經驗已改變他對真相價值的理解。他說：“我在美國求學時，必須賺錢貼補學費，所以我替中國城一家報社《中國每日新聞報》工作。”儘管是個菜鳥記者，他十分珍惜機會，一直把路走下去，不管它通往哪裡。他笑了，當記者讓他覺得像“無冕之王”。

胡舒立上路毫不浪費時間，她的創刊號便是一篇爆炸性的封面報導，揭露一家叫“瓊民源”的房地產公司股價崩盤時，散戶被坑殺數百萬元，只是有內線的人事先得到消息，及時倒貨。金融管理官員火冒三丈，譴責胡藐視中宣部頒布的限制，以至於她的老闆們必須寫自我檢討，來讓刪檢人員息怒。但《財經》崛起的關鍵時刻，是旗下名叫曹海麗的記者於2003年春天來到香港，發現似乎車站人人都戴著外科手術用的口罩。她想，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於是她通知了胡舒立。當時中國媒體一直在報導，衛生官員已控制一種叫做“禽流感”（SARS）的神

秘病毒，不再散播。但事實上，疫情卻在擴大。廣東省各報的總編輯都已接獲命令，有關禽流感，除了安撫人心的消息以外，其他不准報導。

但胡舒立了解：那些禁令並未擴大到廣東省以外，於是她利用這道缺口。她說："我買了一堆有關呼吸道疾病、感染及病毒的書。"她的手下開始指出官方聲明的錯誤。在一個月的過程中，《財經》發表一系列極其重要的報導，而且還著手籌劃另一個，只是中宣部出面叫停。

中宣部從長安街的總部，每天向各媒體總編輯發布川流不息的指示，關於最新的"可以報"與"不可以報"的內容。照理來講，這些報告是秘密進行的——不容民眾得知他們不該知道的——我2005年抵達時，距離記者[師韜]因向外媒描述政治宣傳指令內容而被判刑10年，還不到3個月。為了防止更多機密被洩露，此時刪檢人員偏好以口頭傳達指示。國營電視台總部裡的領導們都有特殊的紅電話，以備此用途。其他新聞機構則在記者們稱為"上課"的會議上，接收指令。

幾十年來，刪檢人員很有技巧地壓抑不樂見的新聞（地方疫病、天災、民間騷動），但科技及旅遊讓這些禁令變得越來越困難。禽流感疫情被掩飾，變成眾人皆知以後，北京大學新聞學教授焦國標無視中宣部無形的權威，提筆寫道："中宣部是中國唯一死穴，不依法規運作；它是個黑暗帝國，法治之光無法穿透。"為此，北京大學開除了他。

有一天下午，我與胡舒立會合時，她正為一件不尋常的事忙到很晚：他決定，自己頂尖的編輯群要穿新裝，而她已叫裁縫師前來。隨著胡以及她手下記者聲譽日升，他們要現身群眾之前，或者前往海外的次數越來越多了，她很討厭看到編輯同仁們穿著普通西裝，和沾了汙漬的短袖直排口襯衫。她提供編務人員一個方案：自買一套新西裝，雜誌社會出錢再買一套。一位矮胖而眼皮很厚的裁縫一手抱著許多西裝，來到會議室，而胡的員工們魚貫進來試穿。

裁縫配了件灰色直條紋夾克給胡舒立37歲的執行主編王爍，胡揪著王的夾克腋下說："這裡是不是太鬆了？"被自己老闆戳著身體，王爍露出一種莞爾但寬容的表情——這表情我曾在狗兒被按進浴缸洗澡時見過幾次。

王爍抗議說："已經很緊了。"裁縫說："他覺得很緊了。"

胡舒立說："等一下！想想看電影《007》裡，詹姆士·邦德穿的西裝，照那樣做！"

胡舒立所做的改變，暗示了她心中炫耀式的國際主義：比美觀好看來得深沉。有位用意良好的美國教授一度勸告她，“你如果留在中國當記者，是永遠無法加入國際主流的。”她決心證明，他錯了，哪怕意味著她得克服中國官場的勾心鬥角。

假如一本雜誌如《財經》壞了規矩，中宣部會給它一張有如足球的黃牌警告。一年內收到3張黃牌，就可能得關門。中宣部並不在出版前審閱文章，相反地，猜測自己能多深入，計算能超越界定極限的任務，是交給編輯自己去做的，那反倒成為很特殊的壓力。漢學家林培瑞一度把它比喻為：生活在“巨蟒盤繞於頭頂的吊燈架”底下，林培瑞寫道：“巨蟒通常不必有動作，沒這個必要。它覺得不需昭告自己的禁令。它悶不吭聲但永遠存在的訊息是‘你自己決定’，接下來，活在其陰影下的男女老少通常會做大大小小的調整——一切相當‘自然’。”

這麼多年來，胡舒立學會，要在巨蟒底下過活，方法是把中國政府看待稱活生生、會呼吸的有機體，她不時揣摩它的情緒、敏感度。胡舒立助手之一的記者王芳對我說：“你可以感受到她在做調整。舉例說，週一的編務會議上，她可能會針對某件事，而編輯與記者們便著手辦事；而到週三的編務會議，她會說：‘大家可能不知道，那個我取得更多資料了，而且我們不能報，或許我們的目標應該低一點。’”

2007年1月，胡舒立第一次嚐到太過火的教訓。有一期封面焦點《誰的魯能？》描寫一群投資人集資想買魯能集團92%的股份；魯能市值100億美元，資產從發電廠到足球俱樂部都有。盤根交錯的董事會股東都隱匿新老闆的身份，而且收購的資金半數來自不可追查的源頭。當《財經》想登一則很短的後續報導時，當局禁止該期雜誌上架，胡的員工們被留下來，用手撕掉已印好的成品。有位前《財經》編輯說，“人人都覺得被羞辱了。”胡舒立把它稱為自己的“最大災難”。一旦報導太近乎影射官二代—

—這個禁忌，即使最想改革、追求更開放媒體的人，都不能碰。

有一天下午我到胡舒立的辦公室，問她：“別的刊物都受罰了，而《財經》卻沒有，原因何在？”她說：“我們從不用很情緒化或很隨意的方式說任何字眼，比如：‘你說謊。’我們試圖分析整個體制，說出何以一個好想法或者良好的願望無法落實。”我對《南方都市報》前總編輯程益中提出相同的問題時，他的看法卻不同。《南方都市報》是中國最活躍的報紙之一，而程益中曾因觸怒當局，被關了5個月。程益中說，他的心力放在限制

政府的警察權，而胡舒立重點在提升政府表現，兩者有所區別。程益中說：“《財經》的主題不會影響到統治體制的根本，因此它相對安全。我不是在批評胡舒立，但是從某方面來看，《財經》只是在服務一個力量更強、或相對較好的利益團體而已。”

儘管胡舒立滿腔懷疑論，性情火熱，但她使用的是忠誠反對派的語言。她在2007年一篇專欄裡寫道：“有人主張，推動政治改革會破壞穩定。但是，事實上維持現狀，不思改革，會製造社會動盪的溫床。”換言之，政治改革是鞏固權力之路，而非喪權。

胡舒立的手法很吸引政府的改革派人士，他們真心想解決問題，但不想因此而放棄權力。有些中國記者說，胡舒立最強的技巧，就是讓利益團體互鬥，要不是大聲廣播中央政府出力打擊貪腐市長，便是讓政府一派人馬阻擋另一派的施政。理論推演下去說，胡是讓最強的一派撐持下去，那麼就可以做真的、甚至有油水可撈的新聞報導。胡舒立把刪檢看待稱妥協事項；政府官員震怒，她並不打算爭辯。她會保證改進，更小心，未來避免犯相同過錯。她的朋友錢鋼對我說：“中文裡有成語說，‘日積月累，滴水石穿’。”其他記者偏愛一個更誇張的比喻，稱做“戴銬而舞”。

我請胡舒立談2008年汶川大地震，當時我們在她辦公室裡，時值黃昏，斜陽由窗戶照入，由於主題是天災，死亡人數極多，讓她一時無語。她是在北京西山地區主持典禮，頒發獎學金時，手機簡訊收到這個新聞。她俯身問錢鋼，請他粗略估算損害有多大。

錢鋼報導過以往的地震，他看看自己的手錶，知道當時在上課時間，學生的死傷人數應該很多。

要報導規模這麼大的災難會有政治風險。但時值2008年，胡舒立趕往北京城，由車內打電話、發電子郵件，要她的手下去租一部衛星電話，更派一批人去四川。一個小時內，《財經》的第一位記者便搭機前往震災區，接下來再個9個。他們抵達時，發現許多政府建築沒倒塌，但數百座學校建築垮成一堆又一堆鋼筋水泥廢墟。那些校舍是在1990年代大耗經費蓋的，當時學齡人口大增，需要新的教學空間。只是太多錢被貪汙了，設計圖上註明要用鋼筋，結果有些竟然用竹子取代。

數千個孩子陷身或死在斷瓦殘垣底下，死傷人數多少，沒人敢確定。中宣部很快便禁止報導學校施工問題。然而有幾份

報紙還是報了，並且受到處分。但胡以不同方式解讀中宣部的情緒；她估算，《財經》的地位是商業刊物，如此讓它有藉口只盯住公款的使用。如此報導取得的成功與喝彩，等於火上添油；《財經》已經如此過火，以至於政府的保守機構不再能確定，有哪些部門的官員敢罩它。

此外，胡舒立得自負盈虧，必須考慮到對手競爭；網路世界不斷膨脹，她得跟上時代。她想到，若一篇報導披露的調性、事實都正確，都可能被懲處。她說：“若不是絕對禁止，我們就做。”6月9日，《財經》刊載長達12頁的地震調查採訪，學校倒塌的事也在內。文章冷靜，極為可靠。報導說，盲目追求經濟增長、浪費公款及普遍忽視建築標準的原因，導致這場災難發生。《財經》以一種以往沒清晰說出的方式，報導剝除掉一層通常黏附在中國追求財富的神話外衣：經濟勃興的這些年，為鄉間的貧窮地帶導入新紀元，但經濟崛起的代價卻越來越清晰。報導細述當地幹部如何抄捷徑，但沒點名負責。胡舒立被叫去挨批，但沒被處罰。

胡舒立位居高處，腳踩內外界限，她只能自行判斷；若是她執著於點名貪腐官員，公信力方面可以得分沒錯，但那種獨家新聞會讓她有遭受報復之虞。她對我說：“不想挨批的黨幹部，我們努力不給任何藉口。”她說，歸根結底，最重要的問題不在“15年前，誰偷工減料，沒用品質最好的磚”，而是更深沉的東西。她說，“我們必須進一步改革，查核及平衡有其必要，透明亦然。我們這麼說。不喊口號，不說空話。”這種賭博很明確微妙，而那一輪，她贏了。但接下來的，她則沒贏。

Chapter9自由引導人民

那年春天，中國官方正以宗教慶典般的熱情，倒數計時北京奧運的到來。黨在[添安門]廣場邊裝了一個巨大時鐘，細數時間分秒逼近；整個首都，以呼籲團結至上的口號來裝點門面：“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一天早晨，我踏出前門，發現兩名市府工人正在我寢室的紅磚外牆塗抹水泥。老北京市大片地區正在拆除或重新整修，為奧運營造乾淨、現代的背景。工人把一板光滑的水泥放下來，正在用尺及鉛垂線來丈量對角線。我看了半晌，才了解他們正在老舊真磚的上面，重新畫上假磚的模樣。正對我前門的巷弄牆上，還有一點已褪色的文化大革命時代塗鴉，用肥短字體寫著“毛主席萬歲！”，用水泥刷兩下，“偉大舵手”就消失在水泥之後了。

追求完美的衝動擴展到競逐獎牌。體育部官員揚言要摘下比以往更多的金牌，依據《2001-2010奧運爭光計劃綱要》，計劃涵蓋119個項目，要在競爭激烈的奧運，奮力贏得更多金牌。根據列表，中國總獎牌數估計應為119面，絕不容許變數發生。奧運籌辦人員想找個小女孩在開幕典禮獨唱，但找不到聲音與容貌的最佳結合，所以他們創造一個合成體，訓練一個小女孩在舞台上表演，同步與幕後的另一個小女孩對嘴唱歌。中國一家豬肉供應商則表示，正在特別飼養“嬌貴”的小豬，確保摻有生長激素的肉，不會影響中國運動員無法通過藥檢——但是，這反而使得一般老百姓開始懷疑自己吃的肉，以至於北京奧委會頒布《奧運豬相關澄清報告》，譴責有關豬肉的報導“誇大不實”。

京奧籌組人員越是眾志成城，就越容易碰到控制範圍以外的事。奧運火炬傳遞，中國稱其為“和諧之旅”，將掃遍6大洲，登上珠穆朗瑪峰，由21888名運動員參與，規模空前。中國媒體把火炬稱為聖火，而且說它在希臘奧林匹亞點燃後，將長達5個月不滅，直至抵達北京。在夜裡或飛機上，不能舉火炬時，火焰將保存在一組燈籠裡，維持光明。

3月10日，和諧之旅展開不久，西藏拉薩市有幾百位喇嘛發動有遊行，要求當局釋放因慶祝美國政府頒金質勳章給達賴喇嘛而被關的西藏人，結果數十名藏僧被捕。到了3月14日，抗議的示威惡化，變成198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暴動。政府表示，有11名漢人、1名藏人躲在暴動者縱火的建築物裡，因此被燒死，另有1名警察、6名百姓因毆打等原因致死。[噠籟]呼籲冷靜，但中國政府把這次暴動形容為“達賴團伙預謀、主使及煽動”。安全部隊坐著裝甲車輛進駐拉薩，控制該市，軍警開始圍捕嫌犯，導致數百人被捕。西藏[劉忘]團體指稱，拉薩掃蕩行動中有80人喪生，然而，中國官方卻對此斷然否認。

當火炬經過倫敦、巴黎及舊金山時，抗議[震壓]西藏的聲音沸沸揚揚，以至於主辦單位不得不熄滅聖火，或者改道避開憤怒的群眾。中國民眾——尤其是海外留學生，對這些批評，以罕見的怒火回應；火炬抵達南韓時，親中與反中示威者在街上打架；中國境內，數千人到法國連鎖超市家樂福[是威]，只因為他們認定法國支持西藏[活悅]人士；甚至中國的入口網站之一搜狐，其執行長、擁有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的張朝陽，也呼籲抵制法國產品，“讓完全充滿偏見的法國媒體與民眾覺得失落、痛苦。”

國營媒體則使用不合時宜的語言。當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

西譴責中國對西藏的管理方式，新華社說她“令人憎惡”。《瞭望》周刊警告說，“國內外敵對勢力已經把北京奧運，當成滲透及破壞的焦點。”西藏自治區書記把達賴稱為“披著僧袍的狼，有人臉的怪獸，禽獸其心”。在匿名的網路論壇裡，不堪入目的汙言穢語更是難以計數。一家國營報紙的論壇裡，有人發言說：“嘴巴噴屎的人，我就用大便塞到他喉嚨去！”另一人寫道：“有誰來給我一把槍！對敵人不必憐憫。”這些發言讓許多中國人感到難為情，同時不能忽視的是，外國記者開始收到言語恐嚇。有人匿名發函到我在北京的傳真機，警告說：“如實報導中國的事實……不然你或你的家人會生不如死。”

抗議不斷滋長，我開始快速搜尋中國網路上最具創意的愛國言論。4月15日早晨，有個標題為“2008，中國站起來！”的影片短片出現在新浪網。它的來源沒人知道，沒有上傳者，沒有旁白，而且除了英文縮寫CTGZ以外，沒註明作者。

影片是支自製的紀錄片，一開頭是用鮮明色彩繪製的毛主席，他的頭部發射出陽光。萬籟寂靜中傳來合奏，眾鼓咆哮如雷，黑屏不斷閃爍，用中、英文寫了毛最著名的箴言：“帝國主義從不放棄其摧毀我們的打算。”接下來跳到最近的圖片與新聞剪影，展示中國新近發生的一些“法西斯騙局及災難”：中國暴跌的股市（因為外國投機瘋狂的操縱了中國的股價，玩弄了中國的新興股民，害他們損失慘重）；百姓因通貨膨脹而苦惱，現在連豬肉都成了一種奢侈品。接著出現警告：這是全球貨幣戰的開端，西方打算“讓中國人為美國的金融災難買單”。

畫面接下來跳到另一個場景：暴徒在拉薩洗劫商店、鬥毆，螢幕上閃過“所謂的和平示威！”。紀錄片以蒙太奇手法處理外國媒體批評中國的新聞的剪貼——它們都“不顧事實”、“用扭曲的聲音說話”。螢幕上鋪滿CNN、BBC等外國新聞機構的商標，最後全讓位給納粹宣傳部部長戈培爾（JosephGoebbels）的肖像。音樂達到高潮時，螢幕出現了這樣一句話：“顯然，這背後是一場針對中國的陰謀。一場新的冷戰。”鏡頭又跳到巴黎場面，示威者想從官方聖火領跑者手中奪走火炬，迫使警衛不得不保衛他們。影片的結束畫面是一面在陽光下鮮紅的五星紅旗和一句鄭重的承諾：“我們要站起來，要像家人一樣團結。”

CTGZ的影片長度雖然只有6分鐘，但卻捕捉到當時四處瀰漫的民族主義情緒，上網第一週便吸引百餘萬點擊、數萬好評，成為該網站第4大熱門影片（第一名是則是新聞主播打哈欠而出醜的畫面）。平均而言，影片每秒鐘就有兩人點擊，它變成一群自命保衛中國榮譽急先鋒的代表宣言，而那群人則被稱

為“憤青”。

在[添安門]示威發生19年後，中國年輕精英再度奮起，但不為追求民主自由，而是為了保護中國名譽，令我驚訝。麻省理工大學媒體實驗室創建者尼可拉斯·尼葛洛龐帝曾預言，網際網路的全球化會改變我們的國家認同感。他曾說“國家會像樟腦丸一樣，從固體到氣體直接蒸發”，而且“民族主義的生存空間會比天花還小”。可是在中國，事實卻不是這樣。我對CTGZ非常好奇。這個使用者名稱連接到一個電子郵件網址，擁有人是一位上海28歲的大學畢業生，他名叫唐傑。

中國頂尖學府之一的復旦大學，其校園中心為兩座高30層樓的鋼化玻璃大樓（很容易被誤認為企業總部），再往外輻射。我與唐傑約在大門口。他穿一件粉藍細條紋襯衫、卡其褲及黑色正裝鞋。他眼睛呈明亮的淡褐色，臉圓而擁有稚嫩的五官，頰邊有一抹山羊鬍子。看到我從計程車上下來，他鞠了一躬，還想給我付錢。

我們走過校園，唐說自己很高興能趁論文寫作的間隙休息一下：論文主題是西方哲學。他專攻現象學——尤其是觀念的“相互主觀性”，此說是德國哲學家胡塞爾（EdmundHusserl）提出，他的影響力下及薩特等人。除了中文以外，唐的英文、德文閱讀流利，但不常講，所以有時候，他會不好意思地在三種語言裡換來換去。他另外還鑽研拉丁文及古希臘文。他是如此謙虛、輕聲細語，以至於有時候聲音聽來低到像在喃喃自語。他頗為嚴肅，不常笑，彷彿是為了節省力氣。娛樂休閒方面，他聽中國古典音樂，話雖如此，他也愛香港影星周星馳的無厘頭喜劇電影。唐對自己的不嬉皮引以為榮，跟“瘋狂英語”的張濟民不一樣，唐不用英文名字。CTGZ這個使用者名稱，是取自中國古詩裡的兩個晦澀詞彙“長亭”與“公子”，意思是“長亭裡的貴族子弟”。跟其他中國精英學生不同的是：唐從未加入共產黨，唯恐黨員身份有損他學者的客觀性。

他叫了一些朋友，我們一起在一家叫胖兄弟的川菜館吃了午餐，之後又去了他的寢室。他一個人住在一棟6層的樓裡，樓房沒有電梯，他的工作室還不到75平方英尺，感覺像被一個挑剔的人違章占領的圖書館的儲藏室。房裡到處是書，凳子上放著厚厚的目錄。他的藏書幾乎包括人類思想的各個方面：從柏拉圖到老子，維特跟斯坦，培根，海德格，可蘭經。當唐想把床弄得寬點時，他就把邊上的書堆的更高，最終書散了一屋。他只好把他們放在了前門邊的厚紙盒裡。

唐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我問他是否想過自己的影片會如此

受歡迎，他笑了，說：“顯然我表達出了人們共同的情感、共有的觀點。”

劉成光坐他邊上，他是政治學的博士生，寬寬的臉上充滿笑容。他最近正在翻譯哈佛保守型教授哈夫雷曼斯菲爾德的一本關於男子氣概的書。躺在床上穿一件灰色運動衫的是雄文馳，他在去年成為老師之前已經拿到了政治學博士學位了。曾可為坐在唐的左邊，是一位苗條時髦的銀行家。在進入金融領域前，他曾取得西方哲學的碩士學位。唐的朋友和他年齡相仿，都是家中第一個上過大學的人，而且對於西方思想都很有興趣。

劉說：“中國在現代歷史中很落後，因此我們一直在尋找原因，為什麼西方能夠變得那麼強大，我們向西方學習，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有這個夢想：通過學習西方而使自己變強大。”

跟我認識的中國遊客及[愛未未]“童話”的參與者一樣，我身邊這幾位年輕人看待西方的誘惑時，混雜著尊敬與焦慮。他們在抗議美國CNN報導不實，但同時又有個英語研讀計劃，在中國猛打廣告，口號是“一個月後，你就能聽懂CNN”。

唐跟他的朋友們是如此親切有禮，以至於到最後變成我在傾聽他們講話，也開始好奇，中國那一年春天的怒火，是否該視為一時偏差。然而，他們請求我別再犯那樣的錯誤。

曾可為說：“我們研讀西方歷史很久，知之甚詳。我們想，自己愛中國，支持政府，謀求國家福祉，倒不是自動自發的反應，而是考慮周詳之後，才發展成型的。”

事實上他們對中國走向的看法，只要免除尖刻，倒是與中國主流吻合一致。中國人支持國家運作的比例達9/10——在那年春天“皮尤研究中心”（thePewResearchCenter）調查的24個國家裡，比任何國家都高（在美國，相形之下，出聲支持的只有

2/10）。實在很難斷定中國的愛國主義正向的改變有多普遍，但學者們指出，一份中國反對日本取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會員權的請願書，到最後竟取得4000多萬人的簽名，這約等於全西班牙人口。

我請唐示範他怎麼做那個影片的，他調頭看著自己桌上的電腦螢幕，問道：“你知道MovieMaker嗎？”指的是一種影片剪輯軟體。我回答說，一竅不通，問他怎麼從書上學會。他憐憫地瞧著我，說逐頁看說明書就學會了，他說：“我們得感謝比爾·蓋茲。”

唐推出自己的影片處女作一個月前，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網路使用國。上網民眾達2億3800萬人，雖只是總人口的16%，但換算下來，將近25萬中國公民每天第一件事便是上網，而且正在改變思想傳播的方式。

在一個因方言、地理及階級而分割的國家，網路能讓人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發現彼此。一群中國志工聚起來，開始每週逐字翻譯《經濟學人》（TheEconomist）雜誌，而且免費提供給讀者。譯者解釋他們的目標時寫道：“網路時代，最強大的力量不是貪婪、愛或者暴力，而是獻身於一種興趣。”他們年紀輕，對科技烏托邦的信仰不計毀譽。他們寫道：“網路讓你連接到志同道合的人，釋放不可思議的力量。”為了避開刪檢官員，他們先行公開自我審查，告訴新會員：“文章若是涉及敏感話題，你不確定是否獲准的話，請別冒險。”那種自我審查就是一種自我管理。有些網站會招募志工，移除可能令網站陷入麻煩的題材。他們以“版主”的身份而知名，但是，若用戶認為版主太嚴或太寬，還可以換掉他們，這個過程通稱為“舉報”。

中國最早期的網路使用者是一批熱心的愛國志士。1999年春天，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戰機使用美國情報，誤將3枚炸彈投入中國駐貝爾格勒使館，中國網路界發揮出他們的力量。愛國駭客把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首頁用“形同野蠻人！”這樣的口號蓋起來，而且用洪水般憤怒的電子郵件淹沒並癱瘓了白宮網站。有位評論家說道：“網路是西方發明的沒錯，但……我們可以用它對全世界說，中國不能被侮辱！”對很多人來說，民族主義提供一位愛國青年形容的“初嘗言論自由的神聖權利。”

跟其他許多同齡人一樣，唐傑把大部分時間花在網路上。2008年3月拉薩發生暴動時，除了中國官方媒體以外，他密切觀察歐、美新聞網站報導。在防火長城下挖地道，他可毫不猶豫。他使用海外代理伺服器。他只在網路上看電視，因為網路電視有更多選擇。他還從中國的海外留學生那裡接收了外國新聞簡報；過去10年，中國留學生人數成長

近2/3，約67000人。外國不少人認為，與唐傑同輩的中國人，由於刪檢的扭曲，似乎不那麼有智慧。這一點令唐感到困惑。他說：“因為我們生活在這種體制之下，總是捫心自問，是不是被洗腦了；我們熱衷從不同渠道取得其他資訊。只是，當你生活在所謂自由體制中，你根本不會思索自己是否被洗腦的問題。”

那年整個春天，有關西藏的新聞及輿論不停在復旦的電子佈告欄（簡稱BBS）打轉。以科技來看，BBS是老古董了——很

簡單的論壇，有多條談話貼文——只是當時推特還有它的中國同類還沒有生根。對許多中國人來說，BBS首度讓他們體驗進入滿是陌生人、而且敢放聲直言的空間。在復旦BBS上，唐傑讀到很多外國新聞簡報，唐傑看到了被中國網民指責誤導和不公平報導的一系列的外國新聞剪報。舉例來說，CNN網站上的一張照片，被裁剪成軍車衝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但未經剪裁的原版照片顯示一大群示威者是站在旁邊，而有人揚手向軍車投擲東西。唐傑認為，這種剪裁等於蓄意的歪曲。

（不過CNN否認說，他們發表的圖片說明客觀地描述了現場）。

“這是一個鬧劇，”他苦笑地諷刺說。這張照片和其他的照片一起，加上網民潦草寫就的批判，通過電子郵件傳遍中國。然後又有人補充了發表在倫敦泰晤士報，福克斯電視新聞，德國電視，和法語電台上的更多的歪曲事實的例子。相當多的新聞機構，在有些人看來，這都有點像製造陰謀了。它使得唐傑和其他相信西方新聞界的人十分震驚，但更重要的是，它觸犯了唐傑他們，因為唐傑一直認為，他們正處在中國現代史上從未有過的最繁榮和最開放的年代，而世界似乎仍然以懷疑的態度看待中國。CNN評論員卡弗蒂似乎想譁眾取寵，竟稱中國“還是蛇鼠一窩，過去50年來沒變”。這句話登上全中國媒體的首頁，惹得後來CNN為此道歉。唐傑跟許多同濟一樣，無法理解外國人何以會對西藏如此激動——依他看來，那裡是凋敝的內陸地區，中國竟花數十

年時間較以文明。因西藏之名而阻礙北京奧運，這種邏輯對他來說，好比抗議美國虐待切諾基族（Cherokee），而不參加2002年的鹽湖城冬季奧運一樣。

他在YouTube網站上搜索駁斥偏見、澄清中國事實的影片，但除了擁護西藏人的影片，他沒有發現任何用英語說明的影片。他本來很忙，已經跟出版商簽了契約，翻譯一本萊布尼茲的《形上學與單子論》和其他論文，可他還是對無人站在中國的角度說話感到無法釋懷。

“我想，好吧，那我就來做點什麼東西。”他說。然而，動工前他必須回家幾天幫幹農事。他的母親曾告訴他收穫季節到了，要回來幫忙。她需要兒子回來幫她在田間地頭挖竹筍。

唐傑出生在中國東部城市杭州附近一個農村家庭，是四個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的。唐傑父母都是文盲，直到唐傑四年級，還沒給他取名字。而是按排行叫他“小四”。等到實在不能這

麼叫下去的時候，父親才給起名叫“唐傑”，因為他父親最喜愛的相聲演員叫唐傑忠。

唐是個書呆子，在這個喧鬧的大家庭裡，他顯得沉默寡言。他喜歡讀科幻小說。他告訴我，“我可以告訴你《星際大戰》這些電影中的所有內容。”他是一名好學生，但並不是非常突出的那類學生。而他對思考表現出早熟的興趣。“他並不像其他的孩子把錢花在買零食上，他把錢攢起來買書。”大他7歲的姐姐唐曉玲說。他的兄弟姐妹都只國中畢業，他們將唐視作一個讓人欽佩的怪胎：“如果他有事情沒想明白，找不到問題的答案，就連覺都睡不好，我們可不會。”

到了高中，唐傑的學習成績提高了，還在一些科學發明比賽中取得了成功。但他自己卻感到很沮喪。“我發現科學並不能幫助一個人的人生。”這時他偶然讀到了《蘇菲的世界》的中譯本。這本書的作者是哲學教師喬斯坦·賈德，講述一個十幾歲的少女遇到偉大思想家的經歷。“就是從那時起，我發現了哲學。”唐傑說。

在唐傑的家庭裡，並沒有特別強烈的民族主義痕跡，但愛國思想包圍著唐傑。為了預防[添安門]事件重演，黨加倍努力於中國青年的思想教育。唐傑讀小學時，國家主席江寫信給教育部，呼籲要以新的手法來解釋中國歷史，文中寫道：“甚至要到幼兒園學童。”此手法強調百年國恥——這道弧線的組成部分，始於19世紀中國在鴉片戰爭敗北，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占領中國國土。

黨解釋，專注於“愛國教育”，有助於“提升民族精神”、“強化凝聚力”。學生們學到“勿忘國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批准一個假日叫“國恥日”，教科書都重寫。

《愛國主義教育實用大典》有多達355頁篇幅，細細陳述中國的恥辱。民族主義幫忙黨理順社會主義急先鋒經營自由市場的悖論。新教科書轉化對中國苦難的解釋，不再那麼強調“階級敵人”的角色，改而強調外國侵略者。毛澤東時代，中國曾粉飾自己多次失敗的事實，可是現在，共產黨青年團還投資開發愛國網路遊戲如《抗戰Online》，讓玩家扮演紅軍士兵的角色，與日本侵略者以機槍互射。

情緒與政策變得更難捨難分。中國外交官譴責別國政府舉動時，經常說它“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而且引用這種說法越來越頻繁。有位名叫方可成的記者計算那種場合，發現中國人情感受傷，在1949到1978年代只有3次，但是到了80年代及90年

代，平均一年發生5次。

唐傑來復旦讀書時，他遇見個性文雅、研習中國文學及文字學的博士生萬曼璐。他倆跟朋友肩並肩坐在餐桌上，但沒有交談。後來，唐傑在復旦BBS找到她的網名“gracelittle”，還發消息給她。兩人開始第一次約會，那樣的情節，就像以中國故事《傷逝》為本的試驗歌劇一般，在現實裡發生了。

他們發現彼此都對中國的過度西方化充滿了的挫折感。萬曼璐對我說：“中國的傳統有很多美好的東西，但我們已經拋棄了它們。我覺得應該有人將它們延續下去。”她來自一個中產階層家庭，唐傑的卑下出身和舊式的價值觀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這一代人大多數生活一帆風順，包括我在內，”她說，“我覺得我們的性格缺乏某種東西。比如說，愛國心或者克服困難的毅力。這些品質，我在自己和很多同齡人身上都看不到了。”她又補充，“對於他來說，來自這樣的背景，家裡沒人受過教育，沒人能教他讀書，還要承擔極大的家庭壓力，所以他得到今天的一切，真不容易。”

見面之後，我開始往返於上海，找唐傑消磨時光。唐傑跟他那群同學都追隨時年39歲、富有魅力的復旦哲學教授丁耘。丁是政治哲學家史特勞斯（LeoStrauss）著作的中譯者，史特勞斯受到包括曼斯菲爾德（HarveyMansfield）在內的新保守派的擁戴。在當時的美國，施特勞斯能重獲矚目，是因其反暴政的主張。施特勞斯在芝加哥大學的前學生夏爾斯基（AbramShulsky），在入侵伊拉克之前，一直主掌五角大樓的特殊計劃署，施特勞斯另一位前高徒便是伍夫維茲（PaulWolfowitz），時任助理國務部長。

丁教授將史特勞斯的思想作為一門經典理論來教授，並鼓勵學生復興中國古代思想。“在1980-1990年代，大部分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看法是負面的。”丁教授最近對記者說。他留著短髮，戴著時髦的方角眼鏡，喜歡穿唐裝衣領的寬鬆襯衫。他說，在改革開放初期，“保守派”是一個貶義詞，就像“反動派”一樣。丁教授在2003年的面試時見到了唐傑，丁教授回憶說，“我是負責考試的考官。我感到這個孩子很聰明，又勤奮。”他把唐傑招收了進來，他對於唐傑和其他學生對抗西方文化衝擊感到十分欣慰。

唐傑對我說：“事實上我們已經非常西方化了。現在我們開始讀中國古典書籍，我們重新發現古代中國。”曼斯菲爾德途徑上海時，上海的年輕新保守派人士邀請他吃晚餐。造訪上海之後，曼斯菲爾德寫封電子郵件給我，信中寫道，他們“深切地感

受到，自己的國家雖然能感受到正在復興，也為此自豪，但卻沒有指導的準則。其中有些人發現……西方的自由主義都對自己失去信仰，於是他們轉向施特勞斯，學習基於原則、基於‘自然權利’的保守思想。這一派保守思想與安於現狀的保守派截然不同，原因在於前者對一個國家只安於現狀而沒有原則，並不滿意。”

如此重拾自豪，同時也影響唐傑與同伴看待經濟的方式。他們相信，世界從中國獲利，但中國想投資海外卻受到阻撓。曾可為歷數中國公司想投資美國的例子，他說：“華為想購買3Com，遭到拒絕；中海油想買優尼科（Unocal）、聯想收購IBM部分業務，都引起政治反彈。不是因為經濟論調，就是政治論調。而我們還以為，這世界是自由市場……”

還沒等他說完，唐傑就插嘴道：“這就是你們美國人教給我們的。”他說，“我們打開了市場，但是當我們試圖購買你們的公司時，我們就遇到了政治阻礙。這不公平。”

他們的這種看法在中國很流行，也有合理性：美國政界人士援引對國家安全的關切來取得了各種程度的可信性，以反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但是唐傑這種以“受害者”自居的觀點，同樣遮蔽了某些與“受害”的相反事實：中國在其他海外交易中取得了成功，它的國家財富基金進入到了黑石集團和摩根史坦利，雖然中國逐步開放市場給外資，但在類似於石油之類敏感行業它也拒絕讓美國公司收購。

唐傑深信，美國將設法阻撓中國的崛起，發動“新冷戰”，這種觀點也超越了經濟學，擴大到對更廣泛的美國政策的看法上。一些相對而言在美國人眼裡不那麼重要的事務，如支持台灣和華盛頓要求的人民幣升值，也被中國人上升到美國戰略遏制的高度來看待。

唐傑在農村的家裡待了5天，然後回到上海，開始做他的這個影片。他圍繞著他的朋友們思考的主題，從網路上搜集各種資料，從通貨膨脹到台灣要求獨立等等。他選定的一些圖片只是因為比較能刺激人，比如一個男人在人海裡高舉國旗的畫面，很像德拉克羅瓦的名畫《自由引導人民》；他還選擇能夠體現某種有強烈政治含義的照片：一個坐輪椅中國殘障人士火炬手在巴黎進行奧運聖火傳遞時，防備示威者搶奪火炬的那一刻。

他到百度搜索和下載電子音樂大師範吉利斯的音樂做配樂。他最喜愛的范吉利斯的音樂來自熱拉爾·德帕迪約主演的哥

倫布傳影片《1492：征服天堂》。看著銀幕上的哥倫布站在橫穿大西洋的輪船的甲板上的鏡頭，唐傑想到的是：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他把毛主席和田徑明星劉翔這兩位時代標誌者的照片放到影片裡，他的影片作品6分16秒長，其中一些英文字幕充滿了錯誤，這是因為他匆匆忙忙地趕著製作，急於把影片公布出去。他把完成的影片上傳到了新浪網，並公布在復旦大學的BBS上。

對於這段影片的流行，丁教授很高興。“我們曾經認為他們是後現代化、西方化的一代人。”丁說，“當然，我認識的學生還是很好，但是從更廣的範圍來看這代人呢，我並不樂觀。看到唐傑的影片以及它在年輕人中的流行，讓我非常、非常高興。”

不過並非每個人都高興。對於有些人來說，中國愛國青年太極端了，一些人利用諧音而把“憤青”說成“糞青”。這批志士認為自己是在保衛中國的海外形象，實則建樹無多。在中國的愛國行動之後不久，英國金融時報的一項調查表明，歐洲人將中國視為了全球安全穩定的頭號威脅，甚至超過了美國。但憤青的爆發更讓志在進一步促進民主的人感到不安。從年齡和受教育程度來看，唐傑和他的同仁繼承了源遠流長、可追溯到1919年的激進主義傳統，當時的民族主義者喊出了“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口號，直到19⑧⑨年，學生們湧到[添安門]廣場，挑戰政府，樹立自由女神雕像。當時是2008年，還有一年，[添安門]事件就要滿20周年，但從我與唐傑等人相處的經驗，讓我明白經濟繁榮、訊息技術和西方化並沒有使得中國的年輕精英走向寬容，而是使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伴隨著生活的改善，將理想主義置於腦後。

19⑧⑨年的學生抗議貪汙腐敗和濫用權力，“如今，這些問題不僅沒有消失而且變得更嚴重了。”一位敢於直言的報紙編輯和改革擁護者李大同對記者說，“但是，現在的年輕一代對此熟視無睹，我從沒有看到他們對這些主要的國內問題做出過反應，他們寧可選擇一種功利的、機會主義的方式。”

70

有幅漫畫顯示中國年輕人對[添安門]廣場的鎮壓一無所知（中國人將其稱為“[⑥④]”）——原因在當局從官方歷史清除它。然而這說法也並不完整。任何人只要採取一些步驟，連上代理伺服器，就能隨心所欲找到有關“[⑥④]”的消息。然而，很多中國青年採納官方說法，認為19⑧⑨年運動遭到誤導，而且行動太天真。唐傑對我說：“我們接受一切人權、民主價值，那點我們接受。問題是如何落實。”

那年春天，我遇見幾十名城裡的學生、年輕教授，最後經常會談到[添安門]事件。一次很經典的談話裡，一位大四女生問我，若是把1970年肯特州立大學發生的明兵槍殺抗議學生，當做衡量美國自由的尺度，公不公平？一位環境工程學研究生劉洋（音）說："在當時，'⑥④'是無法也不應該成功的。若是它成功了，中國只會變得更糟。"

時年26歲的劉洋一度自認為自由派。十來歲的時候，他跟朋友們批評共產黨政府還很爽。他對我說："在90年代，我認為中國政府不夠好，也許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更好的政府。"他告訴記者說，"問題是我們不知道一個好的政府究竟是怎樣的，所以就讓中國黨留在原位吧。另一個問題是，我們也沒有能力把他們踢出局。他們有軍隊！"

當劉洋走出大學，他在一家石油設備公司找到了一份工程師的好工作。他一個月賺的錢比父母一年的退休金還多。他積攢起一筆錢，再加上獎學金，得以進入了史丹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本來對北京奧運引發的愛國熱沒什麼興趣，直到他看到火炬在巴黎的遭遇後，"我們非常憤怒。"他說。當火炬到達舊金山時，他和其他中國學生都跑到傳遞經過的街道上去表示支持。

那年春天稍晚，我也來到舊金山，與劉洋安排在他帕羅奧圖市學校宿舍附近的一家星巴克碰面。他騎著一輛山地車來，穿著Nautica的羊毛套頭衫和牛仔褲。那一天就是⑥④，海外中國學生的BBS整個下午都進行熱烈的周年討論。劉洋提到了那張著名的照片，一位無名者站在坦克面前，那也許是中國現代歷史上最震撼的一幕。"我們真的很佩服他，真的認為他很勇敢。"但是，對於那一代中國人，他說，"他們為中國奮鬥，希望國家變得更好。政府是有些問題，但最終我們得承認，中國政府是不得不不惜一切代價地讓整個事件平息下來。"

加州夜晚清爽恬靜，劉洋一邊喝咖啡，一邊說，他不願意拿他們那一代人在家鄉的快樂來冒險去推動自由，這種自由他在美國已經認識到了。"你能靠民主過日子嗎？"他問我，"你得吃麵包，喝咖啡。民主不能帶來所有這些東西。印度人有民主，非洲一些國家也有民主，但是他們都不能養活自己的人民。"

"中國人開始認識到，一邊是舒適的生活，另一邊是民主。"劉洋繼續說，"如果民主確實能給你帶來好日子，那當然很好。但是，如果沒有民主我們照樣能過上美好的生活，為什麼我們還要選擇民主呢？"

當火炬於5月回到中國時，中國人似乎決心彌補它在海外受到的委屈。人們蜂擁到火炬經過的街道上。一天下午，唐傑和記者到上海市區去觀看火炬傳遞。

當時，這個國家還沒有從四川大地震的震撼中恢復過來，超過6.9萬人喪生，數百萬人無家可歸，這是30年來最嚴重的災難，但它也提供了一萬眾一心的罕見契機。捐款蜂擁而至，顯示出幾週前爆發的愛國主義積極的一面。民族主義包含一種暴力精神，年長的人都會想起紅衛兵或是在歐洲崛起的光頭黨。在杜克大學，一位叫王千源的大一女生想調停校園裡親中與親藏兩派示威者，但是在網路上她被打上了“叛國者”的罪名。人們搜出她母親在濱海城市青島的住址，還破壞了她們家。至於對外國人的立場，他們對外國記者的威脅所幸並未成真，沒有流血傷亡；巴黎包圍火炬的亂象結束之後，中國人抵制家樂福的行動也消停了。中國領導人醒悟到，自己的海外形象正在惡化，最後呼籲只進行“理性的愛國主義”，而約束了學生。

坐計程車去看聖火途中，我感受到唐傑對衝突如此激烈而產生的不安。他對我說：“我們不想發生任何暴力。”他想說服自己中國同輩的看法是：要從周遭世界找出真相，不再是簡單的事，不能光接受媒體告訴他們的，中外皆然。“我們不再受限於只有兩種選擇，我們自己也有媒體了。現在，我們當中，有人有攝影機、錄影設備。他們有真相。”他相信，那年春天同一代人學會了重要的事情。“現在他們知道，得用自己的大腦。”

從遠處眺望，很容易把中國愛國青年平凡化，當成政府的卒子，但就近端詳，會發現這種說法不太有說服力。政府對待網路上的愛國志士也很謹慎小心，原因在於政府感受到：他們的自豪是針對國家民族，而不一定是專指共產黨。換言之，他們的熱情是可能以無法預料的方式轉變方向的。

2004年，一家愛國網站被刪檢人員關掉以後，有位評論家寫道：“我們政府軟如綿羊！”有些時候，政府允許民族主義滋長，另一些時候則緊張地加以控制。來年春天，日本批准一部新教科書，批評者指稱書中粉飾日本二戰犯下的屠殺罪行，北京的愛國人士草擬出抗議計劃，透過聊天室、BBS及手機簡訊發送出去；多達1萬人上街，向日本大使館丟飲料及瓶子。儘管政府警告，叫大家住手，但接下來一星期，數千人在上海遊行，還破壞日本參事館——此事為多年來，中國規模最大的示威之一。有一度，上海警方還切斷市中心的手機服務，以防止群眾集結起來。

亞利桑那大學教授蘇吳（音）研究線上民族主義的崛起。

他對我說："直到現在，中國政府還能控制住它。但我把它稱為'虛擬[添安門]廣場'。人們不必再去廣場。他們在線上就能做同樣的事，有時甚至破壞力更強。"

唐傑與我接近聖火傳遞路線時，他眺望著群眾說："瞧瞧大家，人人都認為這是他們自己的奧運。"小販在賣T恤、頭巾及國旗。唐傑跟我講，等火炬通過了再買，屆時小販會降到半價。他帶了一個小塑膠袋，手伸進袋裡摸索著，拿出一條鮮紅色的領巾，是中國兒童的飾品，象徵自己是"少年先鋒隊"隊員——某種社會主義版的童子軍。他自己系一條在脖子上，露齒而笑；還拿一條給路過的青少年，而對方婉拒了。

天空一層霧霾，底下空氣停滯且沉重，但大家情緒很高昂。倒數時間一到，聖火來臨，全城都出來一看。有位男子身著深色西裝，出了一身汗，在整理自己頭髮；有位工地工人戴著橙色安全帽，腳穿農人的高統膠鞋；還有個飯店服務員身穿制服，衣上有好多顆金色扣子及飾章，讓他看起來像元帥一樣；有些較年輕的觀眾穿著反映中國近來麻煩的T恤，上頭用英文字寫著"反暴動、求真相"。有位女士爬上路燈杆，還有個綁紅頭帶的年輕男子爬上樹，周遭的人都爭著找視線更好的地方。

群眾的熱情感染到唐傑，讓他想到中國的未來屬於他，還有身邊的人們。他說："我站在這裡，真能深切感受到中國青年共同的情感，我們有自信。"

警方封鎖了道路，人群一陣騷動，人們湧向路邊，引頸翹首。但唐傑反而沒跟上去，他是個冷靜的人。

Chapter10奇蹟與魔法引擎

從金門泳渡叛逃到大陸的林毅夫1980年在北京大學讀書，當時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WilliamSchultz）應邀來北京發表演講。林奉命擔任翻譯，原因是他在台灣時，就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當時剛得諾貝爾獎不久的舒爾茨對他印象深刻，返回芝加哥後，出力安排一份獎學金。林毅夫再度奪得"第一"：文革以來，第一位赴美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中國學生。更叫人矚目的是：他選擇到自由市場思想大熔爐的芝加哥。

1982年，林抵達美國，他的妻兒也來到美國，一家團圓。自從他叛逃後，他與妻子陳雲英秘密維持聯繫。她甚至送一首詩給他，其中有"我了解你，了解你做什麼"這樣的詞句。來到美國之後，陳雲英到喬治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

在芝加哥的求學時代，林毅夫著手研究念茲在茲數十年、

關於中國的浴火重生，而他的結論經證實有所爭議。取得博士學位後，1987年林毅夫偕妻子陳雲英返回北京。返國之後，他碰到一個微妙的問題：他是美國歸國學人，該怎麼設法把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自由經濟理論，傳授給社會主義信徒呢？

他告訴我："一切會議我都參加，但不發一語。"最後，他得到發聲的機會。他說："他們都很驚訝，因我的用語跟他們類似，用他們能懂的語言。"舉例來說，1990年代末期，中國貨棧塞滿沒賣出去的電視、冰箱等消費品，許多經濟學家歸咎於低收入所造成，林毅夫則不同意。他說："人們沒有基礎建設，何以消費這些產品？"他變成最敢出聲、倡議大力投資於鄉村電力、自來水、道路的人。此一提議獲得共產黨接受，納入當時"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口號的配套改革。

冷戰結束以及[添安門]廣場鎮壓，這兩件大事撼動中國政治、經濟建制。鄧小平最早的經濟智囊成員之一、曾任黨總書記而具改革思想的趙紫陽因未能及早鎮壓示威而獲罪；他創建的智庫遭解散，好幾位經濟學家因支持抗議而坐牢。趙則被軟禁在家14年，以打高爾夫球、秘密錄製回憶錄，度完餘生。中國政府則把趙紫陽從國家成功的官方歷史中抹掉。

就經濟來看，當時是總的結算點：[添安門]事件後兩年，經濟成長之遲緩，為1976年來之最；鄧看見自己的改革成功在消退，於是把中國的經濟學家都叫回來上工。改革繼續下去，但為防"[添安門]事件"重演，黨向人民提出交換條件：經濟活動方面有更大自由，而政治生活的自由度則減縮。交易有弔詭的成分：黨在人們生活的其中一半，點燃個人的野心與自我創造，但是在另一半則壓抑那些傾向。若作為經濟戰略，這種手法讓中國與當時西方主流經濟學家覺得齟齬；西方學者建議已崩解的蘇維埃政權採行"震撼療法"：削減政府開支、國營公司民營化、開放外國貿易與投資，這些方案後來通稱為"華盛頓共識"（theWashingtonConsensus）。

1994年，在一間向北大地理系借來的小小辦公室裡，林毅夫與另外4位經濟學家創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這個智庫旨在吸引海外留學的中國學者前來。他著迷般地投入工作，經常埋首書桌直到凌晨1、2點，翌日早上8點再回公司奮戰。在同事當中，他以火熱幹勁出名，某種程度上甚至是難以企及的。這些年間，他寫了18本書，數10篇論文，他對學生們講，"我的野心，是死在書桌上。"他的研究中心擴張，而且在過程中，林毅夫講話的影響力也越來越有分量，成為政府5年計劃之類專案的

顧問。他不是黨內決策最核心成員——永遠當不上——但是對一個一度被懷疑是台灣間諜的外來者，這樣的崛起還是很了不起。

年復一年，林毅夫對西方主流觀點，變得越來越批判——那種觀點，在前蘇聯推銷震撼療法——而林毅夫則越來越認定，中國要崛起的關鍵，是讓市場與強力政府融合起來。蘇維埃崩解前10年，很多東歐地區爭著走向自由市場，都遇到失業率升高、經濟停滯及政治動盪的問題，使得大家對震撼療法這種經濟手法，支持的力道大為減弱。而在同一時期，即1990年代，混血而不走經濟光譜任何極端的中國經濟，卻開始勃興。某些領域，資本流通無阻，而某些領域，政府則強力管制。焦點放在經濟成長，則始終不懈。不管什麼時候，當碰到要在經濟成長或環保做個選擇時，經濟成長一定勝出；社會安全若對上經濟成長，也是經濟成長勝出。轉型的代價很嚴峻：健康保險及退休金蒸發掉了；土地上的環境汙染嚴重；房地產開發者剷平城市大塊地區，只為蓋起新的住居大廈。民眾的不滿滋生起來，但黨動用武力，同時穩定地邁向繁榮，使得不滿的情緒不致爆發。

然而，衡量數據很明確：1949年的平均壽命為36歲，識字率僅2成。到了2012年，平均壽命已達75歲，識字率高出9成。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DavidSachs）寫道：“中國很可能在21世紀率先成為終結貧苦的20世紀貧窮大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國想以計劃經刺激方案對抗其影響，但在此之前已蓋了那麼多新機場、公路，以至於計劃官員無法立刻決定，還有什麼能蓋。

林毅夫則在形塑輿論，思索政治改革對經濟成功能扮演何種角色；他的觀點與立場，並不討好呼籲民主化的中國[字由派]人士。他出版與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國的奇蹟》，書中聚焦在蘇聯崩潰後產生的混亂現象，然後下結論說：“改革越激進，摧毀社會的衝突，其力道會更強烈，反改革力量亦然。”林毅夫推崇中國“笨手笨腳、循序漸進的手法”。2007年秋天，他在劍橋大學發表演講，指出“‘華盛頓共識’的改革失敗”。他揶揄由國際貨幣基金制定的震撼療法政策，似乎更像“徒有震撼，沒有治療”，注定會導致“經濟大紊亂”。他請聽眾回憶，當初“華盛頓共識”的擁護者都警告，中國慢吞吞的改革手法，用林的話來說，“可能是最糟糕的轉型策略”，注定“導致無法避免的經濟崩潰”。林毅夫成為中國最顯赫的布道家，講述中國自己的繁榮故事。

2007年11月，林毅夫接到專門提供貸款與專業對抗貧窮的世界銀行來電。世銀總裁佐利克（RobertZoelick）要來北京，想聽一聽林對中國經濟的見解。兩人在佐利克的飯店房間見面，兩個月後，世銀再度來電，提議林毅夫出任首席經濟學家這一職位。此舉又是空前未有：他將成為第一位以中國公民身份，同時也是發展中國家第一人，出任一個以往只由西方達官顯要盤踞的職位——其中有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兼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EugeneStiglitz）及美國前財務部長、歐巴馬總統“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的薩默斯（LawrenceH.Summers）。

毛主席曾認為，世界銀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可現在，中國是世銀的第三大股東，而且公開表示，決心在國際經濟機構擁有更大發言權，2008年6月，林毅夫及其妻子搬到華府。他隨身帶的一切東西，兩個手提箱就裝完了。他們在喬治城旁邊租了間房子，有露台供林毅夫在室外寫作，廚房裡放了台跑步機。因公出訪時，同儕都外出交際，林則在飯店房間裡，工作直到深夜。

74

我在熱得汗流浹背的8月下午，去華府訪問林毅夫，他在世銀總部4樓一間寬敞的轉角辦公室。世界大廈有13層樓，離白宮只有幾區的距離。他離開書桌（他本來一如往常在寫論文），問道：“發展中國家如何才能趕上發達國家？”在林毅夫畢生志業的中心，這個問題很分裂，只是此時他已做好準備，提出自己的答案。他說：“失敗的案例很多，成功的只有一些。”林有大約300位經濟學家及其他研究員當作幕僚，他們的工作，是幫助世銀及貧窮國家政府制定種種策略，以提高國民收入；這項主題，數十年來因意識形態大辯論而紛擾撕裂。

林毅夫抵達華府幾星期內，全球便碰到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對林毅夫造成難題：美國、歐洲及國際貨幣基金的官員都呼籲中國調升其貨幣價值，以提高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此舉可讓其他國家的產品售價相形便宜一些。紐約選出的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舒默對記者們說：“中國對人民幣的操控給美國經濟復甦的影響，彷彿扼住我們的咽喉。”但是，林毅夫看待本課題的方式大不相同。他在香港面對一群聽眾表示，強迫中國升值人民幣，“不會改善失衡，而且會讓全球復甦為之延緩。”他主張，升值人民幣只會讓美國消費者需求低靡，原因在人民幣升值，中國出口品會變得更昂貴，這對美國經濟無益，原因在於美國人並不製造那些從中國購買的

東西。

金融危機終於從根本面改變中國經濟勃興公式的核心：美、歐對中國出口品的需求大幅下跌，因此，為了防止經濟疲軟，北京政府大舉轉向投資，公款大筆押注到鐵路、公路、港口及房地產。政府調降房地產稅，另敦促銀行放款；貸款的增幅在2009年比印度全年國內生產毛額還高。政府官員裡，營建狂熱釋放出巨大的雄心：武漢市打算在7年內建造140英里長的新地鐵，而同一時間的美國，紐約市發出的錢，只夠在地鐵第2大道線興築2英里。

這次全球衰退也讓林毅夫有機會落實他的願景。在此之前不久，中國知識分子及官員還很不想把中國經驗，形容成西方做事方法的替代選項，原因是害怕激起敵意，或者讓大家岔開心思，沒注意到大多數中國人民依然十分貧窮。西方各國在掙扎奮鬥，而中國受到的損害卻小得多。有位西方駐北京外交官員對我說：“這次危機的一大教訓，在於我們的經濟學家應該學會謙卑。我想，我們必須接受，中國可能變成類似完全開發的經濟國度，而不必傷筋動骨地進行政治改革，這種可能性很高。”中國重返世銀成為會員屆滿30年之時，世界銀行官員造訪北京參加慶祝，世銀總裁佐利克讚美中國減少貧窮的成就，說：“世銀，還有整個世界，可以從中國受益良多。”

任職世銀時候，林毅夫寫出一系列論文，用意在“重新檢查”大家對窮國如何致富的見解，彷彿想宣告1990年代大為流行的“華盛頓共識”無效。他與喀麥隆經濟學家蒙加（CélestinMonga）掛名合撰，主張政府必須“重回中心舞台”。他說，產業政策，也就是政府尋找並支持特定部門，批評者叫它做“挑人來贏”，當時西方出境維艱，而且有良好理由：它失敗的頻率總是大於成功。但林毅夫主張，更糟糕的便是沒有產業政策，他指出最近對13個成長快速經濟體所做的研究。

他對我說：“所有成功的國家裡，政府都扮演很主動的角色。”他主張一種“軟性”產業政策，在其間，喧囂的自由市場會產出新的產業、公司，然後政府再相中最有希望的，協助它們成長，給它們稅賦優惠；建設基礎設施，如遍及中國大陸的港口、公路。這個想法，是芝加哥與北京結合的產物：他與蒙加寫道，要由貧窮中崛起，市場“不可或缺”，但政府“同樣不可或缺”。

75

他利用自己在世銀的地位發聲，主張中國的手法有其基本

強項，而其他國家可資效法。他造訪發展中國家時，都意有所指地說，當地讓他回想到30年前的中國。在一場他命名為“中國奇蹟解密”的演講上，他問道：“其他發展中國家能達成類似中國過去30年的成就嗎？答案很清楚，可以！”他給貧窮國家忠告，若是它們想致富，必須延遲政治改革，不然就會落得跟後蘇聯的俄羅斯一樣，紊亂而苦惱。他支持說，美德不是源自免受壓迫，而是“源自害怕貧窮與飢餓，對此我兒時回憶依然鮮明。”他用自己姓名而非世銀名義寫作時，講得更刺耳：“某些學者提出樂觀、有時天真的說法，認為民主……較可能推動經濟改革。”他援引鄧小平的話：“美國把它的制度吹得那麼好，可是總統競選時一個說法，剛上任一個說法，中期選舉一個說法，臨近下一屆大選時又是一個說法。”

兩個月後，林毅夫回北京幾天，一天晚上溫暖舒適，他坐著一台司機駕駛的奧迪黑色大轎車到北京另一頭，參加一場聚會，表彰他共同創設的MBA深造課程10周年紀念。會場設在一間中國傳統四合院，紫藤與山楂樹蔭影扶疏，當地一度是慈禧太后的家。只是，為了當晚盛會，四合院被搞上紅地毯，聚光燈之耀眼有如一場時裝秀。

杯觥交錯，約100名賓客——大多是中年夫婦、前學生及同事——帶著過節的快樂，歡迎林毅夫偕其妻走進會場；陳雲英此時是中國首屈一指的特殊教育專家兼全國人大代表。林氏夫婦抵達，這群有錢的賓客歡呼起來，簇擁著兩人，輪流擺姿勢與林毅夫合照。閃光燈叫人眼花撩亂。一組電視記者進來採訪。有個青少年要求簽名。林毅夫來到較安靜的桌畔，只是一名來賓拉著他，跟他講蓋高爾夫球場大有商機，令人興奮，林毅夫的表情雖還客氣，但難免不耐，主辦方趕快擁著林氏夫婦到隱密的一區休息，林也準備發表演講。

林毅夫登上講台，往外一瞥來賓，他一開始就指出過去10年中國經濟發生“天搖地動的轉型”，然後宣布，“未來10到15年，將更為可觀”，聽眾報以喝彩。他指出，2000年北大國際MBA開始之際，中國登上《財富》世界500強的公司，還不到一打，而美國有將近200家。他說：“我相信到2025年，中國經濟已成為世界最大，與美國共享舞台，屆時中國經濟將占全球經濟的2成。中國登上《財富》500強的公司，可能會有100家。”他以一句規勸作結尾：“我希望各位在建設中國經濟時，不忘幫忙建設更好、更和諧的中國社會。”

“和諧社會”這個詞彙，並非所有中國知識分子很快就採用。它是國家主席胡青睞的口號，象徵目標在建立廉明而穩定的社

會，但批評胡的人則歪用它，指稱鎮壓、消除[意義]人士，像是一個網站被關掉，就說“被河蟹”了。林毅夫是以正面的意義來使用這個詞，它與他長久以來信仰政府權力，兩相吻合。

1999年，著名自由派經濟學家楊小凱發表演講，主張“沒有政治改革，就沒有廉明，將導致民眾的不滿”。楊很好奇，中國沒有民主制度，能否變成強大國家。但是，在一項回應之中，林毅夫指出中國經濟領先印度，他寫道：“不論在經濟成長的速度或品質，中國表現要比印度優秀。”依林毅夫看來，中國已經成為沒有民主的強大國家，而且瞧不出有什麼要改變的理由。我訪問林毅夫，談那場辯論，他說自己與楊小凱是好朋友（楊於2004年去世），但意見不一：“他（楊小凱）認為，中國若想成功，首先必須採納英式或美式憲法。我的觀點不同，我認為我們並不曉得，哪種治理結構才是世上最優。”

林毅夫雖然聲名大噪，他的人生仍被極不尋常的事實包圍著：他泳渡大陸已經超過30年，依然面臨逮捕令，是台灣國防部頒布的，罪名是“叛逃敵方”。經過這麼多年，許多台灣民眾已經把林毅夫的成就，視為家鄉人的光榮，台灣重量級政治人物也要求國防部撤銷此案，但國防部重申，林要是敢踏上台灣土地，將被逮捕，並依叛國罪軍法起訴。

林毅夫的兄長林旺松對記者們說：“我不了解為什麼很多人把他當壞人。我弟弟只是想追求他的志向而已。”林父於2002年去世，林家要求准林毅夫返鄉奔喪，但軍方拒絕這項要求，聲稱林將“終生蒙羞”。林別無選擇，只能在北京透過網路現場直播，看喪禮進行。他在辦公室打了祭壇，跪倒在前。在頌讀祭父文時，林毅夫這樣寫道：“阿母病危，未能侍奉左右，阿爸抱病臥床，仍無返鄉之途，黃泉路口，不得執手扶送……不孝之罪大矣！蒼天可罰，蒼天可誅吾矣！”

林毅夫靠著當人民共和國最熱心的經濟發言人而飛黃騰達。但在意見不合者的眼中，中國的麻煩、困難卻是越來越重。聽完林談經濟光明未來的演講，幾天之後，我去拜訪吳敬璉；改革開放展開十年之間，吳敬璉崛起為中國首席經濟顧問之一。當時他已將近80歲，身形矮小，濃密的白髮下眼睛湛然晶亮。他的工作地點在北京市邊緣，雖然還是國務院官方顧問，但他的發言並不十分討喜。吳對我說：“中國此刻遭逢的最大麻煩，便是貪腐，這實在明顯。貧富差距的原因，就是貪腐，貪汙腐化哪裡來？事實上來自政府持續掌控太多資源。”

吳敬璉寫出一連串的相關文章及書籍，指出裙帶資本主義，還有貧富差距，都是證據，指出中國經濟模型，已撞到極

限，政府再不允許政治更為開放，來斡旋彼此競爭的需求，將無以為繼。近幾年，他激烈地主張，中國必須採行西方民主制度，因此民族主義者抨擊他已變節。曾有一次，雙方的爭論惡化到攻擊個人：《人民日報》刊載網路謠言，說吳敬璉當美國間諜，正被調查。這種說法實為荒謬——國務院最後出馬挺吳，駁斥該指控——但那次口誅筆伐那麼醒目，他的批評已叫有權勢、能透過《人民日報》發言的人冒火。

我問吳敬璉事情擺平沒有。他嘆息了，說："1個月前左右，網路上有文章說，某人持磚敲我，但我僥倖活了下來。"該文章全非事實，我問他打算如何處理。他說："文章在暗示，叫人動粗。"撰文人署名"中國剷除叛徒協會"。誰躲在背後想妖魔化他，吳敬璉無從頭緒；嫌犯五花八門，數量激增：是右翼民族主義邊緣人？反改革的掌權要角？

在中國，注入金融的資金成長得如此之大，以至於神秘晦澀的經濟學辯論，都沾惹上一抹強烈的反對色彩。吳敬璉最近主張，支持中國貨幣升值，接下來就在網路上聽到了群眾的反應。他說："文章底下有個發表評論的人透露我住的地址，並說住處的治安很鬆散。"他微弱地笑一下說："那樣子寫，在美國是違法的，在中國，沒人在乎。"

隨著辯論搞大，原本平和的言詞出現政治的尖銳。林毅夫愛把經濟的勃興描述為"中國奇蹟"，但自由派作家兼批評家[劉小玻]卻是這樣看待此事的，他寫道，自己只看到制度貪腐的"奇蹟"、社會不公平的"奇蹟"、道德傾頹的"奇蹟"與揮霍未來的"奇蹟"。劉又說："經濟繁榮正變成'貴族強盜'的樂園。只有靠著錢，黨才能維持對中國主要城市的控制，指派從政官員，滿足許多人想一夜致富的貪婪，鎮壓任何新生反對團體。只有靠著錢，黨與西方各國打交道才能獨斷專行；只有靠著錢，它才能收買流氓國家，買到外交支持。"

51歲的[劉小玻]瘦骨嶙峋，有如灰狗，頭髮剪得很短，而且發尖收束在額頭呈V字型。他是個大煙槍，博學而幽默。[劉小玻]生長於東北，11歲那年，學校因文革關閉——他形容為"暫時地解放"——嚐到獨立的滋味，自此他一生的思想很不傳統。他在北京師範大學取得文學博士學位，但想在中國學術界吃香得哈腰屈膝，他卻不擅長。他相信，中國作家"無法有創意地寫作，因為他們唯一的生命，根本不屬於自己。"他對西方漢學家也沒客氣多少，抨擊說"98%是廢柴"。他的出發點不是想冒犯人，但就算是要觸怒人，他也絲毫不畏懼。他寫信給漢學家白傑明說："或許我的人格意味著

無論往哪邊走，都會碰壁。對此我可以接受，哪怕最後我撞破頭。”

[劉小玻]寫了17本書，幾百首詩、論文及散文，大多與政治強烈相關，因此也付出代價：2008年春天之前，他已入獄服刑過3次。第一次是因他參與[添安門]廣場[是威]，角色重要，故以“反革命宣傳及煽動罪”而被判刑。他拒絕那些指控罪名，但欣然接受“黑手”這個標籤，認為那是“榮譽勳章”。鐵窗之後，他能保存的東西不多，勳章卻是其中之一。一首獄中詩裡，他寫道：“除了臥處，我別無所有了。”

這麼多年來，[劉小玻]已懶得區分監獄、羈押中心及勞改營。有段期間，他被軟禁在家，與我通電話時說：“入獄時，我被關在較小而有牆的豬圈；出獄，我只是被關在較大但沒牆的豬圈。”1996年他因“擾亂社會秩序”罪名去勞改營時，他娶了自己的長期伴侶、藝術家劉霞。勞改營守衛一問再問劉霞，知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她回答說：“對！那個‘國家敵人’！我要嫁給他！”

勞改3年，[劉小玻]1999年獲釋，回到兩人公寓後，發現家中此時多了部電腦。他在一篇文章裡回憶寫道：“一位朋友送給我太太，她已經能用它來打字。上網。她教我如何使用，實際上接下來幾天來看我們的朋友不停告訴我，要學會電腦。我試了幾次，但要在一部機器前組句成篇，感覺就是不對勁。我避而不用，繼續用墨水鋼筆寫作。”

只有在他用電子郵件投出第一篇文章之後，他才領悟到科技帶來的可能性。“幾個小時內，我就從編輯得到回應——網路神奇的力量突然讓我如夢初醒。”劉霞再也拿不回自己的電腦了。[劉小玻]經歷[意義]人士的舊日儀式，他稱其為“自行車加電話時代”；當時的知識分子，必須等候舉行葬禮，或某事件周年紀念，才能集會而不至於引起政府懷疑。全球資訊網把方言、階級與地理限制一揮而斷，以至於中國第一份線上雜誌《隧道》（Tunnel）編輯群1997年寫道：“獨裁者之能塞耳閉明、鉗制吾人思想的原因，在於他們專擅散布資訊的科技，而網路已改變這道公式。”

那種理想幾乎談不上普世皆然。全世界“網路烏托邦”的批評者主張說，網路只提供開放的幻相、微弱的合群感；而且，藉著造出宣洩出口、化解更深層改革的壓力，它反而強化了[威全]政府。但對[劉小玻]而言，那些因素並沒有壓垮在網路時代從事[閩權]活動的現實好處。多年來，他想把自己的手稿寄往海外，郵局總能攔截；若是他準備發表抗議公開信，可能要花1個月逡

巡於北京城，才找得到足夠的志同道合者簽名。他寫道：“為了完成一封‘⑥④’的公開信，提前一個月就要開始準備。先要尋找發起人並把人湊齊，就需要一段時間；之後討論信的內容、措辭、發表時機，起碼要花費幾天時間才能達成共識；接著要找地方把手寫的公開信變成鉛字，還要列印和影印數份。”[劉小玻]變成網路烏托邦“怙惡不悛”的支持者。他寫道：“只要輕輕按幾下滑鼠，幾封往來的郵件就能基本解決問題……所以，網路像一台超級發動機，使我的寫作如井噴般爆發。”

在2008年秋天，閉關於北京無電梯的5樓公寓門後，[劉小玻]寫著自認為很重要的東西。他想，這文件產生的衝擊，會大於以往他做的任何事情。沒錯，他在寫的東西必須保密，只要一等時機就緒，他就會公開，而這要拜他稱為“上帝賜給中國人的大禮”之科技所賜。

前一年冬天某個午後，我與[劉小玻]在他家附近的品茗屋見面。他看來異常削瘦，冬季外套鬆垮垮垂下肩膀，彷彿是掛在吊衣架上。他口吃很重，很難不令人注意。喝茶時，他咳嗽著。當時的他，算是中國最著名的[意義]人士，意味他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是名流，但在更廣大的中國人海裡，幾乎默默無聞。多年來，中國官方查禁他的作品，線上刪檢人員拿掉他寫的文章。他的書在海外出版，但他不說英語，而且拒絕許多移居海外的邀請。不管政府喜怒，中國是他家鄉。

當天他平靜得很意外，令我吃驚。長年坐牢，已讓他火氣大減，而且他領引我了解新公開信裡的論述時，不疾不徐，扼要精準——信中警告中國領導人，說他們再不注意與日高漲的政治改革呼聲，會有“適法性危機”。

他對我說：“西方國家一直在要求中國政府履行承諾，改善[仁權]處境，但假如國內沒發出聲音，那麼政府會說：‘那只是來自海外的要求，國內民眾並沒要求。’我想表達，它不只是國際社會的希望，中國人民也盼望改善他們的[仁權]處境。”

[劉小玻]的樂觀讓我錯愕。隨著中國自我整合進全世界，他猜想“當今政權或許會變得較有自信”。他邊說著，後仰坐進自己椅子，享受自己預言的聲音。“它或許會變得較溫和、有彈性、更開放。”而他的任務呢，按他認為，便是繼續寫作、為民喉舌。“不管有無功效，我會繼續要求政府履行其承諾。”

他也這麼做了，幾個月下來，野心變得越大。秋去冬來，他與一小群志同道合者已接近完成他們的秘密計劃——發表詳細宣言，要求[仁權]及政治改革。他們寫道：“有法律而無法

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現實。執政集團繼續堅持維繫[威全]統治，排拒政治變革。”

他們的異議宣言異乎尋常的地方，在於並非自我設限於主張單一事件或模糊條款，而是呼籲進行19項基本政治改革，包括定期選舉、司法獨立、禁止政治控制軍隊，而且終結“因言獲罪”行為。激勵他們的源頭，是《77[憲樟]》，捷克的哈維爾（VaclavHavel）與其政治同胞30多年前發表的宣言。哈維爾等人當時寫道，他們能團結起來，是因“個人與集體有此意志，願為我國及全世界尊重人類及文明權利而奮鬥”。在[劉小玻]等中國共同起草人一案之中，他們在導言的結尾以鬧鐘倒數的緊迫寫道：“現行體制的落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他們內部討論之後，決心在2008年12月10日那個冬日，向大眾公布該宣言——當天也是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公布60周年。宣言定名為《08[憲樟]》。早初簽名者共有303人，但需要一個主要掛名支持者，而[劉小玻]同意擔當該角色。對大多數人來說，那份文件前景黯淡。有句中國人愛說的俗諺這麼講：“槍打出頭鳥。”

79

Chapter11獨唱團

房地產大勃興由東到西、由新到舊，橫掃北京城——經過世貿國際公寓，直達鼓樓。2008年秋天，我拿到補貼金，搬離居住地區。我在往西一英里、一條還沒重新開發、名叫“棉花巷”的街上，找到更便宜的住所。巷子兩旁各有一排白楊樹及老舊的四合院；來自山東、安徽等地的流浪民工很喜歡住那裡；那些人因為較矮小、皮膚黝黑、警戒心比城裡人要高，所以令人側目。他們一般在租來的斗室裡睡行軍床，只有在最悶熱的夜晚，才扯著床墊來到街上，盼望有風吹可睡。

人不必離開胡同，對經濟如何就能略知一二。從棉花巷轉角看白天臨時工的人數，我就能瞧出失業率。那些人都是中年男子，穿著灰撲撲、打補丁的運動外套與平底膠鞋，不時左右腳交換支撐體重。金融危機加深時，他們的人數爆增3倍。望著他們，我終能了解“家得寶”這家建材零售商想把自己動手做家居裝修說得多浪漫，但煞費力氣而成效不大的原因。這些人拿著牌子，列舉自己的技能，每個人條列、兜售自己能力的方式，與約會網站上年輕人列舉自己需求的方式，恰成其反：“能蓋小房子、搭石牆、瓷磚地板、防水防漏、隔間牆、油漆、通水管、鑄模、裝潢、水電”。

生活無常，而且大家都一樣，似乎離成功或失敗都不會太遙遠。離我住屋幾扇門，2月時有間賣芝麻餅的小攤開張了。店裡有個熟食櫃朝向街道，食物香氣由開口直噴到寒冷的空間。有位中年婦女戴紙帽穿藍圍裙，殷勤地向過往行人吆喝，免費試吃。人家叫她郭太太，她湖南口音很濃；她站櫃臺，而她的先生，一個高大沉默的漢子，則在她身後搗麵團，麵粉及蒸汽飄浮如雲。小攤算是24小時營業，假如你把夜裡那7小時扣掉的話；夜裡，他們把一張桌布掛在店口，就睡在餐桌上。

只是，幾個星期後，我駐足下來吃早餐，發現他們已貼上“出租”告示。郭太太說，“我們賺不到任何錢。”租金每月150美元，太貴了。她另說，“人群繞路而過，這地點過往不便。”我不知怎麼介面。對街賣胸罩的，生意不錯，還有店內擺一元熱狗在電燒烤器上滾的便利商店也生意興隆。“我們要搬去復興門”——北京另一個老市區，往南約一英里——她說：“再看著辦吧。”過幾天我回家時，他們已經人去樓空了。我透過窗子往裡瞧，除了最後幾個有麵粉的腳印以外，別無他物。他們從開張到關門，一共7個星期。

沒多久，蟻先生搬來了。他25歲，緊張兮兮，來自福建省，學會製作北京油煎餅的基本技巧，想在競爭激烈的市場占有一席之地。然而，這條街有太多煎餅店，那年春天還沒過完，他就走了。過沒多久，那家小店掛上醒目的新招牌“神秘大鳥建築供應店”

——我打算去光顧，買些五金用品。但店開張後，才發現是家妓院。店員只有一名，她小心翼翼地坐在郭太太以前坐的櫥窗——但妓院也只撐了兩個星期。到了秋天，那地方暗無燈火，只剩花俏的招牌還留在屋頂。生意不好的原因很難判定：或許是金融危機、地點，也可能只是現代胡同生活太無情，留不住客人。

棉花巷夜裡最忙碌的地方是網咖，天花板不高，面積廣闊，擺著一排排會搖晃的桌上型電腦，戴眼鏡的青年男子一坐就是幾小時，抽菸兼打網遊。我去過的任何城市，無論多偏遠，都能找到類似的場所。窗戶幾乎總是遮掩，彷彿賭場，給我的印象是：在中國，網咖是唯一讓人們能遺忘時間的地方。

網路賦予[劉小玻]之類知識分子的一切能量，並且在唐傑等民族主義者中翻攪狂熱，但中國網民的生活跟任何別的國家一樣，不那麼關心嚴肅的事務。2010年4月，中國網民翻牆的人數暴增，原以為是大家的政治意識突然升高，但事實證明是日本AV女優蒼井空在推特開了帳號。中國男魯蛇不惜一切想去看

看。要在中國網路上博眼球的方法很多，部落客開始揪出黨宣人員動手腳——只為了使群眾看來更多、官員更崇高的照片。中宣部耍弄幾十年的技倆，目前公開受到嘲笑：有位部落客留意到，國營媒體播報中國新型噴射戰鬥機的畫面，居然有些摘自電影《壯志凌雲》。湊近一看，還有湯姆·克魯斯把蘇聯米格機打下來的畫面。

在網路上，民眾逐漸擺脫奧威爾稱為"顛倒黑白"（blackwhite)的習慣——"黨紀要求時，為了以示忠誠，願意把黑說成白"。行之已久的例行儀式，效力漸失。國營電視台播出國家主席胡錦濤新年訪問政府補貼住屋低收入家庭，那戶人家的老母親對他說："真感謝黨和政府把國家建設得這麼偉大。"但網民很快就發現，那名老母親是城裡交警局的公僕；而且，她身為一名低收入戶的形象，也因大家發現她帶女兒到上海及度假勝地海南島去玩的照片，信用大打折扣。

有了網路，官媒效用大大減弱。部落客冉雲飛把這種現象稱為"平行語言系統"，而且兩種語言系統間的緊張，讓原本在中國凋萎幾十年的玩世不恭基因復活起來。獨裁者對諷刺大多不解風情，對開玩笑則敵意更深。1949年革命結束之後不久，共產黨設立一個委員會，專門審查中國喜劇。委員會正式結論說，單口相聲演員應該用"讚美"來取代諷刺。在網路上，人們較不吃讚美那一套。中央電視台新總部正式啟用時，因為建築物是由兩座高聳、傾斜而在頂部連結的大樓組成，人們開始稱它為"大褲衩"。大感狼狽的黨把它稱為"知窗"，即知識之窗，人們樂於採用，但略略歪讀，變成"痔瘡"。

在網路上，中國青少年觀賞免費而且有字幕的美劇《老友記》，而同一時間，國營電視台的鐵桿老黨員，名叫秦明新的，則冒煙地向記者們表示，在親自看過之前，他本來考慮讓《老友記》在中國電視頻道播出的。"我本以為，該劇的焦點在友情，但仔細預覽後，我發現每一集跟性都扯上關係。"儘管黨能掌控播什麼給觀眾看，但人民反應的方式，還是叫黨氣餒。共產黨斥巨資拍攝《建黨偉業》，自我謳歌，還招募一大堆電影明星志願參與演出。但是民眾在流行文化網站豆瓣為該電影評分時，負評鋪天蓋地，惹得豆瓣網只得趕緊關閉其評分系統。

基本上，網路文化恰與共產黨文化針鋒相對：中國領導人喜愛嚴肅、一致與神秘；網路則奉行不羈、新奇，而且最高原則是公開。記者師濤因公開一條刪檢令而下獄4年之後，目前那些命令，中宣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還有其他部門一簽署，幾

小時內就會洩露到網路上。雖然網管會儘快拉下來，但其他網民則在搜集後將其轉帖到防火長城以外，讓網管鞭長莫及。海外新聞網站《中國數位時代》特地為其成立檔案庫，取名為“真理部指令”，以紀念奧威爾。指令通常簡短有力如推特訊息，彷彿中國政府已隨著讓它抓狂的那種科技之節奏而起舞。每一條讀起來，恰成國營媒體新聞標題的相反鏡像：

“所有網站應立即刪除標題為“許多大貪官都獲死緩”的文章，不容遲疑。”我註冊取得了用電子郵件寄來的“真理部指令”，透過我手機傳來時，提示音跟收到簡訊一樣。嗶嗶！“所有網站應立即刪除標題為‘94%中國人不快樂，貧富不均居首’的文章。”

嗶嗶！

“公告：陽光榆林高爾夫俱樂部正提供前所未有的優惠：商業會員卡，買一送二。”嗶嗶！

“所有媒體不得渲染人民解放軍調薪的新聞。”嗶嗶！

“各類收據大優惠，別在網路上受騙，凡有需要，請撥13181902313。”

網路上眾聲喧譁，而我最先注意到的人之一是韓寒，一個住在上海的26歲青年。他的部落格背景走少女風格，角落裡的照片，內容是隻實驗室小狗。但隨著日子過去，他寫文章批評官場的自命不凡與偽善，相形老一輩人用委婉詞語及比喻來暗諷真相，韓寒顯得更為直接：為什麼政府在高官去世降半旗，而災難降臨，大量平民死亡時，卻沒那麼做？他寫道：“我有個中國特色的解決方案，旗杆高度加一倍，這樣各方都滿意了。”傳言說，高級領導斥巨資包養情婦，韓寒打擦邊球挖苦說：“你如果花100元，則買女性的親密服務，那算嫖娼；但如果花100萬，那就是風雅了。”他揶揄黨的策略，在網路上用一大堆支持政府的訊息粉飾太平。他說：“你看見一群人站在街角吃屎，並不意味著你也想推擠而上，去吃一口。”

韓寒不是異議人士。在中國政治光譜中，他的地位極為曖昧。有時候，他是中國最敢放言批評的人。“中央電視台做過多少壞事？用謊話代替真相，操縱公共輿論，褻瀆文化，亂用事實，隱藏惡行，掩飾問題，製造和諧的假象。”韓寒的這篇貼文，跟其他很多篇一樣，都被網管刪掉，話雖如此，神通廣大的讀者已先讀過，而且廣為散播。他批評時政，不時與“憤青”們處於交戰狀態。2008年春天，唐傑等人散播愛國影片之際，韓寒寫道：“我們的民族自尊，怎麼會如此脆弱淺薄？……有人說

你是暴徒，你就詛咒他、攻擊他，然後自己說，‘我們不是暴徒’。這好比有人說你是笨蛋，你就站到他女朋友哥哥的狗面前，拿個大牌子寫道，‘我不是笨蛋’。他是會讀到這個消息沒錯，但還是認為你是笨蛋。”有個親政府網站一度把韓寒列為“西方的奴隸”，在他相片上掛了個絞索。但他一樣能精心計算而隱晦：當他必須使用敏感字眼，肯定會引發網路自動過濾時，他就寫上“敏感字眼”，讓讀者自己去琢磨。

2008年9月，京奧結束不久，韓寒超越電影明星，成為中國最有人氣的部落客，累積的讀者總數，自開始寫部落格以來，超過2.5億人；只有中國股市小道消息部落格，人氣比他旺。我打算去上海，問了韓寒能不能去拜訪他。他提議我在路上跟他會合。每星期他會離開上海城一兩次，回到自己成長的小村，老家農舍現只有祖父母居住。

韓寒用一輛有著深色車窗的黑色GMC廂型車來接我，駕駛人是他的朋友孫強。韓寒買這部廂型車是為了長途旅行，原因在於他不敢坐飛機。他身高5尺8寸，體重不超過130英鎊。他的顴骨高如韓劇偶像明星，前瀏海如牧羊犬的優雅長毛般掠過黑色眼睛。他愛穿多層灰白色、質料為丹尼布的服裝——符合中國當時流行文化的美學。他的造型整潔而有時尚感，與[劉小玻]之類不修邊幅的典型知識分子，真是天差地別。韓寒的外表看來既像美國跨時代作家凱魯亞克，又像美國歌手賈斯汀。在個性方面，他給人溫暖的感覺，講話簡明，說話時帶著微笑，往往能掩飾他說話辛辣的鋒芒。

網路已改變韓寒一生的軌道。1998年，他還在讀十年級，七科目被掛而退學。翌年，他把手寫的稿件寄給出版商。那是一部小說，書名叫《三重門》，描寫一名中國高一學生步履艱難地走過“以鐘點計數的無限空虛，複製課程，由黑板到筆記薄再到考試卷，而他的母親則餵他吃藥，期望增加他的智商。韓寒把中國的學校制度比擬成製造蠟筆——本系統的宗旨，在取得“長度完全相同”的產品。另一位出版商宣稱，這部小說太陰暗，不合時代腳步；中國年輕人成功的故事，經常類似《哈佛女孩劉亦婷：素質培養紀實》，雄心萬丈的常春藤學生握冰來鍛鍊堅忍。但有位總編對韓寒的小說非常欣賞，印了3萬本，3天內就銷售而空；加印3萬本，很快賣光。

若以全球青少年文學的準則來看，《三重門》算很溫和，但是在中國，它可是史無前例，嚴厲而現實地諷刺教育與權威，而作者則是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學生。國營電視台在全國播放節目裡，花一小時討論《三重門》引發的狂熱，想把它搗下

去，但效果適得其反。電視上，韓寒散發出傲慢的魅力。教育者穿西裝打領帶大聲斥責“反叛”為“可能助長社會不安”，韓寒微笑了，插斷他們說，“由聲音聽來，您的生活經驗甚至比我還淺薄。”他立時成名——一種年輕人嶄新叛逆深具魅力的代言人。中國媒體稱此為“韓寒熱”。

《三重門》接下來賣到200萬冊以上，名列過去20年中國最暢銷小說。接下來幾年，韓寒再出版4部小說，幾冊散文合集，忠實探討他最了解的主題：青少年、女孩及汽車。書又賣了幾百萬冊，雖然成績如此卓越，他的出版商、果麥文化傳媒公司董事長路金波並不把它們稱頌為文學。路金波對我說：“他的小說通常有頭有尾。”2006年，韓寒開始寫部落格，其關注點出現確然無誤的轉折，探討某些中國最敏感的事務：政黨貪腐、鉗制言論、剝削年輕勞工、環境汙染、貧富差距。這就好像以寫青少年吸血鬼小說成名的作家梅爾，繼《暮光之城》系列，開始引領讀者去注意濫用公款的問題。韓寒成為年輕抗爭者的庇護人，他們從他身上看出一條路，如何在剛萌芽的懷疑主義，以及甚為垂涎的物質滿足兩者之間，取得妥協。在韓寒的世界裡，搞政治不再意味著貧窮。

我們在交通尖峰時刻蝸步前行時，韓寒對我說：“我一從寫作賺到錢，就開始買跑車參加比賽，其他車手瞧不起我，原因在他們認為，‘你是個作家，照理講開車要撞牆吧。’”

將近10年，韓寒還兼做上海福斯車隊場地賽、速霸陸車隊越野賽車手，成績不錯。那個世界滿是贊助金與香檳浴，與他的寫作生涯突兀得令人不知所措。大致來說，他的讀者不在乎賽車，但作家兼賽車手的雙重身份，造就一位獨特的名流：他登上時尚雜誌封面，同時獨立網站——韓寒文摘（HanHanDigest）、單位（Danwei）、中國科技狂（ChinaGeeks）——都把他的言論譯成英文，加以分析。有次電視訪問，他起頭便說，假如你講中文，就曉得我是誰。這句充滿自信的言論，聽來並不荒唐。

他是唯一一個由企業贊助的政府批評人士，也是投合BOBO族品味的熱誠代言人。有個平價服飾連鎖店“凡客”把他的臉孔印上廣告，旁白說，“我是凡客”。JohnnieWalker把他的照片配上這樣的廣告詞，“夢想便是實現每個閃過腦海的點子”。他把名字供瑞士豪華表宇舶（Hublot）使用，只此一支，供慈善拍賣，用英文獻鐫上“獻給自由”（ForFreedom）。

接近他的家鄉亭林鎮時，我們離開幹道，走較小道路，直到我們碰上一條溪流，跨溪水泥橋只比廂型車寬個幾寸。掌駕

駛盤的孫強猶豫要不要過。韓寒由前座的空隙探頭看去，用半開玩笑的嚴肅說：“這道橋是最佳測驗。”我們安然過橋。韓寒說：“我在那裡失誤很多次。”

上海市的邊緣是一塊小農田、工廠，距擁有驚人財富的市區僅一小段車程，故不斷受到侵蝕進逼。霧氣籠罩在休耕而人跡罕至的田地上。我們抵達一座兩層樓高的磚質農舍，門口有狹窄空地。韓寒身形矮小的祖父母，穿著寬鬆打補丁的棉衣，緩步出來迎接我們。一隻黃金獵犬看見我這陌生人來訪便開始暴躁。我們穿過猶有鄉間濕冷氣息的客廳，再來到一座四合小院，韓寒微笑著指點我爬過一道窗戶，進入他的廂房。他說：“設計時有小瑕疵，這一邊我們無法裝上門。”

裡面可就是中國青少年幻想的神秘巢穴了。一台報廢的山地自行車倚牆而靠，對面的牆則裝點著巨大的電視機螢幕。還有另一面巨大螢幕，配上駕駛盤及腳蹬，以備玩賽車遊戲。房間中央則是桌球檯，韓寒把球收好，開球。他馬上進入躁動狀態。為了顯示他罕見的全面投入，他把兩台手機面朝下放，不管它們出聲抗議。在撞球檯上，我進第一顆，第二顆失誤，就被韓寒清台了。

故鄉的改頭換貌，在韓寒對中國的觀感裡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他指著遠處的工業建築群——那是一家化學工廠，他責備工廠汙染他兒時常釣小龍蝦的溪流。他在部落格寫道：

“我的祖父可以由溪流顏色認出當天是星期幾。到處都是屍臭。環保局說水質正常，話雖說如此，河裡滿是死魚……在不同時間點，我的故鄉總被說打算蓋全亞洲最大工業港、亞洲最大戶外雕塑公園、亞洲最大電子購物中心。但目前為止，一切只生產出數千畝瓦礫，沒完工就廢棄。”

韓寒經常被描述為中國年輕人的象徵，這麼說不完全是讚美。他出身自毛澤東死後，也是一胎化開始之後第一代人——也就是80後——它是個參照點，供中國人討論價值與民族性格時使用，猶如美國嬰兒潮時代：他們成年時正逢社會激烈轉型，讓他們與父母一輩的成員疏離開來，這使得他們要不是有新的自覺，就是自我陷溺，一切端賴評價的人怎麼說。

韓寒在他的著作裡戳刺官方版本的中國崛起，敦促工人別為新繁榮的表象歡呼，原因在他們“勞工低薪的總合，只抵得上老闆勞斯萊斯豪華轎車的一根螺絲釘”。有位47歲婦女自焚而死，以阻擋建築工人拆毀她家。他寫道：“如果是你還沒自焚成灰……如果你家人都還健在，就達到幸福生活的標準了。”

我們往外走，進入寒冷的空間，我提到他的批評，似乎低估了中國有史以來最繁榮時期的好處。他睨著眼、狐疑地看我一下，說中國經濟成長的規模，讓成果分配的細節變模糊了。“為了參加拉力賽，我們旅遊甚廣，原因在比賽淤泥路上進行，經常在小而貧窮的地方。那裡的年輕人不在乎文學、藝術、電影、自由或民主，但他們曉得自己在乎一件事：公平。他們游目四周，看到的是不公平。”

為佐證自己的觀點，他提到自己最近看到的新聞，內容是17歲移民工，站在火車車廂的中間走道達62小時，才返回故鄉。那種煎熬，中國報紙一向描寫為剛毅的人物形象。但韓寒看待該男子站兩天半火車的經驗，角度與眾不同。他驚駭地說：“那個人得包成人紙尿褲。”於是它成為韓寒下一篇部落格貼文的基礎。他寫道，中國年輕人漸漸“在都市化過程消耗掉”。他勾勒經濟繁榮提供給他同時代人的是：“工作一整年，排隊一整天，買張全票，穿紙尿褲，一路站回家——多麼有尊嚴！”

韓寒寫作的日子，會睡到中午方起，獨自一人寫作，動作迅速，通常寫到拂曉時刻。他娶了中學時代的朋友金麗華，金擔任他的助理兼把關人。她對我說：“韓寒太容易相信人，幾乎是輕信。過去他曾被出版商騙過，因此破財。”他倆生下女兒時，中國八卦雜誌報導時，還用上了對待名流貴族的鋪張排場：韓寒當爸爸了，第一次談女兒。

韓寒自豪地自稱為“鄉下土包子”。他與其他著名的中國政府批評人士不同的地方，在於與西方關係不深。他去過歐洲，但沒去美國，而且不怎麼在乎西方文學。很久以來，他便認定大家把他貼上“叛逆”標籤是陳腔濫調——他愛這麼說：“我若是叛逆，就不會開奧迪或寶馬了。”而且，他生活節奏低調：不抽菸，很少喝酒，對夜店也沒興趣。

韓寒的父母退休以前，都是公務員：母親周巧蓉在地區福利辦公室分發福利品；父親韓仁均一度打算寫小說，但終老與地方黨報，而且拒走升官之途。韓寒跟我說：“他不喜歡那種生活，每天得喝酒，拍領導馬屁。”他爸媽還不曉得胎兒性別時，便同意把嬰兒取名為韓寒，這是韓仁均私藏的筆名。當韓寒的成就開始獲得肯定時，父母二人因其激烈質問當前建制的關係，而影響到在政府的工作；他提議在經濟方面支援爸媽，他倆便提前退休了。

韓寒小時候，父親便把文學書放在書架低的地方，而把正統派政治小冊子放得很高。韓寒自己形容，書讀得越多，越是發現教科書與真理之間有鴻溝。他對我說：“我不相信有人真的

喜愛文學，也能愛上毛澤東。這兩樣東西是水火不容的。就算不論他的政治表現，或他做過多少壞事，多少人因他餓死，他殺過多少人，但有件事是可以確定的：毛澤東是作家的敵人。”

韓寒還就讀松江二中時，偶爾才寫作，當他16歲時，上海一家雜誌社在尋找青年作家，參加“新概念作文大賽”。韓寒以前便參加過比賽。“比賽會要求你寫些以往做過的好事——比如幫忙老奶奶過馬路，或是歸還別人遺失的錢包。更符實際的場景，可能是你把錢包放進自己口袋，但不必介意。”但“新概念”不一樣，韓寒在決賽那輪要解決的任務很抽象：有名裁判把一張白紙投入空玻璃杯——主題便是如此。他對我說：“我隨即想到，紙掉到杯底的過程，講的是人生。都是狗屎。”他奪得一等獎。

接下來他期末考太多科不及格而留級，頻臨再次不及格之際，他退學了，如此讓他急著想出版自己的手稿——他說，“來證明我自己。我曾對同班同學跟老師們說，我是個好作家，寫作就能謀生，但他們說，我發瘋了。”再早個20年，韓寒會因他對時政的批評，早就鋃鐺入獄，但是當《三重門》出版後，它刺激到年輕人，不僅因為書中坦誠批評中國教育系統。依上海作家陳村所述，讓他們“有權利自擇偶像”。

出版家路金波相信，韓寒的粉絲會圍繞著他，原因很簡單：他們從他的生活及著作，看到很罕見的真理。“在中國，我們的文化強迫我們說些違心之論。比如我說：‘晚上來我家吃飯吧。’但事實上我並非真的想請你來。而你會說：‘您太客氣了，只是我已經跟人約好了。’人們習慣以這種方式打交道，不論是報社領導還是尋常人。中國人都知道，你說的與你想的經常心口不一。但韓寒可不這樣。他不考慮別人的感受，只講心中所想，不然他就不說。”簡而言之，路說：“假如韓寒講，‘這是真的’，那麼1億粉絲就說，‘這是真的’。若他說，‘這是假的’，那麼就是假的。”

真誠，或至少外表真誠，在中國百年變成最難能可貴的東西。自從龔海燕的相親網站碰到假單身漢以來，5年內，詐欺猶如疫病一樣蔓延，侵襲到生活的每個角落，最劇烈者，在乳製品業一案。2008年，有家牛奶業者三鹿發現，奶農一直添加三聚氰胺，以提升蛋白質比例，但三鹿並未下令回收，反而是說服地方政府，禁止媒體報導此事。等到衛生部向大眾發布警告時，已有3000嬰兒致病，其中6名嬰兒死亡。有能力到外地旅遊的中國父母開始到香港大買特買嬰兒奶粉，以致港府下令，每人最多買兩罐。

在知識分子當中，韓寒是個極端化的角色。香港作家兼電視名嘴梁文道極力誇獎說，韓寒有“另一個魯迅”的資質，即中國最受推崇的社會批評家。藝術家[愛未未]更進一步，對一位記者說，“韓寒比魯迅更有影響力，原因在他的著作能讓更多人接觸到。”但其他人則對如此比擬感到遲疑。我採訪哥倫比亞大學文學及媒體學者劉禾，詢及韓寒時，她說：“韓寒只是一個喜歡他的人的鏡像。所以，那種倒影怎麼會轉變他們？辦不到的。你在他部落格看到的第一個東西，不是他的文章，而是速霸陸（Subaru）廣告。”

但充當他粉絲的鏡像，或許正是韓寒的最強項。他清晰說出別人只想而沒說的東西。中國最大膽的知識分子與異議人士，因炫耀其反常而突出，韓寒則因正常而受歡迎，容許他的粉絲與他近距離，這能使他提倡的原則給人並非不可企及的感覺。他的傳記承載了微小的勝利及屈辱、叫人立志與失意的種種理由，伴隨著既年輕又不安的中國，使得韓寒的言論更有分量。[添安門]事件發生20年以來，中國年輕人一向不碰政治，原因不僅在基本生活條件改善，還因為碰政治變得叫人驚心，毫無希望。韓寒的著作並未重組中國年輕人的政治生活，也沒逼決策人物做什麼，但他是強力代言人，說出懷疑主義的快樂。

因為他與憤青一直衝突，韓寒與唐傑有共同點：兩人都在找管道，宣洩其不滿，表達出中國的想法。中國境內正要爆發文化戰爭，他們自視為占據正反兩極；只是兩人都沉溺於自我創造的新嗜好，還有培育出政治品味這種不確定的機會。而且兩人都在網路上做，不像上一代的志士要擠滿[添安門]廣場。韓寒與唐傑都成長於富有和有志向的時代，儘管兩人有所不同，但他倆都無法想像：怎麼可以放棄發聲的決心。

韓寒的影響力超出部落格的局限時，他創辦一本叫做《獨唱團》的雜誌。他的出版商擔心會有政治反彈，強迫他把第一期的一半內容拿掉，只是內容還是頗多有趣的亮點。最狡猾的專欄叫“所有人問所有人”，滑稽地沉思在中國，資訊遭鉗制的方式；讀者們出問題——給男朋友、給政府機關——而編輯們則努力找答案，不論是有多困難。上市後10小時內，《獨唱團》已登上中國亞馬遜書店排行榜第1名。書店決定開放更多櫃臺販售，以解決龐大的購書人潮。幾天之後，我手機響了。是由中宣部上海辦公室給各新聞主編的指示：“一切有關韓寒的活動及評論，除了賽車，不准報導。”

韓寒準備在2010年12月發行第2期，但出版商接獲命令暫停

一切，堆積如山的雜誌當成資源回收。後來韓寒告訴我：“大家很擔心。”我們在他租來的辦公室，人員已走了一半。“他們或許是想，‘喲，你出道是在我們的雜誌，是我們掌控的。現在你想把控制權拿走？’”他很好奇這次關門對中國文化的未來有什麼影響。他說：“我們不能老是依靠貓熊跟茶，我們還有什麼？絲綢？長城？那不足以代表完整的中國。”

2010年，《時代》雜誌搜集人選，選出世界最有影響力人物年度排行時，韓寒名列期間。中國官方不高興了。中國的搜尋引擎上，“韓寒”加“時代”被封鎖，《人民日報》還發評論問道，“《時代》是否嚴重近視？”韓寒不覺得被《時代》列名有什麼光彩，他對個人當時在中國的遭遇已無幻想，他寫道：“或許我的寫作幫忙大家釋放些許怒氣、怨氣。但除此之外，它們有什麼用？這種‘影響力’是幻象。在中國，影響力只屬於有權力的人，可以翻雲覆雨的人，可以決定你生死的人，可以讓你半生不死的人。他們才是真有影響力的人……剩下來的我們，只是舞台聚光燈底下的小角色。劇場歸他們所有，而且隨時可以拉起布幕，關掉燈光，閉上門，把狗放進來。”

當他貼出這則短文，便收到了超過2.5萬條回應，有些釋出極度的忠誠，例如“我願付出生命保衛韓寒——有勇氣及尊嚴的真男人”。《時代》的名單仰賴大眾投票，最後統計時，韓寒名列世界第二，僅次於伊朗反對派領袖穆薩維（MirHosseinMousavi）。

一天下午，看完韓寒比完一場賽車後，我發現一小群很熱情的粉絲等著看他一眼。其中一人名叫魏斐然，他19歲，瘦而結實，頭髮短而尖，來自安徽省，似乎因為期待而快漂浮起來。他高一時便讀過《三重門》，深受其影響。韓寒打算出版雜誌，令他鼓舞，此時魏斐然跟幾個朋友也打算在長沙市辦一本。魏說：“我真的想把它辦好，我算是理想主義者，我們打算靠自己來，沒有任何公司或人物在我們背後撐腰。”為了創刊號，他們打算採訪韓寒，所以魏斐然搭14個小時的火車來找他。

無論何時，韓寒的粉絲跟我談論他的作品時，總是形容成是啟示般神聖——一位部落客形容為：“一劑腎上腺素，讓我們從冷漠中甦醒。”有一陣子，魏斐然出力經營一個粉絲網站，專門搜集並評論韓寒的部落格貼文。魏說：“寧夏網管逼我們關閉，我們網友有每一條韓寒寫過的貼子，他們說，那太敏感了。”有位穿橙色毛衣的害羞女孩一直在聽我們談話，接口說：“韓寒代表了我們有心變成的那種人，還有我們想做但沒勇

氣嘗試的事。”

與韓寒的年輕粉絲在一起，經常讓我想到“李陽瘋狂英語”的學生麥可。麥可也是韓粉，接下來一次我遇見他，他掏出手機，秀了他下載的APP給我看，韓寒的書全收在一起。

我遇見麥可不久，他開始脫離“瘋狂英語”系統授課。為了招攬學生，他買了小型擴音機，在廣州某公園教授免費課程，懸了一幅長25英尺的布旗，布旗上他的措詞意味著某種官方立場：歡迎奧運，展開亞運，英語志工戶外活動。麥可不顧父母反對，從鄰居互助會借了5萬元。他對我說：“我們全家都反對。”但是，兩個月後，他招到付費學生。他另哄勸當地奧運宣傳單位與他簽個小合約，錄下100條範例句子，供志工們背誦。他在日誌寫道：“我很自豪，我賺到足以買新西裝、領帶的錢。”

2009年1月，他離開“瘋狂英語”，與另一位教師合夥，組成一家他們稱為“美音英語”的公司。麥可負責業務，而他的伙伴則是首席教師。麥可開始在其他城市安排講演，生意走上軌道。

麥可的英語品質一直叫我吃驚。對從未離開中國的麥可來講，他的英語說得很清晰流利，談話與寫作犯的錯誤不多——只要能有所改進，他幾乎不遺餘力。有位音樂老師建議他，端著鏡子，口部做誇張的動作，來改善他的口音，麥可就算搭車也在練習。

87

另一位老師告訴他，要他叫喊得比李陽建議的還大聲，麥可也試著做。他在日誌寫道：“我沒達成目標，我得到的，只是慢性喉頭炎。”醫生必須開立吸入型藥物，以治療其受損的喉嚨。

基本上，麥可是上網搜索吸引他的英語錄音，然後一再復誦以改進他的口音。他把自己最愛的其中一句讀給我聽：“在‘威訊無線’正發生不可思議的事，會改變全美國談話的方式。重要的事情、大膽的事情、新穎的事情。”（“SomethingamazingishappeningatVerizonWirelessthatwillch
我聽他唸著，意識到普世一致的價值——業務行銷的聲音，即使你不在乎自己在賣的是什麼，依然如此。他繼續念道：“向全國介紹‘威訊無線’推出、毫無限制的談話。現在比以往都便宜30元，由美國最大、最可靠無線網路提供。威訊。”麥可露齒而笑。

他特別喜愛廣告及廣播電視台主持人的聲音；他切換語音，流暢地說出一條新聞快報：“今晨芮氏規模6.2級地震侵襲台

灣，5人受到輕傷……記者彭福瑞特報導。”他正在努力模仿一種獨特的美國南方口音。“哈囉，我是強森。我接觸到普拉克特的傳授之前一年，只賺10077美元。”麥可記不得他是從哪找到這段錄音的，但他愛此人的鼻音方言。“幾年之內，我一週便賺到那個數目，現在，我只花幾分鐘就賺到那個數字，而且多得更多——我不敢想像自己假如沒遇見普拉克特，人生會怎樣。”

麥可生活沒改善的一方面，便是異性關係。讀大學以來，他認真談過兩次戀愛，但都因他太沉迷於英語學習而告吹。他寫道：“她們通常認定，一個男人會半夜起來，聽英語錄音，實在有點荒謬。”他心中實在是個浪漫主義者——他對我說：“假如你老婆真的愛你，她除了你的靈魂以外，是不會在乎別的。”而且，他對財務的關心程度，跟不上同一輩人。他把自己寫的、供學生練習的一組句子給我看，而他的觀感來自自己的課堂練習：

A:你今天看來真漂亮。（Youlookgoodtoday.）

B:多謝。（Thanks.）

C:你愛我嗎？（Doyouloveme？）

D:不愛，我只愛錢。（No，Ionlylovemoney.）

麥可不時會要我看一下他用中文寫的東西，或者修飾一下他寫來當教材的英文段落文法。他把自己擺在敘事中心，十分自在，令我驚訝。中國老一輩人要那麼做，會感到不安。我請他爸爸談談在煤礦工作那30年。他說：“所有礦坑都很危險，那時日子很辛苦，我們每個月掙約60元。”他對這個主題講的，就只有這一點點。相形之下，麥可自視自己的人生，宛如長篇挫折與勝利的寓言。他寫道：“2002到2007年，我極為孤單、困惑，我想成為偉大的人，我不想平凡過一生……我真的注定要成為輸家嗎？我該怎麼做？或許，命中注定我只是個尋常人。”但是，認命的觀點讓他憤怒起來。他再寫道：“為什麼只因我出生在貧窮家庭，就得跟別人一樣？”

他把學習英語奉為道德權利一般的大事情。他對學生們說：“你們是自己命運的主宰，你們理應快樂，在這世上，你們有權與眾不同。”

Chapter12抵抗的藝術

黨越是努力想與中國網路不羈的文化對抗，網路文化就變得更是不羈。2009年，當局宣布有意除掉網路的“線上流氓行為”，人們以一隻微笑的卡通符號回應，那是一隻學名羊駝的生

物，他們暱稱“操你媽”，這個詞在中國話裡，發音與“操你媽”類似。一夜之間，操你媽奔馳於整個網路，在音樂影片裡歌唱，還出現在動畫短片裡——經常跟另一個卡通生物“河蟹”一起歡欣雀躍。河蟹是嘲弄黨鍾愛的“和諧”概念，林毅夫向其聽眾謳歌的東西。每一個新諷刺及雙關語一呈現出來，就等於當面向政府比中指。刪檢人員發出緊急指示：“任何有關‘操你媽’的內容不准提倡或渲染（本原則適用於任何神秘生物或者河蟹）。”

然而指示無濟於事。沒多久，操你媽就出現在T恤上，還有變成供孩子們玩的實體填充布偶。對於這個象徵最感到狂喜的人，莫過於藝術家[愛未未]。[愛未未]貼了一張自己裸身躍向空中的圖，攫著一隻操你媽布偶遮住生殖器。他把該照片題為“操你媽擋中央”——與“操你媽黨中央”同音到幾乎完美。

自從[愛未未]製作燈台諷刺中國新的富饒，派人到德國以探索與西方的關係，這些年來他吸引到越多人的認可，視他為藝術家兼建築師。他為公共工程服務，讓他以幾乎前所未有的方式，接觸到政治。當時他說，自己開始見識到“它如何運作，怎麼工作”，另添上一句說：“接下來你對它怎麼工作，有諸多批評。”隨著他的批評增長，[愛未未]變成中國最有決心的“挑釁創新專家”。等到他受聘於瑞士建築事務所“赫爾佐格和德梅隆”(Herzog&deMeuron)，擔任藝術顧問，設計京奧國家體育場時，他的觀點開始劇烈轉折。體育場竣工前，他宣布自己與奧運會斷絕關係，把它視為用來掩飾中國諸多問題的“虛偽的笑容”。

[愛未未]是莎翁筆下“吹牛騎士”法斯塔夫(Falstaff)之流的人物：大腹便便，肉臉擅長表達，黑白夾雜的鬍子延伸到胸前。人們會覺得[愛未未]相貌堂堂，直到他開口說出異想天開的世界觀才破功。他的哥哥艾軒對我說：“[愛未未]的鬍子是裝飾品。”[愛未未]居住並工作於北京的東北邊緣，自己設計的藝術工作室建築群，像是以離經叛道的創造力所蓋的蜂巢，被一位朋友形容為“修道院與黑幫家族的交叉點”。一扇漆成藍黑色的金屬大門之後，有個天井種了綠草及竹子，周遭繞著磚與水泥蓋的建築，通風頗佳。[愛未未]與妻子路青住院子一邊，數十名助手住另一邊。訪客可以四處逛，不受阻擋；養了一隻又老又病、名叫丹尼的可卡犬，還有一窩半是野生的貓，它們偶爾會破壞[愛未未]的建築模型。

[愛未未]夫妻膝下無子。他倒是搞婚外情，與一位在他電影演出的女性生下一名男嬰。母子住在附近，[愛未未]每天會花一些時間陪他們。他從來不想生孩子。[愛未未]對我說：“她

說：‘對，我想生孩子。’我說：‘正常時，我不認為自己該生小孩，但若是你堅持，當然啦，那是你的權利，我會擔當起父親的全責。’”他很高興自己當初不想生孩子錯了。他對我說：“所謂人類智商——我們真不該高估它。發生意外時，反倒很好。”

[愛未未]花很多時間奔波，他在曼哈頓區、在切爾西，都有公寓。但身處中國時，他的生活軌道僅僅繞著工作室轉；該工作室在北京文化裡扮演的角色，很像安迪·沃霍爾(AndyWarhol)的“工廠”(TheFactory)。他日夜逡巡於建築群中，因此很難分辨他有沒有在工作。近些年來，這項分別越來越模糊，他的藝術與生活界線越來越難以區分。自從發現推特以來，他變成中國最勤於使用的人之一，經常一天8小時在上面。

89

我問他，推特會不會耗掉他的藝術創作，他說：“我想，我的地位以及生活方式，便是我最重要的藝術。其他別的作品可以收藏，可以掛在牆上，但那只是傳統觀點。我們不該按一定的路子來做事，只因為倫勃朗那麼做。莎士比亞若還在世，他也會在推特上寫作。”他總是真情流露，但他也瞧出，這對中國人民有深層意義；他認定，推特是中國人“一千年來首度有機會，行使個人言論表達自由”，而公權力無法介入他們的話語及大眾之間。

汶川地震發生後10個月，同時也是胡舒立開展校舍倒塌調查後9個月，[愛未未]發現自己特別關心一項細節：政府拒絕計算或公布罹難學生的姓名。儘管要求頻頻，當局依然沒有製作表列，沒有統計死傷，沒對出錯相關單位進行公布，有些太堅持要求訊息公開的父母還被拘留起來。這些事情激怒[愛未未]的程度，是任何抽象議題都難以比擬的。他對我說：“我們開始問非常簡單的問題‘誰喪生了？他們叫什麼名字？’”

在一篇部落格貼文中，[愛未未]以罕見的嚴厲立場談及災區主事官員，“他們以維持穩定之名，隱匿事實。他們恫嚇，關押、迫害要求真相的父母。他們無恥地踐踏憲法與基本人權。”

那年12月，他發起自稱為“川震公民調查”的活動，打算記錄為何有這麼多學校倒塌、又因何倒塌——儘可能搜集最多的名字。他簽下義工，派他們到四川去調查。他們搜集到5212個姓名，與父母、保險公司等消息來源交叉對比。這次調查的成果填滿80張紙，貼在他辦公室的牆上——清單中包含數千人的姓名及生日。[愛未未]的工作室每天在推特上貼出當日死於大震的學生名單。有個冬日，[愛未未]在他的工作室對我說：“今天

有17人，迄今最多的一天。”

當時我們坐在他辦公室裡，他一如往常，在鍵盤上發推文。我們邊聊著，他看了一下時鐘，說去法院的時間到了。過去一年，他的辦公室送了150幾封信函到政府各部門，依《中華人民共和國訊息公開條例》，詢問地震受災者及營建問題。迄今他還沒有收到實質的回應。今天他打算控告民政部，訴訟理由是不回應他的要求。

他坐進一輛黑色小轎車的乘客座，車上有司機及一位名叫劉艷萍的女子。他膝上放了一疊紙說：“按政策，他們必須在15個工作日內回應。”我問劉艷萍是不是律師，她笑了，說：“我在家帶小孩好長一段時間。[愛未未]在他部落格上徵求義工，所以我寫了封郵件給他。這工作看起來很有趣，而且我很好奇。”如此發展成一項全職工作及其他新經驗；劉加入艾的調查後不久，她便在四川被捕；她在當地公開報導一名地震受災活躍人士的審判；警方以“擾亂社會秩序”拘留她兩天。

我們抵達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這棟現代建築物很高，穹門入口大器堂皇，後側有個寒酸辦公室，受理新案件。我們通過金屬檢測器，兩名年輕男子穿著警衛制服，沉浸於一本漫畫書之中。一排看起來像是銀行辦事窗口的櫃臺，最靠近我們的窗裡，有個瘦小的、穿著粉紅色夾克的老女士，對著她面對的長方形窗口大吼：“對方沒有證據，怎麼就勝訴？他們是收買了院長嗎？”兩名穿制服的女性坐在玻璃隔罩的另一側，臉上掛著認命的表情傾聽著，這意味著老婦人追蹤該案已有時日。

艾與劉來到1號窗口前排隊，輪到他們的時候，他們把狀紙塞給一位身穿皮質運動上衣的中年男子。他看起來眼神呆滯，意興闌珊。他細細閱讀狀紙，找出一個疑問：“你們說，要求民政部公開這些訊息，但你們為什麼對此有興趣呢？”

[愛未未]俯身過去，朝窗口說，“事實上，根據政策，人人有權要求公開這種訊息——並非必須經過你同意。”幾番你來我往之後，艾與劉同意寫文件描述訴求，他們在等待區找到椅子，身旁滿是拿著類似紙頁的人。[愛未未]說：“他們不願受理此案，原因在於當它排上訴訟日程，法院就必須為此做出某種裁判。”艾與劉過了1個小時，才又抵達窗口。此時他們才知道，他們書寫的筆墨顏色有誤。書面文件必須用黑色，而他們用藍色。他們再坐回去重寫，寫好再排隊。

[愛未未]喃喃地說：“卡夫卡的城堡。”2小時延長為3小時，

我問他，如果他根本不指望會有回應，幹嘛這麼費事。他說："我要證明，這個系統根本不管用。要指責系統不管用，不能光用嘴說，你必須走完整個流程。"在辦公時間結束前20分鐘，玻璃罩後的男子終於接受訴訟狀，艾與劉滿意了，轉身離去。老女士依然在喊叫。

[愛未未]一直覺得自己出生在錯誤的家庭——至少是不詳之家。他的父親是艾青，名列中國第一流文學要角，年輕時便加入共產黨，以詩作平易近人、洋溢革命精神而聞名。他對毛主席格外印象深刻，為什麼寫了首讚美詩，起頭寫道："毛澤東在哪裡出現/哪裡就沸騰著鼓掌聲。"

1957年，艾青47歲，與作家協會年輕成員的妻子高瑛生下兒子。當時，毛整肅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正風起雲湧，艾青對黨的忠誠受到質疑。他寫了一則寓言《養花人的夢》，文中凸顯有必要容許更廣的創造性輿論。在文中，只種月季的養花人曉得，他"激起了所有花的不滿"。一位詩人同儕馮志攻擊艾青，說他已淪入"反動形式主義的泥淖"。

艾青被剝奪一切頭銜，且被逐出作家協會。在夜裡，他曾用頭撞牆，呼喊著，"你們以為我在[返擋]？"那幾個悲慘的星期裡，艾青夫婦得替嬰兒取名。老爸打開字典，隨手亂點一個字，結果是"威"，有力量的意思。鑑於當時處境，這個反諷未免太大，所以他略微更改音調，化成另一個字"未"，意思是"還沒"，最後取名"未未"。

艾家被勒令搬去新疆偏遠西陲。艾青奉派做的工作是打掃公廁，每天13間。為了找額外食物，艾家去收屠夫丟棄的羊蹄，還有凍死的小豬。文革開始，事態更加惡化。折磨艾青的人當他的面潑墨水，小孩向他丟石頭。艾家被分撥住到地下洞，那是原本田裡牲口生產的地方。在那裡，他們住了5年。[愛未未]對我說，"那段時期絕對是父親人生的低谷，最痛苦的時光。他試圖自殺好幾次。"

[愛未未]兒時靠著做手工的冰鞋及火藥來分神。艾青夫婦無法保護兩個兒子免於艾丹稱為"壓力、羞辱與無望"的傷害。談到[愛未未]時，弟弟艾丹說："他是個敏感、脆弱的孩子，所以他看的、聽的，都比其他人多。[愛未未]十多歲時，寫信給他弟弟，回憶他倆的童年。"家具砸碎的聲音，人們求饒的聲音；貓被吊起來直到吊死……當著大家面前被欺凌、咒罵。那時我們年紀那麼小，卻得忍受這些罪過。"他下定決心，絕對不當國家著名的命運囚犯。"我要自己過較好的生活，控制我的命運。"

艾家獲准回北京的那年，[愛未未]中學畢業。他的藝術靈智已開，而且艾家一位翻譯家朋友送給他論埃德加·德加與梵谷的禁書，他還收到一本論賈斯培·瓊斯的書，但地圖與旗幟組成的意象，讓他感到困惑，那本書便“直接進入垃圾堆”去了。他受到前衛藝術家團體“星星畫會”的吸引，但他們的活躍程度受到限制。1979年，鄧小平終結剛剛萌芽的“[閩主]牆”政治運動；其中心人物[衛經生]被判刑15年，罪名是洩露國家[雞密]。[愛未未]回憶說，此後“我覺得不能再活在這個國家”。他當時的女友正打算去美國求學，1981年2月，他隨她而去。

[愛未未]在紐約學英語，在東7街與第2大道附近找到一間便宜的地下公寓住下來。每逢週末就在各畫廊出沒，閒逛紐約市，一如他弟弟形容，好比“一隻泥鰍，有泥巴可鑽的地方就去”。他沉醉於東村的生猛活力，對他來說，當地“好比活火山，煙始終由山頂噴出來”。中國藝術史學家柯恩(JoanLeboldCohen)結識許多當時住在紐約的中國藝術家，她回憶拜訪[愛未未]公寓光景時說：“整個地方散發尿味，他的公寓就只有一個房間，沒有家具，地板上一張床，還有一台電視。而他牢牢盯著電視。”她繼續說：“我記得，當時在播‘伊朗門事件’(Iran-ContraAffair)的新聞吧。雷根政府經歷這樣的洗禮，這樣的掙扎，自身儼然分崩離析，想到這裡，他就非常興奮。因為他簡直無法相信，這一切都是公開進行的。”

[愛未未]打零工——看家、園藝工、照顧嬰兒、建築工，但絕大多數時間，他去亞特蘭大賭“21點”。他太常賭，以至於多年後，賭業媒體報導說，認識他的賭徒發現他也在從事藝術，都震驚不已。他在人行道替人畫肖像，也賺了些錢。像他一般的移民顧客，因為會殺價，他儘量避免。沒多久，[愛未未]放棄繪畫開始探索“移花接木”的各種可能性。他由朋友處拿了把小提琴，拆下琴頸及琴弦，而安上一把鏟子的把手

（這使朋友很不高興）。

[愛未未]在積累影響力。在聖馬可大教堂(St.MarkChurch-in-the-Bowery)的一場詩歌朗誦會上，他遇見了詩人金斯堡(AllenGinsberg)，並不可思議地結交為朋友。但影響[愛未未]最深的人，莫過杜尚(MarcelDuchamp)，他把正統給顛覆掉，讓受訓於學院理想主義的中國藝術家狂喜不已。[愛未未]也嘗試攝影，而且把突發新聞照片賣給《時代》雜誌。他記錄湯普金斯廣場公園的各種抗議，開始與警察吵架爭論。“握有權力的人被你搞的暈頭轉向，你會覺得自己很有價值。”他說。

然而，當時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低迷。柯恩回憶說，“我接

洽一位策展人，他回答說‘我們不展出第三世界藝術’”。柯恩接洽古根漢時，她說：“不僅策展人不見我，連他的秘書也一樣。”1993年4月，[愛未未]接到訊息，說父親艾青生病，於是他返回北京。抵達之後，他發現“[添安門]事件”後這些年，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已經遠離公共生活。有件流行T恤印有三隻猴子遮耳、遮眼及遮口，還有諺語“避禍免災”。

1999年，[愛未未]在北京市邊陲的草場地村租了幾畦菜地，一個下午就勾勒出工作室建築群設計圖。他沒有受過建築師訓練，但他的設計太獨特，以至於吸引一大堆建築及公共藝術裝置的委託案。沒過多久，他便成立中國最具影響力建築事務所之一的“發課設計”(FakeDesign)公司（他老是愛講“我一點也不懂建築”）——這肯定了他的意外成功，還有他質問真純的魅力。

歲月流逝，[愛未未]的時間越來越多用在政治、表達自由及科技的交界處。中國入口網站新浪網邀他主持一個部落格，起初他經營的方式很奇怪——每天貼上數十張、有時甚至數百張快照，內容是他的訪客、貓以及四處遊蕩，而把自己生活公開，受人檢驗。部落格讓他取得的觀眾之多，大於他以往所見。他開始評論遠超藝術之外的主題。他寫一個叫做“C”的國家，由“矮胖又愚蠢的貪吃鬼”所統治，此輩“每年花2000億元來吃吃喝喝，還有同等金額花在軍事預算”。一般記者得奉行中宣部指令，但[愛未未]跟他們不一樣，他與眾不同；他又沒工作，無法因發言肆無忌憚的理由而炒他魷魚。

92

他全神貫注於一個又一個敏感議題。擔任[愛未未]助手的年輕藝術家趙趙對我說：“他會讀新聞，然後說‘怎麼可以這樣？’然後到隔天、第三天，都還講同樣的事。”到2009年，他成為中國最敢發聲的喉舌之一，而公安便去“走訪”[愛未未]與他母親，問他搞什麼鬼。他以貼上網的公開函回應：“竊聽我的電話，我可以忍受；監視我的住處，我可以容忍。但衝進我家，當我76歲老母之麵威脅我，我無法接受。你們不懂人權，但你們一點也不知道憲法嗎？”翌日，他的部落格就被關閉了。

財富與威權交雜，讓中國新式創意階級成員感到兩難。一個社會，既支持技術卻又鎮壓自由表達，藝術家被迫在其中摸索。然而，中國藝術家並非第一批遇到類似狀況的人：凡德羅(LudwigMiesvanderRohe)替納粹工作，因此受到批評。中國文革期間，藝術家不准演出巴哈、貝多芬等作曲家的作品，只能表演“革命樣板戲”。當期的壓力更微妙，中國藝術家能賺到的

錢，為史上之最，但要收受那些好處，必須接受表達有所局限。作家、畫家及電影出品人必須決定，他們的作品裡，有多少屬自發活力，而又有多少屬商品性質。過熱的商品市場、外國對人民共和國藝術家掙扎的期許，當然還有共產黨，諸般壓力下，他們必須設法平衡。

為了了解那種感受，我去拜訪徐冰。徐冰因1980年代創造好些高度爭議作品，而聲名大噪，其中包括《天書》（又稱《析世鑒》），一套手印書籍與卷軸，完全由自創而無人能懂的漢字組成——用以批評中國迂腐的文學文化。徐冰搬去美國，吃香喝辣，贏得麥克阿瑟“天才獎”(MacArthurGeniusGrant)，藝術作品價值很高。只是在

2008年，他拋開外界地位，返回北京，出任中國官方最高藝術學府“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而震驚中國藝術界。

我在一家北京的博物館遇見徐冰，他正在那裡指揮吊車，安裝一套鋼製鳳凰。我們小酌一會，我問他何以用那種方式返回中國。“這地方，事實上還有很多問題，比如貧富不均、移民工課題等等。但中國的確解決了很多問題，經濟發展如此迅速。何以如此？我很有興趣。”

他繼續說：“我們學校不時開會。”開會實際上是國營組織過日子的方式。“你會發現，那些開會真的很無聊又沒有用。有時在開會時，我會寫文學論文，大家還以為我在做筆記，說我格外投入。”他笑了，接著說：“但接下來我會想到，事實上中國人每天都在開會，而且，就算這些會毫無意義，中國依然發展得如此迅速。怎麼會這樣？其中必有道理。也是吸引我的地方。”

[愛未未]在中國當代藝術占有的小市場其實很銼；在海外，他的聲名與作品價格與日俱增——他收到令人垂涎的委託案，替英國泰德現代藝術館(TateModern)巨大如大教堂的“渦輪大廳”(TurbineHall)充實展品；但是在中國，他從未受邀主持大型展覽，而且他與藝術家同儕的關係也不溫不火。趙趙告訴我：“畫廊及雜誌社寄很多東西給他，而他甚至連拆開都沒有。”

策展人兼藝評家馮博一這些年來曾與[愛未未]合作過，我請他描述其他知識分子對艾的看法。馮對我說：“有人很尊敬他，尤其是藝術圈外的年輕人。”但在某些藝術家當中，盛行另類觀點。馮說：“他們攻擊他，說他只想小題大做，他們不認同他的手法。”

許多中國藝術家，跟其他精英人士一樣，都探索過西方自由主義，或者住在海外，但像是唐傑或我在帕羅奧圖遇見的史

丹佛工程師，他們越是接觸西方，愛國心越是升高；

93

而且他們看待西方批評中國時，感到狐疑。依貶低[愛未未]的人看來，他就是急急忙忙想滿足西方對“[意義]人士”的期許，很樂於把今日中國複雜現狀，化約為非黑即白的絕對值，以投合外國人的同情。他們譴責[愛未未]偽善——批評他人面對不公不義時麻木不仁，話雖如此，他出生有名的艾家，還有他在西方的地位，似乎讓他擁有一定程度的保護，而那是別人無法享有的。事實上[愛未未]大多在國外展出，引發批評聲浪，說他較樂於讓外國人把他們的道德饑渴投射到他身上，而非致力解決中國晦澀難懂的問題。甚至有一度太多批評家在網路上揣測，說[愛未未]已放棄中國國籍，使得他被迫貼出自己仍保有中國護照的照片。

[愛未未]與徐冰曾是密友，但後來分道揚鑣。我問徐冰對[愛未未]的政治活動有何感想。徐說：“艾信守某些理想，比如民主自由，讓他印象深刻的東西——冷戰時期的遺緒。這些東西並非沒有價值——它們有其價值——而且在今日中國，[愛未未]有他的功用。[愛未未]是必要且有意義的。但我返回中國時，我認為現今中國與[愛未未]返國時已大不相同。”徐冰再說：“我們不能抱持冷戰態度不放，尤其在今天的中國，原因是今日中國與冷戰中國已有天壤之別。”

徐冰說：“不是人人都能成為[愛未未]，那樣子中國就無法開發了，對吧？但中國要是連一個像[愛未未]的人不容許，那國家就大有毛病了。”

[愛未未]部落格被關閉兩個月後，他去四川省會成都，參與地震活躍人士、被控涉嫌煽動[掂復]國家罪的[譚做人]審判。8月12日凌晨3點，[愛未未]在房間裡睡覺，公安來敲門，叫他開門。他回答說，無法確定對方公安身份，拿起話筒撥電話給警方，同時他開啟錄音機，記錄當時狀況。在他電話還沒打通以前，公安破門而入，接下來發生打鬥，[愛未未]臉上、右頰骨上方挨了一拳。他對我說：“對方有三到四人，他們只拖著我走，打我的頭，襯衫都撕破了。”

公安把他還有他的11名義工、助理帶去另一家旅館羈押起來，看守到[譚做人]審判結束。4星期後，[愛未未]到德國慕尼黑布展，覺得頭一直痛，左臂無力。醫生發現他有硬腦膜下出血——腦右側積了一攤血。醫生認為那有致命危險，當晚便替他做手術。在醫院等候覆原期間，[愛未未]把它的腦部掃描副本、醫生診斷，還有他在醫院時頭蓋骨插了根排管的照片，全傳到推特網站去。接下來他進行自己藝術生涯最大的一次展覽，在慕尼黑“藝術之家”美術館(HausderKunst)一堵外牆設置巨大裝置藝術，

由9000個色彩鮮艷的特製學生背包組成。背包組成巨大漢字，拼出一名女兒死於汶川大地震的母親的一句話：“她在這個地球上快樂地生活了7年。”

手術後幾個月，[愛未未]完全康復，話雖如此，他仍容易疲倦，有些字眼要想起來很困難。同一時間，他開始從種種跡象發現，政府監視他越來越嚴密了。他的Gmail帳戶被黑，設定被更改，訊息會發送到他不熟悉的地址。他的銀行帳戶被官方檢查，審核他的帳務。他家正門外的電杆、電話杆出現一對監視鏡頭，焦點放在進出艾家的人車——這對一個已經把生活瑣事都公開在推特轉播的人來說，誠為多餘，但官方不管。[愛未未]想把他的紀錄片做成DVD，製片廠都擔心跟他扯上關係會受罰。在[愛未未]傳媒製作公司服務的搖滾音樂家左小祖咒跟我講，“連[澀情]片製片廠都不敢接”。

在中國搞異議得拐彎抹角，這種模式令[愛未未]憎恨。傳統上，知識分子照理來說，對政府的批判方式，至少還得保存表面上的團結。正如成語所說，他們應該“指桑罵槐”。[愛未未]對這一點已經失去耐性。有一群較不出名的藝術家打算抗議打著開發名義而拆毀他們工作室的建設計劃，他們來找[愛未未]提供建議，他告訴他們：“假如你們抗議，卻未能出版任何有關抗議的東西，你們不如在家裡抗議。”[愛未未]等藝術家發動遊行，走到北京市的長安街——這個舉動有無限的象徵意義，原因在長安街位於[添安門]廣場附近。走了幾千公尺以後，警方和平地擋下他們，只是他們的壯舉受到矚目，遠超過藝術界所關注。著名的維權律師[普治強]對我說：“長達20年，我認為要在長安街抗議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他卻做到了，他們能拿他怎麼辦？”

在中國，網路時代的顛覆動力——諷刺的重生、尋找社群、有抗議的勇氣——已攪動大家對新形態批評聲浪的饑渴。胡舒立總編與他的記者們無法滿足它，他們既不夠超然，也沒

有欲望來疏導大眾的憤怒；傳統式的[意義]人士如[劉小玻]等人太正經八百，太精英路線，無法擔任更廣大民眾的喉舌；唐傑等愛國人士因過於兇猛，疏離了民眾；而韓寒通常太油嘴滑舌，無法與他的長輩共享舞台；但[愛未未]結合了鐵桿的根正苗紅，與平民派的資質，他的日常用語揉合了諷刺、想像及狂烈。

中國畫家兼社會批評家陳丹青對我說：“有人說[愛未未]搞的是某種表演藝術。但我認為，很久以前他便超越那種定義。”陳丹青另表示，“他做的事更有趣，更含糊不清。他打算了解，一個人的能耐能搞到多大的地步。”

Chapter13七項判決

拜網路所賜，劉曉波終於引得警方找上門來。幾個月來，當局一直在監視他的電郵及線上通訊狀況。到了2008年12月，他與他的共同起草人已搜集到第一批300個簽名，以便公布他們所稱的《08憲章》，當時正打算公布。在他們公布之前兩天，一對警察便集合在劉曉波公寓的門口。

公安帶他離開時，他並沒有抗拒。他的妻子劉霞也未獲告知他的去向，以及被帶走的原因。過了好幾天，劉的律師莫少平試著尋找究竟是哪個政府部門羈押了他的客戶，但當地與政治異議人士打交道的單位——北京市公安局一般事務辦公室——跟中宣部一樣，是棟“不存在”的建築。它沒有地址，電話號碼也沒有公布。即便律師本人現身於辦公室門口，辦公人員仍舊拒絕承認，這裡就是他要找的辦公室。莫少平不知所措，所以只好以舊方法尋求解套：他寫了一份申請書，然後郵寄到這個地方。

劉曉波被捕後幾天，《08憲章》終於公布，這才證實這篇聲明是呼籲漸進、而非突然的改革。作者們刻意緩和其訊息的措辭，他們想跨越知識分子的族群限制，以吸引一般男男女女；當一般人面臨全面動盪會打退堂鼓，但是在改革呼籲當中，或許能看見他們自己奮力追求的東西。劉曉波與合撰人寫道：“現行體制的落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他們提出19項改革，比如司法獨立、公職選舉。書面上，他們對人權、民主及法治的呼籲，其實很像政府自己所說所寫：中國憲法諸多保證，比如第35條便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但在實際上，憲法並沒有高於黨的法律權威，所以大致上，它是無意義的。黨讚美“民主”時，指的是“民主集中製”，想到的是黨員內部自己辯論，然後無異議遵守最後決定。

過了四個月，劉曉波仍然音訊全無。接下來，在2009年6月23日，當局通知他的妻子劉霞，說她丈夫將被起訴以“煽動顛覆國家罪”，審判將在聖誕節前兩天開始。“煽動顛覆國家罪”是個中國特有的罪名。其他威權國家，政府一般要把異議人士關起來，都有更具體的理由；在前蘇聯，莎蘭斯基（NatanSharansky）是因當間諜而下獄（他可沒有當間諜）；在緬甸，前軍政府把翁山蘇姬（AungSanSuuKyi）軟禁在家多年，依他們的說法，是為了“她自身安全”起見。但是中國政府認為，這些都太囉嗦，於是就以劉曉波著作裡的七項罪名起訴他——控方指控，李曉波遣詞用字含括“謠言及誹謗”，攻擊“人民民主專政”。以他一篇犯法文章來說，光是標題就成為起訴書的罪名之一，該篇文章名為《透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

黨沒說出口的是，他們認為劉曉波造成的威脅非常特別。他有海外人脈，又擁抱網路，二者融合起來變成黨最頭痛的課題：隱隱然有發生外國撐腰的“顏色革命”之虞，還用網路組織起來。上一年，國家主席胡錦濤才對政治局說，“我們能否適應網路”將決定“政府的穩定”。

那年12月，劉曉波受審時，控方只花14分鐘便完成提案說明。輪到劉曉波講話時，他否認一切罪嫌。另外，他宣讀了一篇聲明，文中他預測，不利他的判決無法“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飆政見，絕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難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劉曉波陳詞到一半，法官突然打斷他，說控方只用14分鐘，因此辯方比照辦理（中國律師以往沒遇見過這種“原則”）。兩天之後，2009年12月25日聖誕節這天，法院判處劉曉波有期徒刑11年。依中國標準，刑期也算很長；當地民權人士將此判決解讀為有嚇阻其他人之目的，依古諺來說，就是“殺雞儆猴”。

判決刑期之重，令人驚訝，部分原因在於《08憲章》並沒激起多大民眾反應。它一貼上網，就被網管給刪掉了；而且，它發表的時機很糟：中國人民還在享受奧運餘韻；早在那年春

天，哲學博士生唐傑的影片已挑起中國人對西方批評的敏感；此外，金融海嘯在蔓延，中國領導人在經濟方面的表現，相形許多西方領袖，要有技巧得多。作家簡翻譯家宋以朗寫道，“因為美國總統小布希，《08憲章》一出生就夭折了。”他預測，中產階級新成員“不會把他們的公寓、汽車、電視機、洗衣機及希望，押在一片祈禱文上。”

一開始，政府似乎也認為如此；幾乎懶得公開表示知道有《08憲章》。但是在接下來幾個月，《08憲章》開始吸引到知識分子、農民、青少年及退休官員的簽名支持。最後，簽名數達到1.2萬人，這數字所占中國人口比例極小，但象徵意義頗大：它是1949年以來，反對一黨專政最大規模的協同活動。它反映出有一個社群的普通人，不害怕簽署自己姓名；誠如一位署名者所寫，直到當時為止，人們一直生活在“某種疏離而孤獨的國度”，黨不再能裝聾作啞了。2010年10月，官方媒體譴責《08憲章》為“完全過時”，寫出來“混淆民眾的思想”，想引發“暴力革命”。官媒呼籲國人回想起百年國恥：“採用這種憲章，將把中國削弱為西方的附屬品；讓中國社會的進步與人民的快樂，為之結束。”

劉曉波被定罪兩個月後，他提起上訴。上訴被駁回。外國記者向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詢問判決的消息時，他否認這一問題的存在，原因在於，“中國沒有異議分子”。接下來，馬試圖讓氣氛放鬆：中國農曆年要到了，記者會末尾，他祝大家虎年快樂，而且舉起虎形布娃娃。他敦促記者們“提問時要很小心”，不然“這個老虎對你可能會不高興”。

北京城另一邊，艾未未讀到“中國沒有異議分子”這個句子，心中難以釋懷。越來越多訪客以“異議分子”來形容他，但這個詞彙讓他覺得太簡化，不足以含括中國正在生根的異議範圍。在西方，這個詞彙面對鎮壓的暴力時，其不屈服的道德語氣十分清楚；但是，在中國，成為一名“異議分子”，會因為很多方面變得複雜，因為外人經常會低估。

姑舉一例。中國政府絕不讓自己變成單一標靶；它成功改善數億人的生活，儘管剝奪掉他們的政治自由。政府遇到批評者，經常以最實際的詞彙來作此論調：溫克堅既是人權倡議人士，也是成功的商人，他回憶警察找上門，想引導他遠離政治。警察說：“瞧你那爛車，已經開七八年。你的朋友們都已經買賓士了。”溫聽他們說完，認為公安們的說法，並不像他們認定的那麼好笑。雙方都想說服對方，但所說的話根本就是平行線，就像中國俗諺形容的“雞同鴨講”。囉，囉，嘎，嘎。根本沒

辦法溝通。

除了來自軍警維穩很明顯的壓力以外，變成異議人士有可能讓你與朋友、恩人的關係徹底完蛋。在中國，知識分子圈中的異議人士，凡有太多仰慕者，或者顯然無意於取得具體有形的名聲財富，反而想挑起那種很露骨、傳統中國思維迴避的政治衝突，那麼周遭人對你會戒慎恐懼。艾未未著迷於與人衝突。而今他身邊總是有政府派出的便衣安全人員跟著他，他開始去拜訪公安，引發一種《馬克思兄弟》的混亂狀態，各色公安機構重疊在一起：誠如他形容，“一盤走餿的荒謬劇。”他把藝術與政治的尋常邏輯翻轉過來：不是動用藝術來佐助其抗議，反而是把威權的機構徵召進來，化為他的藝術。

艾未未似乎天生就無法與人合作。有一次，艾瑞克森（EdvardEriksen）著名的小美人魚雕像借展到上海，雕像在哥本哈根市原來著名的地點空了出來，人家委託艾未未製作一件作品來安置上去。艾未未沒用雕像複製原作，反而是安置現場轉播影片，讓大家欣賞小美人魚暫時在中國的家。丹麥人認為，艾未未設計的超大鏡頭不怎麼吸引人。艾未未則說：“我們真實生活就是那樣，人人活在某種監視鏡頭下。並不美麗。”

無論何時，中國民權人士總會衡量異議的利弊得失，他們都知道，儘管並不明顯，但若是政府失去耐心，會有什麼下場。只要會想到“高智晟”這個名字就行了。2005年，高智晟身為律師，又是耀眼新星（2001年，司法部把他排名為中國十佳律師之一）。他在法庭上越是成功，就變得越好戰，而且更有意願挑起法輪功人士的敏感案子。他因批評政府執法而下獄，但他拒絕收手，2007年9月，他在人行道上看見一群人逼近他，接下來覺得脖子挨了一記重擊。接下來她被罩住了頭。

高被載往不知名的地方，然後除掉頭罩。他被扒個精光，再被警棍毆打及點擊。他在一篇偷送到海外的描述文章裡寫道：“接下來兩個人扯開我雙臂，把我釘在地上。他們用牙籤刺我的生殖器。”這種酷刑持續了14天之後，他再被羈押了5星期。最後他獲釋時，被警告說決不許對外描述他怎麼被凌辱，不然，下一次“就會當著你妻兒的面進行”。兩年後，有記者去採訪他，高已宣布放棄民權人士的生涯。他簡單地說：“我沒那個能耐再堅持下去。”

艾未未再次端詳“中國沒有異議人士”這個句子。他敲下一串文字個自己數萬名追隨者，試圖了解政府究竟在搞什麼鬼：

一、凡是異議分子都是犯罪。二、只有犯罪才有異議。

三、罪犯與非罪犯的區別，在於他們是否有異議。四、若是你認為中國有異議分子，你就是罪犯。五、中國沒有異議人士的原因，在於他們都是罪犯。六、那麼，現在還有人反對這一意見嗎？

共產黨要圍堵傳統的異議人士相當有經驗，以至於它很容易忽略資訊傳播的速度，一旦擴散起來會有多快。因為網路早已超越中宣部刪檢人員所能處理的量，於是網路警察的工作分屬幾個機構來處理，包括網際網路事務局。該局對這一挑戰的規模有多大，非常坦誠。副局長劉正榮愁慘地承認：“我們最大的挑戰，在於網路一直在成長。”

舊式媒體系統裡，刪檢人員仰賴“盤在燈台上的蟒蛇”——知道胡舒立一干編輯們，會自我刪修，以保障他們能繼續印行刊物——但是在網路上，你根本不知道誰打算寫些危險文章，直到它被寫出來為止。網管就算能儘快取下意見評論，但是要預防文章被轉發、保存及閱讀消化，還是太慢。語言文字正以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規模被表達出來，而刪檢人員則跟在後面跑。

而且，這還造出另一種麻煩。刪檢，以往只是個抽象、看不見的過程，它只會出現在秘密指令或編輯後台的討論中，現今則坦然可見。無論何時，當局拿掉韓寒一頁部落格，在數位時代就不像在郵局攔截劉曉波一篇文章那麼簡單。那種行為，會讓數百萬上網閒逛的用戶看到；除此之外，他們就過著原本的日子，不會膠著在要人感激涕零的刪檢機制。誠如韓寒對我所說，刪一頁部落格是發出信號，說“有些東西，你真的不想讓我知道。因此呢，現在我真的很想知道。”

韓寒說，與他同輩的讀者成長時相信，“任何你試著想掩飾的東西，就變成真理。”有次演講時，他說：“我不能寫公安，不能論領導們，無法寫關於政策的文章；我不能探討體制，無法寫司法；很多歷史片段，我不能寫作，無法寫西藏，不可寫新疆。群眾聚會不能寫，示威不能寫，色情不能寫，刪檢不能寫，藝術也不能寫。”

黨希望最好的事，便是網路談話未展開之前，便先遏制——自動過濾敏感字眼。因為政治議題晝夜冒出來，網管必須不時更新禁忌詞彙的匯編表，很像我由手機接到的，宣傳部發到媒體的指示清單。網際網路事務局發出指令給全國網站，有時候一天好幾次。某個字眼今天可能准用，而明天就禁掉了。你在百度引擎——中國版“Google”——上鍵入那個字，會收到如下訊息：“無法顯示搜尋結果，原因是它們不符相關法律、法

規及政策。”

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人們應變步調變得一樣快速。為了繞開詞彙過濾，他們用拼音類似的中國字來代替，造出一種密碼，一種影子語言，比如網管封鎖《08憲章》，人們就把它叫做“linbaxiangzhang”，沒人在意這樣拼音變成“淋巴鄉長”。

政府跟民眾的想像力賽跑，永遠落後但仍想趕上。每年最艱困的時間莫過於6月，當天安門廣場鎮壓周年逼近時，人們會設想各種隱而不顯的方法來討論。除了幾個永遠掛在黑名單的詞彙——民主抗議、1989年6月4日——網管煞費心機，一旦人們發明出來，就增加程式碼。我讀過最新的查禁字詞表，看來就像自我祭禱文：

火/鎮壓/革除/毋忘

在“六四事件”上，這些網路刪檢潰敗如山倒，黨則在測試終極武器：“關閉全網路”。2009年7月5日，中國少數民族維吾爾穆斯林在遼遠的西部烏魯木齊市抗議警方處理漢人與維族人打架事件不公。抗議轉為暴力，近200人喪生，其中大多數是漢人，他們被攻擊的原因就是因為“漢人”身份。漢人繼而對維吾爾區發動復仇式攻擊，為了阻止人們通訊、組織起來，政府突然切斷簡訊業務，切斷長途電話，幾乎關閉一切上網通道。這種“數位停電”持續了10個月，對經濟影響深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出口商品暴跌44.4%以上。只是，黨願意承受巨大經濟損失，以消滅它認定的政治威脅。未來若面臨更廣大的危機，中國可能有極多內外管道，在全國層面實施全部停網。但，即便是有限的停網，都可能影響深遠。

新疆事件就其他很多方面來看，都是轉折點。前一年，胡舒立與《財經》雜誌已證實，成功的調查採訪大受歡迎。中國民眾收到許多資訊，並且渴望更多。胡舒立把採編人手增加3倍到超過200名記者。雜誌還聘請前投資銀行專家胡傳暉來擔任財務主管，而她兩年內就讓廣告銷售增加3倍，達到1.7億。她跟胡舒立的計劃，絕不只是一本實體的印刷雜誌；胡舒立在她俯瞰北京的辦公室裡對我說，她們展望的，是“全媒體資訊及評論平台”。口氣聽來不像中國新聞工作，反而像矽谷的執行官。她說：“不論你用什麼閱讀裝置，我們都要送上有品質的東西。”

但隨著雜誌越來越賺、越來越有發展，胡舒立與她金主王波明的關係產生摩擦。她遊歷越廣，研習外國的出版，她的報負變得越大。她要有自己的媒體企業，可以按國際準則運作。相形之下，王波明則有待事輕重緩急之分的看法；他進入出版

業，賺了些錢，很享受身為媒體大亨的優越感——他沒意願去當政治烈士。他感到不安。我跟他談到胡舒立時，一抹遲疑橫過他臉龐，意味著他對現狀已感滿足，不想再要什麼了。他說：“我們不知道那麼做會帶來怎樣的風險。”

2009年春天，政府警告《財經》不得調查國營電視系統裡的財務腐敗，還有一系列極其敏感的議題。王波明猛抽菸，說：“但他們還是做了！”他表示，讀者愛扒糞，但廣告商不然。他說：“在某一頁是他們的廣告，但下一頁卻是篇報導，說他們公司在騙人。我們接到的電話，你無法想像。《財經》從不做正面報導。所有跟胡舒立談話的公司，都希望文章講好話，但一見刊，都是負面的！”

那年夏天，總編輯與發行人的關係急速惡化。新疆發生暴動時，網路被切斷，宣傳部官員只准官方認可的記者上網。胡舒立派了3名記者到現場，然而當局給她的配額只有兩名。第三位記者是借朋友的記者證，偷溜進能上網的媒體中心。他被逮到，官員想搜查他的筆記型電腦。他拒絕，還跟警衛扭打起來。當局把他弄上飛機送回北京。

這次吵架的消息傳到政府高層。中宣部當局那年已申訴過《財經》，此時胡舒立的贊助人規劃一串措施，想讓她重返控制之下：從現在開始，雜誌每期的封面報導都得送請批准；《財經》將接受指示，“不容置疑”；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得放棄報導政治，“回歸正面報導金融與經濟”。

胡舒立很生氣。她質問王波明，“‘政治新聞’的定義是什麼？還有‘正面新聞’呢？由誰來當裁判？”接下來幾週，她試著配合新規則。但她的老闆一次又一次拒絕其封面故事。被拒三次之後，她害怕手下最棒的年輕編輯因此辭職。老闆們拒絕第四篇故事之後，她依然把它出刊。

北京城裡，胡舒立與她的靠山們發生衝突，消息傳得沸沸揚揚，她倒是瞧出一條路來。投資人來與她接洽，而她了解，他們的支持可以讓她奪得《財經》更大的控制權。她與王波明關係緊張，原因不光是編輯自主。她辦的是他旗下最賺錢的雜誌，而她要更多利潤撥近來擴大營運，不然，她害怕被網路新時代淘汰。

她帶著一份大膽的經營權買斷計劃，洽詢王波明，可以分享公司的控制權：四成給投資人，三成給她和手下的編輯，另三成給王的公司。最重要的，是她要編務決定的最終控制權。若是有人去中宣部打交道，她打算自己來。她說：“我想，身為

專業編輯，我應該是下最後決定的人。”

但是在王波明看來，這項提議根本是背叛。他幫忙她掙得實際新聞自由的程度，勝過中國其他任何人——她非但不知感激，還敢要求更多；好比中國統治階級，相信自己已經給得夠多了，老百姓還不知足！王波明想，她太天真了。要不然呢，就更陰險，是在作秀——外披言論自由的大旗，偽裝她想爭奪公司控制權的欲望。王波明拒絕胡舒立的提議。

到了9月，管理層分崩離析：業務主管胡傳暉及她手下60名職員辭職，編輯們也宣稱，他們準備離開，一起重新開始。胡的副手王朔對一群年輕編輯、記者們說：“跟我們來。”但實情乃是，他們該怎麼從頭再來，要做什麼，大家都沒有頭緒，可大家都可以選擇。準備打包的編輯們盼望能鼓勵全面出走，給同事們三天考慮，要不要加入他們。

對面臨這一抉擇的記者們呢，這倒是進退維谷：現在是誰提供政治庇護給胡舒立？投資人會再賭她一把嗎？此外，她的記者對她的管理也諸多抱怨：儘管她大談透明、查核與平衡，她也有獨裁的氣質；某些替她做調查採訪的記者認為，她對位高權重的朋友下手較輕；而且，《財經》初創時期她提供的高新，已跟不上中國節節高漲的消費水準了。她的記者們若加入他們採訪的產業線，薪水可能會漲3倍。

然而，儘管有這麼多不確定性，胡舒立的特立獨行，強烈地影響她周遭的年輕記者。負責報導SARS病毒的記者曹海麗說：“我們總愛說，一百年才出一個胡舒立。她真的、真的獨一無二，在美國，那樣的人或許車載斗量，但是在中國真的很罕見。”

11月9日，胡舒立離開《財經》，編輯記者跟她走的有140人。對胡來說，離職是項抉擇，儘管並非她的初衷。她對我說：“你可以說我是被趕走的，也可以說我們自動離開的，真的很難講。”對此，她強顏歡笑，說：“或許我們可以做更大、更有趣的事。”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很少有人認為有什麼值得樂觀的。一名部落客和菜頭寫道：“她劍上染血，衣上有火藥味。要再找個胡舒立，只怕很難了。”

2010年10月，劉曉波被定罪10個月，諾貝爾獎委員會把和平獎頒授給他，“表彰他長久以來，非暴力地為基本人權奮鬥”。若不計獲獎當年是無國籍身份、已流亡數十年的達賴喇嘛，劉曉波是第一位獲此獎項的中國公民。劉的獲獎，讓中國領導人暴跳如雷；北京當局譴責此為對諾貝爾獎的“褻瀆”。長年以來，

中國一直垂涎諾貝爾獎，把它當成國家進步的肯定，並當成測量世界接受中國的程度。對獎的執迷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學者們把它叫做“諾貝爾情結”，每年秋天都在爭辯中國獲獎的機率。甚至曾有一場電視辯論，就叫“我們距諾貝爾獎有多遠？”。

當得獎宣布時，大多數人聽都沒聽過劉曉波，所以國營媒體造出第一印象：以顯著欄目在全國版報導，說劉曉波是靠“說自己國家壞話”來謀生的人。人物概述很經典，文章把劉描述為名酒及瓷器收藏家，還說他對獄友說：“我跟你們不同，我不差錢，外國人年年給我錢，就算我在牢裡也一樣。”劉曉波“為西方反動勢力工作，不遺餘力”，而且因為這樣做，“超越言論自由的界限，變成犯法”。

對人權人士來說，獲獎的消息令人震撼。有人後來說：“很多人放聲痛哭，控制不了。在北京，部落客、律師及學者們聚集在一家餐廳包廂慶祝，但警方趕到，拘留了其中20人。當消宣布時，韓寒在他部落格上玩弄刪檢人員及讀者，只貼了一對上下引號，包住空虛的空白。這則貼文吸引了150萬點擊、2800則評論。

劉曉波得獎後兩天，他的妻子劉霞到遼寧省錦州監獄探望他。他對她說：“這獎是給六四冤魂的。”返回北京後，她就被軟禁在家。政府禁止她及任何人前往挪威首都奧斯陸領取獎項；在此之前，唯一前例發生在1935年，希特勒禁止德國作家兼和平人士奧西茨基（CarlVonOssietzky）的親戚代他去領獎；奧氏本人則在蹲過集中營後，被關在警衛看守的醫院病床上。劉霞的電話線及網路都被切斷了，而且除了她母親以外，不准接觸任何人。這只是開頭，政府的孤立攻勢持續了好幾年。

12月，頒獎典禮逼近時，中國呼籲其他國家抵制諾貝爾獎。國營媒體稱此為“選X站”，而幹練的外交官、在約翰霍普金斯讀到碩士的副外交部長崔天凱質問同夥國家說：“你們是想參加政治遊戲，而挑戰中國司法系統，還是想與中國政府、人民，發展真正友誼？”頒獎典禮上，45國代表現身，19國沒來，缺席國家包括伊拉克、巴基斯坦、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及越南。《中國日報》頭版宣稱：“大多數國家反對和平獎頒給劉”。劉曉波公寓外，工人們忙著立起藍色金屬圍牆，防止攝影記者拍到劉霞軟禁在家的照片。英國廣播公司轉播該典禮時，中國電視螢幕黑屏以待。

這些年來，我看見這招好多次了。幾十年前，黑屏很公平地反映中國的世界觀——目光狹隘，既落伍又與世隔絕。但現在，出於本能而不讓大眾看到當局不喜歡的事實，實在與中國

生活其它部分的開放、世故相衝突得很荒謬，而且，它似乎把尋常中國百姓努力想達成的東西，給廉價化了。中國並非希特勒當政的德國，但中國領導人情願讓自己在諾貝爾獎歷史上，與納粹分子擺在一起。要不是中國政府裡最強大的勢力不夠聰明，不了解這種代價，就是其最睿智的勢力不夠強大，無法說服他人，一般中國百姓對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所知不多。他們從未聽到主持人引用劉曉波的話，說政治改革應“漸進、和平、有序，有所控制”。他們沒有看到獎牌及證書被擱在典禮台上，一張空空如也的藍色椅子上。中國境內，那個瞬間被記錄起來，充其量只如鬼魂。而在那年冬天的網路敏感詞名單中，刪檢人員加了個新的忌諱搜索詞：“空椅子”。

Chapter14雞舍裡的病菌

2011年，第一批戴墨鏡的虛擬人物形象出現在中國社交網站時，並沒有引起太多注意。沒多久，更多的人戴起了墨鏡，包括小孩、外國人及卡通人物。部落客奔走相告，到了關注人數超過500名，網管就把他們刪了，只是他們持續傳播。對知情人士而言，那些圖片算是里程碑，或許是中國首次有政治活動如病毒般流行，人們是在向一個沒有親自謀面的人致敬：盲眼律師[晨光成]。

6年前我曾試著到陳居住的東師古村拜訪他，當地政府始終沒放棄圍堵[晨光成]思想散布的決心，試圖把他像傳染病患者一樣隔離起來。我去造訪的時間，是2005年秋天，當時[晨光成]被召喚去與當地副市長劉傑見面。劉傑想要了解，何以[晨光成]會對外國記者談論一胎化政策的倒行逆施，“你何不透過正常的官方管道，解決此事，而要向海外國家的敵對勢力談？”

到那個節骨眼，態勢已經很清楚，[晨光成]因為訴諸大眾，已然越界，而政府不能容忍。他並沒有被任何罪名起訴，但被軟禁在家，電話被切斷。幾個月之後，有次例行性停電——在某些中國鄉間常見的麻煩，而且頻率越來越頻繁——叫他大感驚奇的是，停電居然使干擾他電話通訊的設備也失靈了。陳竟能打電話給他北京的律師，律師再撥給我。這種狀況之詭異，令他好笑，接下來他收住笑聲，彷彿是想為當下召喚某種合宜而重大的口吻，他鄭重地說：“我想告訴全世界，這個地方政府連自己的法律都不遵守。”他自己試著提醒政府別踐踏法律，居然讓自己被隔離起來，[晨光成]十分困惑。我問他心中最大的問題是什麼，他說：“我只是好奇，中央政府是不想阻止還是沒能力阻止？”

[晨光成]被軟禁在家近6個月後，翌年3月，他的兄弟與同

村人因[晨光成]限居的條件，而與警方吵架。[晨光成]被控以“損毀財產”及“聚眾妨礙交通”罪名，話雖如此，他的支持者認為，以他的身體條件，這些都是欲加之罪。他出庭前一晚，其律師被羈押了，代表他的是法院指派的律師，而該律師沒傳喚證人。他因損毀財產及聚眾妨害交通而被判罪，處刑四年零三個月。

在帝制時代，有種方法可以取得中國領導人的注意——上訪喊冤或揭露濫權——到衙門口鳴鼓申冤。假如這麼做無法引起反應，那麼人們還會在過往大官的轎子前攔轎申冤。申訴冤情成功的人，官方稱其為“冤民”，有權申冤，層層往上，一路到京師去。

共產黨掌權時，還保留了這一古老系統的某些特色。它成立“信訪局”，受理冤民，指導他們把案件送到正確的政府部門。但是到21世紀，信訪局變成過時古董，其案件負荷量不堪重負，其運作如謎。有份研究發現，信訪局解決的案件量，是受理量1%的約1/5。這些案件取得法院充分準備公開審理者，極其稀少，因此當冤民輸掉官司，或案情沒有絲毫進展，信訪局只迫使某些案件更深陷追求正義的征途，終得纏訟多年。

現代版的冤民，人稱“上訪者”，我經常冷不防接到他們的電話。他們跟蹤我，希望外國記者注意到，或許能迫使政府解決他們的案子。他們來找我的時候，我能做的至少是聽他們說完，但我能幫忙的方式，通常不多。他們的案子很複雜，令人困惑，而且上訪的過程長而煎熬，致使數千人漂流在北京市邊緣的貧民窟，通常稱為“上訪村”的地方，在堆積如山的發皺訴訟文件中極度不安。有時，我都不知道他們在訴訟的迷宮中打輸，是因為他們健康欠佳，還是因為訴訟漫長而造成精神異常。

網路出現時，冤民是第一批極力接受它的人。2002年9月，南京市爆發食品中毒，死了40個人以上，但當晚新聞聯播忽略不提，不僅如此，新聞中有一則說工人們“深深感謝”黨領導的同情，還有當地服裝展的閉幕。人們上網抱怨，有人問道：“老百姓就不是人？”另一人寫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沒過多久，冤民們就用這種新式科技來找到同類。當一位25歲的男子張先著發現，自己因為肝炎檢驗呈陽性，竟不得出任公職，他就去線上找尋有相同經驗的人，他們一起迫使政策改變，杜絕這種歧視。很快地，為男女同性戀者、宗教信徒及糖尿病患者爭取更大權利的類似活動也出現了，組織起來的本能更散布進入主流社會。

2007年，一則消息傳遍廈門市，譴責提議興建化學工廠。消息的措辭很嚴峻：“一旦生產這個非常毒的化學物，代表一枚原子彈已經安置在廈門……為了子孫後代行動吧，參加6月1日上午8點的萬人遊行。把本消息傳給你全廈門的朋友。”但組織者沒舉行喧囂的示威，而是呼籲散步抗議，低調遊行，不會引起警方鎮壓。數千名男女現身，有人還牽著小孩——以抗議之名而寧靜地走著。廈門市政府退縮了：它曾計算過，誠如孟子所述，“有恆產者有恆心”。但孟子可沒提到散步抗議，那麼做，是試圖保持安定，還是破壞？肯定不是暴動，但也不合法。市政府與群眾拉鋸來回幾天之後，同意延後化學廠計劃，留待“重新評估”。

這種新的抗議精神，既有協調又溫和，對當局而言造成新的麻煩。誠如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專家孔傑榮（JeromeAlanCohen）所述，“他們是打算擁有一套真能處理這些事情的司法系統，化解緊張，滿足各類需求；抑或它只是個噱頭，會導致人民上街，進行各類抗議，失去穩定與和諧？”孔傑榮把[晨光成]的抗爭，看待成一道測驗，看看威權體制能否包容躐升的野心。陳有次問孔：“他們要我做什麼？走上街頭？我要的是上法院。”孔傑榮說，依此觀之，[晨光成]“不是異議人士，話雖如此，他們可能逼他變成一個異議人士。”

孔傑榮自2003年結識[晨光成]，當時美國國務院所設的“國際訪問者領袖計劃”邀請[晨光成]赴美一遊，國務院詢問孔傑榮有沒有興趣接見一位中國律師，教授正在趕截稿，回答說：“他讀哪家法學院？”打電話的人說：“他沒讀過法學院。”孔傑榮答道：“那你來煩我幹嘛？”“這傢伙很不一樣，我想，你會有興趣認識他的。”

他倆見面了。孔傑榮對我說：“半小時之後，態勢很清楚，跟我打交道的人非比尋常。”這只是開頭，兩人結盟本來可能性很小。孔傑榮高大禿頭，白髭光潔，愛打領帶；他曾替兩位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當助理，後來成為第一位在中國開業的西方律師，被視為外國專家中鑽研中國法律的泰斗。他第二次與[晨光成]在北京見面時，買了一套法學書籍給他，[晨光成]則說：“你若是沒來東師古村，就不會了解我起而反抗什麼，或者我打算做什麼。”

孔傑榮與其妻柯珠恩（就是那位碰巧在紐約結識[愛未未]的藝術史學者）由紐約往東師古村一旅。即使已在中國工作幾十年，他倆還是被當地的貧窮嚇到了。孔傑榮碰到[晨光成]的客戶們，孔傑榮說：“我從未瞧過更悲慘的一群人，瘸子、流離失所

的人、侏儒——各式各樣的人——他們如果不行賄官員，就無法取得開店執照，還得繳納不公平的賦稅，受警方欺凌。”孔傑榮發現，自己買給[晨光成]的書，頁角都有摺起，原來都是由他太太及長兄讀給他聽。

孔傑榮離去之前，[晨光成]已勾勒好計劃：他打算訓練200名村民學習法院基本技巧，來口述散播法律，如此他們就可以跟他一樣，接受法律案件。孔傑榮問道：“你真心認為，地方當局會准我們租一個辦公場所，訓練打算搞倒他們的人？”陳回答說：“沒錯。”

到了[晨光成]入獄的時候，黨已認定，自己控制思想傳播的手法太軟弱了。2007年春天，國家主席胡錦濤對政治局同僚說，防火牆過濾及人力網管已不敷使用。他說，黨必須“使用”網路，黨必須“取得線上輿論權的優勢”。

為此，黨擴大自稱“網路評論員”的編制，他們偽裝成一般的使用者，上網遊逛，試圖轉移辯論，而非消滅。他們按每貼給予報酬人民幣五毛，因此批評他們的人叫他們“五毛黨”。他們很像中宣部職員，照理該無所不在卻又無影無蹤；另外，黨也禁止五毛黨承認為黨工作。但是[愛未未]放話出來，說任何網路評論員、願意談論五毛的工作內容者，他送一台iPad。有一位26歲、自稱“W.”的男生接受這項提議，他曾攻讀新聞學，在電視台兼差，但收入最大的部分，是來自網路評論員。

“W.”這麼解說：每樁差使都始於接到“影響民眾理解”或“穩定網民情緒”的命令。若他公開讚美政府，大家就無視他，或嘲笑他是個五毛，所以他得拐彎抹角：如果群眾越聚越多，他會插個蠢笑話或者無聊廣告，鼓勵不在乎的讀者岔開心思。人們若是在批評黨，比如說調升油價，他可能會丟個爆炸性的想法，“你若是太窮開不起車，那不就剛剛好？”他說：“大家一看到這個評論，就會開始攻擊我，慢慢的主題會從油價轉移到我的評論。任務就完成了。”

“W.”對自己的工作並不佯作喜歡。他幹網路評論員是為了賺錢，而且他沒跟親朋好友講，如他所說，工作可能“有傷名譽”。“人人都渴望探索真相，我也不例外……比起從前，我擁有更多言論自由。但同一時間，等到你取得那種自由，你就會發現還有更大的自由。接下來我們覺得不公平，因為有所比較，才叫人沮喪。”[愛未未]把這段網路評論員訪談貼上網，幾分鐘內網管就刪了它，但沒關係，文章已廣為流傳了。

懷疑與批評如同肌肉，越練越強。大眾的批評如風暴，通

稱“網路事件”，一個接一個橫掃全國。曾有一次，草根工人組織者運用線上論壇及手機，策動一連串罷工，兩個月內在40多個工廠發生……這種騷亂的上升，讓黨格外心驚，因為比起任何人，黨最知道勞工被動員後，可能有什麼力量。每個機構，無論多麼晦暗不明，此時都由大眾來評審。有一次我去拜訪四川省鄉下一家小型職業學校，幾年之後，我再搜索該校的消息，第一條浮現的，便是學生向當地市長上訴，說學校“欺騙”學生，把他們的文憑歸類在“夜校班”。學生寫道：“我們付的是白天的學費，真是欲哭無淚。”畢業生們抱怨了，地方當局召集他們，警告他們別小題大做。學生再寫道：“我們沒製造任何麻煩、暴動或做什麼事，我們沒違反法律或損害社會道德。我們要到，只是一個解釋。”

在上海，一對父母發現，因為他們的戶籍在鄉下，學校不肯提供健康保險給他們小孩。所以他們貼了篇抱怨的文章，標題叫《我們活在僵化的階級制度國家》，他們寫道：“這家學校如何能教育我們的孩子愛黨、愛祖國？”還有另一個例子，沾惹些許笨拙的象徵主義，有個電視劇很叫座，名叫《奮鬥》，描寫年輕男女自力更生，其劇作家上網抱怨說：“我該取得多少收視率，才能生計不愁？”

黨也遭逢自作自受的難題：這麼多年來，它壓縮掉那麼多表達的渠道，以至於人們別無選擇，只能從事黨最害怕的暴動。於是黨以進一步的鉗製作為回應，導致惡性循環。當富庶的沿海城市寧波屋主進行數日的街頭示威，反對計劃興建的化學工業區，市政府最後同意放棄建廠，但為了日後好做事，網管封鎖示威者的口號：“我們要生存，要過活。”

人們行賄而沒達到想要的效果，也上網抱怨。有位湖南省房地產大亨黃雲彪花錢想買人大代表，但給了5萬美元之後，對方說他出的錢太少了。為了報仇，他貼出中間人收錢的影片。與此類似的還有位叫王茜的姑娘，她稱自己花了1.5萬美元，想買軍中肥缺職位，但她的募兵官跟她講，其他軍校生出的錢更多。

人們抱怨的目標不止政府官員，消費者也控告約會網站“世紀佳緣”創辦人龔海燕，說他們上“世紀佳緣”碰到騙子而人財兩空。人們譴責她放任騙子躲在會員裡，裝沒看見。一名男子後來被捕，在北京某法院判刑兩年半，原因據稱是他騙取在“世紀佳緣”結識女子的財物。佳緣否認公司有任何責任，但股價還是蒸發近四成，用戶開始流失。為保護會員遠離詐騙，公司創設一套系統，讓會員上傳正式文件來強化自己的檔案——如薪資

條、政府身份證明、離婚文件——提供的文件越多，你的名字旁邊就增加更多星星。公司聘請文件專家團隊，查處偽造品，清查可疑活動，比如有用戶經常改變其網名或者生日。

但更多批評接踵而至，有國營背景的新聞刊物《京華周刊》指責佳緣公司設置“VIP高端獵婚顧問”，便是特殊的婚配團隊，只與最有錢的會員、大多數是男性打交道，把他們與最多人追求的女性會員連線起來。這些客戶被稱為“鑽石王老五”，花費達5萬美元，進行6次配對，難免帶有高科技伴遊服務的味道。對此我問龔海燕，她毫無歉意，說那只是簡單的供需。她說，“鑽石王老五找年輕漂亮的姑娘，這些漂亮女郎中，有些也指望嫁給那種男人，這樣實為絕配。”

在這些負面報導打擊下，佳緣的競爭對手大發利市；龔海燕創業時，網路相親在中國幾乎不存在，此時已成長為總值10億多人民幣的產業，公司需要老手穩舵。2012年3月，佳緣營收及股價都告大跌，於是聘請科技業沙場老手吳琳光擔任執行董事。相親產業在打割喉戰。吳加入之前，他經營的是線上射擊遊戲，叫“坦克世界”。

以前人們上網會頭昏眼花，現在則不然，期望值已然大升，而且對那些試圖限制他們網路自由的人，他們毫不掩飾自己的輕蔑。最受唾棄的人，莫過一位50多歲、名叫方濱興的電腦科學教授。他在設計網路刪檢架構時，扮演中心角色，國營媒體寫到他時，都語帶尊敬的稱其為“中國防火牆之父”。只是，方到社交媒體開設自己帳號時，有位用戶慫恿他人，“快，大家快去向方濱興‘拍磚’！”另一人搭腔說，“人民公敵終於受審了。”儘管儘速刪除這些辱罵，但跟不上速度，令方受傷的評論源源而至，人們把方稱為“太監”及“走狗”，還有人使用修圖軟體，把方的頭像繪成巫毒娃娃，額頭插針。毋須真正的肉體攻擊，僅用網路語言，方已落入狂熱暴徒之手。

不到3個小時，“防火牆之父”便關閉他的帳戶，不敢再踏入他大力創建的數位世界。幾個月之後，即2011年5月，方到武漢大學演講，一名學生向他丟雞蛋，繼而丟鞋子，打到方教授的胸膛。老師們試圖把丟鞋人、來自鄰近大學的理工科學生拘留起來，但其他學生圍成人牆保護他，送他平安離開。該學生馬上在網路上出名，人們向他送出現金及香港、新加坡度假旅遊，有位女性部落客還主動提議獻身於他。

人們問那位學生幹嘛那麼做，他稱自己的舉動是迫不得已，他對一位中國記者說：“我沒有平台可以與方濱興公平辯論，因此，只有訴諸這種有點極端的方式，來表達我的不滿。”

2009年9月，[晨光成]服刑期滿獲釋。官方沒再控告他。然而當他返回東師古村，卻發現當地政府已為他返家“準備妥當”。他們已為他家屋子安裝鐵窗，泥院周遭都是探照燈，還有攝影鏡頭，24小時監視。他們還組成警衛隊，輪班看守。有一度，[晨光成]與孔傑榮盡力估算，為了阻隔這位盲眼律師，不讓他與外界接觸，那些警衛、餐點等等開銷，要花多少錢？答案是700萬美元。

但[晨光成]最在意的是，這些懲罰大多是心理方面的：警衛們不時從他家裡拿出物件，擺在院子裡，等候他或他家人來拿回去；警衛沒收了他的電話、電腦，還把電視插座折彎，以至於不能使用。有一次，[晨光成]設法偷送出一段描寫自己處境的簡短影片，警衛發現後，用毯子把他包起來毆打，以示懲戒。

隔絕戰術最令[晨光成]擔心之處，在於不光只針對他一人——警衛不讓他的6歲女兒去上學，讓網民們激憤的，似乎正是這一點。2011年10月23日，有30人想去拜訪[晨光成]，但警衛沒收他們的手機、攝影機，還用石頭砸壞，逼迫他們離開。這吸引了不少人的興趣，其中有一人是南京市英文教師何培蓉。

那年秋天，一位朋友提起此案之前，何培蓉沒聽說過[晨光成]。何對我說，“我首先做的事，便是查[晨光成]所說的，有多少事實。”她對[晨光成]被限制居住的事知道得越多，就越感憤怒。“就算他為人權工作過程中，曾經犯法，我想，他已經付出代價了。他獲釋後的遭遇，讓我震驚，我從沒想過，今天中國還有這麼殘忍的事發生，我的朋友們——甚至其中有些人是警察——聽到我所描述的，都難以置信。”

何培蓉把自己戴墨鏡的照片貼出去，參加線上運動。她開始在部落格談[晨光成]的案子，表示她打算在陳生日那天，也就是11月5日，去拜訪他。距離拜訪還有5天，公安開始跟蹤她，甚至載她去上班，建議她別試圖去東師古村。她說，有一次公安們提議，願替她出錢給她去度假，只要她打消拜訪念頭。但是她拒絕了，於是公安把她軟禁在家直到[晨光成]生日過後。她並未退卻，連同其他[晨光成]的支持者，她分發4000張印著肯德基商標風格、顏色的汽車保險桿貼紙——臉孔是[晨光成]，上頭的字卻是“FreeCGC”，若公安盤問，他們就說那是免費雞塊的廣告。

這種模式，足以顯示參與抗議是哪些人物，何培蓉對我說“與中國以往的人權志士相較，這種支持的類型完全不同。我想，[晨光成]保險桿貼紙運動，代表的是中產階級的觀點，原因在於有車的人才會參加。”

這項活動變成國際新聞，兩個星期後，山東地方政府退讓，准許[晨光成]的女兒去上學，但[晨光成]依然被關在房子裡。本案對政府來說，真是尷尬事，[晨光成]與他的支持者越是抱怨，政府越不情願流露出自己對壓力有所反應。有位外國記者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問及[晨光成]的狀況，但這個提問最後還是在記錄謄本中被刪除了。

Chapter15沙塵暴

春天是北京沙塵暴季節。強風由蒙古高原吹下來，一路刮起細沙。沙塵暴侵襲中國首都前，人們用肉眼就能看見它在逼近：天空轉為蒼白、異世界才有的黃色，接下來沙開始在窗欞底累積，宛如小小的雪壩。2011年我與貝莎娜（SarabethBerman）合住（當時她是我未婚妻，後來成為我太太）的胡同房間，冬天過後灰撲撲，了無生氣。

鄰居們則開始在春季首度外出，到首都邊緣的花市買花，為房子添些顏色。可最近北京花農收到不尋常的命令：別賣茉莉花。

茉莉是中國人最愛的花之一，配茶絕佳，小小的白色花瓣，讓詩人聯想到純潔。但是那一年，公安告訴花販，無論人家出多少錢，茉莉花都不能賣。若有人來，問說要買茉莉，記下車牌號碼，立即撥打報警電話。

在中國政治界，茉莉花已沾上顛覆的氣味。幾個星期前，即12月17日，一名26歲的突尼西亞青年布瓦吉吉（MohammedBouazizi）沒有賣水果的許可證，警方抄沒他的貨品，他抱怨，還被掌嘴。布瓦吉吉是一家11口唯一在賺錢的人。他到省政府求救，但沒人接見他。在絕望又被羞辱之下，他自淋油漆稀釋劑，引火自焚。

幾個星期後，布瓦吉吉的的遭遇引發示威，反抗本·阿里（ZineEl-AbidineBenAli）總統的統治。警方介入，手機攝影傳到YouTube及臉書，示威擴大，貪腐、失業、政治自由受限等訴苦都包括進來。一個月內，這股運動已把突斯總統趕下台，引發全阿拉伯世界的抗議。在海外，人們依突尼西亞國花，將此稱為“茉莉花革命”（JasmineRevolution），但在突尼西亞境內，人民稱其為“尊嚴革命”（DignityRevolution）。不管叫什麼名字，這項抗議立即引起中國的注意。到埃及總統穆巴拉克（MuhammadHusniSayyidMubarak）在開羅倒台時，[愛未未]在推特發文說：“今天，我們全是埃及人。”

中國領導人看似漠不關心。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

正說：“認為中國會發生‘茉莉花革命’的想法極其荒謬，不切實際。”《北京日報》宣稱，“人人都曉得，穩定是福氣，紊亂是災難。”在一篇報導裡，《中國日報》7次提到“穩定”的重要性。

但私底下，黨的反應大不相同。我的手機響了，中宣部又有指示流出，是發給全國總編輯的，說：“不准拿中東及我國的政制來比較。當埃及、突尼西亞、利比亞等地領袖的名字出現在我國媒體時，中國領袖的名字不可出現在旁邊。”

“阿拉伯之春”令中國領導人焦躁的程度，超過近些年的任何事件。毛澤東曾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科技的力量很容易就被高估，但它顯然幫反威權人士很大的忙。黨不悅的另一個原因，屬哲學層面：中國共產黨經常說，發展中國家的男男女女較有興趣於累積財富，而非追求民主、人權之流的“西方觀念”。這種論調，由於阿拉伯男女上街遊行，爭民主爭人權，變得較難有說服力。

有些君主如約旦國王對“阿拉伯之春”的響應，是允諾鬆綁，希望扭轉爆炸局麵。但中國領導人則反其道而行，他們從穆巴拉克倒台學到的教訓，跟蘇聯崩潰是一樣的：抗議不加節制，會導致公開造反。政治局派出最正統保守派之一的吳邦國，宣揚其“五不搞”理論：“從中國國情出發，鄭重表明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他在北京對人民代表大會3000名代表說：“我們若是遲疑，國家將淪入萬劫不復。”

2月29日，海外華文網站出現一則匿名通知，呼籲人民翌日下午兩點集合，在中國13個城市集合，“拿一朵茉莉花靜靜走路”。政府動員數萬公安及國安幹員待命，以防滋事。軍方的《解放軍日報》警告說，有場“無硝煙戰爭”，存心想“西方化，令國家解體”。

到了預定的抗議時刻，北京當局關閉市內大多數手機簡訊服務。現身的人大多是外國記者。王府井購物區麥當勞前，聚了大約200名中國人，但誰在抗議，誰是公安，而誰又是在當路人，根本無法分辨。叫我吃驚的是：人群中有一個人，乃是來自上海的的年輕民族主義者唐傑。他對我說：“我只想過來瞧瞧，本以為會有戲可唱看。除了記者，我不認為有誰會來。”他笑著說：“我們拍了很多記者。根本沒有革命。”

我認識唐傑三年以來，他完成哲學博士學位，而且把他的愛國心轉化為職業，他的影片在網路上造成轟動，讓他與擁有類似想法的人連繫起來，比如反CNN網站的創設人饒謹，他的

網站專批西方對中國的報導。饒謹正在籌組一家節目製作公司，唐傑搬來北京加入。他們的公司取名“四月傳媒”，紀念他們起而捍衛奧運火炬的那個月。他們中英雙譯文章，大量生產影片及演講，盼望如他們形容的“能給出真實而較客觀的世界影像”。

計劃中的抗議過了幾小時之後，唐傑從兩位由麥當勞返回的同儕活躍人士聽到消息，他們拍到不尋常的光景：美國駐北京大使洪博培（JonMeadeHuntsman，Jr.）曾短暫出現在人群當中。大使堅稱只是巧合，說他剛吃過午餐，只是出來散步。但在中國愛國人士看來，這是證據，美國想搞“中國茉莉花革命”。影片中有位男子質問洪博培：“你是想看見中國陷入混亂，對吧？”大使說“才沒有”，然後匆匆離去，但是唐傑瞧出賣點。他開始工作，增加字幕，把自己的主張覆以不斷爆炸的紅色泡沫：“當然，中國有各式各樣的問題，但我們不想變成另一個伊拉克！不想變成另一個突尼西亞！不想變成另一個埃及！國家若是陷入紊亂，美國及所謂的‘改革派’會餵飽我們13億人口嗎？他媽的這點別搞錯了！”

他完成影片時，已經是凌晨3點，貼出影片給大眾觀看之前，他躊躇一下。當局曾警告，要他的網站別評論中東動亂或抗議。他對我說：“可接下來我琢磨一番，認為真該把它貼出去，任何媒體機構手中有這種素材的，都知道它是新聞。”他按鍵發出，到了那天結束，已變成外交事件。中國外交部抗議洪博培出現當地，唐傑忙著接各地記者的電話，最遠來自鹽湖城，洪博培的故鄉。

接下來那星期，我去唐傑北京新辦公室找他，辦公室在離北京奧運體育館不遠的辦公建築群。他看來精力充沛。他還在北京找住處，所以一直睡在辦公室一張紅色破沙發上，但新事業讓他興奮不已。辦公室跟我見過的許多中國新創公司一樣，走IKEA美學風格，牆上貼了許多振奮人心的照片：風中飄揚的旗幟、田裡的麥浪。公司的口號寫著：“我們的舞台、我們的希望、我們的報導、我們的信仰。”

我們下樓去咖啡館。吃午餐時，我提到認識韓寒，與唐傑年紀差不多的作家及賽車手。唐傑嗤之以鼻，他說：“他太單純，有時可說是天真，他指出某些中國的問題，但都是膚淺的觀察，他只說好比‘政府很爛’之流的東西。”我說唐傑的網站談的議題，很多也都一樣——貪腐、汙染、政治必須改革——但唐的看法不同。“我們跟韓寒之間的差異，在我們試著想有建設性。舉例來說，他談論貪腐及高房價，讓大家都憤怒起來。而

我們說的則是，做事情要一步一步來，總得有個過程。”

儘管茉莉花抗議失敗，組織者呼籲下一週再試。一則海外華人網站告示說，“中國人民的人權，是中國人民自己必須奮力爭取的東西。”它呼籲黨創設獨立的司法系統，打擊貧富不均及貪腐，如果做不到，就“退出歷史舞台”。在他們選擇的口號裡，組織者結合了實際（我們要工作，要住房！）與抽象（我們要公平，要正義！）。

正如海外中國學生在幾年前民族主義大澎湃時就扮演重要角色一樣，目前那群人的另一面正在發聲。首爾、巴黎、波士頓等地的學生，以他們稱為“茉莉花運動”的名義寫作，設立部落格、臉書專頁、Google群組及推特帳號。他們呼籲“下崗勞工、被迫拆遷受害人參與示威，喊口號，追求自由、民主及政治改革，終結‘一黨統治’。”

然而廣泛來說，這種激進思想超越網路的跡象，實寥寥無幾。下一次抗議預定時間來臨之際，當局不敢賭運氣，派出百名便衣及制服公安，還有身著護甲的快速反應部隊，配備自動步槍及警犬。警方事先去電外國記者，警告他們遠離現場，但還是有幾十人現身，公安於是強勢驅離。彭博電視台的記者恩格爾（StephenEngel）被按倒在地，一腳被拖住，挨打挨踢；一名攝影記者遭公安襲擊，臉上挨了拳打腳踢。後來，記者們要求外交部調查此事件，發言人用尋常的外交保證打發，而且乾脆地說，若是記者打算“製造中國的麻煩”，那麼“沒有法律可以保護他們”。抗議結束了，組織者最後一搏，呼籲人們在指定時間到麥當勞去，只點三號套餐。

過沒多久，政府展開報復。放話支持抗議的人開始消失，至少一段時間如此。有人應答門鈴之後，人就不見了；也有人走在人行道上，就被扯進候在一旁的車裡。2011年4月3日，藝術家[愛未未]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準備搭機去香港，結果被人推擠出排隊線，弄進一間辦公室。在北京城另一頭他的辦公室裡，有位助理往藍綠色大門外探頭，看到一群警察。公安們還來到[愛未未]非婚生的兒子家，他跟母親住在離工作室不遠的地方。在北京城別處，一位名叫文濤的記者經常記述[愛未未]的活動，他被扭進一輛黑色轎車。另有3名艾的合伙人在類似場景中被羈押起來。

在工作室，公安帶走幾十台計算機及硬碟；拘留8位[愛未未]的助理，而且把艾妻路青留在工作室裡盤問。黑夜降臨北京時，公安釋放工作室助理，但有關[愛未未]及其他人仍無隻字片語。隨著他們被捕的新聞開始傳開，網管把敏感詞單更新，加

入：[愛未未]/未未/艾未/艾胖子。

有些更隱晦的參照詞逃脫網管，散播迅速，包括一段模仿德國神學家尼莫拉（FriedrichGustavEmilMartinNiemoller）的文章：

“當一個胖子失去自由，你說，‘這跟我無關，因為我很瘦。’有個留鬍子的人失去自由，你說，‘這跟我無關，因為我不留鬍子。’再來一個賣葵花籽的人沒了自由，你說，‘這跟我無關，因為我不賣葵花籽。’等到他們追捕瘦子、沒留鬍子、不賣葵花籽的人，那時候已經沒人留下來，能替你說話了。”

到了四月中旬，人權團體把這次稱為20年前[添安門]廣場以來，規模最大的鎮壓表達自由。200人遭到審訊，或被軟禁，據估另有35人遭到羈押。名單不光只有老派的異議人士，社群媒體名流與記者也在其內。有人獲釋以後，描述五花八門的遭遇。一位名叫金光鴻的律師說，他被綁在精神病院的床上挨打，被注射他無法辨認的針劑。有人說，公安刺激他們，叫他們回想[高至盛]——那位寫下自己被虐待經歷的律師的下場。人權律師李天天的遭遇則是：審訊人員要她對著一屋子警衛講述自己的性愛史。同樣，李天天也被威脅，不准說出自己的遭遇。但最後她在網路上發表一篇供述，寫道：“我內心是如此羞慚，彷彿我挨打還得微笑，說自己不痛。選擇權被剝奪。無助。”

鎮壓強化之際，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DianeRodhamClinton）譴責中國領袖“試圖阻擋歷史，注定徒勞無功”。《人民日報》援引“皮尤研究中心”對20國人民所做的民調指出，中國人民表示滿意程度最高，達87%。文筆口水戰之中，

有則例行預算報告很容易被忽略，它揭露一個驚人的里程碑：有史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花在國內維安的經費，要多於對外的國防開銷；花在監視自己人民的錢，比起保護自己抵禦外來威脅的還多。但《人民日報》說，這些抗議行動會失敗，原因在於“原本落伍衰敗的國家，已經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世界對此致上高度敬意”。

過了很多天，[愛未未]的行蹤依然下落不明。最後，艾母與他的姐姐突發奇想，她們沿著四周滿是出租告示還有尋狗海報的該區貼了張手寫傳單，上面寫著“尋人啟事”：

“[愛未未]，男性，53歲。2011年4月3日早晨約8點30分，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於登上前往香港班機之前，他被兩名男

子帶走。50多個小時過了，沒人知道他的下落。”

當天下午稍晚，外交部宣布，[愛未未]因為“經濟犯罪”，正在接受調查，另強調與“人權或言論自由無關”。黨的八卦小報《環球時報》譴責[愛未未]是“中國社會的頑劣分子”，必須為他的頑抗“付出代價”。“中國整體上正在進步，沒人有權力叫國家調整，只為迎合他個人的愛或不愛。”

從機場開始，[愛未未]便被左右兩個公安架著臂膀，押上白色廂型車的後座，被黑色頭套罩著。廂型車停下來，艾被帶進室內，按坐在椅子上。被扯掉頭套後，有個肌肉魁梧、剪短髮的人站在他前面。[愛未未]以為會挨打，但沒有，警衛清光他的口袋，抽走腰帶，再用手銬把他右手扣在椅背上。他坐在椅子上等了8個小時，接下來，兩個詢問員抵達，一個打開筆記型電腦，另一個點了香菸。抽菸那人是個中年男子，穿直條紋運動外套，肘部有護墊，[愛未未]只知道他叫李先生。接下來兩個鐘頭，李先生問艾海外有哪些聯絡人、收入來源、還有他藝術作品裡包含的政治訊息。他審核艾一整年部落格貼文及推特簡訊的量，逐字逐行。李詢問艾，是否知道誰是呼籲發動“茉莉花革命”的幕後黑手。艾要求見律師，李則告知，“法律幫不了你的忙，聽命令就好，你會比較好過。”

儘管十分焦慮，[愛未未]卻也深深著迷——在試著從那麼多角度來描寫共產黨之後，現在他與黨面對面了。詢問他的人似乎想奮力了解他生活的世界，李先生問他，怎麼安排畫裸體肖像的細節。他們問他收入來源時，艾說，一件雕塑可賣到8萬美元，訊問他的人一開始還不敢置信。

李先生告訴他，這次逮捕是經過完整策劃的。“這個決定蠻困難的，要不要抓你。但最後決定必須抓。”他繼續說：“你讓中國政府很尷尬，如此違反國家利益。”他繼續對[愛未未]說：“你變成外國‘和平革命’戰略的棋子。”李先生說，最後，政府必須“粉碎你”。他對艾說，很可能被以“煽動顛覆政權”罪名起訴，跟指控[劉小玻]的方式是一樣的。

接下來幾天，一直有人陪著[愛未未]。艾被轉送到軍方建築，留置在一間窄而無窗的房間，牆壁裝了防撞墊，好比精神病院。兩名穿橄欖綠制服的警衛始終守在他身旁3英尺的距離，有時候，他們甚至坐在離他臉龐只差4英寸的地方——不論上廁所或淋浴，都陪著他。他在囚室踱步，他們跟他一起走；他們命令他睡覺時，得讓他們看見他的雙手。一切已經到了艾想摸自己的臉，必須請求准許的地步。[愛未未]不時對他身旁的這些人感到好奇：他們真的自視為中國追求財富時的捍衛者嗎？他

們自認為是在遏阻自私、破壞式個人行為，比如[愛未未]嗎？他們看待自己時，是否無法直視而眼光暗淡，好比身體的肌肉，因為怕死，所以會鼓脹起來？

盤詰進行下去，但[愛未未]沒遭受肢體虐待。恐懼消失，繼以疲倦。他的體重下降，他得吃藥治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以及頭部舊傷。有位醫生不時為他檢查——有時每三小時一次。他開始失去時間感，忘了自己何以身處此地。他覺得，彷彿自己一人蹣跚而行，他形容為，“在沙塵暴裡”。

6個星期之後，[愛未未]突然獲得一件乾淨的白襯衫，人家命令他去沖個澡，準備見他妻子。謠言瘋傳，說艾遭到刑訊，政府飽受壓力，必須駁斥。這些排場叫艾發怒，他說：“我不想見她，因為你們跟我講，我沒機會見到律師，那麼，過去一個半月我遭遇什麼，又該怎麼跟她說？”但是，他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人家跟他講，他能這麼說：他會受調查，是因為“經濟犯罪”，此外，他健康無虞，其他的就不能再多說了。

[愛未未]被捕，卻因此獲得了國際聲譽，這是他的藝術成績未曾得到的。一夕之間，他變成世界最著名的異議人士之一。支持者在各國的中國大使館外示威，他的肖像—

—鬍子、眼皮下垂的雙眼及肉肉的臉頰——被投射到建築物正面、絲質螢幕及歐美販賣的T恤上。英國雕塑家卡普爾（AnishKapoor）呼籲全世界展開抗議，另把他最新作品向[愛未未]致敬，取名為“利維坦”（Leviathan，巨大海獸）——一件龐大、紫色的裝置藝術，在巴黎的大皇宮美術館（theGrandPalais）內充氣起來。印度籍小說家薩爾曼·拉什迪（SalmanRushdie）援引藝術與暴政之間的偉大戰役——奧古斯都與歐威德、史達林與曼德爾施塔姆——而寫道：“今天中國政府已變成世上對言論自由最大的威脅，因此我們需要[愛未未]。”

中國境內，大家反應較為複雜。[愛未未]消失幾天後，一位在北京扎根、發掘中國藝術的美國經紀人在晚餐時，責備我撰寫這次逮捕的新聞。她說，“現在該退讓了。”她援引中國法律條文，即允許警方拘留嫌犯30天而不提出指控，而她預測[愛未未]將依法獲釋。她說：“別再令中國尷尬了，讓這30天程序跑完吧。”請吃晚餐的女主人，是久居中國的外國人，她對中國法院可沒那個信心，女主人對她說：“我替中國辯護已有20年，但這次怎麼也說不過去。你真是他媽的錯了。”晚餐草草而散。

事實上，令我掙扎的問題是：該替[愛未未]寫多少新聞——

或者，依次而論，又該替盲眼律師[晨光成、諾貝爾獎得主[劉小玻]寫多少。他們受到的煎熬，對我們訴說的中國真相有多少？假如一般西方消費者讀到（或看到、聽到）的中國報導每星期不超過一則，那麼那則新聞該談的，是擁有戲劇性生活的人，還是擁有普通生活的平常人？從中國寫報導，最困難的部分，倒不在指點威權官僚，或者警察局偶發事件，而是比例的問題：這齣戲有多少光明，多少黑暗？有多大程度跟機遇有關，而與鎮壓相關的部分，又有大多？局外人由遠處看，很難判斷，但我發現，就是湊近端詳也沒容易多少，原因在於端賴你究竟注意什麼，結果將有所不同。

西方記者報導的刻板觀點，在於我們太關心異議人士。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同情他們對自由民主的渴求、因為他們能說英語、懂得如何發表言論。的確，個人扛起大旗對抗政府這種活戲，本質上顯然很吸引人，而且它有助於解釋何以過去30年，中國最著名的形象不在其經濟崛起，而是一名男子在[添安門]廣場前以肉身阻擋坦克。無論何時，當我寫到人權遭欺凌，可預期的是，最批評我的反應，是來自中國其他流亡海外人士。原因我了解：外國人沒有刺探的理由，可以長年住在中國，而不曾訪問過任何曾被刑求、沒審判就被關的人；而且，對他們來說，我關注的東西不合時宜。在

紐約或巴黎很出名的異議人士，中國尋常百姓根本不認識，這一點意味著討論民主及人權，其實與一般民眾日常關心的，有所牴觸。

但那些論調對我逐漸失去影響力。一個想法的流行程度，總以很奇怪的方式吸引我，原因是中國會刪檢想法。哈佛大學研究團隊後來發現，[愛未未]被捕的新聞，是當年查禁最兇的項目之一，因此若說“中國人民不在乎他被捕”，這種說法有失公信力。

《環球時報》主張，[愛未未]的世界觀“在中國社會並非主流看法”。從某方面來看，報紙說得沒錯，[愛未未]的生活方式顯然絕非主流，但是談到他的思想，跟過去相比，就不那麼清晰了：地震倒塌的學校，吸引一般人民的注意，不光只是城市精英；而且，想讓某些中國最弱勢的人之死亡，變得有尊嚴，[愛未未]在落實許多其他人支持的想法。雖然那只是少數人，但若是無視這一人群有熱情的人的影響力，在我看來那就是誤解了中國歷史——中國歷史當中，少數人經常發揮出極大的影響力量。

能理解[愛未未]何以被捕，或者[高至盛]為何被欺虐、[劉

小玻]為什麼坐牢，這對理解中國至關重要。它能接受一個人物如[愛未未]到什麼程度，它能測量中國往現代、開放社會之路走了多遠，或者原地踏步。

隨著羈押一個月延長到兩個月，[愛未未]的被捕令中國創意界產生分裂：很多人被他的被捕嚇到了，原因在於本案顯示，不管誰再出名、關係再好，都無法豁免。但也有其他人憎恨艾對知識分子同儕的批評，認為他既虛榮又搞獨立。在北京，人們對國際強烈抗議翻翻白眼，私底下竊竊私語，說“[愛未未]與[劉小玻]當真以救世主自居了”，口耳相傳，成為流行話題。

即使對那些感到驚駭的人，[愛未未]被捕也有擴清作用；他讓他們標示出自己以為能成就的極限。我去看作家韓寒時，他對我說：“[愛未未]的消失，我們愛莫能助。”我們算在一個很奇特的場合談政治：一個上海市郊的賽車場。身材高挑的模特兒穿著單薄、用塑膠布做的衣飾走來走去；迷你裙圖案是大眾汽車（Volkswagen），露肚短上衣是起亞汽車（Kia）。韓寒穿著泛銀光的賽車服，胸腹部位替大眾汽車打廣告，袖口邊緣是紅牛廣告（RedBull），肩上則是Homark鋁合金輪框商標。我們在車隊帳篷裡，空氣瀰漫著汽油、橡膠的味道，賽車過彎的聲音好比生氣的蜜蜂嗡嗡聲。賽車手大搖大擺進進出出，掀開帳篷簾的手勢，好比老電影裡的中東蘇丹。

近幾年，韓寒與[愛未未]維持著彼此同情但頗有距離的關係。[愛未未]讚美韓寒的作品，韓寒則在他的雜誌裡，刊登[愛未未]頭部受傷後，顱部的輻射掃描圖。但此時，韓寒措辭謹慎，他說：“假如政府認為[愛未未]大有問題，就應該說出來；若是他們想逮捕他，是有這個權力。假使人人都知道發生什麼事，就沒關係。他們給的理由是

‘經濟犯罪’，你得向我們出示證據才行。”但韓寒不打算在部落格提這件事。他對我說，那麼做“沒有用”，“網管系統可以自動封鎖那個名字。”

我們聊天之際，我突然想到，中國個別人等之間，乍看之下似乎在分享想法，但有分際，很容易被忽略。幾天前，住倫敦的作家馬建才在一篇中國境外付梓的專欄裡揣測，隨著[愛未未]被捕，接下來的目標很可能是韓寒及另三位著名批評人士。馬寫道：“中共政權非到剩下來的只有其‘御用’藝術家的聲音，是不會住手的。”但是，把韓寒與[愛未未]歸為一類，說他倆是追尋政治改革的自由派，則讓深層的差異變得模糊。韓寒對我說：“[愛未未]的批評較直接，而他更堅持在單一議題。對我來說，我批評一件事，惹毛了他們，而若是他們要我停筆別再談

那件事，那我就該而批評別的。畢竟我們可以談的事有上百種。”

要替任何人能在創意生活界走多遠來算命，這不啻是在深夜退潮的沙灘上劃線，全然不切實際；政治地貌不時變動，前一分鐘還牢固的土地，下一分鐘可能就塌陷。韓寒與政府維持緊張關係，只是時而有緩和空間，而且，他決心留在自己目光所及，安全界限那一邊，沒幾個人會對此產生妄想。他的[閩全]活動從沒更進一步，由網路走向街頭，而且他反對多黨選舉的呼籲。他對我說：“黨總之會贏的，他們有的是錢，可以買票。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應當是讓文化更有生氣，媒體更為開放。”外人經常誤以為韓寒要求開放，跟赤裸裸要求民主是同一回事，但二者有根本上的不同。

6月22日，即羈押的第81天，[愛未未]獲告知，他將入獄10年——或者，若他同意接受“逃稅”的指控，當天下午就可獲釋。[愛未未]要求見律師，但遭拒絕。一個盤問他的人對他說：“你若是不簽，我們無法放你走，原因是工作無法完成。”那個瞬間讓他醒悟。他了解到：“你其實不是在跟整個體制對抗，只是在跟兩個人打交道——職階很低的人；他們不認為你是犯人，但他們所執行的任務若無法完成，他們也會很洩氣。”

要釋放他，最重要的條件是他一年內不得跟外國人交談，或者上網寫作。他簽了那份聲明。接下來他被載去警察局，他太太在那裡等他。他很驚訝，他怎麼會被放？是外交壓力嗎？溫總理正準備訪問英國、德國，兩國人民等著為逮捕[愛未未]而抗議，但官方唯一的解釋出現在國營新聞網，報導中說，[愛未未]的公司“逃漏巨額稅款，同時蓄意銷毀會計文件”，而[愛未未]能夠交保獲釋，則是因為他“認罪時態度良好，另有慢性疾病的緣故”。

他返抵工作室之際，一大堆電視攝影鏡頭在蒸熱的夏夜裡守候。他皮包骨的雙臂由破舊的藍色T恤露出來，另提著腰帶以免褲子掉下來。他瘦了20磅，而警方依舊沒把腰帶還他。記者們靠近，他讓大家見諒，因為不准對外談論。氣氛很怪異，搞不清楚這算勝利還是失敗。好比胡舒立之離開《財經》，[愛未未]的獲釋推使他進入一種代價昂貴的自由。自從黨致力於“和諧社會”——一種國家各種差異的願景——這些年來，我目睹隨著中國國內的聲浪要求更高，黨起而應對這項挑戰。對真相的追求，始於各領域的代表性機構，如胡舒立的雜誌，這些年來已擴大到個人，比如[愛未未]及[晨光成]，他們不代表任何建制，政府要想控制也很困難。接下來追求進一步擴大到包括街頭輿

論，而拜科技之賜，它已強化。

既有這麼多聲浪同時喧譁，黨的“主旋律”願景——也就是意識形態有共識，則在分裂崩解之中。中國人民彼此相尋的，不光是訊息，還有信任。微型部落格“微博”

（weibo）出現一年之後，有份研究發現：70%的中國社群媒體用戶把它當成新聞訊息的主要來源；而在美國，其使用比例只有9%。

當然，黨的終極權威具體可睹：有能力把批評它的人關起來。看著變謙卑的[愛未未]悄悄走進青綠色大門，進入他家——等候政府的下一步動作，我很好奇：黨目前是否已重拾對中國表述的權威。單靠蠻力，黨似乎又設下表述的條件。但不到一個月，我就了解自己大錯特錯。

Chapter16風暴雷嗔雷閃

北京南站的形狀像一個飛碟，從天窗透進來的光線將銀色的拱形天花板照得亮堂堂的。它和帝國大廈所用的鋼材一樣多，每年的旅客吞吐量可達2.4億人次，比美國最繁忙的火車站——紐約的賓夕法尼亞車站高30%。當北京南站於2008年啟用時，它是亞洲最大的火車站，然後上海又將這個寶座據為己有。中國鐵道部的員工數量幾乎同美國政府的文職雇員一樣多，該部已經新建或翻修了總計大約300座車站。

2011年7月23日上午，D301次列車正在最後檢票，搭乘此次列車的旅客在北京南站裡急匆匆地走著。D301次“和諧號”高速列車開往南方，在世界上規模最大、車速最快、年份最新的高速鐵路上行駛。它的目的地是2200多公里外的福州。當乘客走上站台時，他們看到的這輛列車看起來更像一架沒有翅膀的噴氣式飛機，而非一列火車：一根由頭到尾有大約400公尺長的鋁合金管，由16節車廂組成，漆成亮白色的車體上裝飾有藍色的賽車條紋。引導旅客入座的女乘務員的制服是泛美航空公司式的筒形帽和鉛筆裙；根據規定，乘務員身高至少要達到1.65公尺，還要接受訓練，微笑時必須露出正好8顆牙齒。一個叫朱平的21歲大學生坐到她的位子上，然後發簡訊給室友，說她要在鐵軌上“飛馳”回家了。“就連筆記型電腦的速度也變快了。”她說。

對於在臥鋪車廂的曹家人來說，講究的出行方式標誌著成就。這家人中的父母20年前移民到紐約皇后區，一路打拚，獲得了在拉瓜迪亞機場做清潔工的穩定工作。他們供兩個兒子讀完大學，成為了美國公民，現在回國旅遊，戴著一樣的帽子留

影，在[添安門]的毛畫像下站得筆直。他們的下一站是在福州與親人團聚。這是他們這一輩子第一次休假。他們的兒子曹立衡在科羅拉多州經營照相器材生意，這是他第一次回到這個國家。在他的成長過程中，這個國家給他的印象一直是貧窮的。

中國的火車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是落後的象徵。一個多世紀前，慈禧太后被贈予一台微型發動機，好拉她到皇城內的各處地方，而她認為“冒火的大車”極其冒犯自然秩序，將其禁止，並堅持她的車廂仍然應該由太監來拉。雖然毛主席坐著火車巡視四方（此時的鐵道有一部分是用於軍事的），但對於普通人來說，坐火車旅行仍然是遲緩、擁擠的痛苦經歷。人們給蒙著煙塵的火車按照車廂顏色取了綽號：“綠皮車”是最慢的，“紅皮車”也好不到哪去。20世紀50年代，日本率先推出高速列車，歐洲緊隨其後，而中國仍然遠遠落在後面。官方媒體對此哀嘆道，中國人均擁有鐵路僅為6公分——“不到一根香菸的長度”。

2003年，中國鐵道部長劉志軍開始負責實施建設12萬公里高速鐵路的計劃——比世界其他國家的高鐵里程總和還多。對於跟中國火車打過交道的人來說，這是很難想像的。“早在1995年，如果你告訴我中國會有今天，我會覺得你是徹頭徹尾地瘋了。”在香港工作的英籍交通顧問理察·迪·博納對我說。這個計劃總投資超過2500億美元，是自20世紀50年代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州際公路系統以來世界最昂貴的公共工程項目。

劉的野心和張揚作風為他贏得了“劉跨越”的綽號。為了趕在2008年內完成第一條高鐵線路，他趕著手下的工作人員和工程師日以繼夜輪班工作，鋪設軌道、修改圖紙、開挖隧道。他喜歡說：“犧牲一代人，實現大跨越。”有些同事叫他劉瘋子。官方新聞大力宣傳一位名叫忻力的工程師，因為他在電腦前坐得過久，左眼幾近失明。“我就是失去一隻眼睛也要工作。”他對記者說。

第一條高鐵線路於2008年6月首次試運行，它超預算75%，嚴重依賴德國設計，但在典禮上沒有人細想這些事情。幹部們流下了眼淚。當另一條線路首次運行時，劉志軍在列車長旁邊坐下，說：“如果要死人的話，我當第一個。”

那年秋天，為了抵禦全球經濟衰退，中國領導人將高鐵投資提高一倍以上，將目標調高為到2020年建造16萬公里高速鐵路，這相當於將美國第一條橫貫大陸的鐵路建造5次。中國準備向伊朗、委內瑞拉和土耳其出口鐵路技術。中國還為一條通過哥倫比亞山區的貨運鐵路繪製圖紙，這條鐵路將對巴拿馬運河

形成挑戰。另外，中國簽署了建設“朝聖特快”的協議——在麥地那和麥加之間運送信徒。2011年1月，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國情諮文講話中提到了中國的鐵路繁榮，作為證據說明“我們的基礎設施曾經是最好的，但領先優勢已經下滑”。2月，佛羅里達州州長里克·史考特以拒絕聯邦資金的方式，阻止了美國第一條高速鐵路的建設。美鐵已經宣布了一項計劃，到2040年將列車速度提升至與中國相當。

D301次列車在翠綠的稻田間向東南海岸疾馳。曹立衡坐在第二車廂最後一個隔間的窗邊，對他來說，列車似乎是在漂浮，在轉彎時劃出綿長優雅的弧線，對面不時有列車開過，兩車交會時發出嗡嗡的聲音。日落時分，一場夏天的暴風雨正在醞釀，立衡觀看著雲層中劃過的閃電。他在車廂裡的摺疊床上伸展了一下身體。他的母親直直地坐在他腳邊。她留著短短的卷髮，穿著藍白條紋的襯衫。她在美國待了將近半輩子，但仍然保持著中國旅客的習慣。她隨身攜帶著超過1萬美元的現金，腰包裡裝著打算用來送禮的玉首飾。她的丈夫坐在她對面，玩弄著iPhone。他照下一張搖搖晃晃的照片：車廂尾部的速度表上顯示著188英里（約300公里）時速折合成公里的數字。

幾公里之外，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情。晚上7時30分，在溫州市郊，閃電擊中了鐵軌旁一個沉重的金屬箱。這個箱子跟洗衣烘乾機差不多大，是信號系統的一部分，這個系統能讓司機和調度員都知道火車的位置。由於隧道阻擋了雷達信號，列車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以電線連接的設備，就比如這個在軌道邊上的盒子。它能讓司機和調度員互相交談，還控制著一套機器般的信號燈，向司機發出停止和前進的基本指令。閃電擊中箱子時，燒斷了一根保險絲，造成兩個災難性的問題：切斷了通信，並使信號燈停留在綠色。

在附近的一個車站，一名技術人員發現了鐵軌上令人迷惑的信號，命令修理工衝進暴風雨去查找故障原因；同時，他將問題報告給上海一名叫張華的調度員。曹家人所乘的火車距此仍有數公里，但載有1072名乘客、也是開往福州的D3115次列車就在D301次前方。張華呼叫D3115次，警告駕駛員：因為錯誤的信號，他的火車可能會自動停駛。在這種情況下，司機應該採取目視行車模式，慢速謹慎運行，直到再次駛入正常區段。電腦正如預計的那樣令列車停了下來，但是當司機試圖啟動列車時，雖然嘗試了許多次，列車仍然原地不動。他在五分鐘內呼叫上海6次，但無法接通。在車上，一位乘客將黑暗的車廂的照片傳到網路上，問道：“狂風暴雨後的動車這是怎麼了？

爬得比蝸牛還慢……可別出什麼事啊。”

調度員張華現在要同時應付10趟列車。他沒有再收到來自D3115次的消息，可能就認為該車已經重新啟動、繼續前進了。載著曹家人的列車已經晚點半個小時，在晚上8時24分，張華向其發出前進的許可。5分鐘後，第一趟火車的司機終於成功重新啟動了發動機，並開始緩慢前進。當他的火車到達一個正常區段時，它突然出現在整個系統的螢幕上，好像憑空冒出來的一樣，調度員看到將要發生什麼事了。它後面的火車按

綠燈信號順著鐵軌猛衝而來。調度員提醒司機：“動車301你注意運行！區間有車啊，區間有3115啊！你現在注意運行啊，好不好啊？現在設備——”線路斷了。

D301次列車的司機潘一恆是一名38歲的鐵路員工，眼寬鼻闊。在最後幾秒鐘，潘一恆扳動了緊急煞車的閘把。他的火車正在一座跨越平坦山谷的細長高架橋上，D3115次列車就在他面前，慢得幾乎像一堵牆。

碰撞讓閘把刺穿了潘一恆的身體，曹立衡被拋到空中。他的身體繃得緊緊的，準備迎接撞擊。但撞擊沒有發生。相反，他在墜落——他說不清下墜了多久。“我聽到媽媽的聲音在喊，”他後來告訴我，“然後一切都變成了黑色。”他所在的車廂和另外兩節一同脫軌，翻滾著掉到20公尺下方的田地裡。第四節車廂滿載乘客，噴出火花，垂直掛在高架橋邊，晃來晃去。曹立衡醒來時已經在醫院了，醫生切除了他的脾和一隻腎。他的一隻腳踝粉碎，斷了幾根肋骨，大腦遭到損傷。當他基本恢復神智時，他得知父母都死了。在救援和治療的混亂中，他媽媽的1萬美元也不見了。

溫州撞車事故造成40人死亡，192人受傷。政府從實用意義和象徵意義的原因出發，迫切希望儘快恢復列車運行，在24小時內就宣布這條線路恢復通車了。宣傳部命令編輯們儘可能少地關注撞車事故。“不質疑，不展開”，宣傳部在一個內部通知上發出如此的警告。當第二天早上報紙出來時，中國的第一起高速列車相撞事故不在頭版。

但是，公眾不想就此罷休，而是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為什麼。這不是一輛在偏遠地區掉下公路的大巴；這是幾十個死於國家值得驕傲的公共建設成就的人——在這個新近網路化的時代，乘客們有手機，目擊者和批評者終於有了讓宣傳者顏面掃地的工具。

公眾要求知道，為什麼救援人員取消搜索後，一個兩歲的

倖存者在殘骸中被發現。一名鐵道部發言人說，這是“一個奇蹟”。批評者一片譁然，稱他的解釋“侮辱中國人民的智商”。車禍發生幾天內，追撞事故這個主題在微博上產生1000萬條訊息，全國各地都有人寫，有人發洩情緒寫道：“一個國家如此腐敗，一個雷擊就可導致列車事故……我們無人能倖免。今天的中國就是奔馳過雷雨的列車……我們都是乘客。”

當局一度將一部分受損的列車挖坑掩埋，聲稱救援工作需要平整的土地。當記者指責他們試圖阻止調查時，倒霉的發言人答道：“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這句話在網路上爆紅，成了政府逐漸消失的信譽的象徵。列車被挖了出來，發言人被解職，最後一次露面是在波蘭工作。

數天之內，生產信號箱的國有企業為設計失誤道歉。但是，對許多在中國的人來說，把注意力只放在一個損壞部件上，就忽視了中國崛起過程中的一個深層問題在此事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普遍的腐敗和對道德的漠視已經導致被化學品汙染的牛奶進入市場，品質低劣的橋樑和公路為了滿足政治目標被匆匆建好。當國家電視台主持人邱啟明脫離台本，在電視上連續發問時，他出人意料地成了這個時刻的代言人：“能不能讓我們喝一杯放心的牛奶？能不能讓我們住一套屹立不倒的樓房？能不能讓我們走在城市的大馬路不出現突然的坍塌？”

總理溫別無選擇，只能趕赴撞車現場，並發誓進行調查。“如果在查案過程中，背後隱藏著腐敗問題，我們也將依法處理，毫不手軟。”他說，“只有這樣，才能對得起長眠在地下的死者。”人們追問總理為什麼等了5天才探訪現場，他回答說自己病得很重，過去11天一直在床上。網路上，則有人挖出那些天的新聞標題及照片，證實他在接見達官顯要，主持各項會議。

調查的首個期限到來了、過去了，而人們仍然繼續要求進行更全面的清查。在12月，當局終於公布了一份史無前例的詳盡報告。它承認“嚴重的設計缺陷”，“忽視安全管理”，在招標和測試中存在問題。報告還在政府和工業界問責了54人，以劉跨越為首。部長的名字成為“崩潰的系統”的代名詞——這是揭黑雜誌財新《新世紀》給鐵道部取的名字，它證明了這樣一種政治現實——用財新的原文說，“因為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敗，所以遏制貪汙的關鍵是限制權力”。當我同一名參與這條鐵路建設工作的工程師交談時，他告訴我：“我無法具體指出哪些步驟被忽略了或者什麼任務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完成，因為整個過程都是被壓縮的，從開始到結束。”他補充說：“在中國有一個

說法：步子太大，容易扯著蛋。”

鐵道部長劉志軍最初看起來不像是大眾會激烈羞辱的對象。他是農民的兒子，個子瘦小，視力不好，牙齒天包地。他在武漢郊外的村子裡長大，十幾歲就離開學校工作，手裡拿著錘子和測量儀，沿著鐵軌走，檢查路況。他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對權力之路的感覺。在幾個省份，一手好字是難得的技能；而劉志軍將字跡練得極好，受教育不多的上級很信任他，讓他代筆寫信。通過婚姻，他進入了一個政治關係深厚的家庭。他吹捧鐵路及自己不遺餘力，一路青雲直上，從省級鐵路局局長的位子一直坐到北京的寶座，手握大權。到2003年，作為鐵道部長，他指揮的官僚帝國在規模和獨立性上僅次於軍隊，擁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法官，數10億美元資金任他調遣。他的鐵道部是國中之國，在中國被稱作：鐵老大。

劉志軍將他凌亂的黑髮往中間梳以掩蓋禿頭，戴一副牛角材料的方框眼鏡，這種眼鏡在黨的高層幹部中非常流行，以至於被稱為“領導眼鏡”。劉志軍的一名同事曾經同他密切合作，這名鐵路員工告訴我：“從革命時代開始，大多數中國官員看起來就很相像。他們有一樣的臉、一樣的制服、甚至一樣的個性。他們循規蹈矩地工作，滿足於無所作為，坐等升遷。但劉志軍不一樣。”如果一份鐵路上的工作真能用魅力經營，他就是決心這麼做的。他喜歡半夜三更召開會議，並炫耀他的工作習慣。雖然他離權力最高層越來越近，但他從來沒有停止過對上司溜鬚拍馬。在一個夏天，當胡主席乘坐火車返回北京時，劉志軍瘋狂地跑過站台去迎接，皮鞋都快跑掉了。“我對他喊：

‘劉部長，你的鞋！別掉了！’”這個員工回憶說，“但他根本沒當回事。他繼續滿臉堆笑地跑著。”

劉志軍的成功給他弟弟劉志祥帶來了很多好處。劉志祥從進入鐵道部後就一路高升。他愛講俏皮話，個性反覆無常——就像演員喬·佩西在家庭中的角色。2005年1月，他因涉嫌以下罪名被羈押：貪汙、受賄及故意傷害——他授意謀殺一名試圖揭發他的承包商。當時，他是武漢鐵路局副局長。被害人的妻子眼睜睜看著丈夫被用彈簧刀刺死，根據一份官方法律雜誌報導，他曾在遺囑裡預言：“如果我被殺了，那一定是貪官劉志祥下的手。”鐵道部長的弟弟將火車票銷售收入的一大部分斂進囊中，積累起價值相當於5000萬美元的現金、房地產、珠寶、藝術品等財產。當調查人員逮捕他時，他住的地方鈔票亂糟糟地堆積成山，已經開始發霉了。儲藏現金是中國貪腐官員面臨的最棘手的挑戰之一，因為最大面額的流通紙幣是100元，價值約

15美元。他被判死緩，後來又減刑為16年有期徒刑。但是，他沒有在重刑犯監獄裡坐牢，而是被轉移到醫院，據說他在那裡繼續通過電話指揮鐵路業務。

在北京，劉部長被忠實的部下簇擁著。這些部下的總頭目是副總工程師張曙光，他曾經身著皮大衣披白圍巾出席鐵路會議，喜歡用“緊握的拳頭”來形容自己的談判方式。他在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任客車處處長，這個位子賦予他對巨額開支的控制權。

“事情全在他點頭。”鐵道科學研究院的退休研究員臧其吉對我說。張曙光沒有多少科研經驗，但他渴望樹立威信，讓兩名教授以他的名字出了本書，以求躋身於一個精英學術協會（指中科院）。最後他以一票之差未能當選。

劉志軍把一切都押在高鐵上。為降低通貨膨脹對土地、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的影響，他鼓吹速度高於一切。“我們一定要抓住機遇，快速推進大規模鐵路建設。”他在2009年的一次會議上說。劉志軍的野心和中國的[威全]主義是一種不穩定的組合。鐵道部是自己的監管者，幾乎沒有監督，部長和他的手下對反對的聲音毫不容忍。北京交通大學教授趙堅公開不同意快速建設高鐵，劉志軍召見了他，建議他保持安靜。趙堅拒絕服從，隨後北交大校長給他打電話。“他告訴我，不要再繼續表達我的意見。”趙堅告訴我。趙教授仍然堅持反對立場，但他的擔憂沒人理睬——直到撞車。“那就太晚了。”他說。

對速度的痴迷是全方位的。這個系統迅速膨脹，供應商生產的幾乎所有東西都能找到買家，無論品質如何。據調查，在溫州撞車事故中失靈的信號系統是在自2007年6月起的6個月內由國有企業中國鐵路通信信號集團公司開發完畢的。公司擁有約1300名工程師，但時間上的要求使其無暇顧及其他；撞車事故調查人員發現，負責信號系統的人員只進行了“寬鬆”的檢查，“未能發現設備存在的嚴重設計缺陷和重大安全隱患”。主管此事的辦公室“一片混亂”，“文件遺失”。然而，信號系統還是在2008年通過驗收，並安裝到全國各地。當鐵路界頒發當年的新技術獎項時，信號系統獲得了一等獎。但公司內部的一名工程師後來告訴我，當他發現這東西是匆忙交差的時候，並不感到驚訝。

還有其他可疑因素。2010年4月，日本東海旅客鐵道株式會社會長葛西敬之說，中國正在建造的列車大量沿用日本設計。川崎重工威脅起訴中國在進行技術轉讓時將川崎的技術說成自己的，北京的鐵道部對此抗議嚴加駁斥，稱其為“心理狀態脆弱

和缺乏信心”的表現。葛西敬之還指出，中國的列車運行速度比日本所允許的快25%。“我們絕不會令其如此接近極限。”他對英國《金融時報》說。

在撞車前的最後幾天，匆忙完工的鐵路成了這一系列原因的組合中最後一個、也是致命的因素。6月，為向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獻禮，政府舉行了最重要的一條線路——京滬線的通車典禮。施工計劃被削減了整整一年；投入運營的第一個星期中，晚點、電力故障頻頻發生。據一名鐵道部下屬的經理說，高鐵工作人員被警告，如若再有晚點情況，他們的獎金將會受到影響。2011年7月23日晚上，當列車在鐵道上擁塞時，調度員和維修人員竭力去修復故障的信號燈，而忽視了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停住列車，恢復信號。撞車事故調查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告訴我：“維修人員對自己的工作不夠熟悉，而且他們不想讓火車停下來。他們不敢。”

當撞車發生時，劉跨越已不再擔任鐵道部部長。2010年8月，國家審計署對一家大型國有公司的帳目進行審計時，發現一筆1600萬美元的“佣金”，是付給中間人的，以換取高鐵契約。這個中間人是一個叫丁書苗的女人，她也許比任何人都更能體現中國的鐵路繁榮所創造的財富。

丁書苗來自山西農村，是個目不識丁的農民，起初以養雞賣雞蛋為生。她身高1.78公尺，肩膀寬闊，講起話來像汽笛。在20世紀80年代，當鄧將這個國家轉向市場經濟時，她收購鄰居們的雞蛋，到縣城去賣。當時，這種行為在沒有執照的情況下是非法的。雞蛋被沒收了；多年之後，她還時時談起遭遇過的困窘。後來，她適時地開了一家小餐館，生意很好，她給有權的客人免單，吹噓自己的成功。“如果她有一塊錢，她會說有十塊。”丁書苗的一名長期同事告訴我，“這讓她看起來更有影響力，慢慢地，人們開始認為，他們能從與她的友情中受益。”

丁書苗的餐館成了煤老闆和政府官員經常光顧的地方，不久之後，她插手煤炭貨運。當時她做的事用鐵路上的話說叫“倒車皮”：跑關係，以低價拿到緊俏貨運線路的車皮，然後——根據王夢恕的說法——“以購入價的10倍”轉手。她同劉跨越從2003年左右開始有交情，從那時起，她利用在鐵路業務上的關係大賺特賺。她的公司博宥集團入股合資企業，向鐵道部提供輪對、聲障以及其他設備。據中國新華社報導，在兩年時間裡，博宥的資產增長10倍，到2010年已達6.8億美元。

“書苗”這個名字顯示了她的農村出身，所以在風水顧問的建議下，她改名為“羽心”。她很容易受到嘲笑——人們叫她“傻

娘”丁夫人——但她是個培育業務關係的天才。她的一個長期同事告訴我：“當我試圖教她如何分析市場、如何經營公司時，她說：‘我並不需要了解這些。’”財新網記錄了她大膽的高攀之舉。為了獲得外國契約，她投資支持一家“為國際外交官”服務的俱樂部，這家俱樂部在2010年設法請到了英國前首相東尼·布萊爾來訪。她舉辦的奢華酒會吸引了中央政治局成員。她當上了省政協委員，並大做慈善，以至於她在2010年《福布斯》中國慈善家名單上排名第六。

2011年1月，丁書苗被羈押起來，最後以行賄、非法商業活動等罪名起訴。她因付給1500萬美元給劉志軍等人，協助23家公司取得價值300億美元的鐵路建造契約，收取回扣總計超過3億美元。和其他很多人一樣，丁書苗知道政府審計人員後來才發現的事情：中國最有名的公共工程項目是一個幾乎完美的滋養腐敗的生態系統——不透明、無監督、充溢著現金，政府審計員直到後來才發現：在某些招標案中，招標期從5天縮減到13小時。而在另外一些場合中，投標純粹是走過場，因為施工已經開始了。現金突然消失已經見怪不怪了：在一個真實案例中，專門用於拆遷補助的7800萬美元憑空不見了。中間人將總款項的1%到6%揣進腰包。“如果一個項目是45億，那中間人就帶回家2億，”王夢恕說，“而且，大家會心照不宣。”

最常見的做法是非法分包。一個契約可以被分成幾部分賣出以拿到回扣，然後又被轉賣一遍又一遍，直到到達勞動食物鏈的底部——這裡的工人是廉價而缺乏技術的。鐵道部的工作可以買賣：列車員市場價4500美元，稽查員15000美元。2011年11月，一個曾經是廚師、沒有工程經驗的人被發現在帶著一群沒有技術的民工建造一座高鐵橋樑，他們在地基裡用碎石取代水泥。在鐵路圈裡，用廉價材料代替真正應該用的材料的做法非常普遍，值得用個專門的詞來描述：偷梁換柱。

有這麼多的回扣，倒過這麼多道手，一部分鐵路遠遠超過預算就不足為奇了。廣州的一個火車站預算為3.16億美元，結果花了這個數字的7倍。鐵道部是如此之大，以至於部裡的官僚會創建虛構的部門，為它們申請開支。採購是貪汙的黃金機會。該部花了近300萬美元拍了一個5分鐘的宣傳片，基本上沒有播出過。這個片子令調查人員注意到鐵道部宣傳處副處長，這個女人家裡有150萬美元現金和9本房產證。

想揭露鐵道貪腐的記者都撞到死胡同。溫州車禍發生前兩年，有位叫陳杰人的記者貼出報導，披露鐵道部的問題，文章名叫《劉志軍應引咎辭職的五大理由》，但後來文章在每個門

戶網路上都消失了。有人跟陳杰人講，劉志軍設有行賄基金，用來收買大型媒體、網站總編輯的忠誠。其他政府機構也有嚴重的財務問題——在50個機構中審計人員發現49個有問題——但在鐵路世界發生的掠奪，其規模超乎尋常。透明國際的亞

洲問題專家廖然告訴《國際先驅論壇報》，中國的高鐵形成了“不僅在中國，也許在世界上也是最大的一樁金融醜聞”。

2011年2月，火車相撞事故5個月前，黨終於向劉志軍開刀。據王夢恕說，調查人員得出的結論是，劉志軍準備用其違法所得大肆行賄，把自己弄進黨的中央委員會，最終進入中央政治局。“他告訴丁書苗：‘給我準備4億。我要撒一些錢。’”王夢恕告訴我。4億元人民幣折合約6400萬美元。王夢恕說，劉志軍實際上設法弄到了1300萬。“中央政府擔心，如果他真的成功行賄4億，那他基本上肯定能買下一個政府的位子。這就是他被逮捕的原因。”

接下來的5月，劉志軍被開除黨籍，原因為“嚴重違紀”和“對鐵路系統出現的嚴重腐敗問題負有主要領導責任”。官方媒體的一則報導中稱，劉志軍在鐵路項目中收取4%的回扣；另一篇報導說他收取了1.52億美元的賄賂。他是近五年來的因腐敗被捕的最高級別官員。但是，劉志軍的私人生活更加令人驚奇。鐵道部指責他有“不正當性行為”，香港報紙《明報》報導說他有18名情婦。據說，他的朋友丁書苗讓她投資的電視節目中的女演員排成一排，供劉志軍挑選。中國官員經常被發現犯有多種肉慾之罪，這促使胡主席在幾年前發表講話，警告同志們要抵抗“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但劉跨越和女人鬼混的形象及擁有18名情婦所需的高超後勤保障水平，讓他跨過了界限。我問劉志軍的同事，情婦的故事是不是真的，他答道：“你對情婦的定義是什

嗎？”

劉志軍落馬時，至少8名其他高級官員已被拿下進行調查，包括他整天四處吹牛的助手張曙光。當地媒體報導稱，張曙光年薪不到5000美元，但卻買下了洛杉磯附近的一座豪宅，這引發了猜測，坊間認為他準備加入捲款外逃官員大軍。近年來，將家庭成員送到海外的腐敗幹部在中國被稱為“裸官”。2011年，中國中央銀行在網路上公布了一份內部報告，估計自1990年起，有18000名貪官已逃離中國，偷走1200億美元——這個數字大到可買下迪士尼或亞馬遜公司（該報告沒多久就沒刪除了）。

我花了幾個月，就劉志軍的起落訪問了許多人，他的經歷似乎讓敵人和朋友都感到迷惑。劉志軍的對手都承認，他並不像許多貪官汙吏那樣：實際上他在在位期間做到了一些事情，並建設了一套鐵路系統——如果其中的問題能被改正，最終會使國家受益。為他辯護的人支支吾吾地說，他並沒做任何他的同僚沒做的事。一位和藹可親的退伍軍人是劉志軍的同事，他對我說，從某時起，避免腐敗對劉志軍來說變得困難："現在在體制內部，如果你不受賄，就必須得走人。沒有留下來的法子。如果我們三個人都在一個部門，而你是唯一一個不收禮的，那另外兩個人會覺得安全嗎？"

不久之前，我遇到了一個鐵路分包商。我問他，自從劉志軍倒台以來，情況是不是變好了。他毫不幽默地笑了一下。"他們表演了一番，但規則仍然是一樣的。"他說。"他們把丁書苗逮起來了，但她只是一個人。還有很多、很多的丁書苗。"

溫州撞車事故發生幾個星期後，鐵道部公布了一系列安全措施：召回54列子彈頭列車，測試其可以導致列車不必要停車的感測器；停止建設新鐵路線；命令列車將最高時速

從350公里降到300公里。但沒過多久，鐵路又恢復了快速增長，溫州撞車事故的一周年紀念活動被嚴格控制。官方媒體收到不得去現場的禁令，倖存者被警告要閉上他們的嘴巴。其中一個名叫鄧幹（音）的20多歲的男子當天試圖訪問事故發生地，警察尾隨著他，錄下他的一舉一動。"他們給我發出的信號是明確的：我現在是他們的敵人、他們的威脅。"他告訴我，"我認為他們會永遠注意我們。"

曹立衡在掙扎。他在中國的醫院躺了5個月，他骨折了，神經受損，被摘除腎和脾，只能慢慢恢復。他一次只能保持幾個小時的清醒狀態，而且神智很容易迷惑不清。回到科羅拉多的家中後，他不得不關閉照相器材業務。"其實我覺得我想死了算了，"他告訴我，"活著還有什麼意義，當你所為之奮鬥的一切都……"政府為其父母的死亡向他家賠償284000美元，另為他自己所受到的傷害賠償85000美元。8月，他和他的兄弟曹立宇飛到中國來領取父母的遺體。他們要求在福建老家村裡舉行追悼儀式，但被政府禁止了；父母被埋葬在長島的一個公墓裡。

劉志軍最後被送去受審。判決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中國審判89%是以定罪告終——但預測劉志軍命運的最可靠的依據是，黨已開始舉行其為時最久的儀式之一了。正如技術人員將政治鬥爭的受害者從檔案和畫像中塗去一樣，審查員將去年的網路內容中為劉志軍的成績歡呼喝彩的新聞報導和紀錄片統統

刪除，留下的只有一些報導他被捕的零星片段。劉跨越在中國成就史中被徹底抹掉，你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他的存在。

溫州的撞車和劉志軍的倒台成了黨面臨的重大風險的象徵。中產階級已經接受了中國後社會主義時期的政治代價：只要黨的執政能力還說得過去，就不挑戰黨的統治地位。但列車的相撞對他們是個打擊，它違反了這個協議，而且對許多人來說，它的影響就像“卡崔娜”颶風對美國人那樣：政府失敗的標誌性體現。這是個無情的判決。世界銀行駐北京的高級基礎設施專家傑拉爾德·奧利維爾指出，列車仍是在中國目前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之一。“如果你仔細想想的話，中國高鐵每年必須運送至少4億人。”他說，“在過去的4年裡，中國高鐵上有多少人死亡？40人。在中國，每五六個小時，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就會達到這個數字。因此，在安全性方面，這是迄今為止最安全的運輸方式之一。這起去年發生的事故是很悲慘的，是不應該發生的，但是，相比用汽車完成運輸任務來說，它的安全程度至少高100倍。”

然而，在中國，人們更傾向於引用一個非常不同的統計數字：在日本高鐵運營的47年中，僅有1人死亡——一名在關門時被夾住的乘客。事件發展已經很明顯了，新中國高鐵這部分，蓋得太快，恐怕不妙；而華北要建最長橋樑之一，預計耗時為3年，卻在18個月內就完工，9個月後，也就是在2012年8月，它倒塌了，造成3人死亡5人受傷。當局怪罪卡車載貨過重，話雖如此，它卻是一年之內倒塌的第6座橋。

人們已不再因中國崛起帶來財富，就心滿意足。劉志軍的倒台，讓橫衝直撞的特權文化更加劇烈。多年來，劉致力於在使國家繁榮的同時也為自己打造一個錦繡前程，他在這兩者之間失去了平衡。現在的問題是，他們的政府是否也是如此？

Chapter17發光

胡岡教我有關行賄法官的第一件事：請吃飯。“第一次邀請，大家都說不，邀過三、四次之後，人人都說好啊——一旦你們一起吃飯，就往一家人的路上走了。”一大堆人談中國的貪腐，但貪腐確切的運作詳情是如何——微妙的技巧、規矩、禁忌——對我依然是謎。這些年來，我搜集了不少資料，想了解澳門紙醉金迷的生活、搞懂劉志軍的故事，或是讀懂胡舒立的調查採訪，但我所能得到的充其量只是斷簡殘編。直到我碰到胡岡，他開始幫我把殘缺的部分補全起來。

乍看之下，胡岡並非傳授成功厚黑學的明師。我遇見他的

時候，他是位小說家——一位矮小而吹毛求疵的50歲男子，對自己女兒既感自豪、又總是不放心，他還會聽從她“午餐別過量”的提醒。但跟他同輩的許多人一樣，當機會到處都是，要想抗拒實在是不可能。大學時，胡岡讀的是哲學，畢業後他開始是在學校人力資源部工作。當中國經濟起飛，他轉行去一家拍賣公司，販賣中國古典畫作，每賣一件就能賺取佣金。有一天吃午餐，他跟我講：“我發現人們寄來給我們的畫作，很多都是贗品，這令我覺得很有意思。我想，我還是有能力以高價賣出這些東西，即便如此，我心中仍舊感到惴惴不安。”

然而，她的不安也沒持續太久。因為長期浸淫於藝術贗品的行當中，以至於最後他也試著臨摹，而且令他大為驚訝的是：他發現自己要臨摹齊白石雄渾的畫筆、徐悲鴻的寫實風格，還頗有天分。他還擴張自己的拍賣生意到法拍，法拍只要法官一簽字，就保證賣出房子、土地等資產時，就能得到豐厚的佣金。胡岡說，大家似乎都在幹，“所以，我開始想，若是他們都能做，我為什麼不可以？”

只是，誠如中國許多有利可圖的行業，競爭總是有的：很多人都費盡心思，找機會想買通少數有權力的人。胡岡馬上了解，光有天分是不夠的，他必須建立人脈，而在這方面，他幾乎是天生好手。他先以香菸打通法官，接下來請吃大餐，再去推拿按摩。沒人教他該怎麼做，但他是謹慎的人，足以學會某些重要的規矩：例如不可向陌生人行賄，以及秋天要準備現金禮，因為當時是開學季。過沒多久，他就能跟眾多法官搞上關係，有時一天安排三趟推拿按摩。他定定看著我，臉上有一絲驚恐，說：“一天三次，那可不好玩，累死人。”

千百年來，每一代中國領導人都會祭出自己肅清貪瀆的戰略。14世紀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貪官處死、剝皮，然後屍體以稻草填充，吊起來供遊客參觀。只是懲戒效果不長，高官依然是穩妥的通向發財之路的途徑，以至於在1799年，清朝貪官和珅被拉下台時，人們發現他斂聚的財富，竟相當於整個政府10年的總稅收。因此作家兼翻譯家林語堂才會有感而發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到了現代，貪腐與經濟共榮成長。1980年代，一包“雙喜”牌香菸、兩瓶“紅星二鍋頭”就足以保證能調遷工作，或者弄到洗衣機配給券。但是在1992年，政府開始開放土地與工廠的私人使用權，貪腐行為開始勃興。開始的頭一年，從貪腐案中追回的金額便增加逾3倍，成為6000美元。雙喜牌香菸開始讓位給愛馬仕名牌包和跑車，以及孩子出國讀書的學費。交易越

大，擁有批准權的幹部級別就越高，賄賂情形與金額也就節節攀升。官商彼此照應，組織成“保護傘”，走到這一步，中國學者們稱作國家“黑手黨化”。

就算賄賂一開始的影響很模糊抽象，但很快也變得鮮明起來。一案接一案，激怒中國大眾的慘事，總可追溯到貪汙、欺詐、侵吞公款。汶川大地震中倒塌的校舍，是回扣拖累的產物；溫州列車追撞，其經營者是國家最腐敗的部門之一；2008年爆發的毒奶粉造成幼兒死亡事件，企業與掮客一開始是賄賂工商檢查人員，叫他們無視摻在其中的化學物質，接下來，當孩子們病了，奶粉公司則賄賂新聞機構，叫他們壓下別報。

只要有創意，什麼都能變成賄賂。生意人安排梭哈賭局，保證官員必勝。名酒是可靠的上上之選，以至於國營媒體都承認，全國最出名的酒類“貴州茅台”的銷量，足堪代表“中國貪腐指數”。2011年，該酒銷量如此之好，茅台酒公司必須按店分配，公司還分出中國股市史上最大的紅利。

我有一次順路訪問自由派經濟學家茅於軾，他家剛好在中國最有權力的計劃部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附近。他指出，佣金總是圍繞著賣酒與精品陶瓷店。想求助的民眾都知道，去開會之前要先屯禮。這位學者說：“這些人從城外進入辦公大樓，進去時帶著大包小包，最後是空著手離開的。幹部們下班的時候，則帶著大包小包離開大樓，但他們不可能吃喝掉一切，因此他們把贈禮賣回禮品店，而禮品店接下來又把商品賣給更多來北京出差的人。我們這條街，就變成這個模樣。”

人民公僕的官方薪水是年薪2萬或3萬元，卻變得如此經常光顧古馳（Gucci）及路易威登（LouisVuitton）精品店，以至於每逢全國人大開會時，北京高端精品店就賣到缺貨（政治人物已學會，要事先打電話，保留他們最愛的物件）。有些案例當中，商人會陪官員打走道穿過，但那樣太招搖了，他可以把一張信用卡留在店內，有必要就刷。大多時候很難知道是誰付誰錢，但偶爾也會有法院案例，讓大家一窺錢是怎麼轉手的。澳門警方逮捕該特別行政區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時，他搜羅了一批“友好手冊”，裡頭就記載了1億美元的回扣。

胡岡教我行賄法官的第二件事，是有至少6個月你不會收到回報。他說：“友誼至上。友誼如此密切，你倆之間不藏秘密。”我倆聊天時，他把豬肉疊在碗裡，宛如小山。“你只有在展現忠誠之後，才能秀出你的技巧——說到做到，還有每次你都讓他覺得，付出心血是值得的。”他眯起眼，靜靜嚼了片刻，一邊想個透徹，再說：“這些步驟做齊了，任何人都能搞定，而且

關係攻不可破。”

胡岡的策略，乃是付出許多成本才學到的。在他賄賂法官的第一年，花了25萬人民幣送上贈禮、女色及請客，但5年之後，回報豐厚。他擁有廣州城內最大的拍賣行之一，存款則“寒酸”到只有150萬美元。他生活有節奏，他說：“我會睡到中午，接下來開始一天流程，包括照顧好大家的情婦。”

但即便如此，他發現仍有不足。“若是我一年賺300萬或500萬，我腦海中盤旋的，是明年怎麼賺更多？假使我是城裡第三名，我該怎麼衝到第一？這就好比你在跑步，而一旦你開始跑，就沒有停止的可能了。你只能跑啊跑啊，你不會想到此中哲學涵義，就心理學層面來說，你完全活在自我世界中。”

對外人來說，中國政治貪腐的規模，經常難以理解，部分原因在於大多數人與其絕緣。造訪中國，相形其他發展中國家，遊客不會受到海關官員、街頭警察小額索賄的困擾；外國人除非接觸到中國學校，或者公立醫院，否則他們不會感受到令人毛骨悚然的賄賂早已深入中國社會的每個角落。檯面上，中國的公立教育部分是免費、有保障的，但做爸媽的知道，要付“贊助費”，才能進入頂尖學校。在北京，那筆贊助費用高達1.6萬元——比平均年薪要高一倍不止。在一項調查中，46%的父母表示只有社會關係很強、或者財力雄厚，才能讓孩子們受到良好教育。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報告，到2011年，部處級官員（相當於市長）的貪腐速度，達到每天1個。

由於花錢買權力的現象過於普遍，2012年，全國語文權威的《現代漢語詞典》被迫增加了“買官“這個詞——花錢買官職升遷。在某些狀況下，賄賂的內容選項讀來就像餐館裡盯著菜單一樣，讓人目不暇給。在內蒙小鎮，計委一職叫價10.3萬元、都市黨書記跳價10.1萬元。這是有一定邏輯可循的，即便人民解放軍也有一大堆任命權漏洞，司令官從麾下呈金字塔狀的忠誠軍官那裡收受一大堆錢財。據說一個一星將領可收到1000萬元的贈禮與生意機會，四星指揮官則能坐享至少5000萬元。

每個國家都有貪腐問題，但中國則“發展”到“自成一格”的程度。對高層人士來說，誘惑之大，是西方匪夷所思的。哪些白手起家的人走合法之路，哪些則不，實在難說得很，但政府官職始終是穩當的發財之道，毋庸置疑。2012年，中國人大最有錢的70名代表，身價淨值約900億元——比整個美國國會議員身價加起來，要多出不止10倍。

驚人的賄賂金額，與完全不透明的賄賂內幕，兩者結合起

來所加乘的結果，破壞了黨最嚴肅隆重的儀式——2012年，照說該整理政治舞台，老一輩的高級黨官，將把政權傳遞給新一代。計劃非常精準：秋季裡某一天，新登場的領導班子將大步走上人民大會堂的舞台，站在長60英尺的萬里長城油畫前，客氣地彼此鼓掌打氣。但那一年開年快1個月，所有接班計劃開始解體。

王立軍原是西部城市重慶的公安頭子，黨媒一向謳歌他的強韌及革新，包括完美地從被處決的犯人身上挖出器官移植，但2月6日他開車逃進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尋求美國人的庇護。他對美國人說，自己發現一樁謀殺案，他把矛頭指向他的上司薄熙來一家。薄熙來是重慶市黨書記，當時是聲勢奪人的大位角逐者，有望在那年秋天登上人民大會堂舞台；被害人是當地一名英國商人，名叫尼爾·伍德（NeilHeywood），遇害時年僅41歲。尼爾·伍德的一位朋友對英國媒體形容他說：“他清白無瑕，非常高貴、博學，好像格林（GrahamGreene）小說裡的人物。”尼爾·伍德兼職替一家企業情報公司工作，公司是前軍情六處官員創辦的，而且，他在北京開的捷豹車，車牌號碼是007。朋友們認為，他更像是《白日夢想家》的主角米蒂，而非詹姆士·邦德。

那年冬天，尼爾·伍德的屍體在一家叫“南山麗景度假酒店”的寒酸房間被發現，警方說他的死因是酗酒，但王立軍告訴美國人，尼爾·伍德一直替薄熙來家工作，解決大病小痛，當他觸怒薄妻谷開來，她就叫人把他毒死。

中國精英政治裡，薄熙來是最富領袖魅力的人物，走人民路線，很會挺人。在他的升官路上，我湊巧見識過，當時他掌管商務部，等著輪到他坐上政治局位子。他是北京名人，是黨元老薄一波的兒子，身材高，相貌堂堂，鑲金鍍玉，宛如一國儲君。他的妻子谷開來是明星律師，曾出版過一本書，談自己在法院的成功——有位美國同事曾形容她是“中國的賈桂琳”。薄當上重慶市書記時，發現有機會智取那些開明改革派的對手，把自己打造成中國最像休伊·朗（HueyLong）的人物。於是他披上毛主義的大旗，召集重慶市民唱《團結就是力量》、《革命人永遠年輕》這樣的“紅歌”；他跟手下的警力發動“打黑”，逮捕並刑罰數千名政敵、巨賈及黑道人士。

我會遇見薄熙來，是因為跟隨採訪美國芝加哥市長戴雷的行程，想知道當美國政客碰到中國政治，會是什麼情景。我們在薄的辦公室外候著，他突然衝出門來，笑著與前一批訪客道別；那批高瘦的非洲團，因受到如此熱誠接待，而十分滿意。

我問倒茶的一名女士這些人是誰，“蘇丹人。”她說。

薄熙來在前門與蘇丹人揮手道別，回頭便伸手攬住下一個來賓。在我被引導入房以前，薄滿口用英語表示歡迎，對一個中國官員來說，這算是罕見的本領。最後我看到他坐在戴雷旁邊，兩相對照下，戴雷像個來自芝加哥南區的消防栓，而薄熙來看起來則像個電影明星。

要不是公安頭子王立軍叛逃，這世界可能永遠不知道薄熙來跟他所打造的王國，究竟做了什麼事。但王立軍的揭發令人震撼，到最後，美國人並沒有給他提供庇護，他絕望地走出領事館，落入中國當局手中，後來被控以叛國罪及受賄罪——對任何考慮叛逃的人，這是很明確的訊息。但王立軍的事，紙包不住火，終於流傳出來，中國權力核心的某些迷思，已開始受到侵蝕。

王立軍到底說了什麼，謠言快速傳遍大街小巷及網路。黨的網管想把它們除掉，但是，對薄熙來造成的政治傷害已經有致命影響。兩個月內，薄被拔官，政府打算以受賄、濫用職權等罪名起訴他。黨煞費苦心，想在好像追求司法正義、又能避免不合宜的細節被公開，這兩者之間求個平衡。在為期一天的作秀式的審判裡，薄妻谷開來因殺害英商尼爾·伍德而被定罪。谷現身法庭時，看起來比她的照片胖很多，中國觀眾揣測，該被告是個替身，被收買來定罪的。無論政府出多大力氣否認，這個疑惑徘徊不散。自由派評論家章詒和寫道，“這讓我們想到了喊狼來了的男孩，一再說謊，直到沒人相信他，最後他也被狼吃掉了。”

薄熙來倒台影響深遠。僅舉其一，薄的事件讓中國公僕謙卑清廉的形象分崩離析。當時的官方薪水相當於每年1.9萬美元，他的親人經查出所做的生意，價值估計超過1億美元。

對外國生意人來說，尼爾·伍德的下場令人心生挫折，這提醒他們，儘管中國經濟環境有所開放，但黑社會的癖性依然潛藏在表面之下，偶爾會爆發出來。有位英國廢五金商人斯里拉斯塔夫（AnilSrivastav）對我談到，有一次他與人談判一批廢金屬，過程火爆。他說：“這些人進門，把我拖出去，我大喊：‘救命哪！’但沒人理睬。他們把我塞進汽車帶走。”他後來獲釋，但不禁想到，“以前這些事情，我只是在電影裡才看得到。”

對中國民眾來說，薄熙來倒台，另蘊含一個更強烈的信號，讓他們思索周遭瀰漫的訊息：一個他們在網路上上傳來傳去的謠言，網管譴責並刪除的東西，一夕之間改頭換貌，變成

事實。微博上有位名叫“Jieyigongjiang”的用戶，他寫道，“‘國際反動勢力’散播的攻擊，現在竟變成真相。那麼，外媒揭露的‘真相’，哪些是我們應該相信的呢？”

醜聞正成為中國崛起的警鐘，以往保護中共領導人免受仔細審視的神秘簾幕，被科技、財富和瞠目結舌的草率舉動共同拉開了。外界已經得以窺其面目。一位默默無聞的共產黨官員韓鋒，在日記裡記錄下自己擔任廣西省來賓市菸草局長的生活，為期兩年，內容共有500多件事。韓鋒的日記被洩露到網路上，裡面記載的生活充斥著宴席、婚外情、休閒商務旅遊，穿插著共產黨的老規矩。過完一個平常的上班日之後，他寫道：

“11月6日，星期二（晴，氣溫攝氏11度到25度）：上午把“文明禮貌”的講座整理一下。中午廈門的李德輝等來，陪他們一起吃飯，喝了酒。下午在宿舍，晚上又和黃桂廷等吃飯，喝了不少酒。黃等明天去重慶和成都，讓阿蘇和譚善芳去。10點多譚善芳開了個車過來把我拉到她家，和她做了3次愛，天亮還做了一次，沒射。”

日記洩露後，韓鋒於2010年3月被捕，受審後判刑13年，罪狀是受賄10萬元及房地產。在政治食物鏈裡，他只是一條小魚，黨很高興把他丟出船外；而我讀他日記時，最驚訝的是那種司空見慣的語調；韓鋒之突出，不在於他是個惡棍或政治家，只是個尋常男子，盡自己所能攫取體制內的好處。公款的濫用以“三公”最為出名——旅遊、吃飯及汽車，財政部估計，這些支出讓國家付出了140億元，超出國防預算的50%。那年最後一天，菸草局長韓鋒對自己生活做出評價：

“2007年過去了，這一年我的工作更順手了……我在員工裡的威信高，今年更是全面完成任務，收入又高達20萬元，明年預期更好。有鑑於此，回不回區局我都無所謂了。能再幹兩年直接回區局幹個閒職再內退最好。今年兒子又爭氣，得到了保送研究生，不用考了，兩年後他找工作會容易得多。今年自己玩相機玩出心得，今後就會好好地玩到老。玩女人這方面，終於玩了楊淑紅，又和小盤玩上了，還固定和譚善芳，還有個莫瑤待玩，今年真是交了桃花運，女人多了就是要注意身體。”

日子久了，中國部落客學會鎖定官員照片，找出花費嗜好與官方薪水不匹配的證據。他們貼出警察局漆成藍白色的瑪莎拉蒂和保時捷的照片。他們指出，有位地方房管局局長叫周久耕，經常被拍到抽一包值24元的香菸，而在一場賄賂調查之後，他被送去坐11年牢。有位部落客專長揭露疑有昂貴名表的黨同志，博得“腕錶看門狗”的名號。

網管儘可能地監視網路，但每個新案子，就讓一個始終保證“先苦後樂”的共產黨形象被撕裂一個洞。每樁不堪入耳的新案子，聽來越像是“常規”，而非特例，而且，每個新細節，都凸顯黨表面正經八百，但表層底下未經修飾的現實，兩者之間存有鴻溝。有位女子常艷上網描述自己與上司、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有染——諷刺的是，衣俊卿正是研究馬列正統學說的專家。這位情婦描述自己怎麼付他錢，買到中央編譯局的工作，還貼出長達3年的手機簡訊內容，用了12萬字長篇敘述他們打情罵俏的細節。

另一個風波，則是由待修電腦中的外流照片所惹起，內容是5名男女在飯店狂歡時，扭成一團的情景，網友很快就認出幾名政府官員的臉孔。問題不在於尷尬，而在於偽善。一個縣級政府決定，把本案宣稱為認錯人，而《人民日報》以“裸男並非我們黨書記”為新聞標題來總結（但結果證明是他沒錯。）

我想趕上時代，還真有麻煩。在這個一胎化國家，有個山西官員被逮到有妻子4名，小孩10個。還有個黨書記叫雷政富的，在一個年紀只有他1/3的女子身上“努力耕耘”的影像畫面，當然，事有蹊蹺，女人是當地房地產開發商雇的，誘惑雷某，以便勒索他。在網路上，因雷某長得肥胖如蛙，中國網名把他的照片，跟《星際大戰》裡的赫特人賈巴（JabbatheHutt）擺在一起，極盡酸諷之能事。

在我放棄、不再追蹤這類報導之後，讀到的最後一案，與新疆省烏蘇市公安局黨委書記有關。此人經發現同時與兩女談戀愛，還把她們提拔到警隊，並用納稅人的錢，租一套公寓供姐妹居住。在此氛圍下，公安局發了一份大概自覺是好消息的澄清稿：齊放局長的兩個情婦不是孿生姐妹，只是姐妹而已。我讀到這段細節時，午餐吃不下了，抬頭眨眨眼，等著消化新聞：“只是姐妹”這個辯護，似乎為中國公僕的形象，設下新的分水線。

這一委婉說法是如此荒謬，以至於大家很容易忽略一件事，就是它腐蝕了黨統治的基石之一：幾千年來，中國統治者仰賴“德治”這個觀念。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與此類似的是：共產黨的威信大力仰仗一個觀念：即使地方官僚腐敗，最高領導層是如此躬行智慧、公正及精英領導，以至於異議與直選，相形就變得膚淺、過時。國家主席胡錦濤說，“培養個人道德廉明，可視為一個誠實

官員的最基本品質。”政府被視為違反“德治”原則時，群眾的反應可以十分激烈：1980年代，[添安門]發生抗暴，很大部

分的起因，即在於貪腐橫行。

在最近暴增的貪腐中，反映黨的美德問題最深刻者，大概莫過於一支影片，儘管有些片段很俗氣，但令中國人民深深著迷：記者們詢問一群六歲孩童，長大想當什麼，孩子們快速地講出很尋常的人生志向：消防員、飛行員、藝術家……直到有位小男孩說：“我要當官。”“哪種官？”記者問道。“貪官，”男孩說：“因為他們能有的東西很多。”

黨官斂聚非凡財富的新聞，來到前所未有的層級。2012年6月，“彭博新聞”運用企業財報及訪談，計算即將成為中國國家主席的習家族累積資產價值在數億元。那麼多的財富，黨很難解釋，於是決定不解釋：24個小時內，政府就封鎖彭博網站——在可預見的將來，它在中國會保持封鎖，而且禁止中國的銀行與公司跟彭博續約，使用其終端機。這使彭博賠上數百萬元銷售與廣告的代價。

隨著中國領導人受到壓力，某些他們的支持者們對於新聞爆料怒火中燒——而且這股怒火以奇怪的方式迸發，延燒到我們的生活。我太太貝莎娜在一家非營利教育組織工作，一天下午，她接到一個在工作上認識的女人打電話來，對方是一位中國教授之妻，與黨關係密切。他們這對夫婦很世俗，有個孩子讀常春藤名校，另與高級領導關係深厚。她要貝莎娜到臨近商場去聊聊，她們在Apple專賣店旁的星巴克，那女人詢問貝莎娜，我的記者工作是什麼樣的內容，還有，我跟傅才德（MichaelForsythe）是不是朋友；傅便是寫作習家族詳細財富的彭博社記者。她有個警告，要貝莎娜轉遞給我，再由我轉給傅才德。她說：“會發生事，看起來會像是意外，沒人曉得事實，人家只會發現他死掉了而已。”

貝莎娜這方面的經驗有限，於是很困惑。這是真的嗎？那女人幹嘛把這個告訴她？貝莎娜儘可能消化她所聽到的，再問那女人，幕後發出威脅的是誰？那女人說：“不是他家直接講的。”這個他，指的是習主席。“是他身邊想顯示他們忠誠的人。”

我打電話給傅才德，在歐洲找到他，他帶妻兒度假去了。他對我說，這個威脅他也收到了，通過另一個中間人。他以前見過教授的老婆，原因在於她是習主席家族成員的公關顧問。現在他不知如何思考了。她是想幫他？還是她想把他趕出中國？習家財富的新聞，是個公關大災難，逼他離開，可能是想防止進一步的揭露。現代媒體與黑道政治，在此交叉起來。

替彭博工作的安全專家調查這項威脅——進行訪問，調查關係——最後他們斷定，傅才德一家人可以安全返回北京。但這件事令人難忘。一年之內，他家就離開大陸，搬去香港。

假如這些威脅及報復，用意是想叫人別再去挖不喜歡的訊息，那它們並未得逞。同年10月，《[扭腰]時報》靠著企業記錄，計算出溫家寶擔任國務院總理那些年，他的家族斂聚了價值27億美元的資產。溫家寶以前並不以財富出名，老爸當過養豬農，老媽是個教師，但此時溫家的財富已經大到足以讓《福布斯》列入全球最有錢家族排行榜。

這則新聞，讓共產黨念誦的真言之一，為之破產。共產黨老愛說，在他們當權以前，中國是由四大家族把持，而黨把那些財富還給人民。現在態勢越來越明顯：末代王朝結束100周年的此時，中國正倒退回某種形式的貴族統治。特權與自肥的規模之大，對溫家寶的聲譽造成特別難堪的打擊，因為他一向擺出自己是黨內自由派旗手的姿態。

溫因為關心窮人，博得“溫爺爺”的暱稱，他曾說：“我經常講，我們不僅應該讓人民有言論自由，更重要的是，我們創造條件，讓他們批評政府的工作。”然而，他家族財富被揭發的當天早上6點，他的政府就封鎖了《[扭腰]時報》——而且，《[扭腰]時報》跟彭博社一樣，會一直被封鎖。

封鎖某些世上最有影響力的新聞來源，恰足以反映這是多麼強烈的一招，共產黨有多麼情願把它的人民與世隔絕，以保護它自己；現在它禁止人民看的有臉書、推特、《[扭腰]時報》、《彭博新聞》等等網站。在線上，網管你追我趕，以保護溫總理的形象，方法是刪除新的字詞結合，包括“總理＋家族”與“溫＋數億”。

受矚目不只是金錢。人們記錄下官員的生活，比起百姓的生活，真的是“健康”多了。有家空氣清淨機漫不經心地激起民眾譁然，原因是他公布出來的促銷訴求，指出中國官員在首都周遭與世隔絕的辦公室裡，是借助200台高級清淨機來呼吸。該公司說：“創造潔淨、健康空氣給我們國家領導人，是人民的福氣。”就在人們在費力了解那個福氣之際，他們有聽說有個“特殊農場”網站，專門提供黨幹部安全食材——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一份報告估計，中國每年有3億人因食物導致疾病而受害。在《南方週末》記者寫了“特殊農場”之後，全國總編輯接獲警告，以後不准他們再那麼做了。

胡岡教我有關行賄法官的最後一件事，實在很值得。5年

後，他在一次例行的掃蕩法院貪腐中被逮到。那次總計140名法官被抓，包括該省最高法院院長。胡岡被判有罪，坐牢一年。

他出獄時，以筆名“浮石”出版一本小說，接下來又一本，當我2012年遇見他的時候，他正在寫電視劇本。對自己的經驗，他已形成結論。他因為消化午餐而眼神呆滯，塌在椅子上，坐得很深，對我說：“即使我們有法律系統，各式各樣法規齊備，執法卻是選擇性的。法規對立法者有利時，他們就用；若不利，就忽略掉。制定規則的人說：

‘我才是唯一真法，而且我最有權。’這個人人皆知。”他笑了。他說，中國是依“不成文法”運作的，“向來如此，只是問題近些年變得較突出罷了。”

在大多數國家，強賊統治的長期影響，很容易預測：經濟學家計算，若在1-10的量表上，國家貪腐每升一級，其經濟成長就掉1%——想想杜瓦利埃統治下的海地或蒙博托治下的薩伊（現在的剛果共和國）就知道了。但有些特例，反而是最重要的：在日本與南韓，貪腐陪同每個國家崛起，而非崩潰，美國更是最顯著的例子。提倡第一條跨大陸鐵路的人，被發現興建鐵路時自肥——1872年通稱“動產信用公司”醜聞爆發，媒體把金錢被掠奪的規模，描述為“殺傷力最大的揭示官商勾結的邪惡與貪腐，赤裸裸攤開給全世界瞧”。1866到1873年間，美國鋪下3.5萬英里的鐵軌，造就龐大財富，但也誠如馬克·吐溫所述，上演了“丟死人的貪腐”。鐵路大勃興太超前，導致“1873年大恐慌”以及接下來的金融危機，再來才有矯治弊病的政治壓力，而在“進步時代”大有進展。

貪腐會如何影響中國的未來，有兩種基本看法。樂觀派認為，這是由社會主義轉型到自由市場必然會有的事，而且即使如此，中國還是造出公路、高鐵，即使是發達國家也羨慕和嫉妒。時任美國運輸部長的拉胡德（RayLaHood）對一位記者說：“中國較為成功，是因為他們國家只要3個人就能決策，在我們國家，要3千人。”學者裴敏欣就沒那麼樂觀了。他對我說，作惡的共產黨員裡，只有3%到6%被起訴，而真正定罪抓去坐牢，又只有1/3。喬治城大學研究中國的政治科學家魏德曼（AndrewWedeman）研究過日本與南韓的等級恩酬制度後，再檢驗賄賂與起訴的形態，期望發現中國貪腐的機制。只是魏德曼的結論說道，“證據顯示，當今中國的貪腐，根本上是無政府狀態。”他寫道，“中國的貪腐，更神似薩伊，而不是日本。”但是，跟薩伊不一樣的是，中國還是處罰了很多貪腐的人：5年當中，中國懲罰了66.8萬名黨員，罪名是行賄、受賄及侵吞國有

資產，因貪腐被判死刑的有350人，於是魏德曼評論說，“在很基本的層面，這麼做似乎能遏制貪腐免於惡化到失控。”

較悲觀的看法認為，中國貪腐造成的威脅不在經濟層面，而是政治。以此看來，中國百姓與其領袖之間的結合程度，正在損壞之中，統治階級正在儘可能搜刮最後幾年的經濟成果，而黨比起前蘇聯，由內而外改革自己的能力也沒有加強。薄熙來醜聞後，幾名中低層黨員開始懷疑起黨的體質。4名退休官員簽署公開信說，“如果黨的最高層，都捲入邪惡程度更甚於《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那麼本黨是何容貌？”他們寫道，新領導班子“必須公布……他們私人與家庭財產”。中國領導人相信，政治改革將導致動亂，但他們是否相信，什麼都不做也會如此嗎？當經濟繁榮時，即使貪腐明目張膽，人民都可以忍受；可是，成長減緩時，同等級的貪腐還能讓人忍受嗎？

我問胡岡，他是否認為中國終究會成長，擺脫其貪腐狂潮，一如美國與南韓。他沉默了一陣子，然後說：“我把我們社會看成一個巨大的池塘，多年來，人們一直把它當廁所用，只因我們能那麼做。而且，即使池子越來越髒，我們還蠻享受那麼做的。可現在我們要有人，能夠挺身而出，告訴大家：池子已經被汙染了，你們再繼續汙染下去，就沒人能活下去。”

Chapter18硬道理

英語教主李陽正在四分五裂。我見過他之後幾年內，曾目睹多批學生獻身於“瘋狂英語”，而與此同時，李陽變得越來越怪異、好鬥。2011年，東日本大海嘯，造成數萬人喪生，因日本二戰時曾侵略過中國。他把這起天災稱為“神的小小懲罰”，一位上海部落客稱李陽是“大明星神經病”。

這麼多年來，李陽獨有的神智、最說服人的證據，是他不斷支持自己的妻子李金，可是在2011年9月，她控告他家暴，訴請離婚。在一個配偶暴力很少見諸公眾的國家，這則新聞很快登上全國媒體。李陽對一名當地記者說，“我有時會打她，但從沒想到她會公開，原因是把家庭衝突公開給外人，這不符合中國傳統。”接下來幾個月，李金不可思議地崛起為偶像，中國媒體形容她是“中國受虐妻子的草根英雄”。

李陽的生意撐過這次醜聞，但他的聲譽受損，事業面臨轉折點，年輕男女曾對他那麼信仰，現在則十分困惑。我認識的那位李陽學生張麥可一天早晨打電話給我聯絡感情，他說：“他打老婆那麼兇，他不是個好爸爸，不是值得追隨的好老師。我恨——”他停了下來，再說：“不對，我不該說我恨他。”

幾個星期後，我到華南，坐大巴出城去看麥可跟他爸媽。他們已經搬離廣州市淘金路的公寓，住到臨近較小的清遠市，車程只有1小時，但清遠感覺上較為灰撲，更像農村。清遠還沒有高鐵直通省會，我在巴士站等候麥可時，身旁站的一位男子，削了根樹杆，挑在肩上平衡其行李。麥可抵達時，戴的耳機時髦地圍在頸上，穿著流行防風上衣，看來很不搭調。他打量一下我身旁光景，似乎急著用較為現代的眼光描繪他住的新地方。他說："3年後，這裡會變成國際都市，我討厭廣州，那裡滿是壞人，我被搶了3次。"

我們坐計程車過城。他跟父母住的地方，或許可以稱為陶瓷區，因為街道兩旁店面都在賣水槽、馬桶及浴室瓷磚。路上散布著各種顏色的瓷磚碎屑。公寓位於灰色水泥住宅樓的8樓，沒有電梯，我們爬梯而上時，聽得到遠處蓋房子的回音。這裡沒他們廣州住處那麼精雕細琢、都市化，但空間較為寬敞，麥可有自己的房間。貼在牆上的自勉標語有他往常的樂觀，但混雜了一絲挫折。其中一張寫道："心理上，我必須改變自己的一生命運！"另一張則寫著："我再也受不了了！"

他的衣櫃上有個很大的瓦楞紙箱，潦草地寫著："瘋狂英語"。我問箱裡有什麼，麥可嘆氣了，他說："李陽真會賣東西，他說服我愛上'瘋狂英語'達9年，他深入我的靈魂，我完全變成怪人。"他笑了，接著說："'瘋狂英語'的學習法很爛，很多學生來找我說，'我花了9000元，但我的發音依然很破。'"

教英語生意不好做。麥可借錢開始"基礎英語"之後，公司營運了兩年，只是最後合夥關係惡化了。麥可一直負責銷售業務，但他的招生成績不好。2011年1月，生意倒閉，麥可破產兼負債，他兩個星期在父母公寓裡來回踱步，心情很糟，思索已發生的一切。他對我說，這次經驗讓他學到無情的教訓：靠人不如靠自己。

而他會搬離廣州，是為了省更多錢，此時，在清遠這間8樓無電梯公寓裡，他制定了新的計劃：打算寫一本英語教科書。他說："我的夢想是改變整個漢英教學系統。"他深信，如果有人給他機會，他能寫出很成功的書。他說，"我有實力，我是無可取代的。"而我則聽見他內心的回聲，他說："你能相信嗎？"

午餐做好了，我們擠坐在客廳的餐桌旁，牆壁上掛的肖像人物在較勁：麥可的房門外，他還貼了一張李陽的海報；而在他母親臨近的牆上則掛了幅標語寫道：基督是撐起一家的柱石。她已改信基督教。而談到基督教，麥可看得很開，他說："我只從各宗教取其精華。"

麥可急著跟我講他的寫書理念，他想克服他蔑視為“考試英語”的難題，也就是許多中國學生為了通過大學入學考試，而學習的那種矯揉造作的語言。

他滔滔不絕地唸出一大堆例子：“懂了。起床。筋疲力盡。振作起來。伙伴，讓我休息一下。伙伴，我搞不懂。伙伴，我真不知道。伙伴，住嘴吧。”他還標出800個單詞，讓他的學生一再復誦，以磨練發音。他展示他的技巧時，聽起來宛如用單句道盡中國現代史：“我能，我能，我能，我能。受苦，受苦，受苦，受苦。有，有，有，有。”

我注意到他的父母在看著他，感覺上他們對此已經習慣了。他已把他們家變成“英語為第二語言”教堂，儘管二老跟他們同代大多數一樣，不懂英語。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相信兒子做的是有價值的。

當天下午稍晚，麥可、他爸媽跟我去看他們最自豪的新財產：一間興建中的公寓，要給麥可與他希望有一天找得到的妻子。我們走過陶瓷區，麥可的爸爸穿著軍中剩下來的迷彩鞋，與瓷磚碎片很合襯。我們抵達一棟高而不寬的高大建築，有現代大廳，光滑整潔，迷彩鞋突然看來不合時宜。大廳中央排放著沙盤，裝設微小能發光的燈，棕櫚樹下還有塑膠小人偶。大廳兼做售樓部，但當天沒有人來；中國經濟在減速，清遠市房地產榮景不復。我們本想去看他們的新公寓，只是大樓還沒完工，電梯的面板連著電線垂掛著，看起來不怎麼安全。麥可戳了戳了無生氣的按鈕，然後提議我們去看看樣板間就好了。

樣板間的四壁只有水泥，意味著未來不是前途光明，就是整個建設工地陷入麻煩。我們往外走到陽台，往下可看到一個湖泊。從18樓俯瞰，底下的人看來就像大廳沙盤上的人偶。麥可與他雙親買得起的公寓，在工地的另一邊，瓷用品店那一側，不在湖濱。我們走回電梯，麥可似乎心有所感，他用英語對我說，不讓他爸媽聽懂，他說：“我不想住這裡，我會把爸媽安置在這裡。我必須回到像深圳、北京或上海的大城市，清遠太鄉下了，一個二線城市只學‘考試英語’，這裡的人夢想不大。”

這麼些年下來，我感受到其他跟麥可一樣努力的青年，也越來越感挫折。低技術工作倒不成問題——工資在上升，但白領工作不足以僱傭每年造就的600多萬大學畢業生。

2003到2009年間，移民工的起薪成長近8成，但大學畢業生的則停滯不前。你若考量到通貨膨脹，會發現他們的收入反而減少了。努力的中國年輕人極力想“車房齊備”——找到配偶，

奮力上升到中等收入階層，然而此時才了解到真相：中國新創造出來的財富，分配極其失衡。2012年時，中國城市一間標準公寓，售價為全國平均年收入的8-10倍。即使在美國房地產泡沫的高峰，這一比例最高也才5：1。年輕人用一種方

式自嘲：男人沒有致富人脈，或者沒錢可結婚，便自稱為“魯蛇”。這些年輕人成長於自我創造的時代，手機行銷時強調“我的地盤我做主”，學校誓詞告訴他們，“我是大自然的偉大奇蹟。”叫他們大夢初醒的理由很多，時序到挑選2009年年度漢字時，網民選擇了“被”字，即被動介詞，如用在“被炒魷魚”或“被虐待”。

一種的新的情緒在發酵：中國經濟勃興，幾乎讓人人在某種程度上比以前好過——過去十年，平均收入增加3倍以上——但貧富差距擴大的程度，則令共產黨始料未及。

2001年，當人家詢問說話耿直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他是否憂心貧富差距擴大會導致社會不安。朱說，“不只如此”。他援引用來測量收入分配、通稱“基尼係數”（Ginicoefficient）的數據，其範圍可以從0到1（而1便是貧富差距達到極端）。中國官員預測，只要基尼係數維持在朱鎔基稱為“危機線”的0.4，中國就不會動亂。然而11年後，這個數字已變得如此之大，以至於政府乾脆停止公布，聲稱富人把自己的太多收入隱藏起來，因此本統計數據不再可靠。

貧富差距可不是什麼抽象概念：一個出生在偏遠青海高原的孩子，5歲前夭折的機率，是北京兒童的7倍。政府被迫有所行動，它本可以改革稅制——中國還沒有資本所得或遺產稅——但它沒那麼做，而是採取更直接的策略：2011年4月，北京禁止公司在名字或廣告中使用“豪”字，叫價31.4萬美元的“黑天鵝豪華蛋糕”，必須改名為“黑天鵝藝術蛋糕”。只是，最終這項禁令沒持續下去。

在多年不敢測量基尼係數之後，2013年1月，政府終於公布一次數值：0.47，但許多懷疑的人嗤之以鼻；經濟學家許小年說它是個“童話”。有項超然的估算，把數值確定在0.61，比辛巴威的水準還高。然而，儘管都在談收入不均，情勢越發明顯的是：人們最最在意的，是機會的不平等。

2009年，哈佛大學社會學家懷默霆（MartinWhyte）調查中國民眾，他發現令人稱奇的事——人們對財閥政治的崛起，容忍度很高。大家憎恨的是讓他們無法加入的種種障礙：司法軟弱、濫權、求助無門。張應強及易利森（TorEriksson）兩位

學者從1989到2006年間追蹤中國家庭的生計之道，發現“機會不平等的等級很高”。他們寫道：“市場改革背後的理念，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接下來這批人再帶動其他人也致富。我們的分析顯示，至少到目前為止，改革少有跡象顯示，整個競爭場地已經掃平障礙，變得公平。”他們發現，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父母的教育是決定孩子未來能掙多少錢，最重大的因素。但是在中國，該決定因素變成“父母人脈”。別人做的另一份研究，對象是中國城市親子，發現“代際流動性低得驚人”，報告寫作於2010年，作者們進行排行，說“中國都市是世界上社會流動最低的地方之一”。

甚至這些統計數據還沒出現、加以佐證之前，人們已在描述自己社會浮現的新區別；不僅分析BOBO族、丁克族及新中等收入階層的區別。此時還出現一條界限，劃在白領階級與人稱“黑領階級”之間。有位匿名的作者流傳一篇文章，定義“黑領”為：“他們穿黑衣裳，他們開黑色汽車，收入不為人知，生活不曝光，工作不為人知。有關他們的一切，都諱莫如深——一切如此神秘，宛如站在暗處。”

隨著發跡機會變小，白手致富的魅力喪失不少。黃光裕是電子業大亨，曾位列中國首富，因為內線交易等罪名，被判刑14年。在8年之間，當局至少處決14名億萬富豪，罪名從老鼠會到雇兇殺人不等。袁寶璟曾是股市經紀人，40歲之前便賺到30億人民幣，因安排殺手去殺一名想勒索他的人，而被處決。因此年度富豪排行榜被戲稱為“死亡名單”。

垃圾皇后張茵碰到的麻煩種類不同。在她被歌頌為世上白手起家最有錢女人不到一年之際，名聲在中國開始變糟。一個名為“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的勞工權益團體發布“血汗報告”，指責她的玖龍紙業虐待勞工，包括工安意外、安全設備不足、歧視B肝帶原者。該團體出版《玖龍紙業員工手冊》部分內容，其中有“尊敬領導，遇見高層領導時停止走動，向他們問好。走在一起時，要走在高級領導後面。”員工很容易被罰款，處罰範圍很廣，比如從公司巴士往窗外吐痰或者在員工餐廳插隊，罰300元；打瞌睡、允許外人來參觀工廠或打麻將，罰500；組織罷工或“散播謠言傷害公司”，罰1000元甚至開除。手冊另指出，工資為機密，“透露人的薪水”或者“問別人”薪水多少，都構成開除的理由。

一家報紙援引美國鍍金時代的剝削行為，譴責張茵“點血成金”。人們指出，她有一次說，“假如國家不是貧富皆有，那麼不會強大富裕。”一本著名周刊《三聯生活周刊》這樣寫道：“如果

張茵識趣的話”，她就該主動請辭全國政協委員一職。文中還說：“玖龍紙業生產出的每一張紙……都浸透了造紙工人們的鮮血。”即使某些最賣力鼓吹自由市場的人，都感受到某個時代已一去不返了。《中國企業家》雜誌在一篇論張茵的報導裡宣稱，“在五年前的中國社會，或許一家公司因創造成功生意，而在其他方面並不完美，還可以被容忍、被崇拜。可是，如今世事已經改變了。”

報告出現時，張茵憤怒回應說：“我們變得有錢，是因為我們找到了變廢為寶的商業模式，而不是嚴厲對待員工。”她說，公司給予員工的獎勵，遠比罰款多。而且她質疑這家勞工權益團體的政治動機，稱它“收受歐洲給的錢”。

我跟她談到這件事，張茵告訴我，玖龍已廢止向員工罰錢的做法。通常一個較懂得盤算、八面玲瓏的董事長，會說到這裡就停了，但張茵推開她的椅子，解釋說，事實上她依然相信，罰款在條件正確時，是合理的手段。她說：“假如你不制定罰款規則，工人們會漫不經心，搞到受傷，再回頭要求更多賠償。”廣東省工會經調查後，儘管批評玖龍紙業的處罰體制和其他管理措施，但聲稱玖龍“是家相當不錯的企業”。這實在無濟於事，張茵的評論，還有工人權益團體的報告，全力讓她的公共形象大打折扣，她已變成放肆資本主義時代的梟雄。

我在中國住得越久，情形看來似乎越是如此：人們已看出經濟勃興有如一列座位有限的火車，對那些已找到座位的人——原因在於他們上車較早，家庭正確，有付賄賂——進展超乎想像；但其他人只能靠自己雙腳所及，能跑多遠多快，就跑多遠多快，只是最終，他們只能望著火車消逝於遠方。

這種挫折感，在極端時像是炸藥。到了2010年，罷工，暴動及其他“大型群眾事件”在近五年中增加一倍，成為一年18萬件。據政府統計數字，幾乎一天500件。2009年7月24日，吉林省的鋼鐵工人因為害怕被裁員，於是攻擊總經理——一位名叫陳國軍的大學畢業生。他們用棍棒及磚塊把總經理打死，而且圍堵公安及救護車。黨結束類似的動亂時，經常說毛病出在“群眾不了解真相”。但似乎毛病就是真相本身，情形似乎越來越是如此。在某種程度上，鄧小平制定的全國大跑步比賽有人作弊，賽場不僅不利於尋常人，甚至可以說玩的不是相同的比賽。

2010年1月，一位名叫馬向前的富士康員工從工廠宿舍樓頂跳下。他在組裝線上每週工作7個晚上，每班11個小時，但接下來被降級去掃廁所。馬死後幾個月內，富士康另有13名員工自

殺。人們懷疑自殺是不是像瘟疫一樣會傳染，而且指出，一個工廠大如城市，按理，成串自殺依然會以這種速度發展下去。

富士康後來在其建築物樓頂安裝圍欄，而且為員工加薪，自殺案件銳減之快，一如其發生之速。局外人很快就想像，這又是一家血汗工廠了，但如此解說相當不正確。富士康請心理治療師到廠，為員工診治，他們發現的狀況，跟社會學家開始由各類對新中產階級所做的調查得知的，一模一樣：第一代組裝線工人，只因能擺脫田地，就十分感激，但下一代會拿自己與飽經風霜的上一輩相比。清華大學社會學家郭於華在2012年寫道，“今天中國最尋常的感覺是什麼？我想很多人會說是失望。這種感覺源自經濟快速成長，但生活改善卻不夠。此外，它也源於個人社會地位提升的程度，與想到‘強大國家崛起’，兩者之間有落差。”

我注意到，人們依然引用《了不起的蓋茲比》來類比中國當下的崛起，只是此時這種參照帶有邪惡的新意味。他們注意到加拿大勞動經濟學家克拉克（milescorak）的成果，通稱為“蓋茲比曲線”（thegreatgatsbycurve）的研究，它得出進一步的結論，即中國是世界上代際流動性程度最低的國家之一。一位中國部落客讀完後寫道：“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出生決定階層。”《了不起的蓋茲比》讀來再也不像一個自我造就的人之奇蹟。另一個部落客寫道：“盜賊橫行，農人離開土地，奔往東岸大城市，農業生活式微，金錢凌駕道德……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就是這些。”中宣部通告周知，各種報導指出大家不快樂，不是大家喜聞樂見的。2012年4月，我的手機嗡嗡響了：“所有網站不得轉載標題為《聯合國公布《世界快樂報告》中國排行120名》的新聞。”

我結束與麥可見面，回到北京那一天，冬陽和煦。我把自行車搬出來，騎到長安街，再右轉往北，經過中宣部，它還是踞坐在佛塔式屋頂之下。

自從我首度注意到中國人在追求真相以來，已過了好幾年，它以一度難以想像的方式膨脹，中宣部也見招拆招。該部幫助黨撐過金融危機，叫“阿拉伯之春”的崇拜者噤口。黨把[劉小玻]、[愛未未]捉拿下獄，把韓寒的出版野心打了下去。即使是愛扒糞、自命啄木鳥想讓體制長得更直一些的總編輯胡舒立，也衝撞到黨認為可以忍受的極限。中國言論管制最高負責人柳斌杰那年春天被問道，自己評估過去6年的表現如何，他毫不猶豫地答道：“客觀來說，相當傑出。”

柳的自負，實在言之過早。以往在中國，國事總是不讓大

眾過目，到最後才以既成事實的樣貌揭曉。可現在沒料理過的素材——各種交易，世仇，背叛——都攤開在陽光下，供人審判評價。人們正在評估，擺出來的這套體制，其價值是否符合他們自己追求的道德目標。2012年，中國首度出現每兩秒鐘就有一人上網的比例——只是，上網人口還是不到總人口的一半。[劉小玻]入獄前指出，讓他取得靈感的哈維爾《77憲章》，在政治體系依憲章作者群預見方式演化之前20年，便已出現。依哈維爾看來，在共產黨統治之下，想過活的關鍵，便是維持雙重生活——心甘情願，能在人前說一套，而私底下則是另一套，原因乃在恐懼，或利益，或兩者兼有。到最後，雙重生活還是撐不下去的。

在中國，雙重生活正在腐蝕。極度不公平這一事實，現在躲都躲不掉：一部分中國人生活的物質世界，跟其他同胞是天差之別。當然，這種現象在很多國家都如此，包括我的國家美國，只是在中國，感覺起來格外深刻；30年以前，中國還打著平等主義名頭，要人民刻苦犧牲，現在則不然。此外，中國精英領導的迷思，與寡頭政治的現實，兩者之間的落差，變得越來越清晰。

2012年，三位政治科學家史宗瀚（VictorShih）、阿道夫（ChristopherAdolph）及劉明興組成團隊，挑戰包圍中國崛起最根本的迷思之一：中國共產黨獻身於經濟開放，始終不輟——誠如鄧小平所說，“發展是硬道理”——保護著精英統治，原因在它獎勵能做最精明經濟決策的黨幹部。但學者們發現，這一點沒有佐證；相反地，中國有搞好經濟記錄的官員，其升遷不見得比表現差的人來得順。最重要的，是他們與上司的關係。

隨著黨對資訊的壟斷消褪，其道德公信力亦然。對諸如哲學系生唐傑之流的人，光追尋真相還不足以滿足他們的疑惑；它導致他們發出更深沉的疑問：想成為怎樣的人？可以相信的人又是哪些？2012年夏天，大家發現另一個字眼在網路上搜尋時被封鎖了。[添安門]廣場紀念剛過，人們一直用密語討論它，把它稱為“真相”。網管逮到這點，等人們搜索微博時，網頁發出一個警告：“依相關法律、規定及政策，‘真相’的搜索結果不予顯示。”

第三部信仰

Chapter19精神空虛

“毛主席像章熱”1966年夏天起橫掃中國，當時上海聯合徽章廠生產一種簡單的鋁質別針——直徑半英寸，上有主席的肖像。文化大革命越升越高，像章蔚為時尚。幾週之內，像章便全國量產，男女老少都把像章別在心口以上，作為效忠的證明，像章越多越好，從他們的胸膛垂下，橫繞在臂上。

像章上，主席的臉安置在往前方面，或者是側面像，但絕不朝右，右是反革命的方向。有些像章能在暗處發光，有的是由美軍在越南被擊落戰鬥機取材製成。鐫文歌頌主席為“勞動人民的救世主”、“偉大救星”及“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文革是毛為了權力的最後一搏。大躍進造成大災難之後，他的政敵把毛晾在一旁，所以毛祭出中國的年輕人來“炮打司令部”。文革讓毛有了新光環。媒體宣稱，“讓毛澤東思想控制一切”，人民則跪在毛銅像腳邊，懺悔自己的罪過。他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據稱有神奇力量：國營媒體報導，小紅書讓一隊外科醫生能摘除重99磅的腫瘤，還幫上海工人把下沉中的城市抬高3/4英寸。

毛澤東摸一下，就能取得神界一般的重大意義：1968年，一支巴基斯坦代表團送一籃子芒果給毛，他轉贈給工人，工人感激涕零到把果子放在祭壇上，群眾排隊膜拜；一粒芒果經包機飛到上海，如此工人們如王小萍（音）才能看見。她後來在一篇散文中回憶說：“‘芒果’是什麼？沒人曉得，有知識的人說它是極其罕見的水果，好比長生果。”那些芒果開始腐爛，便用福馬林保存起來，還造出塑膠複製品。有位村裡牙醫說，有隻複製品看來像甘薯而不像芒果，複製者被訴以“惡意誹謗”審判並處決。

就在毛越來越神聖之際，他的信徒則在拆毀中國古老的宗教信仰基層。馬克思認為，宗教是“幻想的幸福”，與社會主義的奮鬥並不相容，而《人民日報》則呼籲年輕人“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紅衛兵拆廟砸古物的兇狠蠻勁，誠如高萬桑（VincentGoossaert）及宗樹人（DavidA.Palmer）所述，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摧毀所有形式宗教生活最徹底的行動”。在某些案例，毛的神格化，與摧毀他的敵人，變得難以分辨。小紅書被用來當“照妖鏡”，可以剝掉“階級敵人”的面具，而且在兩個省份，這股狂熱惡化成人吃

人：階級敵人被開腸剖肚，在公社餐會上吃掉。

到了1969年，毛派已經失控，危及中國的未來。死亡人數增多，寺廟已成廢墟，而且即使是像章都變成麻煩：中國生產了這麼多像章（總數在20-50億之間），導致工業生產為之缺鋁。最後毛說，鋁金屬必須用來“造飛機保衛國家”，而結束這股狂熱。

毛主席1976年死後，收藏家及投機客看到商機，於是收集像章，當成投資。但這門生意如此油水豐厚，使得像章市場贗品泛濫。這種護身符變成大宗商品，我在北京跳蚤市場看到他們埋在古董攤裡。在線上，工廠大批販售，每個只要7分錢。

毛的文化大革命摧毀了中國舊日的信仰系統，但鄧小平的經濟革命無法重建它們。不懈地追求財富，讓中國過去的被剝奪感為之紓緩，但它要替國家與個人的終極目標下定義，卻又做不到。此時真相明擺著，有目共睹：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土地上，資本主義毫不節制、侵吞、不公平猖獗。一度還有些藩籬，約束住貪腐及道德沉淪，中國則全部跳躍過去了，現還要衝刺往前。中國生活裡有個洞，人們叫它“精神空虛”，得做些什麼，來填補它。

2010年冬天，我們搬進國學胡同一座小磚屋裡。對一條巷尾不通，路面彎曲狹小，兩輛汽車無法同時通行的巷子，巷名倒是氣派很大。到了春天，街坊鄰居在巷弄裡有陰影那一邊占路玩紙牌，巷子變得更窄。

國學胡同，被紫禁城以北的嘈雜大道包圍起來，是老北京的殘留，能躲過拆除，是因為它卡在兩個大寶貝之間：喇嘛廟（北京最大的藏傳佛寺）與孔廟（有700年歷史的中國最重要哲人祭祀場所）。這些地方的四周，北京算命先生聚集得最多，再與廟寺結合起來，讓本區成為北京最講靈性的區域。它感覺起來，有紊亂露天市場的氣味，販賣的貨色倒不是商品，而是各派教義。

這條巷弄的名稱源自它的地點：“國學”指的是中國文學裡混雜起來的哲學、歷史及政治。要確切定義它包含了什麼——該教什麼歷史、哪些思想令人信服——叫人緊張，但世世代代的中國思想家夢想找到最強的處方，讓中國能免除西方化的壓力。20世紀第一流的知識分子梁啟超呼籲提倡“國粹”，而近幾年，中國領導人則投注於這個想法，盼望把社會主義的殘餘，綁緊在中國文化較深的根苗裡。西方政治價值的傳播，令他們氣餒，而且一如哲學生唐傑，他們重新擁抱中國經典，拿來自

衛。我們這一區有張標語旗豎立起來說，這裡是“國學研究聖地”。

我們巷子沒有商店、酒吧或餐廳。它離主幹道雍和宮大街只100公尺，但不通的巷道及古老的房舍，讓它感覺起來像兩個村落，被1900萬人住的城市包圍起來。有位鄰居養雞報曉，另一位做晨操的方法，是在晨風中揮牛鞭。大家住得很近，每晚此刻，我坐在書桌凝神靜聽，我的鄰居、一位叫金寶珠（音）的寡婦準時在下午6點開燈，6點5分，熱油滋滋響，6點15分，晚餐就好了。

巷弄孤絕，生活倒有幾分隨興的品質。中國農歷年時，有位鄰居邀我們過去放炮竹，那件事嚴格說來，是不合法的。有一年，爆竹歪了，一枚衝天炮射進入堆裡。兩個月之後，金太太決定敲掉她的房子重蓋，這樣她才能從空地多占幾英尺空間。我不介意——她有所需要，地方太窄了——但我的房東生氣了，責備她“偷陽光”，因此興訟。誰擁有什麼，他們莫衷一是，部分原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家彼此攘奪了太多太多。

離我們前門不遠，官方設了公告欄，執行“反邪教警告與教育”。上頭橫寫的中文大字說，“留心邪教，建設和諧”。本區有這麼多宗教活動，政府對此不怎麼放心，原因是憂心各宗派競逐人們的忠誠與奉獻。90年代宗教運動[砝侖攻]崛起，呼籲更多權利及認可，黨宣布為邪教，掃蕩且圍捕其信眾，持續至今。有張海報標題寫著，“打擊[砝侖攻]的破壞陰謀”。它說，邪教“使用網路捏造並散播謠言，讓社會秩序陷入紊亂”。我從沒聽過本區有任何人談到要加入邪教，也有一張海報報導如何杜絕：別聽、別讀、別分享、別加入。

外人往往認為，中國人講實用，用在信仰的時間沒多少，但是幾千年來，這個國家是由信仰及儀式編制起來的。曾有一度，北京的寺廟數目冠於全亞洲其他任何城市。循著五花八門的本土神祇，道教與佛教興盛起來；學者們膜拜文聖人，病人拜掌管疾病的神明，炮兵則祭炮神。北京吸引千里以外的人來朝聖，其中有些路上還一步一叩首，像刺蛾類幼蟲。

文革退潮之後，中國學者逐漸獲准重新詮釋馬克思新年，即宗教“是群眾的鴉片煙”，而他們主張說，馬克思指的是他那時代，德國的宗教，而非宗教本身。在當時，中國還在追求滿足物質，而人們發現，那只能滿足他們某些渴求。而在存在方面的問題——意義、自我培育、生命本身——都是死胡同。愛國主義不時會高漲一次，讓人的生命取得形式與方向，但它誠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寫他自己國家的愛國主義那般，“像廉價劣

酒”，“只喝幾杯，它就讓你醉了，叫你歇斯底里，但在你醉了，大鬧一場之後，除了翌日早晨劇烈頭痛以外，什麼都沒留下。”

我們定居到這區來的時候，中國已在全面復興茁壯之中。誠如一篇研究所述，此時“精神空虛”正要填滿，方法是“宗教的宇宙，爆炸之後同心圓般往各個方向散去”。

人們不信任身邊的建制：共產黨偽善肆虐；媒體因賄賂及刪檢而嚴重變弱；大公司恩酬及用人唯親，是眾所周知的事。人們把自己的信仰寄託在別的地方。即使在鄉間最貧窮地帶，寺廟也重新開展，提供混雜道教、佛教及民間信仰的東西。目前基督徒有6000-8000萬人，本社群大如共產黨。我還碰到過信五旬節教派的法官，以及信巴哈伊（Baha’I，舊譯“大同教”）的商業大亨。

面對這麼多選擇，有些人兩面下注，有點像宗教雜交：每年春天，學校要考試之前，我會看到中國父母魚貫走進喇嘛廟大門，祈求孩子成績考好；接下來再走進對面的孔廟去拜拜；有人下午最後落腳於天主教堂，以防萬一。

有些成長最快的團體把宗教、商業及改善自我揉合在一起。我參加過一個名叫“頂級人類”（TopHuman）的組織集會，該組織召集有野心的男男女女，販賣“啟發式行銷”產品，可以助你“瞧入你的心理”。當地報紙詢問，它算是一個“靈性行銷”方案，抑或有可能是一種“宗教”。最後政府查禁了它，創辦人被抓去坐牢，據說罪名是逃稅。

這些年來，我曾追蹤在多年貧窮之後，那些追躡財富者的故事；我曾行旅全中國，訪問各式各樣說實話的人。只是我待中國越久，越想努力了解那些較難一眼看出的變化——也就是追尋意義。中國歷史最近100年，再沒有比爭戰該信仰什麼，而引起更大動盪的東西了。我想知道，中國男男女女試圖決定，人生什麼最重要，他們的生活是怎樣，而我並不必外求遠尋。我住的這區書肆裡，包括中文書名《靈魂指南》、《我們幹嘛活著》的書就有很多。以我前門為圓心支點，繞個圓圈，我可以走到任何一點，都找到不同答案。

國學胡同的正東就是喇嘛廟，是由木石建築加彩漆裝飾的複雜建築群，檀香高燒而成一團。它是世界最重要的西藏寺院之一，而對中國來說，是城裡最敏感的地點之一。有一度，北京與藏傳佛教關係密切，皇帝在京城供養數千喇嘛，祈求國泰民安。但是1959年，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拒絕承認共產黨宣稱擁有他故鄉的主權，從山區跋涉到印度，離開中國。流亡歲

月中，他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而且出力轉化西藏人。依他朋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兼前喇嘛佘曼（RobertThuman）所言，西藏人變成“人權運動的小海豚”（佘曼說西藏人變成小海豚，被中國大惡龍欺負）。誠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被視為反蘇維埃帝國的偶像，達賴變成抵抗中國統治的代表人。2008年春天，西藏抗暴過後，中國領袖譴責達賴醞釀不安。他否認有任何參與，但中方說他是“披著僧袍的狼”，意圖“分裂祖國”。

喇嘛廟四周總是有穿制服及便衣的警察，看到他們實在令人犯疑，原因在大多數遊客並不是西藏人，都是富裕的年輕中國夫妻，前來燒香，祈求生下健康的孩子。他們大多數人認為西藏是中國迷人的大西部，是時髦景點，讓人聯想到靈性與吃苦耐勞的個人主義。有位中國年輕搖滾樂手對我說：“我在西藏時，可以自由自在。”

我認識不少漢族中國人信仰藏傳佛教，其中有位姓林的私募股權投資人就是其中之一，他一腕戴佛珠，另一腕戴瑞士名表。自己信藏傳佛教，而政府對達賴喇嘛諸多警告，讓他糾結，努力調適。他說：“我師從自己的仁波切時，習慣問他們：‘你們是中國人，還是西藏人？你們打算用我的錢，去買武器嗎？’”他曾涉獵心理學及宗教書籍，最後信仰藏傳佛教，原因在感覺起來，它比漢傳佛教要純淨；漢傳佛教已沾惹上道教元素及其他傳統。談到達賴喇嘛，他說：“他寫了大約60本書，我大概讀過30本吧。”

當時我們坐在北京一家露天咖啡館，同桌另一位朋友是開餐廳的，湊巧是黨員——他誇張地倒抽一口氣說：“他這麼講，真夠大膽的。”林翻白眼，我感覺他很享受自己信教時，伴同的大膽包天。林說：“我想達賴喇嘛實則不是西藏分離份子。要是他是的話，西藏現在早就不可收拾了。”

由喇嘛廟往四面八方輻射，屋舍全是小間小間的店面，坐著風水師、瞎子算命仙及命名老師，他們只要價錢公道，就可以提供一個對嬰兒或一家公司最吉利的名字。不見光幾十年之後，算命生意現在公然進行，而且大發利市。在中國，興與敗攸關的神秘因素、私人關係及不見光的交易這麼多，以至於人們急著追求神靈方面的優勢。

算命先生在窗戶貼告示，廣告自己提供的服務：預測政經未來、評估婚姻前途、改善大學入學考試分數。較先進的流程，可以按要求而炮製，誠如一張告示所言，包括解咒等等。尚德剛（音）的鋪子總是讓我聯想到產科醫生辦公室：壁上貼著客戶微笑的照片，讓你約略了解有前途的孩子未來的模樣。

一天下午，他手指敲著一張照片，照片中的女子笑得很僵，臉頰紅潤，而對我說：“這位年輕女士彭媛（音）剛來北京時默默無聞。現在她是美容師，與很多名人交友。”照片中，她端著綠而扁的東西。“我替她造了那個玉盤，改變了她的命運。”

尚大師的辦公室塞了很多不怎麼古老的書，比如《華爾街風水師》，而且他的服務揉合了佛教、道教及幾絲奇門遁甲。只是，他的行銷宣傳大致上與歷史掛鉤起來：他自述為古代將領尚可喜的後代，書桌上保存一本皮質封面的尚家族譜，有4英寸厚。讓他客戶印象深刻的是：尚家那麼多分支在文革中被毀。從未能了解自家歷史細節的客戶，可以透過了解他的，找到少許安慰。他的招牌保證提供：曾經只供上層階級的超自然服務。

毛澤東使盡渾身解數，但民俗宗教依然在生活各角落欣欣向榮。我們搬進來的第一個秋天，我聽到書桌上方天花板有搔刮挖敲的聲音。我不以為意，可幾星期之後，我的辦公室開始聞起來有幾分動物園的味道。有一天夜裡，我從窗子看到一團金黃色毛茸茸的東西竄上樹，消失於屋頂的一個洞。我向鄰居黃文義（音）提到這件事，他笑了。

他說：“那是隻黃鼠狼。你該高興才對！”他表示，黃鼠狼象徵將發財，豪豬、蛇、狐狸跟老鼠也是一樣。因為這些生物都在墳墓溜達，所以被視為帶有祖先的靈魂。黃說：“別理它。”我跟我們管家黃阿姨提到有這動物，她嚴肅地說，“別打它。絕對不能打黃鼠狼。”

但我書桌頂上的氣味叫我難以工作。總得想想辦法。幾天之後，我與一位名叫韓昌東（音）的滅鼠專家站在院子裡。我描述自己看到的。他安慰地點點頭說：“那是隻黃鼠，你真是幸運。”

我說：“但你做的是滅鼠這一行啊。”韓聳聳肩說：“中國人會認為，有隻黃鼠狼搬進家中，是非常吉利的事。”他說。隨著北京越來越多地方變成混凝土建築，最後一批野生動物擠到胡同來找木材跟稻草。

“在我家鄉，你該燒香謝財神才對，但情形不同，我們把它解決掉。”他從袋子裡掏了一罐滅鼠藥，讓我看來不怎麼對勁。

我說：“等等，就習俗來講——這個點子很糟嗎？”

他考慮這個問題一下，再說：“你應該沒問題，因為你是老外，又不信這個。”

我已不敢打包票自己信什麼了。只是為時已晚；韓已開始把一手又一手的粉紅老鼠藥塞進屋頂的大洞小洞。他說，自己的工作有一年保證，無效退錢。他說，“假如黃鼠狼再回來，打電話給我。”

天花板再度安靜了。可兩星期後，搔刮聲再現——這回更大聲，氣味更濃烈——是報仇的味道。我想了想——但沒再打電話叫滅鼠專家。我反而去買了把電風扇，讓我辦公室通風，學懂跟頂上的黃鼠狼一起過日子。

所有鄰居里，跟我們最近的莫過孔廟。它跟我家廚房共用一面牆，這廟是北京最寧靜地方之一，1320年興建、與世隔絕的建築群，古木林立，還有一個很高的木塔，良心般俯臨我們房子。很多個早晨，我會端一杯咖啡到戶外，傾聽隔壁剛起床的聲音：掃帚拂過石板、扭開水龍頭，還有趕走上頭喜鵲的罵聲。

孔廟能僥存迄今，也算是個小小奇蹟。孔子是生於公元前6世紀的哲學家兼政治家，一度全國有數千家孔廟存在，以尊崇孔子。他在中國歷史取得的地位，好比西方史的蘇格拉底，部分原因在他的意識形態鼓勵秩序及忠誠。有次人家問他政府管理是什麼，孔子回答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把道德與政權力量連在一起：“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毛主席信仰“不斷革命”，文化大革命始

於1966年之際，他慫恿紅衛兵小將們去“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狂熱分子譴責孔子培養出“壞分子、右派、牛鬼蛇神”，毛的一名助手還准許去挖孔子的墳，數百間孔廟被拆毀。到了1980年代，儒家被醜化得如此不堪，以至於歷史學者余英時把它稱為“孤魂野鬼”。

2010年9月，我聽到孔廟內擴音器生機勃勃在大喊。接下來的沉重的鐘聲，繼之以鼓聲、笙簫，朗誦者背誦中國古代經典的章節。表演持續了20分鐘，一小時之後重複一次，再一小時又一次，翌日再來一遍。孤魂野鬼以心照不宣的形式在舞動。時間始於1980年代，態勢變得明朗，總之要有東西來填滿“精神空虛”，對此黨決定插一腳。無產階級的舊式美德（革命、階級意識）都過時了。領導們要找到新的道德語錄來搭配執政黨；找個辦法把他們與中國古老文明的光輝連起來。中國需要一種道德、一種政治，供新中等收入階層使用。黨對新加坡及台灣等地華人社區的儒家復興非常好奇。畢竟，孔子是本土的道德偶像，牢牢嵌在中國的“國學研究”。在北京，孔子又官復原職了。中國政府在全球開設400多家“孔子學院”，傳授北京官話及

中國歷史（在海外，學者們抱怨，孔子學院讓有爭議的命題如西藏及台灣不得討論）。支持儒家復興的人主張，入學可以保衛中國，免於西方“自我中心哲學”侵擾，而且最後把孔子出生地曲阜市比擬成耶路撒冷。鄰近據說孔子出生的山洞，投資5億元開始興建博物館及公園建築群，不少計劃呼籲興建孔子像，高度約與自由女神像等齊。曲阜市的行銷策略自稱“東方聖戰”。2012年，造訪當地的遊客有440萬人，超越以色列參觀的人數。“中國孔子研究學會”揭幕新的傳統，鼓勵新人在孔聖塑像前強調他們的婚約。為了給孔子較新鮮的形象，歷史學家公布他們叫做“標準化”的肖像：一位慈祥的老人家身著中式長袍，雙手交叉於胸。

大學為那些想從經典裡找尋“經商智慧”的創業家開設高學費課程。專研孔子思想的“國學網”在深圳證交所上市，有些有事業心的儒家學者創設“國際孔子文化節”，贊助者是以孔子為主題的製酒公司；節慶上，數千人塞滿曲阜市地方體育場，巨大氣球漂浮於頭頂，標著古代儒者的名字，而一位南韓搖滾歌星穿著縮小版的行頭，進行搖滾樂表演。

誠如60年代美國的保守運動獲利於後自由運動後，渴望回歸到道德與高貴，中國古典的復興援引鄉愁般的意象，呼喚什麼意味著中國。它編織出較純粹的過往，依中國古代歷史中理想化的故事記載，來形塑意象，有高貴的軍人、誠實的統治者，他們依明澈的道德及使命而行動。年輕愛國志士如唐傑組織各種活動，活動時造訪孔廟，依穿傳統士子長袍，重新表演大多數人早已忘記的儀式，假設總之他們了解就是了。

儒家復興還創造市場。最令人驚奇的是，近些年來最暢銷出版品，是於丹有關孔子演講的合輯。於丹是影視傳媒研究的教授，也擔任黨的政治顧問。她寫道：“要評估一個國家真正的實力與繁榮程度，不能只看GNP成長，而忽略每個尋常人的內在經驗：他覺得安全嗎？快樂嗎？”懷疑論者揶揄於丹作品是儒家心靈雞湯，但於丹還是成為全國賣座第二的作家。

我聽見孔廟內傳來聲音幾天之後，廟方展開孔子誕辰慶祝，為共黨1949年掌權以來首度。慶典焦點，在政府官員及教授言說，一群孩童背誦論語篇章。我估計，這可能象徵音樂表演至此結束了——只是，事實上，表演持續下去，還排了固定時程：每天上午10點到下午6點，每個小時一次，一週7天，晴雨無休。聲音迴盪在國學胡同所有牆壁，原先還是新鮮事體的東西，漸漸在我鄰居的心目中挖溝刻痕，變成老套。一天下午，鄰居黃對我說：“夜裡我腦中都聽得見。好比我整天坐船，

依然感受得到船搖似的。”

他想到一個點子，臉亮了起來。“你應該去跟他們講，把音量關小。”我問說：“為什麼要我去？”

“因為你是外國人。他們會留意你。”

因為去中國最著名哲學家孔子的廟抱怨，引起關注，這種方法我真不知道該不該嘗試。但我對表演非常好奇，於是安排採訪孔廟的館長吳志友。他跟我料想的大不相同，看來較不像神學家，而像演員，可以在中國連續劇裡扮演慈祥老爸的人；他50多歲，臉龐大而英俊，臉頰上一對酒窩很完美，聲音宏亮，聽來有幾分熟悉。被安排來經管孔廟之前，吳的生涯大多在北京市中宣部研究室度過，而他有心思於行銷。談到孔廟表演，他說：“表演已吸引社會各階層人士前來——中國人跟外國人、男男女女、高學歷的專家及尋常人。”

我詢問他是否參與節目製作。他眼睛亮起來，說：“我是設計主任！我監製每個細節，即使解說的旁白，我都自己來。”

吳志友說，孔廟表演在很吃力的條件下構思出來的。孔子兩千多年前便已去世，但上面只給吳1個月時間組織表演。他雇了作曲家，由當地藝術學校召募舞者，從古籍經典裡挑出文句，像模像樣。他說：“你必須安排高低起伏及高潮，好比電影或戲劇。假如太平淡，就沒有功效。”

我感受得到，吳很珍惜把孔子推上舞台的機會。“我讀國中時，擔任學生會宣傳部的部長，我愛朗誦、音樂及藝術。”空閒時候，他還練單口相聲。對我來說，吳志友已經成功把孔廟打入自己的社區劇場。未來他還有很多計劃。“我們正在建造新的場景，有陶瓷做的72賢。還需要更多燈光。屆時，或許我可以說就完整了。”

吳志友看看手錶。他希望我趕得上看3點的表演。我離開之前，他送我一本孔廟志，然後說：“讀完這本書，你的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

舞台在孔廟建築群北側的亭塔之前，已經安裝好舞台燈光。演員班底由16名年輕男女組成，都穿上士子青衫；每個歌舞流程都由經典文句命名，而且都采振奮人心的詮釋：“快樂”是基於“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而來，舞台版則省略不祥的那一半。結尾“和諧”則把孔子與共產黨連起來。小冊子解釋說，它傳達了“古人的和諧意識形態及和諧社會，對建設現代和諧社會，有正面影響。”

我讀了孔廟館長給我的書，而古代事件的詳細讓我印象深刻：它記錄了700年前，哪些樹是誰種的，而且它在“群賢軼事”章節，收藏孔廟史上，名人栩栩如生的描繪。但有些事體付諸闕如得很明顯，包括1950到1981那些年。孔廟的官方歷史中，20世紀大多空白。

我待在中國的歲月裡，已學懂歷史詮釋感覺起來，有如錄音時音訊的流失——音樂悄然無聲，但接續時彷彿什麼都沒發生。有時，那些剪輯是由上級指示的：黨禁止人們討論[添安門]鎮壓，或是大躍進導致的饑荒，原因在黨從未駁斥或接受這些事件的責任；該怎麼改變或許能防止它們再度發生，這個問題黨也不曾在意。有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百姓也情願協助“遺忘”，原因不只是他們太窮，決心過好日子就算了，還因為他們當中，很多人在某些時刻是被害人，但其他時候卻是加害者。

但是，談論孔廟的書還有別的，而且填補了空白——尤其是1966年8月23日夜裡。當時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幾個星期，“破四舊”的命令已惡化為暴力攻擊各個權威。當天晚上，一群紅衛兵召喚中國最知名作家之一的老舍，前來孔廟大門。

老舍時年67歲，是中國最有聲望得諾貝爾文學家的人選之一。他成長的地方離此不遠；乃父是軍官，死於抵禦外國軍隊的戰役之中。1942年，老舍前往倫敦，待了5年，住在布魯姆茨伯裡附近，讀康拉德與喬伊斯的作品。因為買不起呢子布，他穿卡其衣。

1939年，他出版了《駱駝祥子》，主角是個誠實、心思獨立的年輕黃包車夫，而他不公不義的遭遇，改變了他，用老舍的話，成為“病態社會墮落、自私、不幸的產物”。老舍之於北京，正如雨果之於巴黎：是城市精髓作家。黨點名老舍是“人民藝術家”，被要求生產政治宣傳品，他滿心憎恨，但是跟很多人一樣，他是忠誠的公僕，當同僚作家自黨內失勢，他不忘大肆批評。

可此時他變成靶子。一群紅衛兵——大多是13到16歲之間的女學生——推他走進孔廟的門，逼他跪在一處點篝火的石板旁，身邊還有其他也遭攻擊的作家、藝術家。指控他的人譴責他與西方有關連。他們喊著：“反黨分子下地獄！”，然後用黃銅扣的皮帶抽打他。老舍頭部流血，但撐著不昏倒。這樣撐了3個鐘頭，直到最後他被帶去派出所，由他老婆接走他。

翌日早晨，老舍一大早便起床，從他家往西北走到一處叫太平湖的寧靜池子。他朗誦詩歌並寫作，直到太陽西下。接下

來他脫掉襯衫繫在樹枝上。他在口袋裡裝滿石子，走進湖裡。

隔天他的屍體被發現後，他的兒子舒乙被召來收屍。公安已找到老舍的衣服、手杖、眼睛、鋼筆，以及他留下來的一捆紙。官方的老舍死因裁決說他“自絕於人民”。因為他是“反革命分子”，不准他平常下葬。到最後，他妻子兒女把他的眼鏡、鋼筆放進籃子焚化。

我對舒乙很好奇，他曾去收乃父老舍的屍體。今天舒乙已70多歲，比他父親過世的年紀還大。我四處打聽，發現他住的地方離我家走路僅幾分鐘之遙。他邀我過去採訪。舒乙的公寓落滿了書籍、卷軸及畫作，擺設的方式讓我聯想到算命的鋪子。舒乙滿頭白髮，臉龐憂鬱而慈祥。我們談天時，輕柔的微風由鄰近的運河吹進窗子。我問他對乃父臨終前的心境，是否領會得更多。

他說：“其實很難了解，但我想他的死，是最後掙扎之舉。”舒乙接著說：“多年以後，我湊巧讀到一篇叫《詩人》的文章，是他在1941年寫的”——在他死前25年。“他寫道：‘在別人正興高采烈，歌舞昇平的時節，他會極不得人心的來警告大家。人家笑得正歡，他會痛哭流涕。及至社會上真有了禍患，他會以身諫，他投水，他殉難！’”

這種殉難是中國傳統，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詩人屈原沉江，抗議國事糜爛。舒乙對我說：“這麼做，他們是在反擊，告訴他人真正的真理是什麼。”他說，他的父親是“寧碎毋折的”。

我見過舒乙之後，回頭去找孔廟館長吳志友，問他老舍最後一夜的事情。他嘆了一聲，說：“沒錯，文革時期，這裡有很多鬥爭場面。之後，老舍回家，跳湖自殺。這是歷史事實。”

我問他，為什麼孔廟的書面歷史一點也沒提到這件事。他很費力想找說法，我心中有準備，以為大概會聽到一點政治宣傳話。但接下來吳志友說的讓我感到驚訝。他只說：“它太悲傷，只叫人們覺得悲慘，我想最好別把這件事納入書中。它是事實，是歷史，但事發不因孔廟，而是因為時局。它不應列入孔廟的紀錄。”

我了解他的觀點，但覺得並不完整。老舍之所以在孔廟被毆打，是因為這裡是學習、思想及歷史的場所；允許攻擊中國最知名小說家之一，宛如大多數文革本身，不啻允許攻擊中國意味著什麼，而且在往後數十年，黨與人民對那些時光，他們喪失了什麼，從未達成妥協。即使有人想標出北京最偉大記錄者結束自己生命的地點，都很困難；太平湖幾十年前，就因擴

展地鐵系統而填掉了。中國人民能把那麼多東西安然置於諸腦後：革命、戰爭、貧窮及當今的動盪，經常令我很吃驚。我的鄰居黃文義就住他母親的隔壁，她88歲了。我有一次問她有沒有家族的老照片，她說："文革時都燒掉了。"接著她笑了，泛起那種中國人格外空洞、專門保留給慘事的笑容。

每一天，都有內地來的官員團，以及來自北京市的學生們，現身於孔廟，既來觀光，也來看表演。我看見一位綁馬尾的年輕導演面對著一群中年婦女。她伸出雙手，在身前擺個手勢說："這是向孔子致敬的手勢。"她帶的遊客儘可能模仿她。我了解到：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歷史的間隙已經讓孔子變成了陌生人。

既有此真空，有些人急著把老哲學家派上政治更有用的任務。[劉小玻]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一群中國愛國人士組織他們稱做"孔子和平獎"的獎項，而且在翌年頒給普丁，原因是他為俄羅斯帶來"安全及穩定"。一群中國學者譴責想在孔子故鄉興建大型基督教堂的計劃，他們寫道："我們求求你們，尊敬這塊中國文化的聖地。"

其他學者對這種版本的孔子漸生厭煩。堅持和諧，似乎讓政治協商、思想真誠地碰撞，沒有多少空間。北京大學教授李零瞄準他稱為"加工後的孔子"而寫道："真實的孔子、曾活在世上的那個人，既非聖哲也非國王……他沒有權力也沒地位——只有道德與知識——有膽量批評當時的權貴。他周遊列國，推銷他的政策，絞盡腦汁協助他那時代的統治者解決問題，而總是想說服他們放棄邪路，做得較正直一些……他受苦、執迷，被迫流浪，為自己理念而辯護，較像喪家之犬而非聖哲。這才是真實的孔子。"

作者出版這篇文章，遭儒家人士譴責為"末日預言者"。替他辯護的人之一，是[劉小玻]。入獄之前，[劉小玻]警告一種情緒，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劉寫道，知識分子與其求救於孔子，不如崇尚"思想獨立及人的自主"。

中國人民前來國學聖地，是為了追尋某種道德連續。但他們的追尋很少就此結束。為了維持對歷史的掌控，黨提供的是一種諷刺漫畫般的孔子。幾個世代中國人成長時，被教以該唾棄中國傳統倫理及哲學，現在只發現黨突然又高攀它們，也不容討論兩段期間當中，發生了什麼事情。一個致力於保護"國粹"的市區，似乎只強化此一現實：世上再也沒有單純的國粹。

不少跡象顯示，反對如此強力擁抱孔子的人，不僅是自由

派知識分子。2011年元月，有座孔子的巨大塑像出現在[添安門]廣場旁邊，是自從毛澤東陵墓一個世代前建立以來，唯一新添加的東西。哲學家及政治科學家很好奇，這是否意味黨的綱領有所改變。只是，它還是消失了。就在它運抵3個月之後某個半夜，塑像被挪到一個博物館的院子，地點的位階很低。何以如此？依然是個謎：中宣部禁止任何討論。人們只能開玩笑說，來自山東省的遊方教師孔子，因為未獲許可而住在北京，於是被捕。

Chapter20視而不見

在一個國家的生命裡，總有些時刻，人們會停下來端詳一下自己，琢磨自己是否迷失道路。以中國為例，這個時刻在2011年10月13日降臨，地點是在這個國家南陲的佛山市。佛山是個市集城鎮，許多巨大的露天商業中心以此為基地，一個挨著一個，如鋼材市場、花卉市場、童裝城。童裝城每年銷售的衣服，足以讓全美兒童換裝兩次。

其中最大的一個是五金城，常住人口有3萬，專門製造冷酷無情的建設用人工製品：鋼鏈、動力工具、化學品儲存器皿，以及粗如人臂的電纜捆。它由店面及巷道組成迷宮，占地百畝，雜亂的錫質、塑膠質屋頂遮蓋住底下的世界，永遠籠罩在熹微的光線裡。五金城聞起來有木屑及柴油的味道，有約2000家店鋪，一間接著一間，市場成長得如此快而紊亂，沒有街道指示或交通標誌，以至於很容易迷路。

當天下午剛過兩點，年輕媽媽兼店主曲菲菲去幾區外的托兒所接她女兒，再返回她五金城的家。她是溺愛小孩到無法無天的媽媽，花在做女兒洋裝的時間，比做她自己的要多4倍。曲菲菲與她丈夫開了一家小店“瑞鑫軸承”。他們帶著一個兩歲、一個七歲的孩子住在由倉庫改建的樓上，燈光很暗，天花板的高度僅容大人站直身子。

曲菲菲的丈夫王持昌已在五金城工作8年。他兩眼大而分開，瀏海很長，蓋住眉毛。他出生在山東省某縣，那裡一度以產桃子和李子出名，目前改為生產化學用劑。他在職業學校學畜牧農林，接下來去北京碰運氣；他在北京曾做過建築工，也在寵物店工作，再尋路到佛山五金城。兩人結婚後，曲生了個兒子，取名王碩。再生了個女兒，取名王悅，因為一胎化關係，夫妻繳納了罰款；人人都管這個女孩叫小悅悅。等到她兩歲時，顯得很早慧，很快就能使用卡通節目《巧虎》學到的字眼。母女當天下午從學校回來，曲上樓收晾曬的衣服，而王悅則在樓下玩耍。母親下樓時，女兒不見了。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王悅總是在鄰居家跑來跑去——曲到外頭找她。夜色降臨，天門開啟，秋雨勁急，砸打在市場屋頂上。

幾個街區外，另一位年輕商販名叫胡軍，正準備開車送當天最後幾批貨。跟王家一樣，胡軍與妻子有個小女兒及一家軸承店，而他們也來自山東，然而五金城太大，兩家人並不認識。胡軍爬進小而便宜的廂型號車，中國人叫“廂型車”，可蜿蜒穿梭於擁擠的巷弄。他來五金城並不熟悉的街區收款，一邊開車一邊看街道兩邊的招牌。

小悅悅沒去鄰居家。她跑出去逛，沒多久她就離家兩個半街區。為了招攬客戶，沿街店鋪喜歡把自己的貨物擺在店門外，即使成堆的商品堵到路邊亦然。小悅悅經過高度跟她一樣的貨品堆；小女孩穿著暗色襯衫及粉紅褲子，經過轉角一家店面，那裡裝設了一部破舊的電腦監視器，從外伸的監視鏡頭錄下16個不同角度的動態，且錄到了接下來發生的事：

5點20分。小悅悅一邊側著頭，一邊繼續往前走。當她掉過頭，看前面的路時，只來得及看到廂型車，但已來不及躲閃，她被撞了。胡軍後來說，他只感覺到輪胎有輕微撞擊——“喀”一下，這麼輕微，以至於他認為是市場有人把東西亂丟到路上，如一包破布、紙箱。他甚至停車檢查一下都沒有。

小悅悅被碾了兩下，先是前輪，再是後輪，分別碾到她的上半身及下半身。她最後躺在一大捆貨品旁，除了左臂稍有動作，此外一動也沒動。

她被撞後20秒，有名男子，穿著白襯衫及深色褲子，徒步走近，他看了一眼她的方向，減緩了步伐，接著再往前走；5秒鐘之後，有輛摩托車經過，駕駛人側頭瞥見孩子，但沒減速；10秒鐘後，另一名男子經過，往她方向一看，繼續往前走；9秒鐘後，一輛小卡車駛過來，再次撞到小悅悅，碾過她兩腿，繼續往前開。

更多人經過——有個穿藍色雨衣的人；一個穿黑T恤的騎士；一個在交叉路口裝貨的工人。有個騎摩托車的男子盯著她，跟店主說話，接下來匆匆離去。她被撞4分鐘後第11名路人靠近，是位女性，牽著一個小女孩的手。她在附近開店，一樣從學校接女兒放學。她停住腳步，跟一位店主詢問路上躺的小孩，接著快速離開，推著女兒離開現場。人來人往。

5點31分，女孩被撞6分鐘之後，一名身材瘦小的女性，帶著廢棄瓶罐，她靠了過來。她是第18位路過的人，但她沒有走開，而是把袋子丟下，試著把小悅悅抱在手中。她聽到孩子在

呻吟，小小的身軀鬆垮垮的，死了一般沉重。這位婦人是位祖母級的老太太，名叫陳賢妹，以拾荒為生。她把孩子的身體移到路邊，接著四處張望求救。她去找附近的店主，但一位忙著招呼客人，另一位告訴她：“那孩子不是我的。”陳賢妹試著到下一街區呼喊求救，在那裡他碰到小悅悅的媽媽曲菲菲；她正焦急地尋找自己的女兒。陳帶領她走到路邊，她蹲到柏油路邊，雙手抱起小悅悅，開始跑起來。

在這裡，救護車很罕見，因此小悅悅的爸媽只能把她送上小型家用別克車。當他們抵達15分鐘車程的黃岐醫院，身穿粉紅的護士正在照料川流不息的病人。候診室裝飾得很好，很潔淨，但牆壁上掛的告示則警告大家，中國的醫療系統伴有諸多危險。一張告示勸告大家，不要試圖行賄醫生以為能得到較好的救治；另一張警告“看診黃牛”，上頭寫道：“假如有陌生人宣稱與某專家關係密切，想帶你離開本院，別上當。”

醫生們發現，小悅悅顱骨破裂，腦部受傷極重。一開始，地方記者們估計這應該是典型的肇事逃逸。接下來他們看到監視錄影。一時之間，有17人路過而見死不救的新聞傳遍全國，引發自我反責的狂潮。作家張麗佳寫道：“假如這個國家14億人民都冷血，我們怎可能贏得敬意，在世界扮演領袖角色？”影片在電視及網路上不停播放，宛如指控大城市冷漠、精神扭曲的道德劇。對很多人來說，那個瞬間具體顯現一種感受，就是這個國家充斥著巨大的競爭，讓某些中國最弱勢的人被踩在腳底下。它打開集體罪惡源泉的水龍頭——從嬰兒吃毒奶粉而生病、學童陷身在倒塌的校舍，以及一連串人們無視求救中的陌生人等案例。中國報紙最近才報導一位88歲老翁之死：他在菜市場跌倒，因為沒人幫他翻身，流血窒息而死。

當地記者趕去五金城現場，以填補該事件全貌：轉角有家店叫“新中國安全器材批發”，老闆說他忙著記帳，而他老婆則在做晚餐。他說，“我聽到有孩子的哭叫，但只持續一兩下，接著就沒聲音了。我沒再想什麼。”地方媒體追蹤到騎紅色三輪車的男子，但他能說的只有，“我沒注意到她”，一連說了十次。人們在線上梳理那段影片，認出轉角鉛管店的老闆。他走出自家店面，往地下看，再退縮回去。他堅稱自己絕沒看到路上受傷的孩子，但人們說他“沒良心”，把他的網站塗得面目全非。同一時間，他們把停下來幫忙的拾荒老婦謳歌為英雄。記者們一再問她，為什麼要伸出援手。這個問題叫老太太迷茫了。新聞退燒之後，她問她媳婦，“幫助小孩，我怕什麼？”

中國人最自豪的便是“仁”，而仁是中國道德的基本概念，好

比“待人如待己”原則之於西方。但是近些年，出於實際考量，中國的孩子們被教導要留心一些沒那麼振奮人心的東西，比如“做好事被訛”——意思是在幫助人的過程中被欺被騙。這種恐懼已自成一格到被稱為“碰瓷兒”。

對很多人來講，在今天、在這個時代活在中國，好像活在新近富裕起來的島嶼，周遭暗流凶險——留在干地上，生活可望安全，滿足而快樂，失足一下，世界可能就塌了。能吸收生活慘事的空間是這麼狹小，以至於他們覺得別無選擇，只能加強保護自己。我有位記者朋友李菲，他的父親是個物理教師，她跟我講，有一天她爸爸騎自行車，被汽車撞倒在地。她說：“他自己爬起來，儘可能地快速離開。”回到家之後才意識到，他才是被害人。他是如此深信有人要占他便宜。她說：“我想，在中國，實在很容易掉到麻煩裡。”這些年來，因為幫助他人而有受累之虞，一再出現在新聞報導中。

2006年11月，一位老太太在南京某公車站摔倒，有位叫彭宇的年輕人停下來幫助她，送她到醫院。復元期間，老太太控告彭宇讓她跌倒，法官受理此案，並判彭宇賠償7000多美元——判決的依據不是證據，而是判決書裡的“社會情理”：彭若不是罪惡感驅使，不會出手幫助。

判決引起轟動，而我越是對小悅悅案感興趣，越是注意到事實上我碰到的每個人，都聽過“彭宇案”。人們經常自願提供類似的故事，教訓始終一樣：你一生積攢的些許，可以一瞬間化為泡影。有位姓陳的年輕人遭到不實指控，說他傷害到一位騎自行車的人，之後他對記者說：“若是我再碰到此類情形，會不會再伸手幫忙，我真的不知道。”

儘管當“好撒瑪利亞人”（GoodSamaritan）而被敲詐的機率似乎很小，但在大眾意識裡，它卻膨脹了，原因在於它證實了人們對這個時代的焦慮，證實了他們的感受，即爭相出頭正腐蝕掉中國的倫理道德。而且，有想到其他公民同胞的人越少，他們就越不願出頭幫助——這變成了惡性循環。研究五金城事件的人類學家周如南告訴我，最意識到有風險的人，莫過於來自遠方的移民。他說：“在美國，個人是文明社會的基本單位，但是在中國，人群結合體正在裂解，只是取代它的東西還沒有出現……你來到新地方，你得照料自己；你與家人一道謀生——核心是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們的孩子，此外的人變得沒那麼重要。你在心裡已有所區分了。”

中國媒體急急忙忙強化這個理論，說此類案例反映出大城市生活的疏離感：《環球時報》宣稱“沒心肝的旁觀者不光是中

國問題”，而《人民日報》描述這些案例為“國家邁向都市化不可避免的事”。只是，我越是研究小悅悅及其他案件，我越是發現這些解說並不完整。

最早懷疑都市化傷害國民道德體質的，並非中國人。1964年，美國人因為一位名叫凱蒂·吉諾維斯（KittyGenovese）的28歲女子在紐約被謀殺一案，而震驚不已。誠如

《紐約時報》當時描述，“長達半個多小時，38名可敬、守法的皇后區公民看著殺人兇手大步走著，殺死一個女人”，而沒人報警或伸手救援她。美國人擁抱這個故事，是因為它跟他們的恐懼吻合，即恐懼變成漠不關心的都市社會，而這統稱為“吉諾維斯症候群”（即“旁觀者效應”），成了社會心理學的標準解釋。

話雖如此，它並非完全翔實。多年之後，學者們回頭去找目擊者，翻閱法庭記錄，發現聽到被害人喊叫、並了解她碰到什麼事的人，只有3或4人。而且攻擊事件中，至少有1名目擊者可能有打電話給警方。然而，警方趕來太遲，而沒有救到她。（不意外的是，也有38人默不作聲、旁觀此事，據警察局長跟報紙講。）在小悅悅一案，人們為何猶豫躊躇，冷漠應該不是唯一原因。人類學家閆雲翔研究中國“好撒瑪利亞人”變成敲詐被害人的26個案例，發現每個案例中，當地警方及法院，都先把助人者視為有罪，直到證明無罪為止。那26個案例中，要求勒索者提供目擊者佐證指控的，沒有一件；另外，即使助人者已獲證實遭冤枉指控，也沒有一個勒索者受到處罰。

在經濟勃興那幾年，人們累積更多畏懼而非信任法律。他們成長的時代，執法工作有時是賣給出價最高的人，而法官可以受賄已經習以為常，人們當然要懷疑。中國學者王正緒2008年做調查，他發現“改革後公民信任政府與黨的程度，降低很多”。警方一心一意想起訴定案，達成業績，而且一系列案子最終真相大白時，才顯示了當初匆忙辦案的惡果。一名叫佘祥林的男子，因被控謀殺其離異的妻子而坐牢11年——直到他“被殺的妻子”有一天回家探視家人。真相顯示，她移居他省而且再嫁；被告則是被毆打十天十夜而冤屈認罪，2005年獲釋。2013年，一篇發表在《科學》期刊、研究中國人態度的文章發現，年輕的中國男女，用作者的話說，變成“較不信賴人、較不值得信賴、偏向逃避風險、較不進取、更為悲觀而且比較不講良心的個人”。

事實上，經過小悅悅身邊的每個人都堅稱，自己什麼也沒看見，只是一人例外：一個帶著女兒經過的母親。她名叫林清

妃（音），在當地記者追蹤到她的時候，她並沒有對閃過心中的記憶感到退縮，而說：“她用很微弱的聲音在哭……有個年輕男子站在店前。所以我問他孩子是不是他的。他揮手叫我走開，什麼也沒說。我女兒講：‘那小女孩渾身是血。’我是如此害怕，拉著我女兒就走。”林回到自家店鋪，跟他丈夫講自己看到的事，但他埋頭於自己的工作。林說：“沒別人敢碰她，我又能如何？”

在黃岐醫院，小悅悅的父母在琢磨，如果他們設法找路子，把女兒送到中國最好的醫院，她是否能得到更好的治療。他們翻遍在五金城的人脈，去找一位山東老鄉，老鄉再介紹她去找另一位移民工，那人開一家店叫“國王研磨”，販賣電動砂輪機的砂輪；重要的是他是退伍軍人，他打了通電話，成功讓小悅悅轉院到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加護病房。他看過那個影片，後來說：“很多走過去沒幫忙的人，我都認得。”當他去找其中一人理論時，對方告訴他：“她又不是你的孩子，你幹嘛捲進跟你無關的事情裡！”

小悅悅被撞後兩天的10月15日，她被送到大型的醫院加護病房——牆壁塗成淡青色，身旁插滿醫療機器的架子、管子。她已動過緊急手術，打開顱背，只是仍在危急狀態。她的父母回頭去找肇事者。他們挨家挨戶問道：“您認識影片裡開廂型車的人嗎？”他們在五金城發傳單，懸賞5萬元人民幣，給提供線索認出駕駛者的人。王把一張告示貼上網，標題取為《妞兒會好的》。

在駕駛人胡軍家裡，陰沉的知覺開始扼住他們。他的小舅子是家中第一個看見影片的人。胡軍的辯護人李旺東律師告訴我：“當時，胡軍回過頭想，意識到，‘我想我兩天前撞到了什麼東西。’”李說，胡軍看過影片後，“他從頭到腳都僵了。”

駕駛人向警方自首。根據《羊城晚報》報導，胡軍對警方說：“當時在下雨，雨打在屋頂的聲音那麼響，以至於我沒聽到孩子的哭聲。我看後視鏡，沒看到什麼，所以我才繼續開走。假如我知道撞到了人，我肯定會停下來。”他的律師跟我講，撞到人之後幾小時，胡軍的舉動並不像犯了罪的人，“他沒洗車，或用抹布把它擦掉，他到家時，並沒有緊張或驚恐，與其他店主談天時，舉止也沒有異常。”

胡軍被捕之後，當地記者追問小女孩的父親王持昌有什麼反應，“我真不知道要表達什麼：怨恨嗎？憤怒嗎？那有什麼用？怨恨能讓我的小孩復元嗎？”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小悅悅仍留在加護病房，與父母只隔一扇玻璃。她沒有恢復神智。10月

21日午夜剛過，她死於多重器官衰竭。

電視鏡頭離開五金城幾個月之後，我來到佛山，決定到車禍現場一看。那裡看起來跟電視上一模一樣：路旁放著大捆貨物，上方灑落昏暗光線。我走進一家叫“聰明五金”的店面，發現一名男子坐在凌亂的書桌後面。他叫陳東陽（音），快60歲，頭髮梳成毛主席風格，鼻梁上架著眼鏡。他似乎猜出了我的來意，然後請我坐下。我都還沒發問，他就說他女兒當天一直在工作，“她什麼都沒聽到。”

陳跟我談了很久。對他來說，談論小悅悅，其實是在談論你可以相信什麼。他說：“在過去，你眼見為憑，原因是沒人有時間或金錢去造假？現在即使是魚翅都可以是假貨……在過去，如果你沒吃的，我會給你一口飯。過去是那樣。但改革開放之後，情況變了。假如你有一口飯，我有一口飯，我會設法奪走你的，為自己留兩口，讓你什麼都沒有。”

他說著說著就笑了，“我們這些壞習慣，都是從你們那些國家學的，而我們忘記自己的優良傳統了，你看我，我都忘了請你喝茶了！”他突然站起來，在店裡找茶葉，可接下來放棄了，坐回原位。我問他，是不是把以往歲月描述得太好了？

他說：“現在人人口袋裡都有些錢，但錢不安全，人要有安全感，才會舒服。”我問陳，若是他看見小悅悅躺在路上，會有什麼反應。他沉默片刻。

他說：“要是在改革開放之前，我會衝出去，冒自己性命去救她。但之後呢？我可能會猶豫，我沒那麼勇敢，我想說的是：這就是我們目前生活的世界。”陳有個外孫女，於是我問他，“等她長大，你想她做怎麼樣的人？”

他說：“那要看世事如何，假如好人當道，她應該做好人；假如壞人吆五喝六，你別無選擇，只能做惡。”

當天晚上，我請陳賢妹吃飯，就是那位把小悅悅移到路邊的老太太。她應該是我見過身材最矮小的成年人了：4英尺7英寸高，她家人說，應該是她小時候住在廣東山區的關係，當地很缺食物。她只會說當地方言，別人要聽懂很吃力。她兒子及媳婦是她的翻譯，讓她跟外界能溝通。每天早晨，她替五金城的工人做飯，到下午則去找四散的螺絲釘和廢鐵。她說：“每樣小東西都可以再賣出去。”車禍當天，她家人曾勸她，下雨了，別出門。但她說，下雨天才能發財，原因是其他拾荒人都待在家裡。

人們發現她幫助小悅悅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之後，她變成

了小小的名人。攝影記者前來，把她擺到田裡收割莊稼，以凸顯他微寒的出身——而不管她多少次想對他們解釋，當時又不是收穫季節。她受邀到北京6次，接受官方“公益行動”表揚，雖然如此，說實話，去北京的經驗只讓她覺得不舒服。她說：“我又不懂人們在說什麼，而我說什麼，他們也不懂。”

當地官員及私人公司爭著與她合照，而且她收到大約1.3萬美元的獎勵金。但隨著她名氣傳開，情況卻轉為惡劣。她村子裡的人看見她越來越出名，猜測她實際收到的錢遠多於傳聞說的。鄰居開始跟她借錢，不管她說什麼，他們都堅持要借，他們甚至要求她出錢修整通往村子的路。

陳賢妹跟我講，她很感謝那些獎勵，但她寧可地方政府准許她孫子就讀公立學校；他的戶口在鄉下，不能讀城裡的公立幼兒園，因此他父母每月得花700元人民幣，讓他讀私立學校。而她收到的獎金無法撐太久。

她的義舉出現奇怪的後續發展，影響到她兒子的工作。無論多少次，他對同事講，他並有錢，但人們總是認為他母親藏了一筆財富。壓力變得如此巨大，以至於他不得辭職。他能找到最好的新工作，就是一天開廂型車13個小時，累死人。

至於小悅悅的父母，則收到全國來的捐款。有一班當地孩子送來一個餅乾桶，塞滿小額鈔票。小悅悅父親家鄉有家報紙出於好意，鼓勵人們打電話給他，而他被如此反應弄得頭暈眼花。有次只在5分鐘內，他算一算有51個未接來電。

與此同時，一種荒唐的理論在網路上蔓延，說該案是詐騙。影片、女孩、醫生們——人們說，一切都是騙局。漢娜·阿倫特（HannnahArendt）曾提出一種叫做“特殊的損

人利己”，其若在社會裡生根，往往會讓“謊言持續而且完全取代事實真相”。他寫道，這種反應是“絕對拒絕相信任何事情的真相”。王持昌努力想闢謠，邀請當地記者前來，看著他點數捐款，再存入銀行。細數將近4.4萬美元。但詐騙的含沙射影始終不散。到了10月底，王是如此急著儘快處理掉這筆錢，他把它捐給兩名有急需的病人，接下來他與妻子避開群眾的視線。王父討厭出門。夜裡，夫妻倆不斷夢到他們的女兒；王持昌的夢裡，他抱著女兒，背在肩膀上；而他在太太夢裡，小悅悅總是穿著黃色洋裝，一直在笑。過沒多久，王家就搬離了五金城。

到最後，檢察官認定胡軍並非知情而逃離車禍現場。警方重演事故發生過程——用消防車往五金城屋頂噴水——而胡軍則對過失致人死亡認罪。他向王家道歉，而他的辯護人則請求

庭上施恩；還提交一張胡軍抱著自己10個月大的女兒的照片為證。我注意到，他的女兒穿的不是傳統的開襠褲，而是紙尿布，或許這是一個中國家庭踏入中產階級的第一步，最清晰的跡象。當影片在法院播放時，胡軍低下頭，他被判兩年零六個月。

小悅悅死後幾個星期，深圳市起草中國第一部法規，保護“好撒瑪利亞人”免於法律責任，把舉證的擔子交給控方，而且對誣告設下處罰，其範圍從公開道歉到拘留不等。法律只差沒要求路過的人必須參與（在日本、法國等地則有此義務）——但它不失為中國修法最偉大的一步。日子一天天過去，我開始同情起五金城的男女老少——我必須承認，也包括那些路過的人。他們被徵召進一則寓言裡，但此中的道德戲對他們的生命積澱並不公平。中國民眾讀到小悅悅之死的感受，與1960年代美國人接受吉諾維斯的遭遇，方式頗多雷同，但仔細觀察，還有諸多未盡之處。

想反駁中國人不再關心彼此的理論，最明顯的證據就是他們真的關心：每一支說人們漠視彼此的影片出現，就有相反的例證指出人們在冒險保護他人。2012年12月，有個發狂男子持刀衝入湖南省的一所小學，刺傷22名學生，監視錄影顯示，此時有另一名男子在追逐他，而所攜帶的武器除掃帚之外，別無其他。市場時代帶來諸多霧化效應

（AtomizingEffect），但樂善好施的文化並未畏縮，而是在成長。以往被黨關閉的私人慈善組織，現正重返。捐血成長如此之大，以至於往日的賣血販子、挨家挨戶要農民倒立的人，全部都消失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後，超過25萬名志願者趕往當地幫忙，其中大多數是年輕人，而且自費前往當地。人類學家周如南對我說，“年輕人正在練習變成完滿的個人，而非自私、孤絕的人。那正是希望所在：在年輕人。”

黨煞費苦心想提倡道德，卻得到空洞的回想。我跟大家談到小悅悅一案的時候，國營電視正在播毛主席發現戰士雷鋒60周年的紀念。雷鋒是社會主義奉獻者的偶像。公車站台滿是雷鋒的海報。黨為三部新拍的雷鋒電影加持祝福，但這場全面的宣傳攻堅遭到慘敗，沒人要看雷鋒電影。《環球時報》有篇新聞報導，電影院向空無一人的座椅播映該電影，“以防有人檢查”。在線上，人們揶揄雷鋒：大家統計數據後總結指出，如果雷鋒真如他宣傳的撿過那麼多糞，那他必須在9個小時內，每走11步就碰到

1塊大便；另一篇貼文暗示，雷鋒很可能貪汙，花在治裝的

費用，要比他薪水能支撐的來得多。貼文的兩名男子被抓了起來。警方聲明說，“雷鋒的光輝形象遭到某些網民質疑，很多網民向警方報案，呼籲徹查製造謠言、玷汙雷鋒形象的人。”

有時候，我很好奇，中國領導人若是能提供可靠的跡象，顯示他們正努力把國家機構變得更講道德、值得信賴與誠實，而非揮舞雷鋒與和諧社會的旗幟，那麼事態應該有所改觀。有所為，有所不為，這個政權所執行的道德觀至少很遵循孔子。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政府以其濫權、欺騙，而無以講出可以說服人的論調，闡述中國在當代世界裡的意義。黨已經把它的合法性，押在繁榮、

穩定，以及奉祀空洞英雄的公廟上。如此行徑，在競逐靈魂的戰場上已丟盔棄甲，逼得中國人民必須外出到思想的市場遊逛，找尋他們自己的偶像。

Chapter21靈魂爭霸

這一路走來，不知哪個時間點，我跟一位叫林谷的朋友失去了聯繫。他是一個人脈很廣的記者，自命“社交花蝴蝶”，他自詡自己的家裡從來不必開火做飯。我跟周圍的人打聽，有位朋友告訴我，林已搬進山裡，開始修行當和尚了。這件事倒不稀罕，中國最近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國家。有一次林谷回北京，我倆共進晚餐。我在地鐵外遇到他，他穿了一襲寬鬆的褐色棉袍，頭髮剃光。他住在一個偏遠山區，離最近的城市約兩個鐘頭路程。

“老生常談，是吧？”他說著笑起來，“中產階級和尚？”身為中國記者，林谷向來奉行的金科玉律，是“一切都懷疑”。他時年38歲，成長於文革之後的充裕年代，當時人們對政治沒什麼興趣。他母親年輕時，是忠誠的黨員，而林谷獻身於信仰則拖到很晚。2009年冬天，林谷花大錢，招待母親到泰國一遊。他搭機之前，到成都一家書店逛，湊巧看到一本和尚的回憶錄。他根本沒料想那本書對

他影響那麼大，他說：“我發現佛陀是個靈感，他邀請我勇敢地思索這個世界；佛陀可以挑戰任何社會常規，比如印度的種姓制度。”他繼續說：“我從此開始重新思考舊有的思維框架。”

林谷的泰國旅遊，時間全花在飯店房間裡，浸淫於書中——“我甚至游泳池都沒去。”等他回家之後，便開始頻頻造訪北京自家公寓附近的一所佛教機構。他轉型的瞬間來自他領悟到一個理念的那時候，依他所言，“這個世界是幻影”。他發現不可

能再回到以往的工作狀態。他問道：“我們為什麼要黏著金錢、名聲及社會地位不放？”他繼續說：“身為中國記者，你必須戴銬而舞；無論身處何處，都得臨深履薄；得跟政府及宣傳部官員勾心鬥角，還有你報導的當事人……我們浪費一大堆精力與時間，想繞過宣傳機構的重重障礙。到那時候，你已筋疲力盡，截稿時間已到。因此，你對自己報導的專業水準不會感到滿意，會嫉妒西方同行可以專注於寫作本身。”佛教給他的解答，是新聞辦不到的，他說：“我追尋真理已有很長時間了。”

21世紀頭幾年，活在中國目睹宗教復興，堪比美國19世紀的“大覺醒運動”。中國民眾急於先有車有房，再問道德。這種刻板印象正逐漸過時，人們發現的真相越多，就越挑戰舊有規矩。為了找尋意義的新來源，他們不只仰賴宗教，還有哲學、心理學、文學，在一個意識形態不連貫、野心又無情的世界裡，尋覓指引自己的新路子。在一個超級競爭、市場導向的社會裡，個人對陌生人有什麼義務？在說實話反而很危險時，公民必須說實話的責任有多大？試著從內部改變威權體系，還是冒著一點效用也沒有的風險從外部反對它，哪種比較好？

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喚醒、刺激人們的方式，一如當初追求財富。2012年12月一天晚上，我來到中國東南海岸的廈門大學，學生們當時簇擁在演講廳外——人數超過建築物能容納的1倍以上。我站在大門旁，望著年輕人越聚越多，在玻璃門外，他們的臉上泛著紅光。警衛緊張兮兮，呼籲大家冷靜。大學校長打電話給當晚活動的籌辦者，警告他們別讓場面失控。學生們熱捧的目標——此君在中國取得的歡迎程度，誠如

《中國日報》所述，“通常只有好萊塢明星及NBA球星才辦得到”——是位內向的美國明尼蘇達州人，名叫麥可·桑德爾（MichaelJ.Sandel）。桑德爾是哈佛大學政

治哲學教授，開一門很受歡迎的課程叫“正義”，向學生們介紹西方思想的基石：亞里斯多德、康德、羅爾斯等人。

桑德爾指出各家哲人面對真實世界，要做道德決策而有兩難局面時的理論。折磨可以理直氣壯嗎？你的孩子要靠一種藥才能活下去，你會用偷嗎？這些課程曾拍成美國公共電視系列節目，放到網路上。影片開始在中國流傳，中國志願者幫它配上字幕，兩年之後，桑德爾取得的名流地位之高，幾乎到不可思議。中文版的授課內容，論西方政治哲學，點擊量至少2000萬次。《中國新聞周刊》把他評為2010年“最具影響力外國人”。

桑德爾快60歲，是理智、一絲不苟的人，灰髮漸疏，淡藍色眼珠，帶著無表情而通徹的神色。他比較習慣與妻子、兩個兒子在布魯克林的生活，但他也慢慢適應從國外獲得的聲名，尤其在東亞：在首爾，他在室外體育場演講，聽眾有1.4萬人；在東京，他演講的黃牛票炒到500美元。只是在中國，他激起近乎宗教般的熱忱，有一次，在上海浦東機場，護照檢察官攔下他，只為了向他傾訴，自己有多麼崇拜他。

廈大演講廳外，聽眾不斷增加，直到籌辦者最後決定，只有大開四門，才能防止踩踏事故發生。所以，儘管仍戰戰兢兢，他們還是放聽眾湧入大廳，直到年輕男女把地板坐到水洩不通。桑德爾走上講台，他身後是一張巨大的塑膠告示板，上頭有他最新著作的中文書名《錢買不到的東西》。他在書中寫到，現代生活的太多特徵，是否正在演變為他稱為“生財工具”的東西。在一個似乎一切都有價碼的國家——軍方職位、婚姻、讀幼兒園資格——他的聽眾聽得如痴如醉。他對聽眾說：“明確地說，我不是主張反對市場，我想主張的是：近幾十年來我們已經偏離道路，而且幾乎沒有察覺，我們要市場經濟，而非變成市場社會。”

桑德爾提到一則新聞報導：王尚昆（音）是出身安徽省偏遠地區的17歲高中生，上網聊天，被慫恿去非法賣腎，獲得3500美元，這件事在他母親發現他拿iPhone手機及iPad平板回家，接下來則發生腎衰竭後爆出。動手術的外科醫生及另外8人以10倍價格轉售這顆腎，因此被捕。桑德爾對聽眾說：“中國需要器官移植者，有150萬人，但每年可取得的器官只有1萬枚。”他問道，在場的人有多少支持腎臟市場自由化合法化？

一位身穿白色汗衫、戴厚眼鏡、英文名叫彼得的中國年輕人舉手，大發自由主義言論，支持腎臟交易合法化，認為可以消滅黑市。其他人則不表同意。桑德爾加碼，說有位中國父親已賣掉一顆腎，“幾年後他需要送兒子去讀書，有人來找他，問他要不要賣另一顆腎——如果他願意付出生命，心臟也可以。那這種情形，有什麼不對勁嗎？”

彼得思索一下說：“只要是自由、透明且公開，富人可以買到性命，沒什麼不道德的。”這話激起聽眾一陣騷動，有位中年男子在我身後大喊：“不對！”桑德爾先安撫全場，然後說：“市場的問題，事實上是在質問，我們打算怎麼樣合群在一起，我們要一個什麼都可以賣的社會嗎？”

翌日，桑德爾對我說：“我走訪各式各樣的國家，自由市場的設想與信仰，在中國年輕人當中，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來得

強，美國或許有得比。”然而令他最感興趣的是相應相抗的力量——也就是想到賣第二顆腎，群眾泛起的騷動。他說：“假如你探索、琢磨，你會發現限制把自由市場擴展到一切的例子，此起彼伏。”

在中國，外來思想激起熱潮，行之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杜威（JohnDewey）前來中國游訪，激起大批追隨者。後來則有佛洛伊德與哈伯瑪斯。2007年，桑德爾第一次來訪，時機已經成熟。北京清華大學萬俊人教授介紹桑德爾時，說中國有“哭泣的心”。桑德爾生涯很多時間用在考量他稱為“身為公民同胞，我們彼此該有的責任”。他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雅波利郊區的霍普金斯成長到13歲，再隨家人搬去洛杉磯；在當地，同學們會翹課去衝浪。這種行為，與他在中西部的成長習慣有所不同。他對我說：“南加州對形成今日我的影響，乃在見識到無拘無束的自我在運作。”他很早便對自由派政治學產生興趣，先去布蘭迪斯大學，後來拿羅德學人獎學金到牛津讀書，有一年寒假，他與一位同學打算合撰經濟學論文。桑德爾說：“我朋友睡眠習慣很奇怪。我固定時間上床睡覺，大約在午夜，而他呢，可以熬夜到任何時候……這讓我有很多個早晨可以讀哲學書。”到了開學，他已讀過康德、勞爾斯、諾齊克及鄂倫，擱置下經濟學，改讀哲學。

接下來的歲月中，他主張公共生活中直接談論道德。他說：“馬丁·路德·金公然援引靈性及宗教素材。羅伯特·甘地1968年競選總統時，他暢談的自由主義也有道德及靈性的迴響。”只是桑德爾說，到了1980年，美國自由派人士避而不用道德與美德的語言，原因在它後來被視為“應該是宗教的事”。“我開始覺得，這種價值中立的政治裡，有些東西在流失，所以我想，1968到1992這段時間，美國自由主義或多或少有些萎靡，失去了激勵人的能耐，這不是意外。”

2010年，中國出現一群翻譯志願者，自稱“人人影視”，合作把外國節目加上中文字幕。當情景喜劇及警匪劇都做完了，志願者們轉向線上可取得的美國大學課程。桑德爾在此之前曾造訪過中國一次，對小群哲學系學生演講，可等他的課程上網再返回中國，他發現情況有所改觀。他說：“他們跟我講，晚間7點才演講，孩子們下午1點半就開始占位置。他們多到講堂容納不下，而我得努力走近這群精神亢奮的聽眾。”桑德爾曾看見，他的作品讓其他國家激勵，但在中國如此突如其來，則沒見識過。我們聊著，試圖了解這種現象的意義。哈佛大學光環當然有關係，公共電視製作節目時的修飾，讓它看起來比其他

節目更有趣。但對中國學生而言，他的教學方式也是一種啟示：他要求學生們做自己個人的道德論述；進行並無單一答案的辯論；對無止境、複雜的事務做創意、獨立思考，其方式以往在中國課堂聞所未聞。

然而，除開教學風格，桑德爾感受得到，中國對道德哲學有強烈興趣，此中有更深沉解釋。他說："有道德哲學曾引發興趣的各種社會，從來沒有這般光景——不管什麼原因——大眾如此認真討論重大倫理問題。"年輕人特別"感受到公共論述方面，有種空虛，而他們想改善事態"。在BOBO族及白手致富的年代，中國最講究不羈的自我，在這裡人們能釋放自我，不受社會契約、歷史所約束；依據自我利益來下決定，而且其方式在以往絕不可能。統治國家的技術官僚，公開時提倡一種眾所懷疑的意識形態，然而在實務上，官僚們的信仰是押在經濟與工程，講效率到無情的程度。鄧小平認同繁榮富裕是"硬道理"之際，他讓中國走向充裕的路途，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但中國也出現偽藥、現金堆積無路可去、男人只要是"三無"就得當光棍。桑德爾與他傳授的政治哲學，讓中國年輕人取得一種他們認為有用且挑戰的詞彙，但又不至於顛覆；這是一種框架，在其中談貧富不均、貪腐及合理公平，聽來不像在說政治。它是一種談論道德的方式，不必援引"只有姐妹"（justsisters）來自衛，或是在澳門展出的野心。

桑德爾從不公然挑戰中國政治的禁忌：分裂勢力、黨高於法。但中國當局偶爾會把他刷回去。有一次，上海的中國作家、學者沙龍安排桑德爾在800聽眾前公開演講，但是演講前夕，當地政府把它取消。桑德爾詢問籌辦人："他們有什麼理由嗎？"

籌辦人說："沒有，他們從來不給理由。"

有時候，桑德爾會碰到中國批評家的懷疑。有些人看來，他的反市場主張理論上很好，但罩上薄紗的公平觀念，觸發中國人想回到配給券及貨架空空如也的時代。其他人則主張，在中國，只有錢才保護你，免遭政府濫權侵害，因此限制市場只會鞏固政府的鐵腕。但廈大演講之後，我觀察他在北京對幾所大學聽眾發表演講，狀況很清楚，他描述生活的"天價化"（skyboxification）——美國分裂為有錢人過的世界，與其他人的世界，兩者不同——中國聽眾發現很多相似的地方。往一切都可買賣的未來世界

長征30年之後，很多中國人都在重新思索。

桑德爾北京最後一夜，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發表演講，再會見一群志願幫他把“正義”演講系列中譯弄得完美的學生。有位年輕女子大喊“您的課程拯救了我的靈魂”。桑德爾還沒來得及問她指的是什麼，群眾就簇擁著他離開，要求合照及索取簽名。我則退後，向女生自我介紹。她名叫施儀（音），24歲，正在攻讀人力資源碩士學位，他對我說，自己遇見桑德爾的作品，它是“開啟我新智、質疑一切的鑰匙。一個月之後，我開始覺得不一樣，那是一年前的事了。而今天，我經常捫心自問，這裡有什麼道德兩難？”

她父母曾經務農，直到後來父親去做海鮮生意。“我陪媽媽去拜菩薩，祈禱並在桌上供奉些食物。在過去，我不認為一切有什麼問題。但一年以後，我再陪我媽，就問她，

‘你幹嘛這麼做？’”她的母親對這一切問題不怎麼高興。“她認為我在問傻問題，我開始詢問一切，倒不是論是非，只是發問。”

施儀不再向黃牛買火車票，原因如她所述：“當他依他所設價格來賣，就限制了我的選擇。若是價格不由他定，我就能決定要買硬座或軟臥，可現在他剝奪我的選擇。那麼做不公平。”她開始遊說朋友們也這樣做。“我還年輕，力量沒那麼大到可以改變許多，但我可以影響他們的思考。”

施儀快要畢業了，但她發現政治哲學讓事態變複雜了。“我遇見這些授課之前，我很肯定自己將成為人力資源專家，在大公司當人力資源經理，替受薪員工服務。但現在我困惑了。我質疑原先的夢想，希望做些更有意義的事。”她不敢跟父母講，但私底下她希望自己找不到人力資源工作。“我可能偷空一年出國旅遊，邊打工邊看看世界。我想了解自己能對社會有何貢獻。我想自助旅行，原因在中國許多旅行團都很市儈。總而言之，旅行一切都是你的經驗。”

我問道：“你想去哪裡？”“紐西蘭。北京的空氣太糟糕了，我想逃離到純淨清新的地方，休息一陣子。然後我再思索下一個地方，可能是西藏吧。”

遇見一些幾乎是因為遭遇意外而轉移到新的信仰領域裡的人，對此我已經司空見慣。有位經濟學家叫趙曉，他對我說，“若是中國菜讓我更強壯，我就吃中國菜；而若是西式餐點讓我更強，我就吃西式的。”趙的務實主義讓他很吃得開——到了45、46歲時，他入黨，並得到北京大學的博士學位；他著手研究是否能夠從主流的基督教社會中援引出什麼政策的課程，

並在首都各大知名院校教書。趙結論認為，基督教可以協助中國打擊貪腐、減少環境汙染，而且會刺激出早年曾領導美國基督徒創建哈佛及耶

魯大學的那種慈善主義。趙對我說：“我們看見蘇聯及全東歐的共產黨都垮了，而國家也隨之四分五裂。”他說，只是在中國，黨存活下來，“正因為它持續變革。”

共產黨面臨著持續增加的壓力，要改變其看待人民信教欲望的方式。中國憲法保障信仰自由，但這項權利受到法規縮限，因為禁止改信以及其他活動。中國官方只承認五種宗教——道教、佛教、伊斯蘭、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信眾可以在國家控制的場合膜拜。2000多萬名天主教及基督教徒做禮拜的教堂，是由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及其對應的三自愛國教會所經營。但到未經註冊的“家庭教會”去做禮拜的人數，在其一倍以上；這些機構，範圍由鄉下農舍裡的小型研讀團體，到城市裡大型的、半公立的信眾聚會都有。家庭教會未受法律保護，因此，假如政治命令下達，要加以鉗禁，官方可以某一天寬容它們，而翌日卻強行關閉。近些年，黨雖步伐蹣跚，但邁向寬容；台面下，它允許家庭教會成長，但它對[砝侖攻]的攻勢依然毫不妥協，在西藏及新疆的少數民族自治區，對佛教及伊斯蘭所設的各種限制，也經常引發騷動。

儘管有風險，信眾的人數還是大為成長，尤其在知識分子當中。有位人權律師叫李建強，我們吃午餐時，他勾出一長串已改信的同僚，他們正運用法院，試著為自己的信仰贏取更大承認。他對我說：“他們才不在乎誰掌權：凱撒、毛澤東、共產黨。誰掌權都成，但不能妨害我對耶穌的信仰。”一位世俗自由派作家李凡（音）對我說：“基督教很可能已成為中國最大的非政府組織。”以往避人眼光的家庭教會，目前只要找得到空間，便爭相成立。我在“三溫暖城”參加過一場格外令人振奮的布道，這是家夜總會兼做推拿按摩，裝潢著霓虹的環境堪稱不敬神。我跟傳道人金明日牧師談到這一點，他露齒而笑說：“這裡租金很好啊。”

金牧師39歲，波浪狀灰髮濃密，有著電視福音傳道人的活潑本領。他出生在不信教的家庭，加入共產黨，在北京大學讀書，命中注定可享受郊區中國生活的種種寧靜、安逸。但是讀大三那年，[添安門]鎮壓事件動搖了他對政府的信念。他說：“1980年代的大學生很受國家照顧，政府幫我們付學費及生活開銷。”但突然之間，他“感受到無限的絕望”。教會讓他有出路；它許諾著道德的澄澈，以及成為一個比中國還大的事業體

的一部分這種感受。他對父母說，他要改信教，“他們認為我瘋了。”

長達十年間，他在中國官方的新教教會傳教。接下來他有個想法。與其開一家信眾全擠在客廳裡的傳統“家庭教會”，他倒想變得“公開而獨立”。他說：“我們沒什麼要隱藏的。”金形容，當局規勸他“別走非法的路”，但他安撫他們說自己無意搞對抗。他對我說：“起初，我們有個龐大、一切都管的政府，但政府在穩定的收縮之中，而民間社會的力量及規模都成長了。我覺得教會應該好好利用這個機會來擴張。”

2007年，他在三溫暖城五樓的辦公空間找到一個安靜角落，雖然空間枯燥乏味，但很大，足以容納150人。中國的未註冊教會有不成文的老規矩：規模要小，避開當局。然而，金卻在室外掛了招牌、印名片、歡迎警方光顧他舉辦的活動。他把它叫做“錫安教會”。

錫安教會剛開幕，一位牧師服務20名信眾。一年之間，信眾來到350人——幾乎都是40歲以下、教育程度高的人。我在某個週日來訪，只剩站位，可以聽到孩子們在隔壁遊戲室快樂尖叫的聲音。金擅長表演；他布道時，旁邊有穿亮粉紅袍子的唱詩班，伴奏有鼓及電吉他。他傳授的是非宗派的、保守種類的福音基督教，他還在布道詞中加味加料些流行文化及經濟的參照。當天他結束布道時的呼籲，我不曾在任何教會聽過。他笑著懇求道：“請離開吧，我們沒有足夠的座位供其他想來的人，因此，請保持一天一次禮拜就好。”

隨著行旅中國，碰到基督徒已不再令我驚奇了。有次往東部海岸的商業重鎮溫州市一行，我去拜訪商會會長鄭騰濤，他是中國最有錢人之一，也是工業實業家，總是在隨扈陪行下，坐銀色勞斯萊斯繞行全城。他在中國的經濟裡乘風破浪，但是當毒奶粉事件發生，嬰兒中毒時，他終於認為中國不對勁了。鄭對我說，自從十年前成為基督徒以來，他致力於勸說其他生意人簽署道德保證。他屈指數出各種要求：不逃稅、不賣不合標準的產品、不“改變契約及保證”。但他問我：“假如我值得信任，而他人則不是，那會怎樣？到最後我豈不是輸家？”

對成長於經濟及個人生活都不再受控制的年輕男女，要限制他們能不能信教，似乎已經過時了。我遇見25歲的馬君燕（音），她是基督教唱詩班的成員，該班替各家教會表演而維持生存。這些開銷都不入帳，我問馬，她的唱詩班申請表演，要不要經過地方政府批准。她扮了個鬼臉，對我說：“耶穌教我們向大家傳教，他從來沒說：‘你必須有執照才能傳教。’”實情當

然遠遠複雜得多，但我了解她的意思：她活在一個如此自給自足的世界，不必對政府思量再三。馬與另外50名團員合住在市場小街的宿舍裡，路面有車轍，兩旁則是賣包子及蔬菜的小攤。嚴格來說，他們這個團不算合法，但他們的生活沒什麼格外偷偷摸摸的。牆上掛的標語寫道：北京歸神所有。這個口號平凡無奇，除非你想起來，北京是歸共產黨所有的。

馬與他人正在排練一套舞，伴奏有吉他、鋼琴及鼓。房間潮濕，塞滿了人，男孩們有的十來歲，有的二十來歲，時而竄高時而伏低，高喊著："這是聖靈的力量！什麼也不能擋！"我以前在美國遇見過這類場景——在西維吉尼亞以及在芝加哥南區——但是在中國，它依然令我驚愕。馬跟她的朋友們與父母一輩不同，在其成年時，基督教不再是危險的秘密。因為有身份高的改信，所以西方宗教有一抹魅力；比如電視女星姚晨，她是中國社交媒體最受歡迎的人。馬跟她朋友們結束排練時，他們低下頭，緊閉雙眼，淚水流下他們的臉頰。兩排陣列的中心，有個女子仰起頭祈禱說："中國會成為基督教國度。"

那種願景——中國會全盤大轉向，皈依西方宗教——除了在這群真誠信仰者的白日夢之中，不然似乎不太可能。中國顯然更傾向吸收西方信仰、哲學中最有用的部分，而丟棄其餘，一如當初中國對待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等舶來品。但是以別種角度來看，中國的認同新而重疊，在這個背景下，它已經是基督教國家——一如它是害相思病的國家、愛扒糞的國家、破除偶像的國家。那麼多事情同時發生，方式空前未有。共產黨不准許信仰的成長，一如黨奮力想追趕上它。

Chapter22文化戰爭

我造訪[愛未未]工作室時，感覺很奇怪——有種壓迫感，空間幽閉得令人恐懼。他的助手正在工作，設計圖用大頭針釘在牆上，但[愛未未]還生活在法律的煉獄裡，雖然能自由創作，但禁止離開首都。警方要求他每次離開家門都要先行報告，他跟我說："我必須向他們報告我要去哪裡，要見誰。基本上我聽他們的命令，原因是這根本不意味著什麼。我還想告訴他們，我不害怕，我可不想偷偷摸摸。他們可以跟蹤我。"

《藝術觀察》雜誌最近公布全球最有力量的藝術家排行榜，[愛未未]列在首位。有位記者電話採訪他有何感想，他說這荒謬至極，因為他"感覺一點力量也沒有"。他覺得脆弱，在很久一段期間裡，他第一次向自己無法控制的力量屈服了。

[愛未未]已走出監禁，並投入更大的戰役，以爭取影響中國

的文化生活。在這位藝術家獲釋不久，國家主席胡便立志強化中國“文化安全”工作，他警告說：“國際敵對勢力正加強西化、分裂中國的戰略陰謀。”主席呼籲國人要“敲響警鐘，提高警惕”。黨正在意識到一些急迫的問題：如中國藝術、理念及娛樂的邊界由誰來界定？在政府、異議人士、企業大亨與耙糞人之間，公眾會相信誰？

黨決定採用當初對經濟很管用的方子——計劃、投資及制定規則——然後應用在文化領域。第一批目標鎖定了地方電視台的選秀節目，黨下令電視台拿掉“重複、越線及泛濫過多的節目，包括那些談愛情、婚姻、友情的東西；還有選秀、煽情故事、電玩節目、綜藝秀、脫口秀及紀實節目”。3個月內，政府把那些東西的數目砍掉2/3，而且宣布讓電視回歸到宣揚“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

藝術家、作家及製片人逐漸失去了耐心。中國可以在一天內新增電影銀幕10塊，但其製片人卻被掐得透不過氣來。導演賈樟柯抱怨說，為了在中國發片，“我得把所有的共產黨人描繪成超級英雄。”中國產出的電視節目比任何國家都要多——每年超過1.4萬檔——但其他國家不要那些東西，所以中國進口的電視內容，仍要比出口多15倍。當裝模作樣的韓國影片《江南Style》轟動網路——中國藝術家們則抱怨說，他們是做不出這樣的作品的，原因是主管官員絕不會允許戲謔嘲弄北京上流精英的東西。反之官員們堅持，出口用的音樂影片要堂而皇之，令人印象深刻。藝術圈流傳一個苦澀的喜劇短片叫“上海Style”，影片中江南Style舞步的創造者，不但未能獲得灑下來的鈔票，反而被關起來，罪名是“瘋狂四處跑”。

文化界人士變得越來越辛辣。電影導演陸川本來答應替北京奧運會製作一個短片，但他被如此多的官方“指南及命令”干擾，最後只能放棄，並造出一個新詞來形容這一問題：“功夫熊貓”。這個詞彙要形容的是：那部有史以來描述中國最成功的動畫片

《功夫熊貓》（KungFuPanda），事實上必須由外國電影公司（夢工廠）來生產，原因是中國製片人沒能獲准，拿這個嚴肅的主題來搞笑。

“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刪檢人員總是私下作業，他們絕不會公布自己的命令和指示，只是現在，導演們開始向民眾公開抱怨了。2013年4月，電影導演馮小剛領取“年度導演”獎項，發表獲獎詞時，抓住機會大膽陳詞，他縮短自己的感謝對象名單，然後說：“過去的20年，中國的每個導演都備受煎熬，

這種煎熬就是審查！”

馮小剛並非異議人士，他靠拍浪漫喜劇及大預算史詩電影白手致富，只是數十年來的妥協、退讓，在他的專業自豪裡留下不平的傷害。他對聽眾們說：“為了通過審查，我得把自己的電影往壞裡改。”若是馮小剛的論點講得還是不夠清楚，那電視觀眾可以看看刪檢人員好像不經意的示範：就在他致詞時，控制間不知是誰，及時按下了按鈕，刪掉馮談到的刪檢行為。電視機前的觀眾只聽到馮小剛說，“這種煎熬就是——

‘嗶’。”

一些中國最有創造力的人認定，按規矩玩的成本，要超過利益。在馮導大暴走幾個星期後，作家慕容雪村也遭到限制，網管刪掉他的微博帳戶後，他發表一篇散文叫《給匿名審查人員的一封公開信》，他寫道：“在未來的幾年裡，我會長期奮筆反抗，不停創作直到看到黎明的曙光……我意識到這封信可能只會給我帶來不幸……我曾經恐懼，但從現在開始，我不再懼怕……這就是我們之間的不同，親愛的匿名審查員——你擁有的只是現在，而我憧憬未來。”

為了創意而奮鬥，遠超過電影及小說的界限。中國經濟已來到轉折點：廉價勞工的時代快要結束，中國領導人也絞盡腦汁，想培育創新，以讓國家超越組裝線時代。中國在研發方面的投資僅次於美國，而且已超越美、日，成為最大的專利申請國。但其中很多沒什麼價值；提出申請只為符合政治目標或吸引資金。中國生產的科學論文數目，除了美國，別的國家望塵莫及，但就品質的測量標準（論文平均獲他人引用次數）來說，中國連前10名都打不進去。學術造假猖獗。浙江大學有本期刊，使用“交叉檢查”軟體，掃描抄襲行為，發現收到的所有論文裡，1/3有抄襲，不然就是從以往論文裡拷貝篇章。在一項政府支持的、由6000名中國科學家所做的研究裡，有1/3的作者承認自己捏造數據或者抄襲。

在北京清華大學蒼翠的校園裡，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悲嘆說，很多中國機構根本是在擋路，不讓國內某些最有才華的年輕人出頭。他舉例說，在一個渴求要冒險的時代，在一個白手致富及出現農民達文西的時代，1999年政府創設小型企業創新基金，但其官僚DNA卻叫它只押安全賭注。薛院長對我說：“鑑於它是公家基金，他們在乎的是，如果失敗機率很高，審核不怎麼好，人們就說：‘嘿，你們在浪費錢。’但創投資本家則說：‘碰到一大堆失敗，是很自然的事。’”要培育新銳創意，並讓它們發展，所耗費的可不是簡單的宣布自己有此野心，就足

矣；它需要強大的法庭，以保證不受政治干擾，且可以保護智慧財產權，如此創業家們才能彼此信任，足以推動創新及合作共事；它需要大學實驗室，裡面的創意思考者可以自由挑戰其老闆，不必害怕報復，也不擔心中宣部會來干擾。部落客兼新聞分析家趙靜習慣用“安替”的筆名寫作，他便問道：“若是你厚顏無恥地抄襲美國網站，就變成億萬富翁，然後再推它上市，那麼誰願意挺身而出搞創新？”

有時候，中國操行其控制，在制度面上的本能反射，違背生產力幾乎到了叫人窒息的程度。曾有一度，網路工程師被禁止更新一套很受歡迎的網路應用程式叫“Node.js”，原因是它的0.⑥.④版本使人聯想到⑥月④日，[添安門]鎮壓的日期。還有另一個案例，有個數字設計方案，取名自瑞典一個叫法倫（Falun）的城鎮，結果被封殺，原因是防火牆把這個名字詮釋為“提及[砝倫攻]”。臉書上市前幾天，投資銀行家兼哈佛商學院畢業生、易凱資本創辦人王冉，翻閱臉書的上市說明書，看見一個句子提醒投資人說，臉書在4個國家遭到封禁：伊朗、朝鮮、敘利亞及中國。他看見中國列居世界上某些功能最失常的國家之一，這實在令他錯愕，他對自己數百萬名社交媒體追隨者說：“我不認識各位，但我開始認為，國事如此，實為汙辱。”那記尷尬像是蜂蜇，其背後還有一個問題——攸關中國未來的深沉問題：假如中國連讓他的人民使用臉書都不敢，它怎麼能期盼發明出“下一個臉書”？

挑戰中國文化的限制，無人可以超越[愛未未]，而當局最後回應的策略，是叫他住嘴。他獲釋後第5個月，也就是11月，政府勒令他支付“未繳納的款項及罰金”240萬美元，說是跟3宗建築設計案有關：他替北京設計的攝影博物館、替英國及新加坡付費客戶設計的兩間公寓。[愛未未]懷疑，這些案子會吸引官方最高矚目，是因為它們牽涉到海外客戶及戶頭。但[愛未未]並未接受罰單，反而挑戰它；按照法律，假如他在

15天記憶體入80萬美元（罰單金額的1/3），他就可以提出上訴。這一消息傳開之後，援助源源而至：人們把百元大鈔折成紙飛機，射過圍牆，進入[愛未未]工作室的院子。他們用現金包蘋果及柳橙，送到他家門口。他們電匯金錢給他。有位捐助人寫道：“別急著還，你可以等到新貨幣出現再還。”

這種反應，叫[愛未未]感到敬畏。“有個年輕女孩背著背包，包裡都是錢，走進來說：‘該把這個放哪裡？’”她對我說：“錢本是購車的積蓄，而我現在不能買車了，錢給你。”[愛未未]表示：“人們會發聲且行動，捐錢給一個政府說是‘罪犯’的

人？這個局面真是無法想像。”他的會計師貼出不斷增多的捐贈，贈與者的名單令人如遭雷擊，我從中認出一個孩子喝了毒奶而生病的爸爸的名字。而到第一週結束，支持者捐贈的錢已超出[愛未未]必須存的金額。他接受捐贈的命題成為微博上最流行的話題之後，他關閉帳戶。我的電話嗶嗶叫了，給中國記者的新指示說：

“刪除提到[愛未未]借錢繳稅的一切網路上訊息，必須迅速刪除互動頁面上趁此機會攻擊黨、政府及司法系統的言論。”

黨的政治八卦小報《環球時報》提到，折鈔票紙飛機扔過工作室圍牆，可能構成“非法集資”，而且傳達一項警告：“過去30年間，[愛未未]之流此起彼伏，可是儘管他們悲觀地預測中國，中國依然持續崛起，真正的社會潮流乃是這批人將被剷除。”[愛未未]等候出庭日，他變得越來越焦躁。冬天來臨，他屋外的樹都禿了，而公安裝在路燈杆上的攝影機突出而刺眼。[愛未未]向它們扔石頭，警方把他拉進警察局，指控他“破壞警用設備”。他的一個粉絲則傳播一則假作關心的揶揄：“鏡頭嚴重受傷了？需要檢查嗎？有可能喔，要電腦斷層掃描，是吧？”

幾天之後，我們坐在他餐廳的餐桌旁。冬季陽光由南方照進來。年邁又耳聾的可卡犬丹尼歪歪斜斜地繞室而走，宛如醉漢。艾的妻子路青下樓走進餐廳，往門口走去。去年發生多起偵訊，還有她丈夫被押期間，她代他發言而造成轟動，對此她還不甚習慣。她的名字在工作室的正式文件上，所以她也被捲入逃稅案。[愛未未]從餐桌看著他老婆，正拿著一條亮紅色的圍巾纏過肩頭，包起來抵禦冬寒。她準備到法院繳交更多文件。她抓起一個牛皮紙袋抱在胸前，打開前門時她稍稍停下來，[愛未未]問說：“你還好嗎？”他點點頭，強笑一下，閃身出門。

我問他是不是有逃稅。坦白講，就是有，我也不驚訝——在中國，人們開玩笑說，逃稅是全國運動。政府研究員估計，在2011年，逃稅使得政府少收1兆人民幣——大約1570億美元——而且他們發現，最大的逃漏稅人事實上是國營企業。每天好幾次，我都會收到垃圾簡訊，打算賣給我偽造的開銷發票，可以用來逃稅。[愛未未]回答我這個問題時說沒有。一般遇到這樣的狀況，我會審核他案子裡的檔案，可是警方查扣他公司的紀錄，不讓大眾及媒體了解法院訴訟程序，我致電法院及檢察官，也沒人願回答我的問題。即使是艾的律師[普至強]也從未獲准審查本案的原始文件。我問藝術家，自己認為會不會贏，他說：“不會，我們只贏在揭露真相。”

他說得沒錯，沒有贏。2012年3月，他申請就他的逃稅指控

舉行聽證會，政府拒絕，所以他試別的招數：他控告國稅局，說該部門在處理證人和證據上有錯誤。這次讓他很驚奇，法院居然同意聽審。只是，等他想前往法院進行聽證時，收到警方來電說："你就算嘗試，也絕辦不到。"他太太及律師出庭，但法院外圍著數百名制服及便衣警察，不讓記者靠近。人權人士胡佳想去參加，結果被候在他屋外的幹員掐住脖子毆打。北京市還更改了大巴線路，繞過法院。他被捕一周年那天，面對他家電話被竊聽、電郵被監視、工作室外包圍著攝影機，[愛未未]決定煩死警方：他在工作室裡裝設了4部網路攝影機，其中1部在他臥室的天花板，他開始在網路上直播自己的生活。他稱此為"weiweicam.com"。警察被搞傻了。幾個星期後，他們下令要他拆除，他不能對自己做監控。他開玩笑說，要寫本有關稅法的書，很可能是當代藝術家的首創之舉。對他來講，任何知識都是他可以創造的藝術，而其具備強大的力量，他說："他們的權力基於無知，而我們假裝不知道。"

[愛未未]本以為獲釋一年後，自己能取回護照，但一周年，即2012年元月來了又過了，卻沒消息。他獲告知，不准旅遊外出，原因是涉嫌另外三項罪名：重婚、非法集資及拍攝淫穢品。當局告訴他，淫穢品的調查重心是照片：一張他在自己工作室裡拍的裸體照，艾本人坐在椅子上，左右有4個女子站著瞪著鏡頭。當他的粉絲聽說他可能因此被起訴，便開始拍攝自己的裸照，以示與[愛未未]團結在一起。

那年秋天的某個早晨，我經過艾府，他悶悶不樂。逃稅案的最後上訴，法院已做出不利判決。政府還關閉他的製作公司"發課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原因是公司未能取得年度登記。（做年度登記很困難，因為警方早已經抄沒文件與印章。）他說："這就好像你跟來自外太空的人玩棋，他們的玩法你怎麼都想不到，而且棋局早就設計好了，不管我下得多好，最後仍是輸家。"

以前我沒聽到他這麼消沉過。他已認定，當前體制的最大弱點，倒不是它不同意你的見解，而在於它根本不屑跟你談，乾脆直接剝奪你抗衡的唯一權利。"每天都坐著等，或許有個官員會來敲門說：'未未，來，我們坐下來，聊一聊，你的觀點是什麼？讓我瞧瞧你有多白癡。'"

他兒子當時3歲半了，我問[愛未未]打算怎麼向兒子解釋艾家的處境。他不發一語很長一段時間，眼眶都紅了。接下來他說，對這個問題他萌生過很怪的幻想："我希望我兒子慢點長大，我不要他太快成熟、懂事。"那是我頭一次聽到[愛未未]支

持無知，勝過知識。“當前的處境根本無法解釋，不講理，對此我真的無從理解。我搞不懂為什麼非要這個樣子。”他的情緒似乎令自己也吃驚，於是他改變話題。他的一切麻煩，讓他感受到身邊正攢聚更廣大的變化。“我想，今天幾乎社會各階層都了解，中國在信任、意識形態、道德標準上，正遭逢大危機，還有很多很多別的東西……這樣撐不下去的。基本政治結構再不改變，中國已走到盡頭，所謂的奇蹟將無法維持。”他說：“共產黨成功了90年，依然是地下黨，從來無法真的說明自己的理念，而且，他們也絕無能力與任何智力上可挑戰他們的人平起平坐。”

我認識[愛未未]這些年來，他已成為男子漢的象徵，他也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最知名的異議人士。談論[愛未未]的書籍、電影及文章不少。可等到這位藝術家變成名流，藝術界似乎失去了耐心，急著找下一個替代品。（《新共和》雜誌刊了一篇文章，標題為《[愛未未]：傑出的異議人士，很爛的藝術家》。）最讓[愛未未]心煩意亂的，可能是中國藝術同行的舉動，“我消失期間，幾乎沒有人問：‘這人跑哪裡去了？他犯了什麼罪？’”

我問[愛未未]，對於同行的悶不吭聲，他有何看法。他淡淡地說：“我想他們是害怕，我如果碰到他們，他們總是說100%支持我，但如果

你要他們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他們絕不肯那麼做。”

對有些人而言，[愛未未]為他人設下了並不公平的道德標準。他主張，一個想避免衝突、避開政治的藝術家、作家及思想家，根本就是懦夫。當倫敦舉辦中國藝術展，並受到正面評價時，他則抨擊該展沒能解決“這個國家最壓迫人的當代議題”。他把展覽比擬成一座“唐人街餐廳，賣的是一些如宮保雞丁與咕老肉等標準菜色”。

創意階層因遭逢壓力而掀起的衝突，遠超過[愛未未]的世界；為競逐道德權威及信任而發生的爭戰，漸漸轉向個人。2012年元月，一位名叫“麥田”的部落客寫了一篇標題為《人造韓寒》的文章，他在裡面比對韓寒部落格文章的時間與他參加賽車的日期，總結說文章不可能是韓寒所寫，可能是由槍手代筆的。麥田聲稱韓寒現象是個騙局。韓寒的反應是駁斥，懸賞300萬美元給任何能證實麥田無誤的人。他的粉絲指出麥田的時間點多有錯誤，於是麥田把文章刪除，但是這次論戰，引起了一位不尋常人物的注意，他叫方舟子。

方舟子是生物學家，在密西根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因揭

露學術造假及學術腐敗而名聲大噪。在中國，這種工作很危險。方曾遭到槌子及辣椒噴霧的攻擊，事後證明，這些人是一名醫生僱傭的，而方舟子曾指控該醫生學術造假。方的指控並非全部正確，他曾因誹謗罪被起訴過——依他自述，贏了3件官司，輸了4件——但是在中國新出現的懷疑文化裡，他吸引了大批追隨者。我遇見方舟子時，他對我說，他質疑的信眾有很多種；這麼些年來，他曾批評過福音派基督教及[砝倫攻]，而他看到人們把信仰重重地押在韓寒身上，與信教有類似之處。他告訴我："我想批評的，是他們想製造假的偶像。"按方舟子說法，那些讓韓寒變成明星的事實，比如驟然崛起、習慣一人振筆疾書、堅稱他愛賽車勝過寫作，此時聽來十分可疑。韓寒努力想平息此事，最後掃描、公布了手稿，粗略估計有1000頁，但方舟子反駁說，這些都是影印本，顯然缺乏"情節上的變化，以及特殊點"，他揣摩韓寒的著作，都是由他的父親代筆，一個不得志的小說家，或者出自那位我曾遇過的、伶牙俐齒的出版家旗下的其他作者。

韓寒與方舟子兩位中國最具影響力評論家的碰撞，造成轟動，兩星期內衍生1500萬條相關微博。有些抨擊韓寒的人，甚至要求國稅局去調查他；他們質疑他的賽車成績是否已有內定；甚至責備他虛報身高。爭論韓寒的真相與美德，讓中國知識分子循此戰線而分裂，它如此尖刻，以至於小說家慕容雪村有感而發說："中國知識分子彼此表達巨大的仇恨，為文革以來首見。"天下之大，何以是這件事導致如此激烈的對戰呢？蘇聯時代的詩人葉甫圖申科（YevgenyYevtushenko）一度問道："為什麼右翼那些混蛋總是肩並肩站在一起，很團結，而自由派內部卻分崩離析？"依慕容看來，原因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被打壓匍匐，以至於他們只能趴在地板上爭碎屑吃，這麼多思想家"花那麼多精力在筆墨之爭，我們已經忘了批評政府權威，我們已經忘了關心社會福利，那些才是我們該操心的。"

我去拜訪韓寒，請教他對那些指控的看法。他說："要反駁你從沒做過的事，實在很難，"他暗示指責他的人是神經病，"他們就像那些堅稱美國從沒登陸月球的人。"我問他，其父是否曾用他的名字寫過文章，他說沒有，"我們的寫作方式各異。"他父親在意的是故事，而他只關心情緒。他帶著賽車風馳而過的咆哮說："倒不是說我寫得有多好，我的寫作其實不完美，而是我們的風格截然分明"。韓寒以更廣的原因來勾勒對他的指控，"在這個社會，人們彼此不信任，所以他們利用這份不信任來攻擊他們想攻擊的任何人。"提到方的線上粉絲團，他說："他們只相信自己的電腦。"

說韓寒是他父親與出版商炮製的成品，這種可能性在理論上說得通——或者說，至少不比薄熙來老婆毒殺英國商人，或鐵老大侵吞的現金多到會腐爛，更加怪異。說實話，我倒有幾分想看見對韓寒的指控真實無誤，原因在那就是上好的新聞報導了。我有兩次遇見中國作家，說他們聽聞某人是“韓寒槍手”，但我追蹤下去，總是沒有下文。我採訪過韓父，結果認為，如非韓家父子都是極為高明的演員，不然就是指責韓寒的理論根本是痴心妄想。我認為，韓寒最有可能的模樣是：一個由其行銷團隊精心雕琢出來的作家，但這不是騙局。

依我看來，很多批評韓寒的人痛罵的倒不是他這個人，而是他印證的當下。對指責韓寒者，比如追蹤真相、斥責韓寒為“偽偶像”的方舟子，韓寒的成功，是對傳統知識分子生活信譽的嘲弄，原因在他以惱人的速度產出作品，用半生不熟的作品餵飽市場。而對其他批評人士，韓寒是老於世故的批評家，當風險變得太大，他情願放棄變革的呼籲；韓寒拒絕發言反對[愛未未]被拘留，兩人的關係就變差了，藝術家形容作家“太默從”了。在這些批評裡，我看見共同的根源：人們把他們的期待投射到韓寒身上，而他抗拒他們的投射。依次言之，他最終是個業餘者，一個個人主義政治的偶像而已。我越是從公車站海報、地鐵廣告中看見往外窺看的韓寒臉孔，越是聯想到戰士雷鋒，舊社會主義的看板人物。不管情不情願，韓寒已變成一種穿牛仔衣的雷鋒——承載著一種信仰，而沒人能實現它。

2013年春天，我最後一次順道去看韓寒，感受得到：這些年來他承載著那種信仰，已對他造成傷害。經歷過全套戴銬而舞——雜誌被關、來自黨的警告——之後，他已把他的辦公室搬去上海某住宅區的安靜別墅，四鄰是小型科技公司。他經營一家初創公司，生產安卓（Android）手機的App程式——“一個”（One），一天推送一檔內容給用戶——小說、詩、影片。創辦頭6個月，它就吸引了300萬用戶，但它夠隱晦，不引起中宣部的注意。他對我說：“因為不准我做雜誌，我們就把它轉變成應用”。我們當時身處他房子頂層，一間小而陽光燦爛的會議室，樓下幾個房間裡，年輕員工正在工作，四周是布娃娃、桌球桌等初創公司的裝飾。韓寒說他的時間大多花在與女兒玩耍，開他的跑車。望著他最新的化身，壞孩子作家已退休，我問他為何不再寫披露貪腐、司法不公正等敏感題材。他說：“我們現在有微薄了，在上面人們可以找到所需的一切。我很少寫政治，對我而言，政治已變得無聊了。”

“無聊？”我問道。“因為同樣的壞事一而再、再而三發生。

身為作家，你不想自己寫老套，我有其他方式來表達憤怒，不然，我可以選擇完全不表達。”

韓寒寫作生涯的弧線可以說令人振奮，也可以說叫人沮喪，取決於你怎麼看。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頻頻與黨大碰撞，但這些年下來，他跟當前的體制已找到容納彼此的方式。他的作品對中國的影響力已大不如以往，但要批評他選擇較不喧鬧的方式，也實在很難；熱忱太高，不肯妥協，會碰到什麼重大危險，黨已經讓大家清清楚楚——這一點只讓我發現有人爭取更大自主權而失敗時，還一再選擇爭執，顯得更為突出。

2010年3月，有一次我接到邀請函，參加北京市中心一場典禮：胡舒立總編輯重出江湖，來搞挖掘醜聞了。她與發行人決裂不到4個月，便租下一家餐廳的舞廳，邀滿記者、官員及學者。她開創一個媒體集團，左右手很多是隨她一起離開《財經》的編輯、記者。她耍了想吵架的一招，把新刊物取名為《財新》，在中文裡聽起來像新《財經》。

我在來賓席就坐，看著胡舒立走上講台。她穿了一件紅色有金屬亮片的夾克，麥克風周圍放了花，勉強看得到她的頭。她用尖銳的嗓音說：“我們的編輯方針，客觀報導中國重大經濟、社會變革，不會改變”。她的新事業讓她得到一直想要的股份；她跟手下的編輯們握有3成經營權；剩下的則由一群投資人，以及一份相形進步派的中國報紙《浙江日報》持有。與一家國營報紙共事，自有其風險，但隨著日子過去，她有信心《浙江日報》會實踐諾言，讓她有掌管採編中心的迴旋空間。

接下來兩年，我看著胡舒立與她的員工奮力重新站起來。創刊初期的興奮之後，很多記者逐高薪而他就，或者到較穩定的新聞機構。她冒險行事，有一次她擴張，開發廣播分支，結果成本太高昂複雜，於是她放棄了——有人戲稱這件事為胡舒立的“大躍進”。然而，她撐了下來。從業人員報導有影響力的新聞，談金融欺詐、官員濫權。有一個案例中，掌管一胎化政策的官員經查居然帶走嬰兒，賣到孤兒院，再給外國人收養。胡舒立撰寫火熱的社論，挑戰黨的基本論點，即民主容易引發動盪。中東人民起義時，她寫道：“製造混亂的，正是獨裁制度，而民主則孳生和平。支持獨裁體制，事實上是拿短期利益，換取長期代價。”

文章雖然大膽，但胡舒立的聲音不再超群拔類如12年前她辦第一本雜誌的時候，原因很簡單，此時有太多聲浪與她競爭。企業劣性及貪腐一向是她發力的主要目標，現在每一天都有尋常人在揭發，而他們不必有什麼工具，能連上網就行。以

往只把獨家專訪給胡舒立的企業大亨，現則上網自己發聲。即使胡的老雜誌《財經》都自我重組。王波明或許是感受到自己身為傳媒大亨的光輝陷入危機，於是向讀者保證，自己會抵抗“來自上面的不適當控制”，而且雜誌繼續聚焦於調查採訪。

2013年春天，貝莎娜與我準備離開北京。經過了8年，我們想有機會，借助於距離的隔閡，來思量中國。我們開始與好友道別，而我則最後一次到胡舒立的公司拜訪。這麼些年來，我已把她認定為一種“心臟監視器”，以此測量北京知識分子的生活，她的脈搏加快或減緩，取決於包圍住獨立思考的壓力與機會而定。

我抵達時，《財新》的辦公區又比上次見到空曠了。我知道，年輕編輯記者們正偷偷溜走，找更光鮮或更高薪的工作去了。她的辦公室還能運作，裝潢稀少。我問她，現在在中國要做醜聞揭發者，是變得簡單還是變難了，而她則坦承，競爭者如雨後春筍。她說：“我創辦《財經》時，問題點在無所取材！唯有《財經》！”現在則有太多可取材的，而你必須判定哪些才是真的，因此，必須找到眾人信賴的消息來源。“社會上有個缺乏信賴的小眾市場。”

“你靠那樣能存活嗎？”我問道。“這要看中國的整體情況，若是中國能改變，未來光明，那我們能堅持下去，而且成長很快。”另一種狀況她沒說。思索了片刻，她接著說：“我想，要叫中國走回頭路很難，所以我還是心存希望。”此時她在廣州中山大學兼課，接觸年輕人，叫她重拾活力，“大學生們問我說：‘我們知道當記者很難，因此，你為什麼鼓勵我們去當記者？’我說，若是大家都知道很難，而你總之堅持去做，你會成功的。人人都怕難，所以他們不來競爭。”

對胡舒立來說，決心從頭開始，意義不只在新聞或出版，她忠於那些一開始就激勵她的想法。“我們不想死，我們要的是新生。”他說，“這些年輕人很有自信、很樂觀，而他們在引導我。他們的年紀大約在30-40歲之間，都有創業取向。他們信任的不只是我，還信任未來。那對我來說，不僅是壓力，還是鼓勵。他們說：‘我們何不自己做？我們有能力再次開始。’”她笑開了，說：“當然，對我來說壓力很大，但有時候，你就是得做出選擇。”

Chapter23真正的信徒

愛國者唐傑再次躍躍欲試，那個民族主義影片讓他一戰成名，這些年他住在上海、柏林、以及北京——他加入北京“四月

傳媒”還不到6個月，便計劃更大的行動：他打算把自己的工作擴大，不僅批判西方媒體，也批評中國媒體，而且發表政治評論；他要把自己的權威意見，拉高到其他線上同行的水準之上，從而躋身於他稱之為“獨立傳媒”的水準。他的幾位合伙人不同意，他們擔心一旦跨出狹小的專業範疇，會讓他們關門大吉。唐傑告訴我：“我們都密切關注著這個國家和它的問題所在，這就意味著政治，‘政治’一詞的英文字根與政策、警方相同，如果你要談一個國家的崛起，要避開這個主題實在不可能。對我們這樣的年輕人，若是不談政治，那麼該談什麼呢？”

2011年8月，他與10名員工出走，創辦一個新的網站“獨家網”。新口號野心十足，叫做：“與中國一起崛起”。我認識唐傑的4年裡，中國網民已增加了1倍，達到了5億人，而他想成立中國民族主義者的YouTube。他說：“我們要的不只一個態度。”唐傑找到天使投資人，籌到300萬人民幣來周轉運營，在北京百度總部的隔壁租了一套辦公室。他與同仁們把一間屋子改成錄影室，透過網路播送訪談及教學演講。為了看起來很搶眼，他們找到都柏林一家圖書館的照片，讓它呈爆炸形狀，貼在牆上當背景。

他們製作的影片檢視過中國的太空計劃、歐債危機、高盛銀行、希臘債務問題及槍枝管制。他們自始至終地懷疑西方，他們也批評胡舒立總編，說她呼籲改革、引進自由派民主到中國來，不啻在“書法真跡”上塗抹出“偽西方的油畫”。即使依中國標準來看，唐傑的民族主義都走得過於極端。有一次，他批評國營電視台立場太軟弱，而中央電視台的一名記者把他叫成“五毛”——這是個忠誠的“輿論引導人”的稱謂。我問他：“央視新聞說你是支持政府的誘餌？”他咧嘴笑說：“沒錯，我們認為那有點滑稽。”

我碰到過有錢的中國商人投資唐傑這樣的網站。而在獨家網，他的投資人卻不願意透露姓名。“300萬元對他而言並不多，那個數目在北京根本買不到一套房。”唐傑說，“我們想盈利，一開始我們的投資人也認為我們做得到。”但後來證實很難：2012年4月，薄熙來的謀殺醜聞事件驚動了黨的檢查人員，他們展開廣泛的行動，掃蕩網路上的政論，這使得連唐傑的愛國網站都受波及，他從國新辦收到通知，要求關閉1個月，等待“認可”。我們交談時，唐傑使盡全力，讓自己看來和顏悅色，他說：“‘認可’的意思是你必須告訴他們有關工作人員的資料，誰在管理，他們都會記錄下來，然後你才能回去做事。我們了解，他們必須這麼做，不然政治評論會泛濫得一發不可收

拾。”他接著說：“那件事很煩人，但我們從沒停止工作，即使我們自己的網站被關，我們還是可以把自製影片送到其他網站，傳播出去。”

“你認為網站被關合理嗎？”我問，這問題讓他想了一下。“我認為他們做得太過火了。當然，我們希望氣氛能自由一些，只是，‘自由一些’是很抽象的概念……我們必須保持有建設性。”

唐傑的信仰還在。但是等待“認可”從1個月變成了3個月，他的投資人失去了耐心，不再投注資金，唐傑開始操心起租金與薪水。

最後，在網站被封的第5個月，也就是2012年9月，他被獲准重返網路——正好讓他來得及趕上，幫助政府捍衛稱為東海“神聖領土”的5個小島、三個暗礁——中文裡稱為釣魚島的主權。島上住的只有錢鼠及信天翁，無人居住，日本控制了這些地方

但中國堅稱自己才是釣魚島的合法擁有國。數十年來，該爭議本已沉寂，但據說島嶼底下蘊藏有珍貴的石油、天然氣，慢慢地，局勢演進成具體衝突。

當年9月，擁有那幾個島的日本某家族，把其所有權賣給政府，此舉引發了中國多個城市的抗議，有些地方甚至失控。在西安，群眾甚至包圍住有日本遊客的飯店，最後必須由防暴警察驅退。在該市區其他地方，一名叫李建利的中國人，因為開的是日本車而遭到攻擊：他被人從這輛本田車的後方扯離駕駛座，並被自行車鎖暴打，導致半身癱瘓。在北京，有些店主在櫥窗貼出告示抗議日本人，其中有家餐廳用英文寫道：“本店不接待日本人、菲律賓人、越南人及狗。”

在這種氛圍中，要質疑愛國主義者的大義，非常危險。經濟學家茅於軾已達84歲高齡，他質問政府說，何以花納稅人的錢去保護這個彈丸之地，“既無GDP又無任何稅收”，結果他在深夜受到電話轟炸，起鬨者說他是“賣國賊”；有個左派網站製作“西奴”

——即西方人的奴隸——的肖像，陳列了一串學者及記者，包括胡舒立總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小玻]等人，每幅像都繪有絞刑索，圖說寫道：“中國平安，西奴平安；中國有難，上門清算。”

另一場遊行示威計劃在駐京的日本大使館外舉行。我看到，這一次，中國警方已經準備就緒。穿迷彩軍服的民兵部隊

及穿藍色制服的警員，人數遠比示威者來得多。而日本大使館的建築，也反映出它與中國關係之嚴峻，似乎設計這個大使館時，已經料想到要挨石頭：這座6層樓的堡壘式建築，遠離大路，且窗子都有鐵柵欄掩護。

然而，相形前幾天的暴動，這次示威更像是遊行。警方允許示威者向大使館丟礦泉水瓶及垃圾，再催促他們往前走。我隨著情緒高漲的示威者一路而行，不禁想到，中國政府要費力提醒示威者，自己與他們同路同心，這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我聽見擴音器傳出一名女性的聲音，但很久我才了解到，聲音的來源不是示威者，也不是日本人，而是警方呼籲群眾要支持他們：

“我們的感情與各位相同，政府的立場很清楚，絕不容許我國主權受到侵犯。我們應該支持政府，以合法、有序、理性的方式表達愛國情操。我們應遵守法規，不採取極端行為或擾亂社會秩序。請與我們合作，聽從警方指揮。”

仔細觀察街上的這些男女示威者，與其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是意識形態，不如說它是經濟勃興時代另一種找尋意義的方式。我的朋友路寒（音）是作家兼翻譯家，對反日示威興趣索然，但她卻感受得出其他人何以受到吸引，她對我說：“我們成長於中國，很少有機會去表達那樣的感受——精神昂揚地致力於一件更大的事，而非個人事務，它是比你日常生活圈還重要的東西。”以此看來，民族主義是一種宗教，人們把信仰寄託在其中，一如他們對儒家、基督教或康德的道德哲學。報紙主編李大同對我說，他相信中國年輕愛國志士的怒火，源自他們“累積已久而想表達的欲望——彷彿洪水，突然衝往缺口”。洪水的流向隨心所欲，因此對中國政治領袖來說，年輕保守派人士是令人生畏的新力量。

通俗民族主義的爆發讓唐傑左右為難。他看見這股情緒公開流露，但他厭惡暴力：暴力不僅在道德上是錯的，而且還破壞生產。他急著在自己的信仰與民粹的狂怒之間，劃出界限。我去他公司拜訪，他對我說：“我這裡的年輕人，比起那些上街拿標語的，要有知識得多。”

辦公室由玻璃牆隔成許多方塊辦公區，我們一屁股坐進兩張灰撲撲的沙發。儘管他遊歷甚廣、又研讀西方思想，在黨鬧出這麼多醜聞後，他的保守主義思想並未減損。他急著把中國的政治體系定義為自成一格，而它也努力自成一格。“在北京，每天有1000萬上班族穿梭於城市，外加數萬輛卡車把食物運進來，把數量驚人的垃圾運走，所以很難想像沒有強力政府，誰

能辦得到。”他補充說：“我們必須了解自己，絕不能無視自己的特殊性。在建國60年之後，我們變成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可能是第一，這要看你怎麼衡量——而在同一時間，我們從沒殖民任何國家。”

我們聊著，他說的一些話叫我震驚。唐傑感覺到了公共輿論轉而反對他，他認為民族主義式的抗議沒有焦點，前景渺茫；他越來越相信，大多數中國人並不贊成他。他說：“一切都朝往一個方向，也就是美國方向，這是主流觀點，按理來講不該懷疑它；人們說，一切都必須更像美國，不論是經濟、法律、還是新聞——那已變成老生常談。”叫我吃驚的是：唐傑相信政府裡的很多人也是那麼想的，即使他們不說出來，“自從開放變成國策以來，大多數政府官員都支持改革，叫他們接受另一類觀點，非常困難。”有位嚴肅而年輕的男士加入我們的談話，他名叫李育強（音），最初是唐傑的助手，後來更上一層樓，長久地主持獨家網。他畢業於北京大學，念心理學及軟體開發。他說：“中國媒體的主流是自由派，已經是眾所周知了。”他點出一串他不贊成的目標：司法獨立、市場經濟、小型政府。這位年輕人以更嚴厲、更衝動的態度看待事務，“這些控制媒體的人說他們是自由派，但他們做事更像威權人物，如果觀點另類，就遭到封殺。”一瞬間，我以為他在說笑，但他沒有。崛起中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很真誠地抱怨說，他們自由表達的程度還不夠。

在中國，有件最難的事情是揣度輿論，民調雖可提供某些洞見，但有其局限性，原因是，大多數公民在談論自己的政治觀點時，不會說出坦率的答案。從遠處看，民族主義的爆發，以及偶爾伴隨的暴力，讓中國看起來到處焚燒著愛國怒火，但湊近一看卻不是這麼回事，其中的愛國激情真假難辨。黨向來自豪於它表達出中國生命的“主旋律”，但隨著這些年下來，共產黨版本的主旋律似乎越來越走調，並非用來放大輿論，而是旨在強塑人民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宛如主旋律裡的任何其他音符，出現得快，消退得也快。但它是主流觀點嗎？民族主義者可不這麼想。

唐傑的網站被關5個月，受創極重。唐找不到其他投資人。他說：“錢幾乎用光了。”拿民族主義當一生事業？他猶豫了。他開始接洽人，爭取回大學教書的可能。他太太的故鄉重慶，有家大學的哲學系有一個兼職空缺，他接受了，於是他把時間分成兩半，既在重慶教柏拉圖的《理想國》，又在北京經營網站。他說：“我們很擔心，下週我要跟一個可能資助我們的人見

面，但這項計劃不保證有收益，他會給錢？我很懷疑。”轉換身份的他已斷定，自己做生意這方面不怎麼在行，他說：“這不是我。”

夜色漸深。我們回到那間有圖書館背景的錄影室，一起拍照。儘管唐傑的觀點如此尖刻，但有時候我感受得到，他對西方某些東西還是羨慕的，他對我說：“第一次見面時，我問你美國最基本的價值是什麼，你好像說是自由。我想到，哇，這個國家有舉國信仰，而且它把公民教育得這麼好，以至於人人都相信。”無疑這是個理想化的意象，但我懂得他的意思。他繼續說：“你們美國有這個基本信仰——共同的價值，但對中國來說，這還真是個問題。在中國，信仰各不相同，自由派、傳統派、毛主義，不一而足。”我問他如何描述自己的信仰，而他用地緣政治的詞彙來作答，“幾百年來，我們變成西方中心觀點的囚徒，而把世界分割成兩大陣營：西方與東方，民主與

權威，光明與黑暗。光明的一切都屬於西方，一切黑暗都屬於東方。這種世界觀應該被推翻。”他能談到的信仰，近乎於此。他說：“這就是我的革命。”

隨著抗議持續到那年秋天，有些人開始反擊民族主義。社交媒體有數千萬粉絲的自由派作家李承鵬寫道，他本來是“標準的愛國志士”，直到汶川大地震發生為止。李寫道：“愛國主義……不是一邊號召不讓強盜欺負我們的母親，一邊在大地震裡讓很多喪子的母親被欺侮的主義……愛國主義是……多吐槽些醒世真言。”有位南京作家寫了一篇很流行的文章指出，中國正在東海保衛神聖領土，同一時間，農民工卻無法讓子女進入城市的學校就讀。文中寫道：“假如中國學童甚至無法進中國學校讀書，再多領土有什麼用？”有些笑話包圍住“五毛”——那些總能找到方法來捍衛黨的人。若是一個五毛聽到有人說，“這個蛋嘗起來真爛。”他會回答說：“你怎麼不試著去生蛋，瞧瞧它滋味如何？”

這是一個想成為真正的信仰者分外困難的時代。同年6月，叛逃者林毅夫結束了他的世界銀行任期，返回北京。他對任內的成就非常自豪，他促使世銀多學習中國經驗，多強調基礎建設及工業政策。送別時，大家向他致敬，只是私底下，他與世銀分手時，彼此都覺得五味雜陳，他以局外人的姿態到任，離職時還是個局外人。但他在世銀內部碰到批評人士，質疑他信仰的政府能最好的投資決定時，他避而不談。他與招募他的世銀總裁佐立克並無加成作用。林愛掛在嘴邊的是：他不僅是第一位出身在發展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還是頭一個“能好好了

解發展中國家”的學者。

出國那些年，林只是更多地宣揚中國經濟手法的福音，可等他返回北京，那個觀點已經令他跟不上許多同行。中國有許多成就沒錯，但其人均所得依然只在土庫曼與納米比亞之間。中國讓一個原本貧窮的鄉土國家成功工業化沒錯，但那麼做還能撐多久，經濟學家們見解分歧。曾預言安然公司（Enron）破產的避險基金經理人查諾斯

（JamesChanos）主張說，中國經濟仰賴的大泡沫“1000倍於杜拜”。在201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近7成來自基礎建設及房地產，在現代國家中，沒有其他大國曾瀕臨那個水平。即使在1980年代經濟繁榮到頂點的日本，也只抵達那個水平的一半。在一窩蜂投資熱當中，由省級、地方當局控制的公司所獲得的新貸款，比例之大，實在離譜。2006年到2010年間，中國地方當局撥出超過8000萬平方英里的鄉村土地來開發，整個面積相當於紐澤西州。城市化是中國經濟成功重要的一環，但伴同的是高昂的代價，包括汙染、攘奪珍貴土地而引發的憤怒。2011年，地方政府債務飆升到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5。中央政府不准他們發行自有公債，所以地方政府只能從農民手中低價買地，再轉售出去來籌錢，而這正是中國許多民怨的來源。

林毅夫前學生之一、名叫姚洋的教授在北京發表他關於中國未來的政經見解，與其恩師大相徑庭。姚指出，裙帶資本主義興起，貧富差距拉大，都證明中國的經濟模式，如果再不允許更大的政治開放“以平衡不同社會團體的需求”，那麼已經走到一切可能性的極限。他舉網路及工會管制，還有工作條件不安全為例，“中國公民面對這些侵犯，不會默不作聲，而且他們的不滿將導致週期性抵抗，”他警告說，“再不久，某種明確的政治轉型，允許尋常公民參與政治過程，是有其必要的。”這篇文章流傳很快，它似乎捕捉到中國知識分子因惑於政府不肯分權，讓改革陷入停滯而累積的挫折感。

金融海嘯後幾年，大多數經濟學家最後都相信，隨著中國勞動大軍老化，其成長將減緩。有多快？影響多廣？取決於中國政府怎麼做，它能不能控制貪腐、維繫大眾支持、解決汙染、縮小貧富差距、釋放人民另一波潛能。到2012年，減緩的跡象很明顯，許

多經濟學家預測會硬著陸，但林毅夫堅持說中國有潛力“保8”直到2030年，這個姿態讓他變成外交部的甜心，替他安排媒體發布會，駁斥較悲觀的預測。有位專欄作家替林毅夫取名為“林增長”，還譴責他是在“放衛星”——絲毫不客氣地提到毛澤

東的助手林彪，在大躍進時代把浮誇的假收穫量，比擬成蘇俄成功發射“史普尼克”號人造衛星。有個經濟學網站設立專頁：“林毅夫3.0能返回地球？”《南華早報》寫道：“你不必是顯赫的國際經濟學家，也能看見他論證裡的破洞。”

我到北京大學採訪林毅夫。在校園偏僻角落的一處傳統瓦頂四合院，建築已修復，他的辦公室設在其中，寬敞而漂亮。自從華府回來，他喜歡坐在書桌前，在那裡他最快樂。話雖如此，看到他身處辦公室裡，我感到他似乎很孤獨。我提到外人批評他如此堅定地信仰當前的體制時，他笑了，承認它那麼樂觀，以致讓他變成箭靶。他說：“中國做得很好，但收入分配變成難題，貪腐也一樣。而且，收入分配與貪腐有關，感覺上讓貪腐更為嚴重。因為有那些經驗，人們往往更負面地看待它，他們很失望。”

林以林正誼上尉的身份登上大陸海岸30多年來——被懷疑為間諜、“來歷不明”的人——他如此徹底獻身給新主人，沒有什麼能讓他的信念偏移或動搖。他一直把國家的成功，描述為其決心所致，而這與他的人生道路沒有兩樣，他寫道：“成敗不該是宿命的東西。”他最愛的文章裡，有一行是經濟學家簡諾貝爾獎得住劉易斯（ArthurLewis）寫的，劉易斯認為，所有的“國家都有機會，只要它們能鼓起勇氣及意志力好好把握”。可此時，他的觀點與周遭的情緒發生衝突，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霍德明寫道，林毅夫的觀點“在中國沒有市場”。

在華府看到林毅夫，還有他返回北京，我感覺上他始終是局外人。他從華盛頓回中國時，北京政府正式質問台灣，最終是否允許林毅夫回到故鄉，顯示兩岸關係的改善。但台灣方面拒絕。假如林踏上台灣土地，他會因叛國罪而面臨軍事審判。他的妻子當時說：“我必須一直安慰丈夫，跟他講再等等，或許等我們百年後，才可以回到家鄉。”

林毅夫的反應則是更投入工作。他3年內出版3本書，而我最後一次看到他時，他給我第4本書的校對大樣。我讀了，而且我喜歡和他交談。只是，林毅夫的另一面仍是我無法了解的。多年以前，我曾因他暢談叛逃的經歷，受到吸引。我曾把它想像成理想主義的行動。但這些年來，我終於看到他在抉擇時務實的一面。總之，他是個相信僅憑實力就可以達成野心的男子，而且為了如此，他什麼都願意做。而且我了解那相當合適。這正是中國經濟大繁榮的動能所提煉出的最堅硬的真理：一名男子，孤身一人，他決定只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實現他的未來。接下來沒多久，我遇見另一名男子，他相信自己

唯有離開中國，才能實現他的未來。

Chapter24突圍而出

那個時刻是因[晨光成]的選擇而降臨的。這位盲人律師被軟禁在家15個月後，即我第一次想去採訪他的7年之後，他下定決心要走。2012年4月20日，他躺在床上已有幾個星期，希望藉此誤導看守人員，讓他們以為他在生病，或者已對現實投降。此時，他與妻子[袁煒靜]已知道看守人的作息，還有監控他們的攝影機的角度。早晨慢慢過去，來到令人昏昏欲睡的晌午，[晨光成]開始爬起來。

他從自家後門爬出去，爬過院子，來到石牆腳邊，攀沿而上。行動是如此匆忙紊亂，以至於他翻到牆外時，右腳摔斷了。他拖著身體來到鄰居的豬圈，藏在裡面，等候白天過去。等到夜色籠罩四野，他再次開始行動，摸索著往村邊一條叫做蒙水的河畔走去。那條路自小時候便鐫刻在他的記憶裡。他蹣跚而行，不時跌倒，每聽到什麼響動就匍匐在地。他知道有個河灣，小時候他曾與哥哥們一起游過，那個地點水很淺。到夜最深時，他涉水而過。

抵達河的對岸時，[晨光成]身上發冷，裹滿泥巴，但他已離開東師古村。天色破曉，一名村民看見他，帶他到以前的客戶、一位叫劉遠誠（音）的農民家中。他把[晨光成]拉進房裡，再通知陳的哥哥。消息開始在同情[晨光成]的人當中傳開。參與線上墨鏡活動的英語老師何培蓉，從一封加密的電子郵件中得知陳逃離成功，內容為：“鳥兒已出籠”。當地警方得知[晨光成]的失蹤，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因此何老師與其他人開兩部車，出發前往山東接他，載他到北京。

這趟車程花了20個小時，他到了北京後，只能暫時地、偷偷地在各戶人家之間移動。這樣不是辦法。保護[晨光成]的民權人士向美國大使館求救。美國外交官權衡這件事——這樣合法嗎？聰明嗎？他們的結論是[晨光成]腳斷了，可以理直氣壯地用人道理由庇護他。但把他弄進大使館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們安排在北京市邊緣見面，一輛大使館的汽車與搭乘[晨光成]換地方的汽車會合。他們發現兩台車後都有中國公安跟蹤。他們取消會面地點，突然轉入巷道。大使館車輛靠近，然後打開車門。誠如一位使館人員後來對我描述，美國人是“抓著領子”把[晨光成]拉進車內的，然後往大使館方向疾馳而去。

等他們回到城裡，一位大使館醫生開始治療[晨光成]的腿傷，外交官們則料理接下來與中國政府的對峙。19⑧⑨年，一

位中國異議人士名叫方勵之，與妻子在館內避難，他倆在一個暗無天日的房間裡待了13個月，直到談判人員斡旋出方案，把他們弄去美國。（史上留館最長的客人，是匈牙利紅衣主教約瑟夫·閔真諦（JozsefMindszenty），因反抗蘇聯共產極權，他在1956年進入駐布達佩斯美國大使館，待了15年。）事情更棘手的是：再過幾天，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就要來北京，舉行戰略及經濟談判，中美雙方都極力避免她的行程與這樁外交危機相撞。

中美談判人員在外交部會面，磋商解決方案。一開始雙方立場南轅北轍：美國人建議，[晨光成]可以到上海求學，紐約大學正打算在當地開設法學院。中方則表示，他應該以叛國罪被捕。3天談判之後，雙方的折中方案是建議[晨光成]到天津讀書。他同意了，坐車前往北京朝陽醫院，與家人團聚。但當天晚上，[晨光成]夫婦及子女發現，他們已經沒有美國人的陪護，而滯留在醫院。[晨光成]對離開美國大使館非常後悔，他打電話給在美國的朋友求救。這麼些年來，[晨光成]反強迫墮胎的活動，已吸引宗教保守派的人士的支持，其中有位華裔美國人[傅西丘]，他領導一個叫對華援助協會的基督教促進團體。傅對美國政治很了解，他很敏銳地敲響警鐘：“美國政府已拋棄[晨光成]。”而當時正在競選總統的羅姆尼（MittRomney）則宣稱，當天是他對手歐巴馬總統的“羞愧日”。接下來[傅西丘]組織了一個值得紀念的場面：在國會山莊的聽證會上，他拿著自己的iPhone手機湊近麥克風，讓全世界聽見[晨光成]在北京求救的聲音。陳說：“我擔心家人的性命，”請求美國給予庇護，“我有10年未曾休息了。”

新的協議匆匆敲定：[晨光成]以紐約大學訪問學者的身份去紐約市。當協議公布時，“人權觀察”組織的中國專家林偉（NicholasBecquelin）不禁嘖嘖稱奇：“一個人，竟能讓中國政府彎腰。”5月19日，[晨光成]還拄著拐杖，登上飛往紐華克機場的班機，他的妻子、兩名年紀10歲及6歲的小孩陪在身邊。飛機到達後，有一群人接機，包括[晨光成]的老朋友孔傑榮。他們駕車前往紐約大學，有另外一群人在那裡等著。[晨光成]走向麥可風，感謝中國官員“以冷靜克制處理情況”。在中國，中宣部禁止報導[晨光成]赴美，同時把網路黑名單擴大，禁掉了人們可能用來討論[晨光成]狀況的詞彙：盲人/《肖申克的救贖》（TheShawshankRedemption）/光明＋真相/

墨鏡哥

大約6個月後，一個和煦的紐約早晨，我穿過華盛頓廣場，

往南走麥道格街。來到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晨光成]在他研究室門口等我。首次在這麼接近我故鄉的地方見到他，感覺怪怪的。他的研究室很整潔，灰白空間，空調的聲音在背景處朦朧地鳴叫。他穿著短袖直排扣襯衫，墨鏡框小而橢圓。研究室內牆壁光禿，書架上大致空蕩，只有幾株盆栽，還有一個“我愛紐約”的咖啡馬克杯。

抵達紐約以來，[晨光成]的時間大致用在發表演講，寫回憶錄，適應東師古村與格林威治村的不同。他早年很多印象來自嗅覺：河流散發自然味道、汙染發出強烈臭味。他最愛的地方是紐約的植物園，那裡對鼻子來說堪稱盛宴。也有些事情頗讓他驚奇：跟北京地鐵不同的，紐約地鐵站沒有空調。他曾前往華府，拜訪眾議院議長貝納，貝納的話雖然不多，但他辦公室裡皮沙發的舒適程度，確是[晨光成]坐過之最。

他跟我講，當時他最擔憂的，是自己留在中國的親戚。警方發現[晨光成]失蹤後，便去找他哥哥陳光福，揍他一頓並套索在他頭上，帶去盤問。此過程中，陳光福的兒子陳克貴用菜刀割傷一名警員；他宣稱是自衛，但還是被判刑3年以上。[晨光成]在自己的辦公室說，“任何人的權益若受到侵犯，或者遇見不公不義，都會保衛自己。那種狀況下，人們要脫身，不奮戰是不可能的。”

多年來，我一直想知道[晨光成]的司法、民權理念是怎麼形成的，於是我問他，眼盲與他的維權之間有無關係，他說：“你經歷過的不公越多，就越是渴望公平，越是要求正義。”但我感受得出，他對這個問題感到厭倦。大家都認為他肉體有缺陷，便注定他擁有堅定信念；我了解自己的這一假設，而忽略掉[晨光成]自己的好奇心。他說：“我小時候，有問題無法解答，會一再去問年紀較大的人，也就搜集到不同的解釋。接下來我再思考，哪個似乎更接近正確答案。”

他回憶說，自己小時候坐上卡車，摸遍機器的每一個部位。他的好奇心超越了實物界。有一次他與母親坐火車，車上服務員沒收一位乘客的丙烷罐子，理由是丙烷可燃。“我問道：‘他們賣掉丙烷後，會把錢還給那個人嗎？’我母親沒回答，默不做聲一陣子，突然生氣起來說：‘說實話，你怎麼會認為他們會把錢還給那個人？’可是我想，他們怎能隨便拿走別人的財物轉售給別人？”

[晨光成]說，自己心中還感受得到希望，乃是受他父親的影響。“他認為對仁慈、公正的追求是人的本能，你必須勇敢把它說出來。”我問他是否相信，共產黨最後能從內部改革成功。他

說，“那倒很難想像，共產黨依然相信槍桿子裡出政權，而且它通常可用武力武來控制局勢。”黨經常把[晨光成]等異議人士形容為反常，但[晨光成]自己不這麼想。“2500年前，孔子就說人可以殊途同歸，看看[愛未未]的背景與我差異有多大，他出身世家，而我家貧困，但我們追求正義卻是相同的。”他打個比方，“這就好比水面，沒人打擾時，水面平靜，可你丟個小石頭進去，漣漪會擴散向四方，有時還會相交。”

我們交談時，[晨光成]用輔助工具上網——一部黑色機器，大小有如鍵盤，在他指尖下造出有形的朗讀，而非螢幕顯示。只是，當我問[晨光成]，網路在中國發生變化，是否會扮演重要角色時，他嘆息了。他把科技形容為旁枝末節，說：“倒不是中國每個人都仰賴網際網路，還有很多其他途徑，在中國，我們說，‘言語快過疾風，一傳十，十傳百。’”

[晨光成]不是很隨和的採訪對象。他發現我的問題空洞或激不起他興趣時，我可以感受到他的不耐煩，也發現自己中文講得更蹩腳。我越想理順自己的措辭語句，他越是轉向其電腦。我請他的助理幫我轉述，但過1小時左右，我察覺到我們的訪談已到盡頭。我向他道謝，他客氣地送我到門口。

往回走過華盛頓廣場公園，此次採訪遇到的溝通障礙，是我始料未及的。他愛爭辯，而我感到挫敗。但我指望什麼？他身處紐約的唯一原因，來自體制上他不願接受他發現不具說服力的想法。我突然覺得，[晨光成]一生都是流亡者，即使身處他家村子：他在一個不怎麼寬容盲人的國家裡，眼鏡瞎了；他在一個推崇包容的文化裡，是固執己見的人。要不然他怎能自學法律，爬過他家院子圍牆，溜過看守他的人，動員那麼多外交官替他斡旋妥協方案？我期望太多別的，未免太蠢了。一定程度上，我會受[晨光成]吸引，與會受叛逃戰士林毅夫，或這些年當中其他很多人所吸引，道理是一樣的：他們每個人都意識到命運注定了什麼——而拒絕接受。就近一看，他們並不像崇拜者眼中的偶像，敵人想像的惡棍，他們只是中國歷史上，“拒絕纏足”的人。

[晨光成]拒不聽從他人的期望，接受我採訪並不是最後一次。我拜訪他4個月後，他涉足美國的政黨政治：他與反墮胎人士結盟，其中有對華援助協會的[傅西丘]，還有一位名叫科拉洛（MarkCorallo）的公關顧問。科拉洛是司法部長阿什克羅夫特

（JohnAshcroft）的前發言人，據其官網自述，“華府過去十年內，共和黨危機管理值得一記的事情，幾乎無役不興”。紐澤西州選出的保守派眾議員史密斯（ChristopherSmith）譴責紐

約大學試著阻擾他與[晨光成]見面，而[晨光成]責備大學為了討好中國政府，拒絕延長他的訪問學者身份。（兩項指控，紐大悉數否認。）[晨光成]公布聲明，內中寫道：“中國共產黨在美國學術圈內的影響，遠大於人們想像所及。”話雖如此，他拒絕解釋自己的指的是什麼。[晨光成]與紐約大學不歡而散，讓許多他的支持者失望，包括孔傑榮，他沉鬱地說：“身為教師，我失職。”2013年秋天，[晨光成]出任“威瑟斯龐研究所”（WitherspoonInstitute）的高級學者，該保守派研究組織反對墮胎及同性結婚。與此同時，為了努力讓自己被貼上標籤，他變成天主教大學的訪問學者，以及“蘭托斯人權與正義基金會”的顧問，該自由派組織同年稍早曾頒獎給他。

看著[晨光成]的生活移往新方向，我感覺上認為，他在中國練就的本能，已經引導他走進美國的政治地雷區；那對任何想穿梭其中的人來說，向來很困難，尤其對[晨光成]。他能存活多年，靠的是不信任各色權威，而就很多方面看來，他已在紐約的新生活應用該原則。但它讓他與一些本可以幫助他的人疏遠。[晨光成]不曉得他會在美國待多久，但睽諸歷史，流亡生活其實沒較好過。蘇聯時代，索忍尼辛蟄居佛蒙特州，對真正存在及憑空想像的敵人咆哮；昆德拉從布拉格逃到巴黎之後，他憂心自己的志業會變成“無意義，宛如鳥兒的啁啾”；中國異議人士在海外尤其吃力。在中國坐牢

18年的[魏鯨生]，1997年出獄後直接去了紐約，他抵達的時候，成為中國最知名的流亡人士，但幾年之內，他與贊助人士及人權人士形同陌路，那些人的注意力已不在他身上停留。有些人遂下結論，說[晨光成]正重演早期中國流亡人士的命運。

[晨光成]從東師古村到北京、紐約，還會走下去，這趟漫漫旅程太戲劇性，因此大家很容易說它是異數。異議人士逃離威權國家，是一直都有的事：它跟中國百姓的生活有什麼關係？只是，在他決心逃離自身處境的行動中，[晨光成]體現的，是遠大於他個人的力量。我當初抵達的中國，是奮力想把被剝削拋在身後的國家，人們直到最近還是如此飢餓，以至於一開始想都沒想過，自己除最基本的三餐溫飽、活下去以外，還能有什麼野心。但那個時候已經過了。驅動[晨光成]的既不是財富，也不是權力，而是想到他自己一生的命運、尊嚴，就這一點來說，他跟其他很多人有共通之處。

2013年3月，我接到英語老師麥可打來的電話。這麼多年來，他一直在講要來北京，現在，機會終於來了。有家小型出版公司打電話給他；一位編輯人員聽他教過一堂課，於是邀請

麥可來北京，工作是寫教科書。上次我見著他是幾個月前，他意氣消沉，但這次機會讓他高興到發抖了。他在電話中對我說：“他們找到我了。”接著坐13小時的列車，來到首都。即使對一個曾住過大城市廣州的年輕人，北京依然暗示著可望改頭換面，誠如毛澤東說過，這裡是個大熔爐，人別無選擇，只能轉型。

麥可的列車抵達後，他請我幫助校閱他寫的幾章課程。我邀他到我家。我們約在喇嘛廟地鐵站碰面，然後回到我家。他把背包放在客廳，抽出筆記型電腦。自從他前任偶像、“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出大醜以來，麥可已認定：李陽想量產說英語的人，犯了錯誤；李陽的方法感動了不少人，但不夠深。麥克說：“李陽總是對我說：‘你將來必須賺很多錢。’”但我不打算那麼做。錢不是活下去的唯一道路，只是生命的一部分而已。你必須成為重要的人。比如史蒂夫·賈伯斯。

麥克已找到新偶像。他說：“我的英雄是賈伯斯，他用iPod改變音樂產業，接下來再用iPhone4改變世界。這你能信嗎？”賈伯斯2011年去世之後，在中國變成叫人迷戀的對象。對崇拜他的中國年輕人來說，他是個不守舊規而變成億萬富翁的人物。我見過買不起iPhone手機但買得起《賈伯斯傳》中譯本的年輕人，很多人將其奉為聖經。麥可找出一個影片，那是一個蘋果電視的老廣告，“給發瘋的人、格格不入的人、惹麻煩的人、不合時宜的人……”廣告以“想想不同的”這個句子收尾。麥可屏息說道：“好美。”

麥可一如既往，總是有新點子可分享。有些很務實（他打算授權出版一本簡化、縮短的賈伯斯傳記，上頭有語音標註，協助學生們閱讀時，發音正確），但另一些則十分好笑：他正努力推廣一個他夢想出來的行銷詞彙“魅力痴狂”（charmiac），憑以描述跟他一樣的人，會痴狂到某些事物到魂不守舍的程度。我跟他講，那不是利用時間最好的方法，他聽來很失望，低聲到不行地說：“李小龍讓‘功夫’二字收錄進詞典呢。”我們翻看幾章麥可已寫好的新課程。在一章當中，他鼓勵學生們填空，寫出讓他們有動力的東西。“賈伯斯的使命在用科技改變世界，愛迪生的使命是帶光明給人間。李小龍的使命，是讓中國功夫聞名全球。而我的是使命是＿＿＿＿＿＿＿＿＿＿＿＿”。

我們校好之後，到外頭呼吸新鮮空氣，走經一張慶祝毛主席發現無私戰士雷鋒60周年的海報。上頭寫道：“扛起雷鋒的大旗，參加義務勞動”。麥可讀著，微笑起來；他遇上李陽“瘋狂英

語”之前，曾認為雷鋒是他兒時偶像之一。我問他，是否還認為雷鋒補襪子撿大糞的寓言，是真實無欺。他皺眉說，“我想，至少四成真吧。”我了解，在這個認定毛為“功過七三開”的國家，那種回答很明智。麥可並不堅稱雷鋒標準算有多高，我覺得挑起這個問題算很傻。他說：“若是有人真能讓我怦然心動，我就相信。”在他寫的一課當中，他把它們塞進一個段落，讓學生們復誦：

“偉大的賈伯斯有句諺語：‘我們來到世上，是要讓宇宙塌陷。’他讓我了解，我們生命中最有力、珍貴的東西是靈魂，而靈魂是最後落腳於信仰。天下真的再沒有別的，能比信仰更影響我們！縱觀人類歷史——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藝術或宗教——都始於信仰。它就好比耶穌、孔子、賈伯斯、李小龍、毛澤東與雷鋒。為了創造更美好的世界，他們一開始便改變自己。”

他來北京幾天後，撥電話給我，說出版社的工作不怎麼順利。他說：“他們什麼都要管，他們不在乎我，只在乎賺錢。他們年紀較大，正向我施壓。”我搭計程車，到出版社去看他。地址位於科技區，離唐傑經營的網站不遠。麥可在地鐵站接我，帶領我走進招牌寫著“動物用藥管制辦公室”的建築群，教科書出版商怎麼會坐落在動物用藥管制辦公室，他茫無頭緒，只是他已習慣神神秘秘的做生意安排，因此決定不問太多。

當時是週末，人少了一半。麥可在一間借來的辦公室裡賣力工作。房間用中國傳統家具及書法作品裝潢得很好。他的電子用品四處擱著，幾天來他一直在寫英語教學，交給編輯出版，但編輯的命令讓他很受傷。我們聊天的時候，有人急速敲門，探頭進來。那人是老闆，身材矮胖、滿臉橫肉。麥可很禮貌地介紹大家認識。他離開之後，麥可扮鬼臉說：“他一直讓我抓狂，‘你今天寫了什麼？你有什麼本領，秀給我看看’。”

我們決定在老闆回來檢查他之前離開。我問麥可住哪裡，他帶我走到街上，經過一串賣吃的小攤，走進一家超市後頭的停車場。有一側是間兩層樓宿舍，麥可租了個床位，他與另外9名男子合住一間房。他的床位每月租金280元人民幣，相當於每天1.5美元。房東寫了一系列規定，告示牌寫道：“不管去哪裡，住宿者必須隨身攜帶一切值錢物品。”

我們到他房間時，麥可食指湊嘴，提醒我別做聲。當時是晌午，他的有些室友上夜班，此時正在睡覺。房間裡空氣不流通、潮濕又狹窄。房裡有五組上下鋪，地板上塞滿行李；窗戶前有根竿子晾著衣服。天花板有個洞，大小如籃球。這些宿舍

在中國城市裡大肆出現，中國大學畢業生、找工作的越積越多，盼望找到突破。擠住在一起的這些人，中文裡通稱為“蟻族”。

這個詞彙令我想到1970年代那本書《藍蟻帝王》（匈牙利學者哈爾瓦斯所著）。在當時，這個比喻還是很中性，描述中國現實而已，但一個世代之後，年輕且有野心的人自稱蟻族，是源於憎恨。若是中國再不開始把他們整合入城市，這批都市邊緣人群，數目到2030年就會達5億（整個都市人口的一半），只是政府發現，這個事實讓他們不舒服，因此在2010年12月，職司失業人口的部門推出一組美好的統計數據，宣稱前一年的大學畢業生，90%以上現已就業。這種說法讓人們狂笑，網路上充斥著來自學生們的證詞，他們說學校強迫他們自述為“已就業”，以便提高統計數據，維護學校的聲譽。

麥可與我回到正午的陽光下。看過他那叫人心生幽閉恐懼的房間後，戶外感覺起來涼爽寬廣。他一直要我去看看他的宿舍，可此時似乎有自知之明了。我們走開時，他說：“那裡我受不了。”居住條件讓他尷尬。“隔壁間，有10個女孩住在一起，我們上同樣的洗手間、同一個廁所。我討厭這樣。”問題不在不舒服，他說：“那樣子是在浪費我的生命，我無法跟這些人住在一起。”他有幾個室友失業，流連在房間裡睡覺、吃東西、打電玩。他說：“這樣會摧毀我的精神，打擊我對生活及事業的熱情。”

我們走著，他似乎突然領悟到，目前他的生活在他人眼中看來是何模樣，於是他問道：“英文裡形容像這樣的人，是哪個詞？”

“像誰？”我問說。“像我。”他說。我想了好一陣子，在我還沒能回答之前，他自己便有了想法，他說：“社會底層？”“不對，”我說：“英文裡，對此真沒有好的字眼。”

我們往前走。他說：“我英文遇到困難時，總是先找網路。若還找不到答案，我就請教你。”我覺得虧欠他一個答案。他過得比那些住鄉下的人好多了，但他還卡在成功的邊緣。我最後說：“我想，我們會把你稱為‘有志氣的中產階級’。”麥可請我把詞彙寫在一張紙上，他把紙放進他口袋。

我們駐足在一家低檔房產中介店鋪門口，櫥窗貼了許多廣告。我端詳著報價，看看是否有任何能讓他脫離蟻族的出租報價。但最便宜的是一間120平方英尺、租金每月300美元，比麥可一個月掙到的錢還要多。

到最後，麥可還是以失敗告終。他不信任出版公司那些人，他說：“他們只想拿走我的成果，把他們的名字印在上面。”他決定回南方，繼續寫他的書。他離去之前，我帶他去吃午餐，部分算是餞別——我要搬走了，可我也想鼓勵他，把眼光定在較具體的目標上。跟他父母住在清遠市空蕩的公寓，我想也不符合他的性格，於是我希望他能考慮再應聘別的工作。他從一個志向轉移到另一個，漂來漂去，而且他決定靠自己而成功，這可能只加深他的孤離而已。

他說：“你不必替我操心，我是堅強的人。”他讓我想到斯坦貝克（JohnSteinbeck）筆下的一隻海龜——在公路上寸步移動，“勇往直前”，但海龜被卡車撞癱了，它靜靜躺著，接下來才調整自己，舉步向前，“在塵土上劃下一道波浪狀的淺痕。”我們交談著，麥可似乎經常風裂於兩種狀態：既自認為可以成功，又擔心前途多艱，搖擺於自誇與自憐之間。有一度，他說：“我恨英語行業”，詛咒那些他認為想拿走他的點子，但不把功勞給他的人。下一個瞬間，他說：“我想教英語，一如信教，我的事業有規劃：5年、10年。”接下來他的自信又消退了。他說：“中國人真骯髒，至少四成如此。”

但事實是，他沒多少時間可以斟酌思考了，他也感到時不我予。麥可28歲了，他說：“在中國，三十而立。”那是個莊嚴的期限。他思索了一下，接著又容光煥發起來，說：“或許明天你走進書店，會看見我的書擺在架子上呢，你信嗎？”我說我信。不知怎地，我相信。

當時是週末，我們在餐桌逗留沒走，客人們漸漸散去。麥可挑起話題，談他父親在煤礦工作的往事。那種謀生方式向來極其危險。有一次，在麥可生長的五號礦，一起事故就能讓49名礦工喪生。該事件並非很不尋常，儘管近來有所改善，中國依然每星期平均有60名煤礦工死於礦災。麥可談到他父親，“他一天工作至少14小時，每天早晨5點起床，對我母親跟我不發一語。那時我不知道原因。”只有到後來，麥可才多少了解他父親遭逢的壓力。他說：“他得支撐讓四個孩子去上學，從不抱怨。”

然而，他父親生命有一部分，是麥可永遠無法了解的。“他很多朋友喪生了，但他們的姓名，你在書裡找不到。”幾十年來，死於中國礦場、工作場所、工廠裡的人的詳細描述——中國崛起的犧牲者——被列為機密。政府公布的統計數據很廣，但工傷死亡的細節、方式，依然是不對外公開。麥可說：“政府只講一號礦或二號礦，就這樣。”想到他爸爸的同事死得默默無聞，距離麥可看待自己及世界的領域是如此遙遠，以至於他發

現它消化不進來。他花那麼多時間幻想著取得認同——出版自己的作品、群眾熱愛、名聲響亮，想到此刻卻默默無聞，令他十分困惑。他對不能掛名極其排斥，其方式讓我想到[愛未未]在尋找死於震災兒童的名字。麥可對政治一絲興趣也沒有，但對他來說，名字有關尊嚴，而且跟政治全然無關。

翌日早晨，麥可搭上回鄉的列車。要回到清遠耗時13個鐘頭。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升級，去搭飛機，只是那天還沒到。目前，他背負著雙重壓力：界定今日他的過往，還有他奮力想創造的未來。傳統世界期待著包容，而現代則施壓叫他自立自主，令他左右為難。一如過往，他把這種處境寫成一個段落，讓學生們背誦，而我聽來，那個段落宛如佛經、天主教聖母經等經咒。但這段祈禱文，只供他們自己：“我將完全接受自己生而有之的一切，而我會竭盡全力來改變世界。”

（完）